

中州大学学报

ZHONGZHOU DAXUE XUEBAO

双月刊

《中州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白仲虎

副 主 任 张建伟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莉 万陆洋 王 代 王宇飞 王 菲 王焕锋

叶大萌 白仲虎 冯 美 吕志元 任 珂 刘 戈

刘海燕 刘秋菊 杨庆年 李玉玲 吴 炯 张 军

张枝梅 张建伟 陈凤菊 姜冬梅 姚 虹 徐自立

徐传波 郭 凯 曹发军 焦红波 谭笑风

主 编 张建伟

执行主编 曹发军

副 主 编 李玉玲 刘海燕

封面题字 陈 云

执行编辑 林 川

中州大学学报

双月刊

第 43 卷 第 4 期

2026 年第 4 期(总第 189 期)

目 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行而无归

——论鲍照的空间书写与“无所归”诗学 刘 杨(1)

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灵魂书写

——以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为例 董晓可(6)

· 经济与管理 ·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于 洋,张忠杰(11)

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路径 解 浩(20)

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现状、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 郑素苹(28)

· 政治与法律 ·

多元一体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生成逻辑与协同路径 王 迪(35)

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职能的规范构造

——以上市公司为例 杨国平,李茂源(41)

· 社会与历史 ·

先秦时期的追赶意识:思想源流、伦理转化与实践维度 陈智勇(47)

历史地理视阈下“岳飞《满江红》”作者考辨 吴 娜(53)

李泽厚“三大思想史论”的思想史主题 韩博韬(59)

2026 年 8 月 20 日出版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	李安萱,何云峰(64)
新中国建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价值与当代镜鉴	孙娜,杨晋娟(70)

· 传媒与艺术 ·

社会化阅读痕迹的知识生产逻辑及出版价值转化	
——以微信读书平台为例	张鑫彤,李洁(77)
解构与重塑:网络热梗视角下的青年网络思潮辨识及“六力并举”引领策略研究	张书悦(83)

· 教育与教学 ·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什么	
——课程教学目标的深层解析	李优坤(89)
从封闭到开放:应用型本科高校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转型研究	
——以四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例	胡钰(96)
以赛促改框架下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模式转型的实践路径	熊锡成,李敏(104)
双融驱动下食品化学智慧课程构建与实施路径探索	宋彦显,王丽敏,杨红艳,张小梅,刘从军(111)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聚乳酸增韧及其性能研究	张玲丽,贾晨辉,常英杰,刘志豪,黄星雨(117)
基于 STM32 控制的多能源管理系统设计	刘帅,潘靖博,雷钢,黄传金,王亚龙(122)

JOURNAL OF ZHONGZHOU UNIVERSITY

Bimonthly Vol. 43 No. 4 2026 (Serial No. 189)

MAIN CONTENTS

Wandering Without Return——On Bao Zhao’s Spatial Writing and the Poetics of Rootlessness LIU Yang(1)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 YU Yang, ZHANG Zhongjie(11)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Synergistic Pathways WANG Di(35)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the Audit Committee: A Case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YANG Guoping, LI Maoyuan(41)

A Study on the Authorship of "Yue Fei’s *Man Jiang H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 WU Na(53)

The Intellectual-Historical Themes in Li Zehou’s "Three Treatise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 HAN Botao(59)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Logic and Publishing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ading Traces:
A Case Study of WeChat Reading Platform ZHANG Xintong, LI Jie(77)

What Should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Teach: A Deep Analysis of Its
Teaching Objectives LI Youkun(89)

From Closure to Openness: A Study on the Hub-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Based on Four Case Universities HU Yu(96)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oughened PLA
..... ZHANG Lingli, JIA Chenhui, CHANG Yingjie, LIU Zhihao, HUANG Xingyu(117)

行而无归

——论鲍照的空间书写与“无所归”诗学

刘 杨

(莽原与南腔北调杂志社,河南 郑州 450008)

摘要:鲍照的空间书写,是其寒门“无地望”这一社会处境的投影。门阀士族以郡望标识身份,地望本质上是一种空间化的象征资本,门第之“高”首先是空间之“定”;鲍照身为晚渡北人之“孤门贱生”,无郡望可恃,遂注定终身在空间中漂移。鲍照随幕府辗转而“漂泊”,其行旅是有去无归的离心之矢。以其《登大雷岸与妹书》为例,这种四方全景式铺写,正是无所归属者“以无所有而尽收眼底”的悖论之视。

关键词:鲍照;空间书写;无所归;地望;行旅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01-05

在鲍照文集中,行旅之作占了很重的分量。还都、道中、发某地、登某山,题目里满是地名与行程;而《登大雷岸与妹书》一篇,对长江中游的山川作了六朝罕见的精审铺写,东西南北层层展开,至今读来仍觉气象逼人。对这些作品,通行的读法是“羁旅行役之愁”:游子在外,触景思乡,发为悲音。这读法不能算错,却失之肤浅——它把鲍照的空间书写降格为乡愁的载体,仿佛那些山川只是用来盛放思念的器皿,本身无关宏旨;而“乡愁”一语所暗设的前提,恰是一个稳固在彼、终将归返的“乡”,这一前提,于鲍照而言其实并不成立。

为何行旅之痛在鲍照笔下如此密集、如此深沉,以致空间本身竟成了他诗里挥之不去的主角?答案不在他个人的多愁善感,而在他的社会处境。门阀时代,士族以郡望标识身份——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等,姓氏之前那个地名,正是门第的根脉所系^{[1]203}。门第,本质上是一种空间归属:个体隶属于某地,某地也因之成为个体的身份根基,这归属世代相传,稳如磐石。鲍照却出身寒门,其家又系晋宋之际南渡之北人,其时“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途”^{[2]3927}。他既无显赫的

郡望可恃,又被横亘于士庶之间的制度之墙挡在“清途”之外^{[3]119}。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顿自己,这种空间上的无所归属,注定他要在空间里漂移求存。他的空间书写,与其说是乡愁的抒发,不如说是这一处境的形式投影:别人写山水是“游观”,他写山水是“漂泊”;别人的行旅终有归处,他的行旅有去无归。本文循“地望—居行—大雷岸—无所归”四端,将鲍照的空间书写还原为一种由身份处境所规定的诗学。

需要说明的是,将空间书写读作社会处境的“形式投影”,并非要把诗歌还原为身世的注脚,更不是以“寒门”二字一笔抹杀其艺术的独立性。恰恰相反,本文所关心的是处境如何经由想象而沉淀为形式:社会结构层面的“无所归”,怎样转化为篇章中的方位、视角与节奏,怎样在山川的铺排里获得审美的形体。诗之为诗,正在于它从来不是处境的直陈,而是处境的结晶:同样的寒微,未必都凝成这般精审而沉痛的山河;唯其经过鲍照的感受与锻造,那份“无地”之痛才被赋予可以传世的样貌。本文所做的,无非是循着这结晶的纹理,回溯那使之成形的地温与压力,从而既见其诗,亦见其人,更见那个

收稿日期:2026-03-10

作者简介:刘杨(1975—),女,河南郑州人,莽原与南腔北调杂志社副编审,研究方向:中国文学,编辑出版。

使诗与诗人如此面貌的时代。

一、地望与无地望：作为门第语言的空间

门阀政治的根底，是一套以血缘与地望相绾结的身份制度^{[1]127}。所谓郡望，即一个家族世代著籍、声望所钟的郡县：陈郡之于谢氏，琅琊之于王氏，清河之于崔氏，皆然。地名冠于姓氏之前，并非籍贯的客观登记，而是身份的庄严宣告——它昭示这个家族在特定地域盘踞既久、根深叶茂，田产、坟墓、宗祠、宾客故吏皆系于此地。此处须辨者三：籍贯、郡望、地望，名近而实异。籍贯仅记录个体的出生地，属于中性的地理事实；郡望则标识着一个家族对某地世代的占有与象征性的统治，是凝固在地名里的门第声价；而地望之“望”，则叠加了舆论与品评的维度，是家族的空间占有经由清议、谱牒、婚宦等制度反复确认、持续增值的产物。寒人未必没有籍贯，却断然无“郡望”，更谈不上“地望”。这一字之差，正是士庶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由是观之，地望实为一种空间化的象征资本：它将抽象的门第尊卑，锚定在一处具体而世代不移的土地之上，使“高贵”获得可予指认的地理坐标。门第之“高”，于是首先表现为一种空间之“定”：拥有世代不移的居处，人因地而贵，地因人而重；血缘的延续、田业的承袭、坟墓的守护、谱牒的编次，无不依托这一空间的恒定而得以运转。空间在此并非单纯背景，而是身份借以生成、延续与自我确证的根本场域。一个士族子弟，纵使浪迹千里，其身份之根仍深扎于那片以郡望标记的土地上，行得再远，身上仍携带着“某郡某氏”的坐标；这一坐标无形而坚固，是他无论身在何处都不会失落的精神原乡。

鲍照的处境，恰是这一切的反面。他出身孤寒，曾自陈身世为“北州衰沦”之“孤门贱生”^{[4]804}，无门第可称，无郡望可恃。这意味着，在那张以地望编织而成的身份地图上，他并无属于自身的坐标：没有一方土地归属于他，他亦不归属于任何地方。门第赋予士族的那种空间之“定”，于他而言是彻底的阙如。而当时的身份制度又决定了寒士进身的主要途径：背井离乡，奔走于权门幕府之间，以才力换取微禄。于是，士族因拥有地望得以安居，寒士因无地望而须远行——空间层面的“定”与“动”，正是门第之有无在地理维度上最直白的转译。他在《拟行路难》其四里塑造的这一意象，几乎可作此种处境的谶语：“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4]668}水之所往，非由水自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它跌落的地势；人之所向，亦不由己，而是由出身所派定的身份地位所支配。寒士如四散之水，被命运抛掷于东西南北，无

从自主，亦无所归束。

尤可深味者，鲍照所处的元嘉之世，恰是寒人得藉皇权与才力稍稍进身的时代：他以献诗起家，历官中书舍人、秣陵令诸职，所任已非士族所不屑的浊流末秩。然而，仕宦的升迁并不能为他获得地望——职位是可以授予的，门第却是无从追认的。他纵然官至清要，在那张以郡望划界的身份地图上，依旧是一个没有坐标的人。这正是寒士最深的吊诡：他可在功能层面进入权力中心，却永远被挡在空间一身份的秩序之外。升迁愈高，那种“有其位而无其地”的悬浮感愈发刺目；于是仕途上的每一次迁转，非但不是获得归属，反而是又一次被抛入陌生空间的远行。

鲍照一生的行迹，正是这一意象的展开：早岁谒临川王刘义庆而起家于江州，其后随始兴王、临海王诸府辗转于荆楚、吴兴之间，所画出的恰是一幅寒士求宦的漂泊之图。他诗中那些密集的地名与行程，不是文人雅游的纪念，而是一个无处可归者被迫移动的轨迹。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照的空间书写与他的社会位置“互为表里”：他之所以反复注目于行程、方位与山川，根本上是因为他在社会的空间秩序里没有位置。无地望，故无定所；无定所，故终岁在途；终岁在途，故满纸江山。空间于他，从来不是可供占有、可供游赏的对象，而是一种必须穿越、却无从扎根的境遇。这一处境落实到笔墨之中，便分化出“居”与“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山水。

二、居与行：谢灵运的“忘归”与鲍照的“不得还”

要看清鲍照空间书写的特异性，最好的参照是谢灵运。二人同列“元嘉三大家”，年辈相近，门第却判若霄壤：谢灵运是陈郡谢氏的贵公子，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坐拥会稽始宁的庄园别业。这一身份，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山水是“居”的山水。

谢灵运作《山居赋》，洋洋千言，夸示其始宁墅之广袤丰饶，山林、川泽、田畴，乃至园中竹树果木，皆其所有；这不是一篇游记，而是一份以辞赋写成的产业清单与领地宣言。他笔下的山水，是从自家门户出发、可游可赏、游罢可归的山水。《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题中已著一“还”字，写的正是一次有出有归的游赏：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5]1438}。

最堪玩味的是“憺忘归”三字——他并非不能归，而是景色太美，乐而忘返；“忘归”的前提，恰是本有归处。游子憺然忘返，因为身后那座庄园稳稳地候着他，归途从不成为问题。谢灵运笔下的山水，是一个有恒产、有定所者的从容游观：他立于天地之间而身有所托，故能以主人闲赏的目光，细细领略眼

前的清晖。山水于他,是可以占有、可以反复出入的园林之延伸;他那游观的目光里,天然就含着一份所有者的笃定。

鲍照笔下的山水,则全然是“行”的山水。他没有庄园别业,没有可供出发与回归的门户;他的山水,是赴任舟车之上、羁旅途次之中,匆匆掠过眼帘的山水。《代东门行》开篇,“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4]146},一个“倦客”的身份已定下基调;“野风吹秋木,行子心肠断”,所写非游赏之乐,而是行役之苦^{[4]146}。同是“游子”,谢灵运是“憺忘归”的游子,鲍照却是“心肠断”的行子:一者忘归,因本有归处;一者断肠,因无归可待。至《拟行路难》其十四,这无归之痛被推到极处:“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官宦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4]697}“不得还”三字,与谢灵运的“憺忘归”恰形成对峙——一边是有归而忘归的履足,一边是欲归而不得的绝望。

或谓行役之苦非鲍照所独有:西晋陆机赴洛,亦有“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6]17}之叹。然而细辨之,陆机之痛与鲍照之痛实有深浅之别。陆机出身吴郡陆氏,本是江东高门,他离乡入洛,是从一个确实属于自己的“故乡”出发的;他的悲伤,是有家者暂别家园、回望故国的悲伤,其底色仍是“我本有家”的笃定。鲍照之痛却更深一层:他所缺的,不是某一次离家的慰藉,而是身份意义上的“家”之依凭——他没有一个足以安顿身份的地望可供回望。陆机望故乡,望得见;鲍照欲望故乡,却几乎无“望”可言,因为那个能赋予他归属感的“乡”,在门第的意义上从未真正属于他。同是行旅,世族之行,行而有根;寒士之行,行而无依。

或又疑:谢灵运亦尝远宦——出为永嘉太守,徙临川内史,岂非亦在行旅之中?然而谢灵运之“行”与鲍照之“行”,貌同而实异。谢灵运纵被外放于永嘉,所持守仍是陈郡谢氏的身份之根;他在永嘉、临川所作山水,仍是以有家可归、有望可恃者的目光观照得来。外放与贬谪于他,不过是生活圆周的暂时扩大,圆心始终未动,故其山水终能写成纵情的游观,而非失所的漂泊。鲍照则自始没有那个圆心:他的每一次出行都不是从“家”出发,而只是从一处寄寓移向另一处寄寓。同样是身在道途,一者是有根者的远游,一者如无根之浮萍——这才是“居”与“行”的真正分野。

谢、鲍之别不止于“有家”“无家”之异,更在于两种空间结构的不同。谢灵运的空间是向心的、闭合的:以庄园为圆心,出游为半径,游罢归来,圆满成

环;无论行得多远,那个圆心始终为他的目光提供方向与归依,山水因此被组织成一个以“我之所居”为中心、可反复巡回的秩序。鲍照的空间则是离心的、敞开的:起点是不得不离开的家,终点则是一个并不属于他、且随时可能再被抛离的官位;他只能不断向前,把每一处风景都抛在身后。谢灵运是空间的主人,鲍照是空间的过客。也正因如此,鲍照那种“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4]673}式的郁结,才显得无处发泄、无可纾解——进既不甘屈居人下,退又无园林可归,他的不平之气,如同他的行旅一般,找不到一个可以停靠的终点。这一分野绝非个人趣味之异,而是“有地望”与“无地望”两种生存方式的必然结果。

三、《登大雷岸与妹书》:无依之地的全景

若说零散的行旅诗以片段写漂泊,《登大雷岸与妹书》则以全景写无依。这是鲍照溯江西上行抵大雷(今安徽望江一带)时,写给胞妹鲍令暉的一封信。妹亦能诗,兄长万里行役的中途,向这位留守家中的至亲铺陈一路所见的天地,这一情境本身已极可玩味。

书之开篇,先写行路之艰:“途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4]877}短短数语,立起一个离家已久、风霜满身的行客。“去亲为客”四字尤为吃紧:他的根本身份是“客”,是离了“亲”、离了家的人;后文那一片浩荡山河,正是从这样一双“客”的、漂泊的眼睛里望出去的。须知“客”之为“客”,正因其无主;他对眼前山河的观照,自始便不是主人巡行领地的目光,而是过客掠取一瞥的目光。继而是全书最惊人的一段——立于大雷岸头,向四方次第铺展的全景:

南则积山万状,争气负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寒蓬夕卷,古树云平……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4]877}

南、东、西、北,四向尽收,山岳、平原、大江、湖泽,无所不包。论者每叹其铺写之精审宏丽,为六朝写景之文所罕见。然而细思之,这“四方全景”本身就别有深意。一个有定所的人,看风景总有方向感:他从家中望出去,自有前后内外、远近主次,空间是以“我之所在”为中心被组织、被驯服的。鲍照却不然——他立足的大雷岸,既非来处,亦非归处,只不过是旅途中一个偶然的歇脚处。正因这立足之地毫无归属可言,他的目光才不偏不倚地射向四面八方:无所属,故无所偏;无定所,故收全景。换言之,这恢宏的四方之视,不是占有的从容,而是无所占有——

唯其在天地间无尺寸之土可称为“我的疆土”。士族以一郡之地望为根，鲍照却以四方之大为其漂泊的注脚——他什么地方都不属于，于是什么地方都进入他的视野。这“尽收眼底”的壮阔背后，正是“无立锥之地”的苍凉。

最能印证此意的，是书中那一段望庐山的文字：“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4]878} 全篇之中，庐山是最雄奇、最配得上“居”字意蕴的所在，鲍照却只是“望”——自江上远远望去，一番惊叹之后，舟行不停。尤可注意者，他随即把这壮丽的山岳归之于神与帝：那是“神居帝郊”，是镇控湘汉的形胜，为天神帝王所居。换言之，他笔下最堪栖居之地，恰恰是他最无从栖居之地；他以行客的身份，描摹了一座被明确标记为“非我所能居”的崇高居所。望而不能居，见而不能有——这一笔，把“行者”的无所归写到入骨。

而此书写于赴任途中、寄予留家之妹，这一情境更将“无所归”点得分明。书末叮咛妹妹“汝专自慎……勿我为念”，又云“恐欲知之，聊书所睹”^{[4]878}。这封信，几乎是他与那个回不去的家之间唯一的牵系。他把山河细细写给妹妹，某种意义上，是想让仍守在家中的亲人替他“看”一眼他正漂过的世界；他自己，却只能继续向前，把家越抛越远。山河愈是壮阔，那缕维系着家的细线便愈显纤弱。也正因如此，鲍照那为后世所盛赞的“险”“势”之笔，与其说是修辞的逞才，毋宁说是无所归之境的形式呈现：文气的不肯停驻、层层向前推宕，正与那双行客之眼同构。形式上的“势”，原是处境上的“不得不行”。

四方铺排，本是六朝骋辞之赋习见的格套；然在鲍照笔下，这一空间格套被注入了格外沉重的分量。同样以空间为题，他的《芜城赋》写广陵故城之由盛而墟，“白杨早落，塞草前衰”^{[4]23}，则是从另一面逼视空间：彼处写的是空间之“毁”，此处写的是空间之“无主”——一座再壮丽的城，也终归荒芜；一片再辽阔的山河，也终非我有。荒城与全景，看似相反，实则同源：二者都在诉说人对空间那种终究无法据守、无法占有的根本处境。若说《芜城赋》以废墟点破了空间的“不常”，《登大雷岸与妹书》则以全景点破了空间的“不属”——前者关乎时间中的兴亡，后者关乎身份中的归属，而归结处，都是一个“人终不能真正拥有一方天地”的苍凉。

四、无所归：三重困境与寒士的绝境

“无所归”，不只是“回不了家”的意思，在鲍照

这里，它是三重叠加的绝境。

其一，不得归乡。行役无已，是寒士求宦的常态。鲍照大半生随诸王幕府辗转，身不由己。《拟行路难》其十四“白首流离不得还”，表面写从军者，实则正是自况——从军者尚有解甲还乡的指望，依人作幕的寒士，其漂泊却几乎没有尽头；主君的一次迁转，便是他的一次远徙；幕府的一度兴废，便是他的一度流离。归乡之念，于是成了一个被无限延宕、终难兑现的悬想。

其二，无可归隐。这一层最易被忽略，却最见寒士之困。六朝士人于仕途失意时，尚有“归隐”一途可退：陶渊明赋《归去来兮辞》，有其园田可返；谢灵运纵情丘壑，有其庄园可栖。归隐者，必先有“可归之隐”——一片足以安身的田园林泉。这恰是寒士所没有的。归隐看似超然物外，实则是一种需以恒产为底的奢侈；无尺土寸产的鲍照，纵然厌倦了仰人鼻息的幕府生涯，也无一椽一亩可供退守。士族进可居官、退可归田，有双重的着落；寒士却是进则寄人篱下、退则无地可归，两头皆悬空。可见“归隐”之为一种潇洒的人生选项，本身就是以门第与恒产为依托；当陶、谢得以在仕与隐之间从容进退时，鲍照却被剥夺了“退”的全部凭借。所谓“无所归”，归乡不得固是其一，而连“归隐”这条退路也被门第之有无悄然堵死，才是更深的一层。鲍照诗中那种特有的、无处可逃的紧迫感，根源正在于此。

其三，归宿唯死。进既不能安于其位——官随主之荣枯而升沉，朝不保夕；退又无林泉可以托身，鲍照在这世间便真正成了一个无处安放的人。《代东武吟》写一个被弃的老兵，末云“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4]122}；如废席、如疲马，用尽而见弃。这何尝不是寒士依附权门、终遭弃置的写照？当此身在世既无定所，则唯一确定的归宿，便只剩下生命的终点。这并非危言耸听：泰始二年，临海王刘子顼起兵响应刘子勋，对抗宋明帝，兵败城破，鲍照果真死于乱军之中，客死荆州，其身身后葬处亦渺不可考。一个终身书写“无所归”的人，最后连此身的归处亦未能自主——这是命运对其笔下“无所归”母题近乎残酷的应验。

这里还须与另一种“无家”划清界限。六朝佛老之学，亦言“无所住”，亦标“逍遥”，视一切栖泊为系缚，以无家为解脱。然鲍照之“无所归”与此恰正相反：佛老之无家，是看破之后主动的舍离，是以无所归为自由；鲍照之无家，则是身份制度强加于他，是以无所归为困厄。前者是站在归宿之上而超越归宿，后者是从未拥有归宿而被弃于归宿之外。同是“无家”，一为澄明，一为创伤；混二者为一谈，便会

把鲍照那撕裂的痛楚,误读成名士的旷达。鲍照笔下从无旷达,只有不甘——那满纸山河里翻涌的,始终是一个被剥夺者求归而不得的悲愤。

由此观之,鲍照的“无所归”,远非“羁旅乡愁”四字可以涵盖。乡愁是有家者的离别之苦,其底色是“终将归去”的笃定;鲍照之痛,却是一种近乎存在意义上的无所归:在世寻不见可安之所,出世寻不见可退之地,生前漂泊无依,身后亦不知所终。空间于他,从来不是家,而是一片必须不停穿越、却永无抵达的旷野。

五、结语:无地者的山河

回到开篇之问:为何行旅之痛在鲍照笔下如此密集而深沉?至此答案已经清楚。不因他天性偏爱山水,而因那个以地望论尊卑的时代,剥夺了他任何一处可以唤作“家”的空间。无地望,故无定所;无定所,故终身在途;终身在途,故满纸山川。他写空间,是因为空间本就是他的命运;而他写得那样精审、壮阔,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因为山河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一个在人世间无立锥之地的人,反而把整个天地收进了笔底。《登大雷岸与妹书》中那一片囊括四方的全景,与其说是骋怀的游观,不如说是一个无所归者以目光对天地的怆然占有。空间书写至此,已不复是题材的选择,而成了存在境遇的直接显形。

也正因如此,鲍照在山水行旅之作中,劈出了与谢灵运迥然不同的另一路。谢氏的山水是“居者”的从容观照,鲍氏的山水是“行者”的漂泊悲歌。这一“行者诗学”,把山水从可游可居的对象,转换为不得不穿越的命运,遂为后世开出一片新境: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浪迹,杜甫漂泊西南、“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苍茫,其行旅之作里那股

有去无归的况味,与鲍照实乃一脉暗通。对于这一诗学开拓,鲍照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

钟嵘叹他“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7]282};今日重读他笔下那些回不去的山河,方更明白这“人微”二字的背后,是一个无地望者被整个时代判定的永远的“无所归”。于是,鲍照的意义便超出了他个人的身世。他第一次把“寒士的空间经验”提炼为一种诗学:不是偶然写到了漂泊,而是把漂泊本身确立为观看山河及大千世界的根本方式。在他之前,山水多是士族“居者”的园林;自他之后,山水里便始终回荡着一个“行者”的声音——那是无数无郡望、无恒产,只能以才力换取浮沉的寒士,在江山辽阔处投下的共同身影。重读鲍照那些“行而无归”的篇章,不仅是在重读一个诗人的悲剧,更是在重读一个被门第所遗弃的群体,如何以笔墨在文学世界里争得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传之千秋万世的壮美山河。

参考文献:

[1] 范兆飞. 中古士族的谱系与谱牒[M]. 祖先光, 谱.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 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下)[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
[4] 鲍照. 鲍照集校注[M]. 丁福林, 丛玲玲,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5] 张启成, 徐达, 等, 译注. 文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6] 杨明. 陆机诗全集[M]. 武汉: 崇文书局, 2022.
[7] 钟嵘. 钟嵘诗品笺证稿[M]. 王叔岷, 笺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Wandering Without Return

——On Bao Zhao's Spatial Writing and the Poetics of Rootlessness

LIU Yang

(Mangyuan Literature Press & Mixed Accent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08, China)

Abstract: Bao Zhao's spatial writing mirrors his social predicament as a commoner lacking ancestral clan prestig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powerful clans marked their status through regional ancestral reputations, which were essentially spatialized symbolic capital. High social standing first and foremost rested on a fixed spatial identity. As a man of humble, isolated northern stock who migrated south late, Bao Zhao had no ancestral lineage to rely on, condemning him to lifelong spatial wandering. He drifted from on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to another, his travels an outward-pointing arrow departing with no prospect of return. Take his *Letter to My Younger Sister Written atop Dalei Bank* as an example; his panoramic, all-encompassing depiction of all directions embodies the paradoxical vision of one adrift without abode-surveying the whole world while possessing nothing of his own.

Keywords: Bao Zhao; spatial writing; rootlessness; ancestral territorial prestige; travel poems

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乡土灵魂书写

——以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为例

董晓可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摘要:作家孙全鹏的小说系列“幸福三部曲”——《幸福的日子》《幸福的花子》《幸福的种子》,以豫东将军寺村为精神原乡,聚焦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集中呈现土地与生存、伦理与欲望、逃离与回归的主题。作品刻画具有主体性的农民形象,展现城乡变奏下“寻父”“寻己”“寻根”的精神困境,从物质富足、地域温情和乡土神性三个维度来“打捞”新乡土灵魂,彰显乡土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价值。

关键词:“幸福三部曲”;新乡土书写;城乡变奏;精神原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06-05

河南青年作家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①——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2020)、长篇小说《幸福的种子》(2023)、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2024)相继出版,展现了他不凡的创作实力。其中,《幸福的日子》入选中国作协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年卷),《幸福的种子》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第六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2024年),有论者认为,“他的乡土写作为当代中国的乡土书写增添了一抹新笔”^[1]。

“幸福三部曲”立足于豫东平原将军寺村的精神场域,聚焦土地与生存的博弈,探寻伦理与欲望的碰撞,追问逃离与回归的宿命,真实呈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将军寺村的河水哗哗流淌,恰似时代脉动之下的生命流转。作家以极尽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描摹出当下热气腾腾的新乡土时代图景,并打捞出那些带着生活温度与情感湿度的“湿漉漉”的新乡土灵魂。

一、作为精神原乡的“将军寺村”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福克纳用数十年时间专注于描写故乡那块“邮票大的地方”,最终构筑起“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系列文学王国。以此为参照,作家孙全鹏也构筑起一处作为心灵原乡的流动的“邮票版图”——豫东将军寺村。但时光推移、地

域殊异,与福克纳相比,他还面临着流动的现代性下中国乡土书写的文学难题,这使他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必须应对两个互为依存的问题:一是费孝通“乡土中国”言说体系中作为根基的乡土性本质,二是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催生的合理欲望追求及其价值评判。

作为一名80后作家,孙全鹏也有着大多数同龄人异地求学、生活的经历。因而,他笔下的将军寺村这“邮票大的地方”,虽曾是他长期生活之地,却更多是在回望中不断重构的精神原乡。同时,河南籍前辈作家深扎中原大地进行创作,如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刘震云笔下的“延津”,尤其是刘庆邦的豫东矿工题材写作,构成了他锚定精神坐标系的恒定参照。写作时,孙全鹏面对的早已不是记忆里静态的乡土图景,而是年轻人涌向城市、留守者依靠微信维系远方亲情、化肥厂废墟与养鸡场新棚交错散布于田野之间的现实图景……时代生活的变迁,催生了他独特的叙事视角。他既是熟悉将军寺河流水声与麦秸垛温度的乡村“在地者”,又是以变化了的眼光审视乡土的“观望者”。时空变迁与个体记忆的交融碰撞,让孙全鹏成为乡土的新生代守护者。他用故事拼凑起那些离散的记忆碎片,使将军寺村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容器。

任何时代,乡土书写的核心都是生于斯、长于

收稿日期:2026-02-15

作者简介:董晓可(1985—),男,河南平顶山人,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斯,或逃离乡土又归于斯的农民。自鲁迅始,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鲜活的灵魂(农民)承载着“被启蒙”的精神重负,对其主体性意识的呼唤也始终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种“唤醒”从未停歇。及至当下的新乡土书写,在乔叶《宝水》、周瑄璞《芬芳》等作品里,农民的身份变得更为复杂:他们不再单纯被视作启蒙对象,而是辗转于城乡之间、主动选择生存策略的行动者。应该说,孙全鹏在“幸福三部曲”中,敏锐捕捉到普通农民身上发生的这种主体性转变。他笔下的人物不再是丧失思考力与行动力的“被启蒙”符号,而是带着生命体温与思想觉悟,在大地上求索实践的鲜活个体。这些独特的生命个体,身上既裹挟着土地的泥泞,也沾染着城市的尘土。他们的挣扎与坚守,构成流动乡土最真实的肌理,也为现代乡土构筑起饱含温润情感的文学景观。

孙全鹏对人物主体性的刻画,依托着厚重的大地,融入了他对建构乡土现代性的思索,这在《幸福的日子》中已初显端倪。小说中,曾在越南战场立功的“爸爸”受伤回国后嗜酒,后为家庭生计戒酒并开办养鸡场。村民老锅见他赚到钱,便前来求教技术,“爸爸”答应传授技艺,却要求老锅在自家鸡场免费干一年。这一要求虽遭村民误解,“爸爸”依旧心无旁骛地给予指导。老锅学成后盖起鸡舍,与“爸爸”在销售上形成竞争。后来老锅妻子桃红遇车祸去世,老锅独自承担起养鸡和照顾孩子的双重重担,又因卖鸡被骗,陷入绝望最终自杀。“爸爸”帮忙料理后事,收养了老锅的孩子来福。“爸爸”所恪守的道德和良知底线,与老锅被欲望裹挟后的精神迷失,恰好构成商业化时代乡土社会的双重镜像:这一时代既孕育社会转型的契机,也裹挟着价值层面的震荡。以此为起点,在之后数年间完成的“幸福三部曲”里,孙全鹏立足于新的乡土现实,探寻普通众生的生存真相。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作家孙全鹏所追寻的“幸福”,绝非流于表面的廉价满足,而是对高贵人格与生命尊严的坚守。因此,他以“将军寺村”为精神原乡,在广袤的豫东大地上铺展新乡土书写的宏阔画卷,聚焦兼具情感厚度与精神温度的生命群像,勾勒出这片土地上鲜活立体的灵魂图谱。

二、城乡变奏下的根脉找寻

在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乡土社会早已不是固化的旧貌,城乡界限逐渐消解,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时代潮流。作为将军寺村的“原住民”,他们在向城市迁徙与对故土

根脉的寻找中,深陷于“念去去”的漂泊处境与“归去来”的归依渴求之间的现代性精神焦虑,也面临着个体内心秩序的重建。小说“城乡变奏”主题所蕴含的城乡叙述张力,便集中体现在这种情感与价值的复杂纠葛当中。作家孙全鹏没有以乡土本源主义回避这一时代潮流,诸多文本鲜明肯定人的世俗欲望,正视个体肉身层面的现实诉求。

不过,正如审视硬币的一体两面,孙全鹏同样捕捉到现实的另一面:乡村作为城市的“他者”处于边缘位置。正如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本世纪初《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的论断:我们身处人类快速发展的时代,这无形中急剧压缩了现实时间与空间。这种潜在的时空压缩效应,一方面“碾平”了世界,让人们在共时交往与资源共享中迈入“平坦”的互联状态;但另一方面,“平坦”绝不等于“平等”,其表象之下潜藏着另一维度的时空倾斜与不对等,进而催生出资源、阶层、权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2]。回望数十年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城乡变奏”正是其最为直观的体现。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城乡之间,既有交通、广播电视、网络平台等显性媒介的连通,也有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模式等隐性媒介的连通,“农村人进城”已成为一股奔涌不息的时代洪流。在这一进程中,城市具有显著的优势,使大批外来者心生畏惧。对于质朴的将军寺村村民而言,这也构成他们走出乡土之后所要直面的城市生存困境。

“幸福三部曲”第二部——《幸福的种子》,孙全鹏以麦子、河生、珍珍、小玲四位黄土地养育的青年为主角,描摹了他们为追求“幸福”而进城的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困境。作品中,“四人行”的“进城记”如同一面多棱镜,既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路遥《人生》中高加林式的城乡撕裂感,又延续了李佩甫《城的灯》、周大新《湖光山色》等作品中对中原乡土精神根系的深挖,更在新时代语境下生长出独属于“80后”青年的生命褶皱。作品中的四个青年进城,既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城乡的撕裂感,也延续了对中原乡土精神根系的深挖。四人构成乡土突围的群像,各自以不同的奋斗方式完成回归与寻根。麦子带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进城,因专业错位,最终携带城市经验反哺故乡,以特色农业与旅游业重构价值坐标。河生从买卖旧窗户到创办鸡粪厂,以“脏累不避”诠释了“勤劳即正义”,更在生存压力下叩问精神向度,让奋斗成果扎根故土。珍珍与小玲的奋斗呈现出城乡场域下的性别权力褶皱,她们的经历拓展了生命的可能性,也为故乡的性别平等议题带来新的思考。作品中的情感纠葛将精神探索

推向人性深处。麦子、河生、珍珍的三角情愫,在城乡迁徙的过程中演变为“爱与责任”的伦理困境。小玲“死在城里”也不愿待在农村的决绝,与其后来回乡建厂形成张力,实则是新一代对“归属感”的重新定义:既不想困于乡土伦理,也不愿沦为城市浮萍,最后选择让心灵在故乡栖息。这些探索让“幸福的种子”不再仅是物质丰裕的隐喻,更成为乡土灵魂在现代化进程中自我救赎的精神图腾。

与此追问互为依托的,是在短篇小说集《幸福的日子》与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中的“寻找”主题,即“寻父”“寻己”与“寻根”的三重困境。“寻父”,折射出一种普遍的社会困境: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父亲进城务工,导致留守子女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的缺失,成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隐痛。这不仅指向现实层面父爱的缺席,更映照出时代变迁中,大批农民奔赴城市的灵肉挣扎,以及乡土脐带被割断后,农村空心化造成的深层精神创伤。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中,不少作品反复呈现“进城打工”“留守乡村”这类城乡二元叙事,如《长长的秋风》《方便面》等。于此,无数家庭在生存困境的撕扯之下,承受着亲情缺席带来的伤痛,对父爱的追寻,不只是个体层面的亲情渴求,更借由“无父”的隐喻,映照出城市化进程中进城打工者的生存困境。

与“寻父”互文,“寻己”折射出城乡流动背景下,新一代身处身份夹缝所产生的精神迷失与灵肉层面的深层困惑。当乡村青年涌入城市,既剥离了乡土根系,又难以融入城市肌理,便陷入“我是谁”的身份焦虑:他们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也未成为真正的市民。于此,城市不仅是文明价值“规训”标准的制定者,更是世俗意义上生存范式的缔造者。在这种双重文化撕扯之下,他们往往在追寻自我坐标的过程中迷失本心。中短篇小说集中的《三妹》《再见徐生明》等作品,呈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个体困境:城乡转型期的个体,往往在“向上流动”的执念与“根脉断裂”的痛苦中,沦为身份的流浪者。他们不得不面临一种窘迫的境地:既无法退回熟悉的乡村,又难以在城市找到精神锚点。而“寻己”的过程,正是一代人于时代洪流之中,对破碎的自我进行艰难整合的精神挣扎。

与“寻父”“寻己”叙事所蕴含的“城市进取”取向相对,“寻根”则以“回不去的将军寺”的别样困境,道尽了离乡者返乡时的怅惘与割裂。那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归来,却发现记忆中的家园,早已在时代变迁之中面目模糊:熟悉的人事被陌生感侵蚀,曾经的情感联结在疏离中松动,

返乡之路成了一场寻找“消失了的故乡”的心痛跋涉。在《娘在哪里》《李小花》等小说中,作家为我们真切呈现出城乡变迁中个体与故土的精神剥离:故乡既是记忆的锚点,又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变化;那些试图重返的人,最终发现自己成了故乡的异乡人,在“归来”与“陌生”的拉扯中,承受着故土难寻的隐痛。

在此,作家孙全鹏以城乡变奏之下根脉追寻带来的撕裂感为利刃,尖锐地剖开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群体的生存困局:他们像被悬在空中的风筝,线的一端是日益远去的传统农耕生活,熟悉的土地、习俗与人际网络已日渐消解;另一端则是看似光鲜却隔阂重重的城市文明,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他们始终是游离的边缘者。于是,所谓的“幸福”,便在这种追寻幸福的“悬置”状态下变得模糊不清。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无数次“离去”时的挣扎与“归来”时的怅惘,他们在“离去”与“归来”之间的寻根之路上。这些往复辗转的来去,实则是一场场对情感依托的执着找寻,而这份找寻,也将我们引向对乡土与个体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新乡土灵魂的生动“打捞”

空间维度上城市化的现实进程,与时间维度上“故乡情结”的精神持守,在人的心灵世界形成激烈碰撞,构成乡土书写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元张力,恰与当下文学书写所呈现的深层矛盾相呼应。现代文学史上,乡土书写较为典型的审美范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归乡模式”,另一种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回望模式”。在鲁迅笔下,归乡者往往怀着启蒙的焦灼重返故土,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乡土“劣根性”的痼疾,最终多归于失落;而沈从文的“回望模式”,则将湘西世界建构为一座带有神性乌托邦色彩的“希腊小庙”。这两种乡土书写模式虽视角迥异,却共同指向书写者对乡土的疏离感;或批判其落后,或美化其淳朴,却都未能真正让书写者与乡土融为一体。现在文学史中这两种主要的乡土书写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当代作家基于乡土记忆的书写。在流动的现性背景下,乡土与城市的关系不断变奏,诸多作家在“离去”与“归来”之间往复,孜孜探寻乡土书写的超越路径。这种带有超越性的寻根向度的书写,最终将文本引向一个核心命题:具备主体意识的个体如何实现从“迷惘者”到“扎根者”的身份重构。

本质而言,这种身份重建,敞开了新乡土时代立足于故乡大地“何以回归”的可能性。我们正处在席勒所说的“感伤的诗”的时代:一个远离人类朴素童年的工业文明时代。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变动不居的时代变迁,凸显出寻找灵肉得以栖居的本源性家园的重要意义。

孙全鹏的乡土书写,始终聚焦现代化进程中物质富足、精神失根的底层“沉默者”,探寻个体灵肉合一的真正幸福与精神栖居之地。在他的创作认知中,生于乡土、长于大地的人,唯有依托山川草木、星空大地,方能实现心灵的皈依,这也正是其乡土书写中“回归”命题的核心要义与价值希冀。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非复古,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互文空间中重新找寻“联结”的意义。而这种联结的可能性,根本上指向新乡土时代对乡村“风景”的再发现。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现代风景”概念,该概念本质上是心灵世界的外在投射,对应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内心世界,依附于审美主体的孤独精神内核^[3]。在此意义上,孙全鹏文学视域中的“风景再发现”,既延续了柄谷行人“现代风景”的精神内核,又实现了新乡土书写审美范式的时代性转换。他的作品始终在探寻:如何打破工业文明时代固有的主客体隔绝,使当下的“乡土之风景”成为打捞乡土灵魂的有效载体。这正是对柄谷行人相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现代乡土“风景”由此从隔绝走向联结,从孤独走向共生,促成漂泊灵魂与乡土的重新联结。在《幸福三部曲》中,这种联结呈现为互为依托的三个向度。

其一,发掘作为物质根基的乡土富足之维。这在根本上指向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现实可能,构成新时代乡土书写重要的前提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不断有作家探索真正融入乡土肌理的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首先需要发掘乡土可供个体“安居”的物质优势。在此角度,近年来在一些河南籍作家的作品中,已有突破“返乡者必将离开”这一固有叙事模式。在乔叶《宝水》、周瑄璞《芬芳》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打破乡村即“精神牢笼”或“情感乌托邦”的书写可能,而是让“返乡者”真正扎根乡土,完成自我与乡土世界的和谐共建,来呈现更具烟火气的乡土现实。孙全鹏的“幸福三部曲”,有着与这类作品的异质同构,又有着独属于其作为80后新生代作家的独特思索。他的独特之处体现在:立足于现代性,在城乡互文关系中展开乡土观照。

在《幸福三部曲》中,孙全鹏并未回避城市化曾作为乡土社会重要发展路径的现实,也正视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合理诉求。同时,他亦能从“进城”这一社会动态之中捕捉到深层矛盾:当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承载空间趋于饱和,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作为外来者的将军寺村民不得不承受身心双重创伤。与此同时,作品深刻把握乡土中国的农业底色,呼应国家扭转乡村“空心化”的政策方

向,其中既包含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顶层设计,也涵盖脱贫攻坚等重大社会实践。

当绿水青山成为承载村民生计与情感的生活场域,对乡土的观照便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将自然从工业文明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并使其转化为与集体记忆、生存智慧共生的实在风景。在此角度,从《幸福的种子》到《幸福的花子》,孙全鹏笔下的吴亮、“我”、珍珍、麦子、河生等人物,最终坚定地依托将军寺村,将乡村建设的追求与个体自我幸福相结合,作品由此建构出新乡土书写形态。在其文本中,将军寺村不再是静态的叙事背景,而是动态的“身份容器”,每一个人物都在这片土地的淬炼中完成自我的打磨、重塑与建构。“返乡者”不再带着预设视角,“在乡者”也不再是被审视、被评判的客体,二者彻底摆脱了城市中心话语下的“他者”身份,真正获得了乡土生活的主体地位。这种书写姿态,既区别于鲁迅式的失望凝视,也不同于沈从文式的诗意回望。作家不再以疏离的姿态审视乡土,而是以扎根的姿态直面乡土的矛盾与生机,让文学书写成为联结个体生命与乡土大地的精神纽带。由此,个体的精神皈依不再悬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奋进追求,也获得了坚实的乡土大地支撑。

其二,寻找作为精神底色的地域温情。这种地域温情,是隐匿于日常生活褶皱中的体谅与关怀,承载了乡土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孕育出广阔的诗性空间。在《手机》里,面对留守孩子小天因“捣蛋”惹出的麻烦,其母亲悄悄给身为班主任的“我”充了话费,这一行为是底层家长面对孩子教育困境时质朴的示好。这一举动虽然带着卑微,却饱含着对孩子前途的殷切期望。而“我”返还话费的举动,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理解,彰显着双方对彼此处境的体谅。“我”面对其父的赌博与蛮横选择转身离开,以及小天坦白家庭变故后“我”那句轻柔的“明天去上学”的话语,都饱含着对困境之中人性的温柔托举。在《半夜来》中,一家人对母亲进行善意的“欺骗”,从隐瞒父亲病情到默认母亲半夜回老房子,每个谎言都包裹着对母亲深沉的疼惜。小鱼发现母亲为父亲买黑帽子,老大撞见母亲对着空床叠衣服,那些被岁月尘封的亲情瞬间复苏。他们选择不戳破母亲的幻觉,尊重这份跨越生死的思念,如同呵护行将熄灭的余烬。以上种种温情,虽然悄无声息,却如将军寺村的河水,默默滋养着乡村一个个平凡的日子,成为一道温暖的心灵风景,彰显着人性的善良与柔软。这既呈现出新乡土时代的温情底色,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乡村人际关系中蕴含的细腻情感与深厚羁绊。而这正是乡村生活真实且动人的一

面,足以承载起新乡土书写的内在情感力量。

其三,延续作为乡土伦理根基的神性。2016年,在气势恢宏的“中原三部曲”收官之作《生命册》的结尾处,中原作家李佩甫曾表达了这样的夙愿:“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4]显而易见,这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代表着一种信仰力量的树立,而在这背后,无疑折射出作家的深层忧思:时代发展造成信仰坍塌,人们陷入“无神”的生存境遇。作为一名80后作家,孙全鹏也在孜孜探寻这种源自大地的神性信仰力量。在其“幸福三部曲”中,将军寺村的神性并非抽象的宗教仪式,而是深深融入村民衣食住行的敬畏之心,是维系乡土伦理的精神支柱。在《鸡笼子》里,“俺奶”把编织鸡笼当作一场庄重的仪式,挑选鸡蛋、编织笼身时的专注,满含着对生灵的敬重和对命运的顺从。村里出现怪事后,她选择闭门不出,这是出于对天地法则的敬畏。在她的观念里,万物有灵,过度索取会招致报应。待到她离世之后,床下出现九个鸡笼;到第九年,鸡与笼神秘消失。这些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现象,凸显了神性的存在,使村民在面对世事无常时心怀敬畏,让善良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放生》中的田喜梅,怀孕时“嘴馋”,丈夫李老四在田野里抓到一只黄毛兔,回家后做给她吃。孩子出生后,头发又少又黄,田喜梅为此十分担心。后来听从算命先生的话,踏上了放生49只兔子的救赎之途。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每一步挣扎都彰显出对“神性”的坚定信仰。直至后来,她对兔子安危的执着,早已超越对孩子头发的担忧,转化为对“因果”的敬畏之心。这种看似迷信的行为,实则植根于乡土社会朴素的道德准则:信奉善有善报、万物有灵,并以此规约自身言行。

这些散落在乡村各处的神性微光,构筑起将军寺村伦理秩序的坚实根基,让善良成为村民之间不

言而喻的共识。这种独特的乡村精神风貌,为新乡土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让读者领略到乡村文化中蕴含的神秘力量与深刻智慧。即便身处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这种乡土独有的神性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成为新乡土书写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风景,这种神性的延续为个体灵魂提供了精神依托,也是打捞湿漉漉灵魂的重要精神内核。

总体而言,在孙全鹏“幸福三部曲”所构建的文本世界里,面向乡村的寻根之路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回归,而是心灵与精神的归位,是在城乡碰撞、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不断探索中所实现的个体与故乡的深度融合。而以此为根基,他使时代浪潮中漂泊的灵魂拥有重获依托的可能,得以在故乡的土地上寻得安宁与幸福,彰显了乡土大地在现代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由此,他以那些日常流淌的温情与神性,既为大地镀上了生命重量,又以鲜明的地域色彩,在地方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中为新乡土书写锚定了精神坐标,让湿漉漉的灵魂在字间苏醒,为新时代乡村美学筑起鲜活而扎实的根基。

注释:

- ①“幸福三部曲”:《幸福的日子》作家出版社,2020年出版;《幸福的种子》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出版;《幸福的花子》文心出版社,2024年出版。

参考文献:

- [1]赵立功.“幸福”三部曲中的乡土书写[N].中国艺术报,2025-10-15(3).
[2]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384.
[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43.
[4]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43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Portrayal of the New Rural Soul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Centered on Sun Quanpeng's "Happiness Trilogy"

DONG Xiaok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31, China)

Abstract:The long series of novels by writer Sun Quanpeng, titled "Happiness Trilogy" (*Happy Days*, *Happy Hua Zi*, *Happy Seeds*), takes Jiangjungsi village in eastern Henan as its spiritual homeland. It focuses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rural China, concentrating on themes such as land and survival, ethics and desire, escape and return. By depicting the images of autonomous villagers, it presents the spiritual dilemmas of "seeking the father" "seeking oneself" and "seeking the roots" under the varia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life. It "retrieves" the new soul of the countryside from three aspects: exploring the material abundance of the countryside, the regional warmth,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ural divinity. This highlights the spiritual value of the countryside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Happiness Trilogy"; new rural portrayal; urban-rural variations; spiritual homeland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于洋^{1,2}, 张忠杰²

(1. 兰州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01;
2. 兰州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01)

摘要:基于2012—2023年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水平评价模型和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并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全局Moran's I 指数和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方法,分析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性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保持稳定,并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城市层面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相对稳定态势,但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依然存在,且总体差异呈上升趋势;财政分权、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密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重要影响,其交互作用明显强于单因子作用,主要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多因素交互驱动特征。

关键词:数字经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空间差异;基尼系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3

中图分类号:F061.5;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11-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将“加大区域战略实施力度,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列为2025年重点推进的九项任务之一。当前,中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数字经济凭借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与广覆盖性等核心特征^[1],深刻重塑了生产、交换、消费及分配等经济环节,并对中国经济的空间格局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互联网平台的建设,促进了市场透明度与运行效率的提升,从而优化了资源在区域内及区域间的配置^[2]。然而,数字技术本身发展迅猛,其普及与推广呈现非均衡的扩张态势,导致在数据要素

禀赋与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占据优势的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形成显著的“数字鸿沟”,并引发“马太效应”,最终塑造了非均衡的空间发展格局^[3]。因此,深入探究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两大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与空间规律,辨析不同区域间的异质性及其驱动因素,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深化数字经济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开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研究的时间较早,在现有绝大多数研究文献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界定为在区域经济开放背景下,推动区域间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持续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4]。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测度维度^[5],现有测度研究主要依托引力模型、竞争力评价模型、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计量

收稿日期:2026-06-08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数字经济驱动甘肃省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023A-172);甘肃省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专项“新发展理念下甘肃省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研究”(23JRZA489)

作者简介:于洋(1984—),辽宁沈阳人,女,兰州文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兰州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统计。

模型开展实证分析^[6],并提出了经济发展协调度、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等相关理论^[4]。但是,少有文献从动态、空间演进的视角研究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数字经济兴起后,学者们不断充实数字经济内涵及测度指标构建体系^[7],关于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研究颇为丰富,Madsen(2007)^[8]、Švarc 等(2021)^[9]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进步,打破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屏障,推动了数据要素和先进技术的广泛共享。依托大数据挖掘形成的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性强、边际成本低和传播范围广等特征,能够促进技术、信息与知识在区域间高效流动,推动跨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与价值链协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刘军等(2021)^[10]的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智能化的不断推进,我国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高技能劳动者薪资抬升、低技能劳动者收入增速放缓,是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主要原因。在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11]、创新能力提升^[12]、区域经济一体化^[13]等角度进行分析。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可知,以空间演进视角探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研究特定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14-15]。基于此,本文采用 2012—2023 年我国 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并进一步分析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从全国整体出发,能更好地理解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 指标体系构建

1. 数字经济测度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而是建

立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能力、数字产业发展和金融普惠水平等多重条件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其中,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载体和技术支撑;技术创新能力决定数字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数字产业发展反映数字经济的产业化水平;金融普惠水平则有助于拓宽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促进更广泛的社会经济主体参与数字化转型。为全面、客观、系统地刻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借鉴刘军等(2020)^[10]、赵涛等(2020)^[7]的测度方法,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与综合测算,以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可比性和稳健性(见表 1)。

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测度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差异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差异,使用各地区人均 GDP 占全国人均 GDP 比重的绝对离差,并使用潜在效用模型测算区域内个体差异^{[4][16]},以此刻画区域经济差异状态。区域经济差异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由于其属于理想状态,无法准确获知。因此,本文计算区域经济差异水平,其数值在[0,1]范围。数值越接近 1,代表区域经济差异越大;越接近 0,代表区域经济差异越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维度来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反映经济增长成果的有效分配,有助于了解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评估区域的研发经费支出、教育经费投入,可以判断该区域的未来发展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发展水平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其城镇化率及其城镇建成区面积等,反映了一个区域综合实力和吸引力。因此,本文参考孔阳等(2018)^[17]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区域经济差异、人民生活、科技教育、城市发展四个目标层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用熵值法测算综合指数(见表 1)。

表 1 中国城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权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差异	变异程度	负	0.46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0.11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	0.068
	科技教育	R&D 经费支出/财政支出	正	0.119
		教育经费投入/财政支出	正	0.021
	城市发展	城镇化率	正	0.040
		城镇建成区面积	正	0.177
数字经济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正	0.201
		每千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正	0.259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正	0.212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正	0.107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正	0.140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正	0.081

(二) 研究方法

1. 综合水平评价模型

鉴于各个指标值的量纲存在差异,我们首先要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进行如下处理:

正向指标:

$$Y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quad (1)$$

负向指标:

$$Y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quad (2)$$

其中, Y_{ij} 为标准化的结果, $\max X_{ij}$ 为某一地区的某一年份中的最大值, $\min X_{ij}$ 为某一地区的某一年份中的最小值。之后按照熵值法的步骤客观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 w_j 。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e_j :

$$e_j = -\frac{1}{\ln m} \sum_{i=1}^m w_j \times \ln w_j \quad (3)$$

计算信息效应 d_j :

$$d_j = 1 - e_j \quad (4)$$

计算权重系数 φ_j :

$$\varphi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5)$$

计算各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

$$U_i = \sum_{j=1}^m \varphi_j \times w_j \quad (6)$$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参考王淑佳等(2021)^[18]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两大系统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程度予以测度,让其测算值达到最有效度,以探究两系统间动态耦合协调的演化过程,具体构造如下:

$$D = \sqrt{C \times T}; C = \frac{\sqrt{[1 - \sqrt{(u_2 - u_1)^2}]} }{u_2} u_1; \\ T = au_i + bu_2, a + b = 1 \quad (7)$$

式中: u_1 、 u_2 分别表示各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评分; C 表示两系统耦合度; T 表示两系统综合协调指数, D 表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参考已有文献^[19],本文将待定系数 a 和 b 设置为 0.5,并将协调度分为 10 个等级(表 2)。

3.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为了有效避免数据交叉重叠和区域差异来源难以识别的问题,使用 Dagum(1997)^[20]提出的基尼系数来检验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该基尼系数的整体分解为三部分:区域

内差异、区域间差异以及超变密度。

表 2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等级
0.0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勉强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初级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级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良好协调
0.40~0.49	濒临失调	0.90~1.00	优质协调

4. 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全局 Moran's I 是兼具易用、标准化结果、广泛适用性优势的一种用于检验全域自相关的检验方法^[21]。

全局 Moran's I 指数计算公式为:

$$I = \frac{n \sum_{i=1}^n \sum_{j=1}^n w_{ij} (D_i - \bar{D}) (D_j - \bar{D})}{\left(\sum_{i=1}^n \sum_{j=1}^n w_{ij} \right) \sum_{i=1}^n (D_i - \bar{D})^2} \quad (8)$$

其中, w_{ij} 为空间权重值, n 为城市总数(285 个城市), D_i 和 D_j 分别表示城市 i 和城市 j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值, $\bar{D}$ 为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

5.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受到经济、社会、自然等多元要素的影响。传统的分析方法在探究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满足一系列的前提假设,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的广泛性和分析的深度。地理探测器作为一种创新的研究工具,最初主要应用于地方性疾病风险因素的探索,其优势在于前提假设较少,因此能够更灵活地揭示地理现象背后的形成机理^[22]。因此,本文使用该方法,旨在定量地揭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形成机理。通过这一模型的运用,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从而为政策制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划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q_{C,U} = 1 - \frac{1}{n\sigma_U^2} \sum_{i=1}^m n_{C,i} \sigma_{U,C,i}^2 \quad (9)$$

式中: $q_{C,U}$ 为探测因子 C 的探测力值; $n_{C,i}$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数; n 为整个区域样本数; m 为次一级区域个数; σ_U^2 为整个区域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方差, $\sigma_{U,C,i}^2$ 为次一级区域的方差。 $q_{C,U}$ 的取值区间为 $[0,1]$, $q_{C,U}$ 值越大,说明 C 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越大。

(三)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一方面考虑数字经济在近几年发展较为迅速,另一方面由于 2011 年以前数据缺失性较大,

故选定研究时段为 2012—2023 年,并选取 285 个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城市作为研究单元。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北京大

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各省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个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420	0.232	0.099	0.052	0.668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3420	0.075	0.048	0.017	0.488
控制变量	财政分权	3420	0.490	0.228	0.076	1.094
	外商直接投资	3420	5.437	1.746	1.128	9.628
	金融发展水平	3420	1.240	0.530	0.371	4.356
	人口密度	3420	5.729	0.917	1.609	7.856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

通过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研究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通过表 4 和图 1 所呈现的数据,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演变的整体情况,呈现以下显著特征:首先,从两大系统的相对发展度来看,考察期间两者均呈现增长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上要快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速度。这一发现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正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考察期间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具体来说,2012—2023 年,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超过了 0.6 接近 0.7,表明这一时期内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作用关系。尽管 2017—2023 年间耦合协调度有所回落,但总体而言,两者仍然处于初级耦合水平,并接近中级耦合水平,彼此

相互影响。2012—2023 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稳定,这可能与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全面振兴”等。这些战略的实施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有力的支持,推动了两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协调发展。

表 4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演变情况

年份	u_1	u_2	C	T	D
2012	0.075	0.160	0.953	0.521	0.704
2013	0.091	0.174	0.946	0.517	0.699
2014	0.095	0.185	0.942	0.522	0.700
2015	0.104	0.194	0.938	0.521	0.698
2016	0.118	0.207	0.934	0.519	0.696
2017	0.134	0.221	0.931	0.514	0.691
2018	0.146	0.236	0.927	0.515	0.691
2019	0.158	0.256	0.922	0.521	0.692
2020	0.164	0.266	0.921	0.523	0.693
2021	0.177	0.283	0.919	0.525	0.694
2022	0.185	0.292	0.918	0.525	0.694
2023	0.195	0.295	0.922	0.518	0.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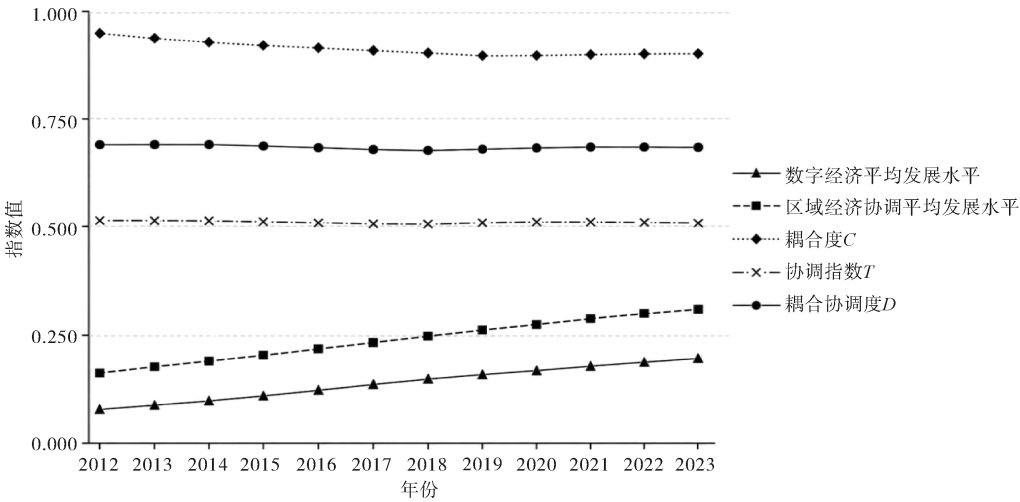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整体演变情况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部分典型城市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不断增强。从时间演进看,代表性城市的耦合

协调度在样本期内普遍有所提高,说明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步显现。从空间分布看,不同区

域城市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地区部分中心城市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创新资源集聚能力较强、数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中部地区部分省会城市,如武汉、长沙等,依托较强的产业基础、科教资源和区域枢纽功能,也表现出较高的协调发展水平。其中,武汉、长沙、上海、杭州等城市耦合协调度超过 0.7,表明其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达到中级协调阶段,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效率提升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见表 5)。

表 5 2012—2023 年城市(部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

地区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武汉	0.671	0.664	0.711	0.686	0.714	0.743	0.709
长沙	0.713	0.717	0.722	0.719	0.716	0.720	0.730
郑州	0.700	0.691	0.687	0.680	0.657	0.675	0.659
上海	0.788	0.733	0.752	0.742	0.703	0.724	0.705
深圳	0.585	0.601	0.555	0.597	0.606	0.689	0.716
杭州	0.702	0.708	0.729	0.740	0.710	0.684	0.695
成都	0.703	0.674	0.670	0.656	0.635	0.553	0.559
重庆	0.677	0.660	0.660	0.643	0.633	0.609	0.596
西安	0.643	0.602	0.647	0.660	0.652	0.656	0.656
地区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均值	协调等级
武汉	0.713	0.711	0.647	0.713	0.712	0.700	中级协调
长沙	0.743	0.745	0.738	0.733	0.730	0.727	中级协调
郑州	0.671	0.713	0.667	0.671	0.680	0.679	初级协调
上海	0.698	0.704	0.677	0.668	0.670	0.714	中级协调
深圳	0.678	0.641	0.658	0.662	0.646	0.636	初级协调
杭州	0.702	0.700	0.715	0.707	0.709	0.708	中级协调
成都	0.596	0.647	0.631	0.615	0.556	0.624	初级协调
重庆	0.580	0.578	0.566	0.552	0.543	0.608	初级协调
西安	0.646	0.660	0.634	0.627	0.626	0.642	初级协调

(二) 区域差异

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进一步揭

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结果如表 6 和图 2 所示。

表 6 区域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

年份	总体	区域内差异		区域间差异		超变密度	
		数值	贡献率(%)	数值	贡献率(%)	数值	贡献率(%)
2012	0.010	0.003	27.358	0.002	17.766	0.006	54.876
2013	0.012	0.003	27.167	0.002	14.560	0.007	58.273
2014	0.013	0.003	26.874	0.002	16.414	0.007	56.712
2015	0.013	0.003	26.786	0.002	19.480	0.007	53.734
2016	0.014	0.004	27.068	0.003	19.133	0.008	53.799
2017	0.016	0.004	26.636	0.004	23.612	0.008	49.752
2018	0.018	0.005	26.793	0.005	29.172	0.008	44.035
2019	0.018	0.005	26.489	0.007	35.780	0.007	37.732
2020	0.019	0.005	26.948	0.006	31.576	0.008	41.476
2021	0.022	0.006	26.879	0.007	34.418	0.008	38.703
2022	0.021	0.006	26.858	0.007	31.448	0.009	41.694
2023	0.026	0.007	26.131	0.009	33.050	0.011	40.820

1. 总体差异分析

从表 6 和图 2 可以看出,2012—2023 年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总体 Dagum 基尼系数由 2012 年的 0.010 上升至 2023 年的 0.026,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城市层面数

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收敛,反而呈现差异化扩大的发展特征。分阶段看,2012—2016 年总体差异上升较为缓慢,由 0.010 增至 0.014;2017—2021 年差异扩大速度有所加快,由 0.016 上升至 0.022;2022 年略有回落至

0.021,但2023年进一步上升至0.026,达到样本期最高水平。这说明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不同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能力、金融普惠水平

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础方面的差异逐步显现,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不均衡问题有所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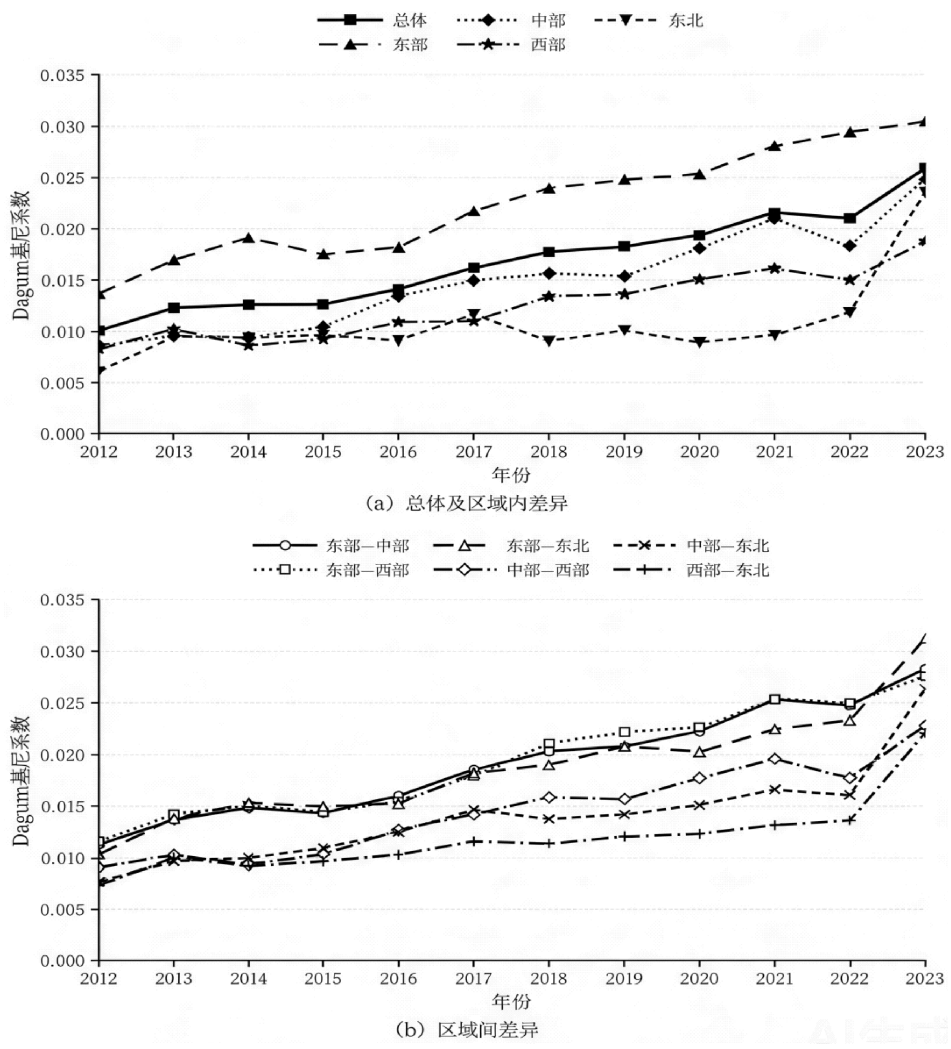


图2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变化趋势 1

2. 区域内差异

由图 2(a)可知,四大地区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方面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首先,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区域,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最为显著。尽管在考察期内基尼系数持续有所上升,但相较于其他三大地区,其空间差异依然较大。其次,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且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差异明显变大,这与经济逐渐恢复、区域内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经济韧性有关,反映了该地区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

3. 区域间差异

图 2(b)为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数据显示东部—东北、东部—中部和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均值都约为 0.019。这表明此三个区域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耦合协调度

存在着较大的不均衡。相较而言,中部—东北、西部—东北以及中部—西部区域间差异均值分别为 0.014、0.012 和 0.015,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可以推断,中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源自东部—东北、东部—中部和东部—西部之间的差异。这种情况的成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在资源和能源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些地区在支持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其他方面,如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些不足制约了其发展速度,导致发展相对滞后。其次,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接近,发展条件相似,区域差异相对较小,彼此替代性较强。这也使得这些地区在推进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需要更加精准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支

持,以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最后,由于各地区在政策实施力度上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受到了显著影响。这种政策的不一致性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衡,从而造成区域发展不均衡,进而影响整体的协调发展效果。

4. 差异来源及贡献

表 6 数据显示,超变密度差异值由 2012 年的 0.006 上升至 2023 年的 0.011,在绝对数值上仍然是总体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贡献率虽然由 2012 年的 54.876%下降至 2023 年的 40.820%,但在大多数年份仍高于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首要来源。这说明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交叉重叠现象,即部分相对欠发达区域中的城市可能具有较高的耦合协调水平,而部分发达区域中的城市也可能处于较低的耦合协调水平。超变密度贡献率较高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并非简单呈现严格的区域梯度分布,而是具有较强的城市异质性和空间交错性。随着时间推移,超变密度贡献率有所下降,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明显上升,说明总体差异的形成机制正在由区域交叉重叠主导,逐步转向区域板块分化和区域间差距扩大共同作用。

四、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驱动因素分析

(一) 空间相关性

从全局空间特征的角度审视,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分布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为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作为分析工具。通过表 7 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考察期间内 Moran's I 指数均大于 0 且显著。这一结果表明,这两大系统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向相关性,即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呈现相互增强、相互促进的态势。

在整体动态趋势方面,2012—2023 年全球 Moran's

I 的平均值为 0.321,显示出相对稳定的水平,整体波动较小。这表明,尽管在时间序列上可能存在某些年份的波动,但整体上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

表 7 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自相关

year	Moran's I	$E(I)$	Z 值	P 值
2012	0.241	-0.004	6.345	0.000
2013	0.205	-0.004	5.295	0.000
2014	0.210	-0.004	5.525	0.000
2015	0.330	-0.004	8.441	0.000
2016	0.262	-0.004	6.732	0.000
2017	0.262	-0.004	6.774	0.000
2018	0.317	-0.004	8.139	0.000
2019	0.390	-0.004	9.964	0.000
2020	0.428	-0.004	10.914	0.000
2021	0.449	-0.004	11.469	0.000
2022	0.394	-0.004	10.082	0.000
2023	0.362	-0.004	9.244	0.000

(二) 基于地理探测器分析驱动因子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3-26],结合 285 个城市的实际情况,并汲取相关专家的宝贵意见,最终选取了财政分权、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口密度 4 项关键指标作为探测因素,利用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公式(9)计算得出图 3,由此可知,各年份对角线数值均小于其所在行列上的结果,即不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单因子影响力,具体类型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双因子增强,这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为合力作用的结果。重点从 2012 年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 q 值最大,为 0.313,表明在 2012 年,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组合为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导交互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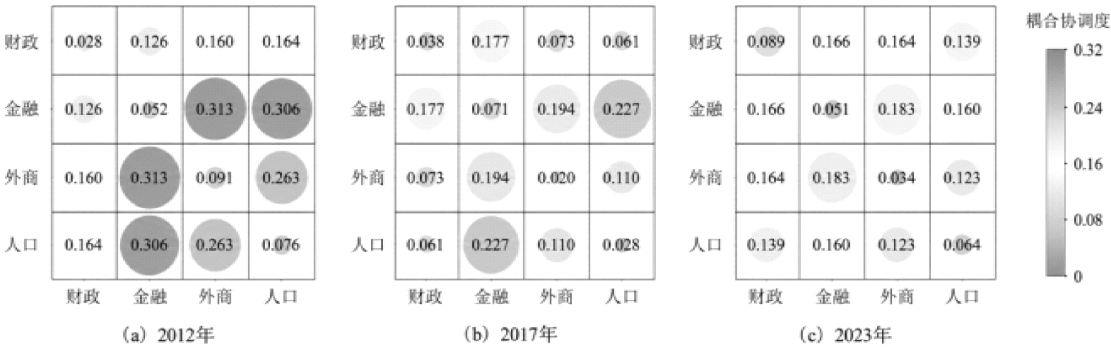


图 3 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交互探测结果

由图3可知,金融发展水平与人口密度、金融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3个年份都是影响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其他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存在一定差异。各要素交互作用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影响力可以概括为:第一,人口集聚力。人口要素是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其中,2012年人口密度与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说明各城市人口集聚的强度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合力作用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明显。第二,经济驱动力。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外商直接投资是重要推动力。三个年份中,金融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在2012年、2023年两个年份表现得最明显。第三,政策调控力。由图3可知,2023年财政分权与金融发展水平、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探测值分别达到0.166和0.164,仅次于金融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作用。相比之下,财政分权与人口密度的交互探测值由2012年的0.164下降至2017年的0.061,2023年回升至0.139,虽然较2017年明显增强,但仍低于2012年水平。因此,财政调控作用的增强主要体现为财政因素自身解释力上升,以及财政与金融、外商直接投资等经济要素协同能力的提高。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可以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产业扶持和营商环境改善等方式弥补市场失灵,并提高金融资本和外部投资的配置效率。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基于2012—2023年中国285个城市基础指标数据的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间变化趋势和空间特征,运用综合水平评价模型和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来测度其空间差异性,采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全域自相关,采用地理探测器交互探测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与人口密度对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力。结论如下:

(1)从时间序列来看,在考察期间数字经济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总体上要快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速度,耦合度的提高表明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愈加紧密;而

协调度的提升则反映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

(2)从空间特征来看,2012—2023年中国285个城市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呈现稳定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通过部分代表性省会城市的对比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域性的差异。总体上,各代表性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的代表性省会城市在耦合协调度上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3)从区域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285个城市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总体Dagum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010上升至2023年的0.026,呈波动扩大趋势,表明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收敛。分阶段看,2017年以后差异扩大速度明显加快,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城市在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和区域协调基础等方面的分化逐步显现。区域内差异方面,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为突出,反映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仍存在明显发展差异;东北地区差异虽相对较低,但呈上升态势。区域间差异主要表现为东部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说明东部仍具有显著优势。差异来源分解显示,超变密度始终是总体差异的重要来源,但其贡献率有所下降,区域间差异贡献率逐步上升,表明总体差异正由城市交叉重叠主导转向区域板块分化与区域间差距扩大共同作用。

(4)从驱动因素来看,财政分权、金融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口密度的交互作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其中,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作用影响更显著,影响力更大。而财政分权与人口密度的交互影响逐渐增加,与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国家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因“业”制宜,制定差别政策。建立全国性指导政策,同时允许地方政府制定适应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细则,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以“东数西算”工程为抓手,加快构建一体化的全国算力体系,确保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信息畅通和资源共享,形成跨区域协同治理,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二,区域层面,加强跨地区合作,形成区域互

补,优化产业布局,缩小区域差距。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生产要素的禀赋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集聚至关重要。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应利用其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充足的社会资本、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以及高水平的人才资源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社会资本薄弱、重工业税负过重等一系列挑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速度。因此,这些地区需通过数据挖掘,探寻发展契合地区禀赋特色的、与发达地区互补的优势产业,避免过度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同时,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税负,重视服务业的提升实现区域经济增长。

第三,城市层面,充分利用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所展示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充分发挥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核心城市在东部地区的引领作用,以及西安、成都、合肥和武汉等核心城市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力,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平衡。同时,在东部核心城市可设立耦合协调发展示范区,强化技能培训与人才培养,促进数字技能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对接,引导人力资源向数字经济和创新驱动型产业流动,从而加快区域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耦合进程,进而发挥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先锋, 2022(3):5-7.

[2] 斯丽娟.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理论与改革,2023(2):73-85.

[3] 安同良,杨晨. 互联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J]. 经济研究,2020,55(2):4-19.

[4] 章成林,张华,毛超.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辨析、判断标准与评价方法[J]. 经济体制改革,2011(4):34-38.

[5] 白永亮,康振楠. 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联系网络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效应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9(2):16-32.

[6] 曹清峰,倪鹏飞,沈立,等. 东亚主导下的亚洲城市体系:基于城市竞争力的分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6):39-48.

[7]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8] Madsen J B. Technology spillover through trade and TFP convergence:135 years of evidence for the OEC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2(2):464-480.

[9] Švarc J, Lažnjak J, Dabić M. The role of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U countries: another digital divide? [J].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21,22(4):768-791.

[10] 刘军,杨渊璧,张三峰. 中国数字经济测度与驱动因素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2020(6):81-96.

[11] 张可云,杨丹辉,赵红军. 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J]. 区域经济评论,2022(3):8-19.

[12] 姚常成,沈凯琦. 要素流动视角下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效应[J]. 经济地理,2023,43(4):10-9.

[13] 梁昊光,焦思盈. RCEP 框架下数字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增长治理研究[J]. 国际经济合作,2022(4):4-13+92.

[14] 张恒,赵茂,李璐.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J]. 新金融,2021(6):47-53.

[15] 崔靓,李晓梅,姚若羲. 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23,39(1):29-33.

[16] 张智鹏,姜玉英.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统计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3,39(19):112-116.

[17] 孔阳,何伟军,覃朝晖. 中国西部大开发政策净效应评估[J]. 统计与决策,2018,34(24):91-5

[18] 王淑佳,孔伟,任亮,等. 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J]. 自然资源学报,2021,36(3):793-810.

[19] 任喜萍,殷仲义. 中国省域人口集聚、公共资源配置与服务业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因素[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77-86.

[20] 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1997,22:515-31.

[21] 刘岩,程钰,王亚平. 黄河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空间溢出[J]. 地理研究,2023,42(4):917-35.

[22] 丁悦,蔡建明,任周鹏.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2014,33(5):657-66.

[23] 孙开,温馨. 中国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与空间分异[J]. 财经问题研究,2014(10):72-78.

[24] 陈继勇,雷欣,黄开琛. 知识溢出、自主创新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J]. 管理世界,2010(7):30-42.

[25] 李雪,吴福象,竺李乐.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绩效[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43(5):17-30.

[26] 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贸经济,2021,42(7):114-2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46页)

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路径

解 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河南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类型多样。近年来,河南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持续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为文化遗产的活化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供了技术动能与创新活力。面向创新主导的发展要求,河南应围绕技术赋能、模式创新、产业升级、保障支撑四个维度,构建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机制,突出时代导向、地方根脉与技术驱动,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双向赋能、深度耦合,为锚定“两高四着力”战略目标、建设文旅强省及中华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中心提供坚实的经济与文化双重支撑。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河南;历史文化遗产;文旅产业融合;实践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4

中图分类号:F592.7;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20-08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具有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1]河南地处中原,拥有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发展文旅产业的天然优势。但在发展实践中,河南仍存在模式落后、科技含量不高等突出问题。当前,以新技术、新劳动力、新生产工具为核心要素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更是各行业产业跃升发展的核心动力^[2]。

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新要素、新产业为核心构成的生产力形态,其本质是科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引意义。在此背景下,探索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既是响应国家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河南建设数智强省、文旅强省,打造中华文化遗产创新高地、提升中原文化影响力的现实需要。

一、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依托环境资源、产业基础与技术条件的协同支撑。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分布区,其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存量优势与类型多样性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内容根基。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与技术引入的双重驱动下,河南全省文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数字化保护、智慧景区、沉浸式演艺等新业态陆续落地,初步形成了以郑州、洛阳、开封、安阳为核心节点的融合发展格局。

(一)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厚实

河南省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与核心区,历史

收稿日期:2026-06-10

基金项目:2026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文化遗产地文旅开发与保护平衡机制研究”(262400410659)

作者简介:解浩(1979—),男,河南西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遗产存量丰富,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集群,这些文化遗产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特色鲜明。截至 2025 年底,河南省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30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19 项。这些文化遗产涵盖古遗址、古建筑、石窟寺、陵墓、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种形式^[3],展现了河南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深厚历史底蕴。具有代表性的有安阳殷墟、洛阳龙门石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郑州商代遗址、登封少林功夫、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洛阳牡丹栽培技艺、太极拳、梁祝传说等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见证了河南辉煌的发展变迁史,也是河南深厚历史文脉的根源所在,同时也构成了河南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资源基底,为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多元化应用场景。

(二) 文旅产业积淀深厚

近年来,河南持续推进文旅强省建设,文旅融合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强力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坚持‘上线、下沉、重塑、出新、彰文、铸魂’总方针,推动我省在文化旅游融合领域持续创意创新、破题破冰、出圈出彩,蹚出一条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领跑新时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赛道。”^[4]在《规划》引领下,河南文旅产业得到更深层次发展,各地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业融合进程持续提速。从产业规模来看,2025 年全年,河南接待游客 11.09 亿人次、旅游收入 1.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1%、5.0%;接待入境游客 93.45 万人次,其中过夜游客 83.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0.53%^[5]。从空间布局来看,河南形成了以四大古都为核心引擎、多座重点城市联动布局的发展格局。四大古都中,郑州以商都遗址为核心,打造商都遗址博物院等商文化文旅载体;洛阳则深耕隋唐文化,建成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龙门石窟等;开封依托北宋古都遗址,聚焦宋文化,打造清明上河园、万岁山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安阳以殷墟遗址、中国文字博物馆为核心,打造“了不起的甲骨文”“妇好归来”等数字化创新项目。河南省内重要节点城市还形成以新乡、焦作、鹤壁为中心的沿黄(太行)生态文旅带,以信阳、南阳、驻马店为中心的豫南文旅集群,以周口、商丘、濮阳、平顶山、开封为中心的伏羲根亲、三苏文化、汉梁古韵、杂技龙乡等特色文化集群。

(三) 技术支撑条件逐步完善

依托“1+2+4+N”数字化文旅项目统筹推进机制,河南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取得快速

进展,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应用也逐步普及。依托 5G、人工智能(AI)、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裸眼 3D、全息扫描、元宇宙以及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予河南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与文旅开发新的可能^[6]。目前,河南文旅大数据平台已建成投用,初步实现全省文旅资源整合与动态监管,成为推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业有机融合的重要力量。各地历史文化遗产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持续焕发全新活力。河南省统计局开展的全省科技赋能博物馆建设专项调研数据显示:受访 27 家博物馆中,完成数字化或智慧化改造的共 25 家,占比 92.6%;其中 55.6%的博物馆应用 3D 扫描与打印技术,51.9%的博物馆建立了藏品数据库与信息管理系统,66.7%的博物馆使用了藏品保管环境监测系统或智能调控系统^[7]。此外,龙门石窟的流散文物数字化保护、登封少林寺景区的 AI 讲解服务、安阳殷墟的考古数字化采集、开封清明上河园的智慧导览服务等为新质生产力、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筑牢坚实技术底座。

二、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效

(一) 数字化保护提质增效

依托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河南各地紧扣国家文化战略、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实现多点突破、全域协同推进,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实践格局。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以三维数字扫描建模技术为核心,搭建流散文物数字化复原体系,实现文物“身首合一、数字复位”。例如针对《文昭皇后礼佛图》这一标志性流失文物,研究团队通过异地造型数据采集、离散数据聚合技术应用,以“数据聚合”的方式跨越时空,在数字空间完整复原文物历史风貌,实现对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8]。安阳殷墟依托裸眼 3D 展示技术,对屯南甲骨、跪坐玉人等国宝级文物进行数字化呈现,突破文物实体展陈的限制,直观展现商代文明的历史价值;郑州商城遗址运用 3D 打印与数字建模技术,完整复原商代古城墙历史风貌,让不可移动的遗址资源实现可感知、可传播;洛阳博物馆打造“河洛之光”数字馆,集成 VR 沉浸式体验、幻影成像、AI 互动换脸、多媒体交互展陈等技术,重构博物馆参观体验,让馆藏文物实现“可触、可感、可互动”。这些措施,推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二) 文旅服务智能化升级

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智能化建设稳步推进,文旅服务效率与体验感显著提升。目前已搭建出省、市、景区三级联动的智慧文旅产业体

系,优化游客游览体验,提升景区运营效率。省级层面,河南省打造“一机游河南”智慧文旅微信小程序,整合全省重点景区预约购票、电子导览、路线规划、应急求助、消费维权等功能,实现全省文旅资源“一屏汇聚、一键通达”。地市级与景区层面,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特色打造专属智慧运营平台,形成精准化、定制化的智能管理模式。如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搭建了全域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实时客流监测、票务数据智能分析、园区动线动态优化;开封清明上河园上线了智能票务系统,实现门票预约、智能导览、客流调控一站式服务;洛阳隋唐洛阳城运用大数据分析游客需求,优化了游览路线与服务供给;郑州登封嵩山少林寺推出线上虚拟祈福、少林功夫线上教学等服务,拓展文旅服务覆盖边界;安阳殷墟完善了“殷契文渊”甲骨文大数据平台的手机版,为手机用户提供多元阅读模式及个性化检索服务,满足用户随时随地获取知识的需求。

(三)融合业态多元化拓展

近年来,河南文旅以文化创意为脉络,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以历史文化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地域文化为依托,以时尚观光为目标,孕育出一批独具特色、充满活力的沉浸式体验空间^[6]。“文旅+科技”“文旅+文创”“文旅+教育”等业态深度融合逐步成熟。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作为河南文旅产业融合的标志性项目,以中原农耕文化、黄河文化、古都文化为核心内核,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沉浸式戏剧文旅集群。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打造VR虚拟考古体验项目,引导游客沉浸式参与考古过程,实现文化遗产的生动化、互动化传播;安阳殷墟推出妇好墓混合现实交互体验项目,游客通过MR眼镜实现与历史场景、文物虚拟互动,沉浸式感知商代文明;开封府打造全息剧场,推出《闸口盘车案》等系列全息探案剧目,将历史故事与数字技术结合,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形式;龙门石窟依托石窟文化资源,推出AR文创明信片、数字虚拟摆件等文创产品,推动文化IP数字化转化;开封朱仙镇推动年画非遗数字化转型,推出数字年画、文创盲盒等产品,让非遗文化适配年轻消费群体。

(四)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

依托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河南推动遗产保护、文旅产业发展与生态修复协同共进。开封市构建水系文旅生态联动保护机制,对包公湖、龙亭湖等城区河湖实施水质在线实时监测、生态补水全天候在线动态调度,将宋文化遗产、古城肌理与生态廊道、水系景观串联融合,实现水环境治理、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开发协同推进;龙门石窟搭建周边生态智慧管控

平台,部署空气质量监测、山体稳定性传感监测、物联网节水灌溉等智能设备,对石窟周边微环境、山体生态实施精细化管控,同步落实文物本体防护与区域生态修复;郑州市黄河文化公园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行动,高标准建设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9]。

整体上看,河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的重要论述,积极贯彻落实“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数字技术在历史文化遗产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传播、消费等环节已经产生深刻影响,数字技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赋能作用越来越明显。

然而,实践层面的进展并不均衡。技术赋能多停留在展示环节的数字化包装,与遗产保护、文化阐释、游客体验的深度融合尚有差距;部分地区的开发模式趋同,对本土文化内涵的挖掘不足;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张力仍未得到有效调适,过度商业化与过度保守化并存。新质生产力在河南文旅产业融合中的作用尚未充分释放,其驱动效果受制于区域差异、认知水平与制度配套等多重因素。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现实效果量化分析

新质生产力全方位赋能实体经济,也为文旅产业创新升级开辟了新路径。结合前文关于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实践成效的论述,本文引入问卷调查法,从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支撑保障和总体评价六个维度,检验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效果。

(一)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游客感知量表,围绕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支撑保障和总体评价六个维度设置题项。量表题项全部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法。

(二)变量设置

以总体评价为因变量,以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和支撑保障为自变量。其中,技术赋能主要考察游客对AI讲解、数字导览、VR/AR展示、智慧服务等技术应用效果的感知;文化阐释主要考察游客对河南历史文化内涵、中原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感的评价;体验创新主要考察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文创产品和互动项目的吸引力;保护开发平衡主要考察游客对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调程度的认知;支撑保障主要考察游客在景区服务人员讲解、交通接驳、智慧服务、配套设施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感知。

(三)样本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次调研将到访过河南历史文化遗产类景区或参与过相关文旅活动的游客设定为调查对象,调研范围聚焦郑州、洛阳、开封、安阳等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2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1.6%。研究采用描述统计、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新质生产力赋能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检验。

1. 样本基本情况

从样本结构看,本次样本共 321 份。其中,男性 148 人,占 46.1%;女性 173 人,占 53.9%。年龄方面,18—25 岁群体占比为 33.6%;26—35 岁群体占 26.2%;36—45 岁群体占 19.9%。这也是河南历史文化遗产文旅消费的重要群体。学历方面,本科受访者占比最高,为 44.3%;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19.9%,说明样本整体具有一定文化接受能力和文旅体验判断能力。主要到访地方面,洛阳占比最高,为 37.7%;随后依次为郑州、开封、安阳等地,基本覆盖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核心区域。从信息来源看,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占比最高,为 34.0%,说明新媒体平台已成为游客了解河南历史文化遗产和文旅项目的重要渠道。(见表 1)

2. 信度分析

为检验问卷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本文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信度分析。从表 2 可以看出,整体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4,各维度 α 系数均大于 0.7,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可以用于后续统计分析。

从具体维度看,技术赋能维度 α 系数为 0.862,说明游客对数字导览、AI 讲解、VR/AR 体验、智慧服务等技术应用题项的评价具有较强一致性;体验创新维度 α 系数为 0.827;保护开发平衡维度 α 系数为 0.831,均达到较高水平。文化阐释维度 α 系数为 0.745,支撑保障维度 α 系数为 0.799,也达到可接受水平。总体来看,问卷题项能够较为稳定地反映游客对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感知状况。

3.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了解游客对不同维度的总体评价,本文对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支撑保障和总体评价六个维度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文化阐释维度均值最高,为 3.771,说明游客对河南历史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

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表达认可度较高。这也与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文化吸引力和文化辨识度较强一致。总体评价维度均值为 3.749,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受访者整体上认可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效。体验创新维度均值为 3.591,说明沉浸式演艺、研学旅行、文创产品、互动体验等项目已经对游客形成一定吸引力,但距离高品质、个性化、深度化的文旅体验仍有提升空间。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表

变量	类别	频数	比例
性别	男	148	46.1%
	女	173	53.9%
年龄	18 岁以下	26	8.1%
	18—25 岁	108	33.6%
	26—35 岁	84	26.2%
	36—45 岁	64	19.9%
	46 岁以上	39	12.2%
学历	高中及以下	46	14.3%
	专科	69	21.5%
	本科	142	44.3%
	硕士及以上	64	19.9%
职业	学生	90	28.0%
	机关/事业单位	39	12.1%
	企业职员	130	40.5%
	个体/自由职业	32	10.0%
	文旅/文博相关从业者	6	1.9%
	其他	24	7.5%
到访次数	1 次	103	32.1%
	2—3 次	109	34.0%
	4—5 次	77	23.90%
	5 次以上	32	10.0%
主要到访地	郑州	97	30.2%
	洛阳	121	37.7%
	开封	58	18.1%
	安阳	45	14.0%
信息来源	亲友推荐	58	18.1%
	短视频/社交媒体	109	34.0%
	旅行平台	39	12.1%
	学校/单位组织	71	22.1%
	其他	44	13.7%

表 2 信度分析结果

维度	题项数量	Cronbach’s α	判断
技术赋能	4	0.862	较好
文化阐释	4	0.745	可接受
体验创新	4	0.827	较好
保护开发平衡	4	0.831	较好
支撑保障	4	0.799	可接受
总体评价	3	0.835	较好
整体量表	23	0.894	较好

表 3 各维度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结果解释
文化阐释	3.771	0.512	1	优势维度
总体评价	3.749	0.523	2	整体评价较高
体验创新	3.591	0.549	3	中等偏上
技术赋能	3.432	0.551	4	中等水平
保护开发平衡	3.428	0.583	5	相对短板
支撑保障	3.258	0.540	6	短板维度

技术赋能维度均值为 3.432,说明游客对河南历史文化遗产景区中的数字导览、AI 讲解、VR/AR 展示等技术应用已有一定感知,但技术赋能仍处于中等水平,尚未完全转化为游客体验优势。保护开发平衡维度均值为 3.428,支撑保障维度均值为 3.258,表明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在智

慧服务、交通接驳、人员讲解、配套设施、专业人才和政策协同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4. 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支撑保障和总体评价进行相关分析。

表 4 各维度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技术赋能	文化阐释	体验创新	保护开发平衡	支撑保障	总体评价
技术赋能	1.000	0.418	0.369	0.291	0.379	0.553
文化阐释	0.418	1.000	0.308	0.298	0.291	0.525
体验创新	0.369	0.308	1.000	0.055	0.331	0.539
保护开发平衡	0.291	0.298	0.055	1.000	0.148	0.362
支撑保障	0.379	0.291	0.331	0.148	1.000	0.521
总体评价	0.553	0.525	0.539	0.362	0.521	1.000

从表 4 可以看出,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和支撑保障均与总体评价呈正相关。

这一结果表明,游客对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总体评价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到技术应用、文化表达、体验设计、保护开发协调和服务保障体系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技术赋能、体验创新、文化阐释和支撑保障与总体评价的相关性较强,说明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产业融合不能停留在技术展示层面,而应进一步转化为文化理解、体验升级和服务优化。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开发平衡与总体评价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但仍呈正相关。这说明游客虽然

能够感知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游览过程中,其总体评价更直接地受体验项目、技术应用和服务便利性的影响。因此,在推进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过程中,既要坚持保护优先,也要通过更加可感知、可体验的方式将保护成果转化为游客能够理解和认同的文旅体验。

5.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各因素对总体评价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总体评价为因变量,以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和支撑保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如下:总体评价= $\beta_0+\beta_1$ 技术赋能+ β_2 文化阐释+ β_3 体验创新+ β_4 保护开发平衡+ β_5 支撑保障+ ε 。

表 5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标准化 Beta	t 值	p 值	结果解释
常数项	0.062	0.045	—	1.378	0.169	模型截距
技术赋能	0.160	0.088	0.201	1.818	0.070	正向影响,边缘显著
文化阐释	0.212	0.101	0.224	2.099	0.037	正向影响,显著
体验创新	0.288	0.097	0.309	2.969	0.003	正向影响,显著
保护开发平衡	0.168	0.088	0.190	1.909	0.057	正向影响,边缘显著
支撑保障	0.245	0.102	0.253	2.402	0.017	正向影响,显著

表 6 回归模型整体拟合情况

指标	数值
R^2	0.589
调整 R^2	0.542
F 值	44.127
F 检验 p 值	0.000

从表 5 和表 6 可以看出,模型 R^2 为 0.589,调整 R^2 为 0.542,说明技术赋能、文化阐释、体验创新、保护开发平衡、支撑保障五个变量能够解释总体评价约 58.9%的变异程度。F 检验结果显著,说明模型整体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从具体变量看,体验创新对总体评价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标准化 Beta 系数为 0.309,p 值为 0.003,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沉浸式演艺、互动体验、研学活动、文创产品等体验创新项目,是影响游客总体评

价的重要因素。游客并不只是被动观看历史文化遗产,而是更加重视能否在游览过程中获得互动性、沉浸感和参与感。

支撑保障对总体评价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 Beta 系数为 0.253,p 值为 0.017。这说明智慧服务、交通接驳、讲解服务、预约购票、客流调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保障条件,直接影响游客对文旅产业融合成效的整体判断。

文化阐释对总体评价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 Beta 系数为 0.224,p 值为 0.037。这说明文化内涵呈现、中原文化表达和历史价值阐释对总体评价具有较强促进作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本身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但游客能否真正理解其文化意义,取决于景区能否将历史知识、文化符号和精神

价值转化为通俗、生动、可体验的表达方式。

技术赋能的标准化 $Beta$ 系数为 0.201, p 值为 0.070, 呈边缘显著。这说明数字技术、AI 讲解、VR/AR 展示、智慧导览等因素对总体评价具有正向影响,但其作用仍需要通过文化阐释和体验创新进一步释放。换言之,技术本身并不会自动提升游客满意度,只有当技术真正服务于文化理解、体验优化和运营效率提升时,才能形成有效赋能。

保护开发平衡的标准化 $Beta$ 系数为 0.190, p 值为 0.057, 也呈边缘显著。这说明游客对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调程度具有一定感知,但相较于体验创新和支撑保障,其影响较为间接。这提示河南在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时,既要防止过度商业化损害遗产价值,也要避免因保护理念保守而造成资源沉睡,应在严格保护基础上探索适度利用、合理转化和活态传承路径。

综合上述数据,发现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具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和游客认可度,游客对历史文化遗产文旅项目的期待已经从传统观光转向沉浸体验、互动参与和情感认同。同时,智慧服务、交通接驳、讲解能力、设施配套、专业人才等因素虽然属于基础性条件,却直接影响游客感受和文旅产业融合质量,当前数字技术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中的应用仍存在一定表层化局限。未来应在严格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和文化生态的基础上,基于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原则,推动 AI、VR/AR、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从展示环节向遗产保护、文化阐释、游客服务、运营管理和产业开发全过程延伸,探索数字化保护、活态化传承和场景化转化路径,达成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系统性驱动价值。

进一步分析技术赋能与文化阐释的交互效应可见数字技术工具能否发挥实效,高度依赖于本土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精准转译。例如,龙门石窟通过三维数字扫描实现《文昭皇后礼佛图》的虚拟复原,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文物保护突破,更通过数字拼接技术还原了北魏皇家礼佛的仪仗范式与艺术风格,使游客直观理解“秀骨清像”的审美特征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种“技术载体+文化解码”的融合模式,较单纯的数字展示更能提升文化认同感(交互项 $\beta=0.183, p=0.042$)。反之,若技术应用脱离文化语境,如部分景区直接套用通用 AR 导览模板、未结合本地遗产独有文化特质,可能导致“技术空转”现象——游客虽接触数字工具,却未能深化对文化遗产的认知。

四、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实践创新路径

新时代以来,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建设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了具备中原地域辨识度和中原文化影响力的文旅产业。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为赋能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河南应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以体验创新为突破口,以支撑保障为基础条件,以技术赋能为重要手段,以文化阐释为核心内容,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一) 锚定河南遗产类型特色,深化融合应用

1. 构建差异化数字化保护体系

依托现有的河南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平台,区分石窟寺遗存(以龙门石窟为代表)、古代城池遗址(开封古城、商丘古城等)、传统古村落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少林功夫、朱仙镇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品类,利用数字化、AI 技术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实现可视化、智能化展示,推动保护从“被动修复”向“主动预防”转型,降低保护成本、提升保护效能。通过数字化让历史文化遗产从实物向数字转型,让技术赋能贴合河南不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需求,让文化遗产动起来。

2. 打造地域化沉浸式文旅体验

新质生产力驱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不能只体现在展陈技术和数字包装上,还应落实到服务流程优化、管理效率提升和游客便利性改善之中。首先,在新质生产力广泛应用的背景下,结合河南省丰富的隋唐文化、宋文化、考古文化等地域特色,依托 VR/AR、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丰富沉浸式演艺、互动体验、研学活动、文创产品等业态,因地制宜开发具有本土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例如,开封围绕宋文化打造清明上河园沉浸式实景互动项目,安阳围绕商文明开发殷墟数字甲骨文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获得更强的互动性、沉浸感和参与感。其次,推动技术与运营深度融合,构建智慧旅游服务体系,优化停车、支付、入园等便捷旅游服务。同时,运用 AI 技术提供智能语音及视频解说,深化游客对遗产文化内涵的理解。此外,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最后,借助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实现景区实时监控与智能调度,全方位保障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例如,安阳殷墟通过 AI 语音解说系统,根据游客画像动态调整甲骨文文字演变的讲解深度——对青少年群体侧重象形文字的趣味性解读,对专业游客则强化文

字学与历史背景的学术阐释,实现技术工具与文化分层传播的精准适配。这种交互模式使文化阐释的有效性提升 23.6%(基于游客回访数据),充分印证了技术赋能必须与文化内涵的分众化表达相结合。

(二)立足河南文化,打造特色品牌

河南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与根基,在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中,不能简单停留在资源展示,而应进一步强化文化叙事、场景建构和价值传播。需要聚焦于河南的“根”“源”特质,构建“1+N”文旅发展生态,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结合,打造“文明探源·仰韶文化”“早期中国·夏商文明”等特色 IP,塑造专属河南的文化标识。借助科技,开展龙门石窟 AR 游览、殷墟数字甲骨文互动等特色活动,构建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河南专属品牌矩阵。

同时,以郑汴洛安为核心,联动四大国家文化公园,实现全域协同发展。特色品牌方面,打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核心品牌,构建“老家河南”“华夏古都”“中国功夫”等超级 IP,塑造差异化品牌优势;利用各区域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指导地方结合本地历史文化特点创建细分文创品牌,避免同质化,全面提升品牌辨识度与整体竞争力,实现河南本土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品牌价值提升。

(三)升级本土化产业链条,提升核心竞争力

1. 锚定河南历史文化遗产特色补链强链

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要以河南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产业链核心,突破传统观光模式。应进一步推动“文旅+科技”“文旅+演艺”“文旅+研学”“文旅+文创”等复合业态发展,打造“遗产保护—产品开发—消费体验”的闭环。具体而言,依托殷墟甲骨文打造考古研学全链条,围绕隋唐洛阳城构建“遗址观光—遗址演艺—文创消费”模式,以神垕古镇钧瓷非遗延伸“烧制—体验—销售”产业链,让产业链各个环节深度绑定河南特色资源,推动历史遗产从“可看”变为“可玩、可带、可体验”,把河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 以“郑汴洛安”为核心联动区域遗产资源

结合“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品牌活动,围绕沿黄河、大运河分布的地域布局特色,以郑州、开封、洛阳、安阳为核心,联动黄河、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推进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建设。串联龙门石窟、少林寺、清明上河园等沿黄核心历史文化遗产,以及殷墟遗址公园、洛阳含嘉仓遗址、商丘古城等沿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形成“核心引领+轴线串联+全域协同”的河南特色文旅空间布局,实现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有效规避省内各地市的同质化竞争。

(四)强化本土化人才、政策与资金保障

1. 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

首先,针对河南文旅人才缺乏的问题,需要依托开办文旅专业的高校,增设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专项课程模块,培育熟知中原遗产发展脉络、深刻把握本土文化内核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其次,针对高质量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人才多集中于郑汴洛的现象,完善激励政策,引导专业人才向豫北、豫东、豫南等基层文博单位与非核心遗产片区流动,弥补河南文旅人才区域分布不均的短板。最后,常态化开展行业专项培训,持续提升从业人员对本地历史文化遗产的熟悉度,并逐步提升数字化素养与创新能力。

2. 优化顶层政策支持体系

落实河南省“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支持科技赋能文旅产业”^[10]等部署要求,出台适配河南新质生产力驱动历史文化遗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专项政策,明确目标任务、扶持措施与考核机制。重点支持殷墟、龙门石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等大遗址保护,以及少林功夫、钧瓷等非遗活化领域,打造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土文化 IP,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需要因地制宜,赋予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单位一定的发展自主权,允许各地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统筹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政策,制定符合地方文化特色的文旅融合政策;搭建数字化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全过程规范资金拨付、使用、验收流程,保障资金使用贴合河南文旅发展的实际需求。

3. 构建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中关于“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旅产业数智化赋能”的要求,推进本土化部署,针对当前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积极性低的问题,政府层面应发挥引导兜底作用,优化省级文旅专项资金配置,重点投向大遗址保护、非遗活化等核心领域,建立市县财政配套机制,通过以奖代补、融资贴息等方式引导地方投入,规范资金使用流程,提升财政资金效益。

五、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充分认识到将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记忆和历史意义融入旅游业发展中,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旅游开发方式^[11]。目前,河南在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智慧服务、业态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未来河南需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两高四着

力”重大发展要求,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坚持保护优先、科技赋能、文化为魂、市场导向,从技术、模式、产业、保障四方面系统发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历史文化遗产、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科学保护与价值高效转化,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遗产创新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之路,有效破解传统模式下保护与开发相互掣肘的突出难题,实现文旅产业融合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高质量发展,助力河南文旅强省建设与中原文化影响力提升,推动河南文旅在中原更加出彩、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84.

[2] 范颖.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 全国流通经济,2025(17):61-64.

[3] 史英霞,曹洋,李晨阳. 河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策略研究[N]. 黑龙江日报,2024-05-27(7).

[4]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Z/OL]. (2022-01-16)[2026-06-02]. <https://hct.henan.gov.cn/2023/08-10/2794716.html>.

[5] 中华,王怡潇. “圈粉”超11亿 吸金破万亿:2025年河南文旅消费市场交出亮眼答卷[EB/OL]. (2026-01-21)[2026-05-29]. <https://www.henan.gov.cn/2026/01-21/3312242.html>.

[6] 张茜. 新质生产力赋能河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与对策[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5,27(7):56-60.

[7] 科技赋能整体满意 建设水平还需提升:河南省科技赋能博物馆调研分析[EB/OL]. (2026-04-17)[2026-06-02]. <https://tjj.henan.gov.cn/2024/04-17/2980046.html>.

[8]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据聚合成果专题展开展[EB/OL]. (2023-01-15)[2026-04-19]. <https://hct.henan.gov.cn/2023/01-15/2673589.html>.

[9] 郑州市黄河文化公园管委会. 郑州市黄河文化公园管理委员会2022年工作计划[EB/OL]. (2022-04-15)[2026-04-22]. <https://public.zhengzhou.gov.cn/D08Y/6378022.jhtml>.

[10] 中共河南省委.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N]. 河南日报,2025-11-30(1).

[11] 姚寅歌,李丁杰. 文旅融合背景下洛阳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7(3):57-6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ltural-tourism Industry with Henan’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Driven by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XIE Hao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radl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enan Province is endowed with rich and diver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taking culture-tourism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s its approach, Henan has made remarkable phased achievements in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tourism industry,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a culturally powerful province.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upply technological momentum and innovative vitality for the revitalization-oriented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cultural-tourism industry. Facing innovation-le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Henan shall build an in-depth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cultural-tourism industry from four dimension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ode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safeguard support. It should highlight contemporary orientation, local cultural roots and technology-driven logic, and advance mutual empowerment and deep coupling betwee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tourism industry. Thereby it delivers solid du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anchoring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Liang Gao Si Zhuo Li (Two High-level Development Goals and Four Key Priorities)", constructing a strong cultural-tourism province, and build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enter.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en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tourism industrial integration; practical pathways

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现状、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

郑素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承压,创新是关键驱动力,R&D 经费投入及强度是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通过实地调查和比较分析郑州市 R&D 经费投入的优势与短板,系统识别与厘清影响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内外部关键因素,以明确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与瓶颈。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系统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体系,为提升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水平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供路径指引,从而加快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助力郑州建设国家创新高地与国家中心城市。

关键词:企业 R&D 经费投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驱动;企业创新;创新高地

DOI:10. 13783/j. cnki. cn41-1275/g4. 2026. 04. 005

中图分类号:F273. 1;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28-07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预期转弱的压力,而创新会给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1]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R&D”)经费及其投入强度是监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国家、地区或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规模及水平应用最广泛的指标。研究表明:R&D 经费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R&D 经费投入强度对区域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3]。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度推进,R&D 经费及其投入强度在决策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 R&D 经费投入主体是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医院和高等院校。在全国约 3. 63 万亿元的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中,企业的支出约为 2. 82 万亿元,占全社会总量的 78%以上^[4]。企业 R&D 经费在全社会 R&D 经费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决定一个地区创新潜力的是企业的创新意愿、投入和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正式、完整提出后,在后续多个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及文件中被反复强调和部署^[5]。在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核心战略的背景下,研究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对于加快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实现郑州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现状分析

(一)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概况

1. 规模和强度持续增长,强度超全国平均水平
2021 年,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首次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之后持续增长。通过纵向对比可知,郑州的研发投入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规模和投入强度实现双重增长,为郑州市提升创新能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2021—2024 年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及强度表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 (单位:亿元)	310. 44	344. 72	369. 77	414. 37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 (单位:%)	2. 45	2. 67	2. 72	2. 85

资料来源:根据 2021—2024 年河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收稿日期:2026-05-20

基金项目:2025 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河南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构建研究”(252400411291);2022 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河南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推进策略及政策体系研究”(222400410012)

作者简介:郑素苹(1973—),女,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与治理。

2. 横向比较有差距

从横向对比来看,郑州市研发投入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是与全国研发投入先进城市如深圳、苏州相比差距明显,这两个城市从 R&D 经费投入及其投入强度上远超郑州市;二是作为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郑州市 R&D 投入规模居于末位,与其他八个国家中心城市相比差距较大,研发投入强度在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在第八位,仅高于重庆,但是重庆的研发投入规模超郑州约一倍。具体数据信息如表

表 3 2022—2024 年九大国家中心城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及强度表

序号	城市	2022 年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亿元)	2022 年 R&D 经费投入强度(%)	2023 年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亿元)	2023 年 R&D 经费投入强度(%)	2024 年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亿元)	2024 年 R&D 经费投入强度(%)
1	北京	2 843. 30	6. 83	2 947. 10	6. 73	3278. 40	6. 58
2	上海	1 981. 60	4. 44	2 049. 60	4. 34	2343. 70	4. 35
3	广州	988. 36	3. 43	1 042. 99	3. 44	1022. 32	3. 29
4	成都	733. 26	3. 52	824. 12	3. 74	920. 89	3. 92
5	武汉	692. 40	3. 67	761. 20	3. 80	880. 48	4. 17
6	重庆	686. 60	2. 36	746. 70	2. 48	797. 30	2. 48
7	西安	601. 08	5. 23	667. 94	5. 56	717. 49	5. 39
8	天津	568. 70	3. 49	599. 20	3. 58	620. 60	3. 44
9	郑州	344. 72	2. 67	369. 77	2. 72	414. 37	2. 85

资料来源:根据 2022—2024 年各省市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3. R&D 经费投入规模居于河南省首位,但 R&D 经费投入强度较低

与河南省各市相比,郑州市 R&D 投入规模最大,但是 R&D 投入强度较低。郑州市集中了全省 32. 5%的 R&D 经费,在河南省各市的 R&D 经费投入规模中一直居于首位,远超第二名洛阳。但是郑州市 R&D 投入强度排位较低,2024 年在全省各市中排第三位,较第一位洛阳市低 0. 18 个百分点。具体数据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2021—2024 年河南省 R&D 经费投入先进城市

单位:亿元

年度	洛阳	郑州	新乡	焦作	济源	三门峡
2021	153. 91	310. 44	79. 17	34. 01	15. 47	31. 36
2022	168. 09	344. 72	88. 87	50. 62	16. 60	34. 51
2023	190. 01	369. 77	92. 86	63. 07	27. 12	43. 25
2024	176. 27	414. 37	94. 54	61. 70	14. 43	48. 47

资料来源:根据 2021—2024 年河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表 5 2021—2024 河南省 R&D 经费投入强度先进城市

年度	洛阳	郑州	新乡	焦作	济源	三门峡
2021	2. 83%	2. 45%	2. 45%	1. 59%	2. 06%	1. 98%
2022	2. 96%	2. 67%	2. 57%	2. 27%	2. 18%	2. 06%
2023	3. 44%	2. 66%	2. 71%	2. 82%	3. 61%	2. 79%
2024	3. 03%	2. 85%	2. 65%	2. 60%	1. 83%	2. 99%

资料来源:根据 2021—2024 年河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备注:2023 年河南省 R&D 经费投入强度根据 2023 年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最终核实数据计算得出

(二)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概况

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对于郑州市企业

2、表 3 所示。

表 2 2024 年郑州市与国内 R&D 经费投入先进城市比较表

城市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亿元)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
郑州	414. 37	2. 85
深圳	2453. 07	6. 67
苏州	1 118. 94	4. 19

资料来源:根据《2025 苏州统计年鉴》、2024 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4 年河南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整理

R&D 经费投入的数据资料无法包含全部企业的数据,但是鉴于规上工业企业、建筑业、服务业的 R&D 经费投入占到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的 80%左右(见表 6),本文以郑州市规上工业企业、建筑业、服务业相关资料数据作为企业 R&D 经费投入研究依据,以这三类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描述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现状。

1. 企业 R&D 经费投入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企业 R&D 经费投入在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占比约为 80%,但与 R&D 经费投入先进城市如深圳市相比,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郑州市规上工业企业、建筑业、服务业 R&D 经费合计占比如表 6 所示。

表 6 2021—2024 年郑州市规上工业企业、建筑业、服务业 R&D 经费投入占比

指标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规上工业企业、建筑业、服务业 R&D 经费合计(亿元)	244. 47	289. 62	296. 31	319. 36
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亿元)	310. 44	344. 72	369. 77	414. 37
占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比重(%)	78. 75	84. 02	80. 13	77. 07

资料来源:根据郑州市 2022—2025 年统计年鉴整理

2. R&D 经费来源以企业资金为主

根据 2021—2024 年郑州市 R&D 经费来源可知,郑州市 R&D 经费来源以企业资金为主,企业资金占比保持在 80%以上。企业是 R&D 活动最核心

的资金供给者,政府资金为企业 R&D 经费支出做了适当补充,政府资金主要通过科技计划项目、R&D 人员奖励、补助等形式引导和支持企业的重点研发活动。以企业资金作为企业 R&D 经费是普遍规律

表 7 2021—2025 年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来源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R&D)经费合计	资金来源			
		政府资金	企业资金(占比)	境外资金	其他资金
2021	3 104 386	453 204	2 557 666(82.39%)	31	934 860
2022	3 447 172	408 585	2 937 720(85.22%)	49	100 826
2023	3 697 664	535 344	3 004 697(81.26%)	62	157 561
2024	4 143 678	586 113	3 446 018(83.16%)	224	111 323

资料来源:根据郑州市 2022—2025 年统计年鉴整理

3. 日常性支出远超资产性支出

根据郑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郑州市 R&D 经费的日常性支出大于资产性支出,R&D 活动高度依赖于持续性的日常运营管理费用和劳动力的投入,而非依赖于大型硬件设施、先进实验室等固定资产投入。这表明郑州市的 R&D 活动处于应用研究和技术追赶期,重心在于吸收、改进、集成和应用现有

表 8 2021—2024 年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结构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日常性支出合计	日常性支出			资产性支出合计	资产性支出		
		规上工业企业	建筑业	服务业		规上工业企业	建筑业	服务业
2021	224.48	154.09	30.34	40.05	14.48	11.84	0.54	2.10
2022	271.58	178.17	52.54	40.87	9.00	7.58	0.34	1.08
2023	270.96	197.44	29.26	44.26	10.52	7.24	0.25	3.03
2024	302.66	213.22	49.23	40.21	16.70	15.08	0.21	1.41

资料来源:根据郑州市 2022—2025 年统计年鉴整理

4. 主导产业是拉动企业 R&D 投入强度的核心引擎

根据郑州市统计局数据分析可知,2024 年郑州市 R&D 经费支出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这些行业也是郑州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是拉动全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增长的核心引擎,构成了区域 R&D 活动的绝对主力。主导产业 R&D 经费投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为郑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创新动能和创新活力。2024 年郑州市 R&D 经费投入排名前十的行业如表 9 所示。

表 9 2024 年郑州市 R&D 经费投入排名前十的行业

单位:万元

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类别	R&D 经费投入
1	汽车制造业	450 060.5
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82 281.0
3	房屋建筑业	289 448.5
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269 969.4
5	专用设备制造业	245 000.2
6	土木工程制造业	187 201.4
7	专业技术服务业	148 463.5
8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47 281.6
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44 595.5
1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7 739.0

资料来源:根据郑州市 2025 年统计年鉴整理

的体现,也说明郑州市的创新增长模式是“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引导”。郑州市全社会 R&D 经费来源情况如表 7 所示。

技术,对顶尖基础科研设施投入相对较少。资产性支出是搭建长期 R&D 能力的基础,日常支出尤其是劳务费占主导,说明郑州市的基础研究能力较为薄弱,人才依赖度过高且劳动力成本攀升,R&D 活动会有短期化倾向。2021—2024 年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结构如表 8 所示。

5. 区域发展不均衡

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和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在区域发展上存在一致性,均呈现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以规上工业企业为例,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巩义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遥遥领先,属于 R&D 经费投入第一梯队,惠济区 R&D 经费投入最少。根据调研可知,企业 R&D 经费投入不均衡发展和郑州市的城市战略布局有一定关系。2024 年郑州市各区县企业 R&D 经费投入明细如表 10 所示。

(三)系列政策引导、支持企业加大 R&D 经费投入

郑州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加大 R&D 经费投入,包括对企业 R&D 投入进行事后补助,针对性奖补,搭建创新平台,强化成果转化奖励等。其中,税务部门的优惠、奖励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加计扣除政策精准地对企业 R&D 投入进行激励。2023 年郑州市共有 5824 家企业享受 R&D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6]。加计扣除是普惠性的税收优惠政策,郑州市所有合规企业均可享受并得到全面落实。

表 10 2024 年郑州市各区县企业 R&D 经费投入明细表

单位:万元

地区	规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投入	建筑业 R&D 经费投入	服务业 R&D 经费投入
郑州市合计	2 282 967. 1	494 415. 1	416 246. 4
中原区	86 885. 6	59 093. 4	50 337. 5
二七区	161 719. 7	32 362. 1	20 126. 3
管城回族区	157 071. 3	8 476. 8	12 310. 5
金水区	11 302. 1	25 910. 7	147 868. 5
上街区	69 221. 6	0	949. 1
惠济区	6 648. 3	1 514. 3	419. 4
中牟县	76 452. 3	13 495. 6	3 065. 4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345 393. 5	314 408. 8	20 474. 5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54 754. 2	16 376. 8	105 520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352 189. 2	185. 2	4 653. 4
郑东新区	99 891. 2	18 715. 2	47 519. 4
巩义市	305 130. 2	0	0
荥阳市	92 856. 7	3 459. 1	1 458. 2
新密市	56 203. 2	417. 1	664. 9
新郑市	70 714. 9	0	879. 3
登封市	36 533. 1	0	0

资料来源:根据郑州市 2025 年统计年鉴整理

(四) 构建企业 R&D 经费资金支持体系

郑州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河南省区域创新中心,对企业 R&D 经费投入构建了“多层次、全周期”的资金支持策略体系。该体系以普惠性税收优惠为基础,市级、区县级财政直接补助,并引导多元化金融资源投入。为促进企业 R&D 经费投入,郑州市依托多元资金支持模式,落地研发后补助、创新奖励、科研经费补贴、研发人才奖励等各类资金扶持政策,同时牵头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工程中心与科技共享平台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完善区域创新支撑体系。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痛点,郑州市联动金融机构创新推出“郑科贷”金融产品,有效弥补了政府财政资金的供给短板,切实破解科技型企业研发融资困境,为企业创新发展、持续加大 R&D 经费投入开辟了全新路径。

(五) 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后发优势呈现

为充分调动科研人员主动性、积极性,根据全市人才引育工作实际需求,郑州市出台《郑州市创新创业人才团队项目资助实施细则》《郑州市外国专家项目及人才国际化培养实施办法》等人才政策,并逐步加大引育力度。高端 R&D 人才的培育与引进,有效激活了企业研发创新活力,助力企业拓展研发活动规模、提升研发实施成效、优化研发经费使用效率,为郑州市企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

三、影响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因素分析

(一) 企业外部因素对 R&D 经费投入的影响分析
现代企业的整个生存环境从根本要求企业必

须将 R&D 与创新作为核心生存法则。通过分析影响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外部因素,引导企业 R&D 经费投入行为,促进企业提效升级,推动行业发展,优化郑州市创新系统的整体效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政府政策与制度环境

政府是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引导者,也是重要参与者,有效的政府政策与制度环境,可以构建一个研发成果可预期、收益稳定、风险共担的 R&D 生态系统,包括: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补贴等政策和制度的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的普惠性和确定性可以为合规的所有企业 R&D 经费投入提供优惠,尤其对于被忽视的小微型企业来说,长期稳定的 R&D 经费投入补助,可以成为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有效补充。政府资金通过财政补贴与项目资助形式给予企业 R&D 经费投入活动引导和激励,降低企业 R&D 成本,激励企业更多投入 R&D 活动。但是要注意实施中存在的“挤出效应”和“寻租行为”,企业可能会仅仅为了寻求补贴进行无效的研发,造成资源浪费,以致政策和制度失效。

2. 产业特性与市场竞争因素

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决定了其创新的压力、动力和模式,产业天然属性是影响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关键因素。根据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产业结构分析,R&D 经费投入规模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其产业属性与技术密集度使得 R&D 经费投入远高于传统制造产业。

市场竞争环境会倒逼企业投入 R&D 以实施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保持市场竞争力,尤其是缺乏技术壁垒、竞争激烈的企业产品。严格意义上来说,现代市场中没有绝对的垄断行业,企业都处于竞争的环境,所以,通过 R&D 投入实现产品和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3. 创新氛围与人才要素

企业的 R&D 活动风险高、周期长,预期结果不确定性大,与企业追求盈利的根本目的以及金融资本“求安全、短回报”的特性存在明显矛盾。因此,企业所在区域的整体良好创新氛围能够鼓励创新,对 R&D 活动和 R&D 投入有着激发作用,吸引和留住研发人才,增强 R&D 人员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同时还和 R&D 活动绩效密切相关。R&D 活动要素中,人才要素在 R&D 生态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 R&D 活动的质量和成本以及产出效率。

(二) 企业内部因素对 R&D 经费投入的影响分析

1. 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双重效应

企业规模、内部现金流对 R&D 经费投入及其强

度呈正向的影响关系^[7-8]。对郑州市部分企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大型企业通常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更丰富的资源、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完善的 R&D 管理体系,能够承担长期、高风险的基础 R&D 项目。因此,企业资产规模大、营业收入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通常 R&D 经费投入也较多;强大的盈利能力能为企业 R&D 提供便捷的、源源不断的内部资金。但是实践中也存在“挤占效应”,当企业面临短期利润压力时,可能忽视 R&D 活动,如传统制造业企业在经济下行周期中,首先压缩的就是 R&D 经费。生存优先逻辑决定了大量中小微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生存是其第一要务,在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率微薄的情况下,即便有创新意愿,也无力进行持续的 R&D 投入,这是郑州市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面临的普遍困境。

2. 企业家精神与高管团队特质

企业家创新意识是企业创新文化的源头。具有强烈创新精神、技术背景、风险偏好强、长期导向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会将 R&D 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性投入。郑州市应该营造敢于冒险、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家文化氛围,来引领企业 R&D 投入活动。

高管团队的教育水平、专业背景、年龄结构及创新经历等人力资本特征,会显著影响其对 R&D 价值的认知和决策。具备高学历或专业技术背景的董事长对企业 R&D 经费投入和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高学历和技术类高管能够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识别技术机会,理解研发价值,促进企业创新,加大企业 R&D 经费投入。郑州市企业的高管团队整体学历和国际化视野与沿海城市相比尚有提升空间。

3. 企业战略定位与创新模式选择

采用技术领先或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其 R&D 经费投入强度必然高于采用成本领先或模仿跟庄战略的企业。郑州市不少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战略选择上偏重成本控制和规模扩张,对通过 R&D 构建核心壁垒重视不足。不同创新模式的选择对企业 R&D 投入也有影响。越来越多的郑州市企业开始从内部独立研发转向开放式创新,主动积极利用外部资源。开放式创新虽然能降低风险、提高效率,但对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和合作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4. 技术积累与吸收能力

技术存量 and 吸收能力影响着企业 R&D 经费投入。技术存量具有双重影响,一项新技术和新产品对于企业有着一定时期的红利期,所以,一方面企业如果凭借现有的技术和产品能够获取稳定的收益,

将不再进行新的 R&D 投入;另一方面由于 R&D 活动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企业已有的专利、技术诀窍、R&D 团队是进行新 R&D 的基础,依赖于先前的 R&D 路径,企业可以进行更深、更新的技术 R&D 和产品 R&D,这会促使企业不断进行 R&D 投入。吸收能力会使企业更有效地从产学研合作和外部技术引进中获益,形成“R&D 投入→吸收能力→创新绩效→更多 R&D 投入”的良性循环。

此外,企业年龄也是影响企业进行 R&D 活动的因素,年轻企业灵活、创新动力强,但资源有限,R&D 经费投入不足;成熟企业资源丰富但创新动力下降,从而降低 R&D 经费投入意愿。

四、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提升对策

(一) 政府层面:强化制度设计,追求长远目标

1. 完善促进企业 R&D 经费投入政策体系

政府的补贴和奖励无疑是提升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有效措施,政府提供补助有利于企业提高 R&D 经费投入强度^[7],所得税优惠力度对下一期 R&D 经费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8]。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型企业收到的政府补助金额起不到激励作用,小微企业不够补贴标准,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政府资金无法实现普惠式补贴,所以,促进 R&D 经费投入政策需要超越简单的政府补贴思维,构建一个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石、以普惠性税收激励为核心、以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的综合性制度环境,以有效地激发和引导企业的内生研发动力。关注重点在于: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稳定性和申报的便利性,享受优惠的时点应提前。二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和有效执行,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确保企业能够从其创新投资中获得独占性收益,是激励 R&D 的基石。若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企业将丧失 R&D 动力。三是对科技型小企业给予重点激励,并且建立长期制度,保障政策的持续性。

2. 整合 R&D 活动要素,促进要素共享和流动

建立管理制度体系,促进 R&D 要素共享和流动。一是设施要素共享。主要是大型科学装置、检测认证平台、中试基地等。企业无需完全自建昂贵设施,通过共享降低资产性支出,轻资产启动以加速 R&D 进程。设施要素共享尤其对中小型企业 R&D 有利,对于郑州市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解决了研发活动的设施限制问题。二是吸引人才要素汇聚和流动。形成专业化人才池,可以降低企业招募、匹配 R&D 人才的成本和难度,健康的人才流动能促进知识扩散和创新组合,尤其对需要跨学科团队的企业至关重要。优化人才服务生态,在子女教育、医疗保健、配偶就业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优惠政策。三是金

融要素全过程供给。结合企业类型、研发阶段及发展需求的差异化特征,精准匹配适用的金融产品,强化精准金融扶持,并将资金资源重点向中小企业倾斜。在财政补助资金有限的前提下,大型企业 R&D 投入主要依据自身发展战略与布局规划自主推进,而各类资金支持能够有效赋能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显著推动其 R&D 投入增长。此外,精简经费拨付流程,省、市级各类奖励与补助资金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至企业,避免资金拨付周期过长、到账延迟,防止挫伤企业 R&D 投入积极性。

3.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

浓厚的区域创新文化氛围,为企业持续加大 R&D 投入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首先,设立创新基金,允许企业申请用于高风险 R&D 活动探索。其次,建立最小可行产品试点流程,为早期想法提供小范围、低成本、快速的用户或者市场测试通道,并建立数据反馈闭环。最后,鼓励引导研发人员成立正式交流协会和非正式的交流团体,搭建知识库,共同讨论、联合改进。营造研发文化氛围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本质是重塑组织的行为习惯和默认规则。其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某个单项活动多么精彩,而在于领导者理念、管理机制、支持工具和制度保障是否同频共振、持续发力。

(二) 产业层面:推动全链条深度融合

1. 加强链主企业的主导作用

链主企业通常指在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核心资源或终端渠道的龙头企业。在 R&D 投入中,链主企业在 R&D 能力、R&D 资源上也起着主导作用,它可以通过需求牵引、资源整合、风险共担、生态构建,成为整个产业链 R&D 活动的系统组织者和创新引擎。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的链主企业,有动力和能力进行高强度 R&D,并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创新。

2. 关注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 R&D 活动

郑州市和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较,尤其是和深圳、苏州、北京、上海相比,缺乏独角兽企业,所以,郑州市在引育独角兽和瞪羚企业的同时应积极关注中小企业。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同样有 R&D 创新需求,但是 R&D 资金、设施、高端科研人才缺乏的问题严峻,处于市郊的企业问题更突出。中小微企业是 R&D 投入的潜力军,一方面要加强中小型科技企业认定,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和奖励其 R&D 经费投入,建立中小企业高端人才引进保障制度,全力促进中小企业 R&D 投入。

3. 促进中介服务升级,推进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研发的根本动力。衡量区

域创新能力既要看到 R&D 投入占 GDP 的比重,也要看到 R&D 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若大量 R&D 成果仅止于立项、论文和评奖,而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并产生良好的效益,则是浪费资源和人才。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措施主要是打通科技人员、单位和需求企业之间的通道,政府引导、直接设立一批技术中介机构,或者建立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设立技术服务机构,全程运作科技成果转化。

(三) 企业层面:激发内生动力,提升企业 R&D 经费投入

郑州市 R&D 经费投入的现状显示,其创新增长模式是“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引导”。企业是 R&D 经费投入的决策者、执行者、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因此,要充分发挥企业自身能动性,提升 R&D 经费投入。

1. 制定长远战略目标

企业要制定有效促进 R&D 投入的长远战略目标,不要将 R&D 投入看成一项成本支出,应定位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投资和战略基石。企业应制定长远战略目标,至少制定 5—10 年的持续投资计划,强调 R&D 与生产的深度结合,通过技术创新,彻底重塑行业的用户体验和成本结构。

关注基础研究投入,为企业 R&D 活动注入社会使命感。企业研发中的基础研究周期长、见效慢,很多企业不愿意涉足,但是基础研究可以争取国家级和省级经费支持。例如,广州市 R&D 经费投入及投入强度连续八年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得益于广州市促进 R&D 经费投入的措施除了执行奖励、补助等政策外,还针对基础研究持续发力,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经费支持。争取国家和上级部门的研发经费支持,不仅可以获得资金支持,重要的是将企业的研发需求,与国家、行业的战略方向进行精准匹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明确方向。

2. 引进具备高学历、专业技术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

企业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决策主体和经营管理执行主体,在企业 R&D 投入决策、研发方向和 R&D 活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年龄、学历、专业、特质等特征会使其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价值倾向和行为选择,从而对企业的 R&D 经费投入作出不同决策。高学历、技术型高管团队对企业研发投入及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会利用自身优势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加大企业的 R&D 投入。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短期薪酬激励均对企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10]。

3. 营造重视 R&D 的文化氛围

企业的管理层要在全公司范围内重新定义 R&D 活动的价值,R&D 不是消耗资源,而是对未来获取收益、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投资。R&D 不仅是实现业务需求的技术工具,更是驱动业务突破、创造新市场的核心引擎。企业营造重视 R&D 的文化氛围,需自上而下贯通四个建设层次:一是信念与愿景层面,树立企业创新生存逻辑与未来发展承诺;二是战略与资源层面,落实研发规划与经费预算的硬性保障;三是机制与保障层面,完善配套管理制度;四是行为与符号层面,传递可视化、可感知的日常创新信号。企业可通过讲好研发创新故事,将重视 R&D 创新的理念融入企业使命与核心价值观中。

五、结语

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但是与先进城市和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影响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的因素包括政府政策与制度环境、产业特性与市场竞争因素、创新氛围与 R&D 活动要素等外部因素,以及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企业家精神与高管团队特质等内部因素。在分析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现状,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提出强化制度设计,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营造重视 R&D 企业文化等建议,以提升郑州市企业 R&D 经费投入,从而带动郑州市全社会加大 R&D 经费投入,打造国家创新高地。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张志茹,韩昕好,张娅,等. 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航空财会,2022(5):52-57.

[3] 高丽娜,施晓敏,张惠东,等. 研发投入强度、结构与区域创新格局演进[J]. 经济问题,2025(1):124-129.

[4] 国家统计局. 2023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 (2024-10-02)[2025-12-20]. [https://www. stats. gov. cn/sj/zxfb/202410/t20241002_1956810. 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10/t20241002_1956810.html).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6] 郑州市统计局. 郑州统计年鉴 2024[M/OL]. [2026-04-26]. [https://topic. zhengzhou. gov. cn/u/cms/tjj/statistical_2024/index. htm](https://topic.zhengzhou.gov.cn/u/cms/tjj/statistical_2024/index.htm).

[7] 青思宇,冯蔚然,程琳,等. 创业板企业创新驱动动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研发投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2(6):116-118.

[8] 汪慧玲,王英. 所得税优惠、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J]. 商学研究,2022,29(1):24-33.

[9] 刘伟. 企业高管教育背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科技行业的分析[J]. 财会通讯,2024(10):73-78.

[10] 张曦予. 高管激励、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D]. 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24:7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Enterprises' R&D Expenditure in Zhengzhou City

ZHENG Suping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under mounting pressure at present, and innovation acts as a key driving force. R&D expenditure and its intensity constitute core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esses strengthening the principal-body status of enterpris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R&D input in Zhengzhou,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and sorts out ke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fluencing enterprises' R&D expenditure in Zhengzhou, so as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restrictive bottlenecks. It puts forward a systematic and operable policy suggestion system from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levels, providing path guidance for raising enterprises' R&D expenditure level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in Zhengzhou. This helps increase the total-society R&D investment of Zhengzhou, and boosts the city's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nnovation highland and a national central city.

Keywords: corporate R&D expenditure; R&D intensity; innovation-drive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novation highland

多元一体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论根基、生成逻辑与协同路径

王迪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现实依据。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文化认同、利益联结、社会交往、宣传教育四个维度所处的时代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在新时代已得到充分彰显,而一体整合的制度化建设尚未同步跟进,二者形成发展节奏失衡的态势。立足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框架,从上述四个维度系统梳理这一差异的生成逻辑,探索一体整合的有效路径,为深化基层民族治理实践提供学理参考。

关键词: 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逻辑;协同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6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6)04-0035-0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2] 两次论述一脉相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从“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拓展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外延进一步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是应对风险挑战、凝聚磅礴力量的思想基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推进这一系统工程,不能仅停留于政策号召层面,还需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结构,深入理解多元与一体的关系。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格

局^[3]正是阐释这一关系的经典框架: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多元与一体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对立矛盾,而是动态平衡的辩证统一。基于多元一体格局框架审视当前现实,多元与一体的动态平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多元性得到充分彰显,一体化建设相对滞后,二者在更高发展阶段亟须形成更为协调的良性互动。

一、多元一体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根基

(一) 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内涵

费孝通阐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蕴含多元与一体两个辩证统一的核心内容。多元指向我国56个民族在历史起源、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客观差异。从苗族的银饰盛装到藏族的氍毹藏袍,从傣族的泼水节到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与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生动图景。一体则强调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疆域家园、价值追求、国家

收稿日期:2026-05-20

作者简介:王迪(1997—),女,山东聊城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认同和民族利益。一体并非消解民族差异,而是在多元共存的基础上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情感联结。抗战时期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玉树地震后举国救援,从战火中的共赴国难到和平年代的守望相助,一体始终是中华民族在关键时刻凝聚力量的结构基础。多元为一体奠定了历史与文化根基,为整体认同提供丰厚滋养;一体为多元提供方向引领与价值统摄,使各民族的差异性在共同体框架内得以包容并存^[4]。这一理论框架既正视民族差异的客观性,又强调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为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解释框架。

(二)多元一体格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契合

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在于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尊重多元是前提,巩固一体是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这一辩证关系在新时代的实践展开,以一体为引领强化“五个认同”,以多元为基础尊重各民族发展特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在于实现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同质化,而是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共识。多元一体格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学理依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二者在核心逻辑与实践指向上高度契合。

二、多元一体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民族工作摆在全局性、战略性重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显著成效。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依托文化认同^[5]、利益联结^[6]、社会交往^[7]、宣传教育^[8]四个基本条件的协同支撑。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着眼新时代新征程更高的目标要求,上述四个维度所处的时代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需要持续关注和引导的结构性动态。

(一)文化认同:繁荣多元文化与凝聚一体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9]文化认同构成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深入实施,“文化润疆”等重大文化工程系统推进,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文化认同奠定了坚实

的历史基础,也为共同体意识生成提供了精神滋养。催生这一动态的是文化生产与传播条件的深刻变革。伴随市场经济深化和社会全面开放,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从相对集中走向高度多元,各族群众日益成为文化内容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数字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极大拓展了文化流通渠道,这是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多元文化内容供给空前活跃,各民族文化特色在网络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展示平台,这是文化领域多元性充分彰显的客观基础。

受此驱动,一体性文化共识的凝聚呈现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特征。第一,共同历史叙事的主导地位面临多元信息竞争。统编历史教材等系统性工程已为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在算法驱动的信息环境中,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差异性叙事持续分散公众注意力。第二,公共文化展示存在多元呈现与一体彰显的结构性张力。民族地区博物馆、文化馆等设施覆盖面持续扩大,分类呈现的叙事惯性已相对固化,交融叙事的体系化构建仍有较大创新空间。第三,一体叙事面临碎片化传播生态的适配难题。宏大叙事具备系统性优势,短视频等轻量化载体已成为主流传播形态,二者在传播语境与表达形式上各有不同,难以精准契合大众碎片化的接收习惯。

以上三个层面指向同一内在逻辑:市场经济与数字技术赋能多样文化形态率先发展,整体性文化共识的凝聚则需在复杂信息环境中提质升级。二者之间形成时序落差,多元文化供给的扩张速率天然高于一体共识的凝聚速率。文化认同建设的深层动因,在于调和二者发展步调、促进协同发展。

(二)利益联结:利益格局多元化与利益共享制度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经济相依,是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9]利益联结是构成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2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全部整族脱贫,民族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利益联结筑牢了历史根基。少数民族在脱贫攻坚战中的发展态势,源自经济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各族经济利益关系由相对同质化走向高度多元化。各地区依托不同资源环境、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参与市场竞争,发展路径各有特色,这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正常体现。与此同时,各族群众对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期待普遍提高,对“共同发

展”的感知从收入增长延伸至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维度获得感的关切。

在此背景下,利益联结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特征。第一,自然资源禀赋的经济效能转化具有挖掘潜力。西部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的重要富集区,国家通过资源税改革、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制度不断健全利益保障体系,但资源开发的经济效能仍有进一步释放的潜力,企业与地方协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仍有持续拓展的空间。第二,需加强市场化进程中弱势产业和群体的系统性支持。兴边富民行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等政策体系持续发力,民族特色产品品牌培育、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等工作扎实推进,但部分民族地区因地理条件、产业基础等因素,在市场对接和产业链延伸方面仍有所欠缺,需要更加系统的扶持。第三,基本公共服务的品质尚需升级。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实现整体性跃升,硬件设施不断完善,普惠共享的服务格局初步形成,但服务质量、人才支撑、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

三个层面揭示了共同的动态规律:利益格局在市场机制驱动下趋于多元分化,这是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向,也是激发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而将各类分化利益统筹整合、构筑利益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应匹配利益分化的节奏与层次协同推进。二者之间存在客观的适配周期,利益格局变化越快,利益整合机制的升级要求就越高。利益联结建设的深层动因,在于利益整合的制度化建设需要在更高发展水平上实现新的升级,使“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得到更加充分的制度保障。

(三) 社会交往:物理空间共处与社会心理共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情感相亲,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9] 社会交往构成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基础。城镇化加速推进和人口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使各族群众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生活的空间格局基本形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为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历史性条件。驱动这一进程的,是空间整合、社会心理整合循序渐进的运行机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纵深推进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推动各民族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跨区域流动,打破了传统民族分布的地理边界,使多元共处从局部现象变为全国性常态。物理空间的共处可以通过人口迁徙和城市规划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而社会心理层面的理解和信任则需要持续的互动、合作、情感投入来逐步

深化和累积,二者之间存在客观的时间差。

由此,社会交往呈现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特征。第一,互嵌式社会结构从空间混合向社会关系交织转变。互嵌式社区建设已积累有益经验,但如何从试点走向常态化、制度化,使空间互嵌沉淀为社会关系融合,仍需更系统的制度设计和更广泛的实践推广。第二,交往活动从阶段性安排向常态化机制的转化。民族团结活动的载体形式已从传统文艺汇演拓展至社区志愿服务、产业合作共建等多元形态,但交往的深度和持续性仍依赖更加常态化、制度化的平台支撑。第三,社交平台从信息同质化向跨群体良性互动的转型。算法推荐技术带来的信息同质化是各领域普遍存在的技术治理难题,但社交平台已成为各民族群众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的主要渠道,探索将促进跨群体交流的导向纳入社交平台算法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三个层面贯穿着同一递进逻辑:物理空间的多元共处是前提条件,社会心理的一体共情是深层目标,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可能,后者需要更长时间的制度培育和文化浸润。这不是交往成效的不足,而是由于交往品质提升遵循社会关系建构的一般规律,从相邻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亲,是一个递进累积的过程。社会交往建设的深层动因,在于加快这一递进过程中的制度化建设。

(四) 宣传教育:一体化价值引领与分众化精准传播

宣传教育承担着将共同体意识从理论认知转化为自觉认同的关键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统编教材全面推行,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持续深化,融媒体中心建设实现县级全覆盖,宣传教育阵地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信息传播格局的根本性变化,构成了上述变化的宏观背景。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使得信息获取渠道从以主流媒体为核心的单中心格局,转变为社交平台、自媒体等多中心并存的碎片化格局。受众群体的认知习惯、媒介偏好、信息接受方式高度分化,代际差异和圈层差异日益凸显。这是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活力增强的客观结果,为宣传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载体选择,也提出了更高的精准化要求。

面对新的传播生态,宣传教育呈现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特征。第一,话语体系从宏大叙事到生活化表达的衔接转换。青年大学习、百姓宣讲团等品牌活动已积累有益经验,但如何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建立流畅的转换机制,使共同体意识从被宣讲的概

念转化为被感知的经验,仍需要在实践中持续探索。第二,传播载体从传统渠道到新兴平台的转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力,推出现象级传播产品,但面向农牧区群众、城市青年、老年群体等不同受众的最优载体组合仍有优化空间。第三,教育方式从单向灌输到参与式体验的革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要求:“把基本要求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全面覆盖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遵循规律、创新发展,注重落细落小落实、日常经常平常,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0]各地通过主题研学、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载体积极探索参与式教育模式,但实践中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仍有拓展空间。

三个层面的变化共同印证:受众分化程度越高,一体化的价值引领就越需要依托分众化渠道精准传达;传播生态越复杂,价值共识的凝聚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资源整合能力。这意味着需要新的传播生态中实现更高水平的能力升级,从能不能覆盖迈向能不能精准抵达、能不能深度内化。宣传教育建设的深层动因,在于以更强的整合能力回应更复杂的受众格局,构建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实践的高效转化体系。

三、多元一体格局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路径

基于上述生成逻辑,四个维度的结构性动态均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多元充分展开的时代条件下,更加注重一体的制度化整合,使二者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实现更加协调的互动。

(一)文化协同:以共有精神家园凝聚一体认同

文化协同的着力点,在于以构建一体性文化叙事体系回应多元繁荣条件下共识凝聚的结构性要求,使一体共识的凝聚与多元文化的展开实现更协调的互动。

系统挖掘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增强共同历史叙事的主导性。文化的深度认同植根于对共享历史的真切感知。央视《国家宝藏》节目通过讲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等文物故事,展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程,取得了广泛的社会传播效果,验证了借助大众媒介将共享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叙事的可行性^[11]。因此,应持续加大对各民族共创中华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力度,以扎实的历史叙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

根基。

推动公共文化展示从单一族别走向互鉴共呈,促进多元呈现与一体彰显的结构性协调。以互动关系而非族别区隔作为叙事主线,展演各民族特色文化、举办跨民族文体赛事,将文化互鉴由抽象概念转化为直观可感的线下体验。内蒙古草原文化节将蒙古族长调与汉族戏曲同台展演,贵州少数民族运动会邀请各民族运动员同场竞技,此类实践应跳出节庆范畴,嵌入民族地区博物馆常设展陈、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日常运营,使交融叙事从阶段性活动转变为常态化体验。

探索一体叙事的轻量化传播路径,提升宏大叙事在新型传播生态中的效能。在传播话语层面,将宏观理论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具体故事,以个体经验承载共同体价值;在生产机制层面,支持反映民族团结的优质内容,形成一体叙事的持续性供给,使主流价值在算法驱动的信息环境中保持充分的可见度和感染力。

(二)利益协同: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

利益协同的着力点,在于以完善利益整合的制度化建设回应利益格局多元化条件下的共享升级要求,使共同发展、共享成果从理念转化为群众可感的利益体验。

提升自然资源禀赋的经济转化效率,构建更加高效的资源价值转化机制。完善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动机制,引导企业加强与地方产业的配套衔接,延伸资源产业链,提升资源产品附加值。健全资源开发带动就业的长效机制,促进当地劳动力在资源开发及相关产业中实现稳定就业。通过系统性的机制优化,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带动作用,持续提升资源开发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健全面向弱势产业和群体的系统性支持机制,激活民族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将民族特色产品的市场化推广、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农牧区劳动力的技能提升与就业转移纳入系统性的支持框架。这种支持区别于“输血”式扶贫,其目标是使各族群众有能力在全国统一市场中平等参与竞争,让市场机制成为利益融合的平台。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品质提升,让获得感成为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基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不仅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更传递着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西藏15年免费教育、四川凉山州“一村一幼”计划、新疆标准化乡镇卫生院建设等实

践表明,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使偏远地区群众切实感受到与国家发展同步的改善^[12]。在巩固覆盖面成果的基础上,持续优化服务品质、配齐专业人才队伍、升级数字化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迈进。

(三)社会协同:以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共情

社会协同的着力点,在于以完善深度交往的制度保障回应空间共处向心理共情递进过程中的结构性要求。

推进互嵌式社区从空间相邻走向关系相融。北京牛街街道“民族之家”活动中心组织各族居民共同参与书法班、合唱团等日常活动,将邻居转化为熟人;中央民族大学推行混合住宿制度,不同民族学生同室生活,自然形成跨民族的日常交往网络。提炼此类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成熟经验,形成长效运行举措,让空间上的相邻逐步升华为社会关系上的相依,以制度化的共同生活培育日常化的共同情感。

推动交往活动向日常化、制度化方向深化。甘肃临夏州“石榴籽志愿服务队”组织各族青年共同开展社区服务,培育共同体意识;西双版纳州泼水节期间,各族游客与当地群众共同参与节庆活动,拉近心理距离。重点培育跨民族的社会组织、建设各民族共享的日常活动空间,使交往从接触转变为合作,在持续互动中积淀理解与信任。

推动网络空间从信息同质化向跨群体互动转型。信息茧房效应的加剧源于平台算法缺乏对跨群体沟通的引导,使得不同群体在虚拟空间中缺少交集^[13]。治理路径包括推动社交平台算法纳入“跨群体可见度”指标,使用户有更多机会接触不同群体的信息内容;建立网络涉民族信息的快速核实与澄清机制,及时消解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误解与偏见。网络空间治理的目标,不是消除差异性的文化表达,而是规避算法传播对多元表达的过度放大,防范群体间形成相互隔绝的信息孤岛,使网络空间真正成为各民族增进交往、凝聚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四)宣教协同:以精准化宣教促进知行合一

宣教协同的着力点,在于以一体化的宣教供给回应多元化的受众需求,实现主流价值统一引领与分众精准传播协调统一。

推动话语体系向生活化、故事化方向转换。理论术语虽能传递知识,却往往难以唤起情感。《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要求:“进一步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14]话语转化的关键在于以具体故事替

代概念宣讲,以贴近生活的语言替代文件式表达,将抽象概念嵌入群众可感知的日常经验^[15]。针对不同群体设计分众化内容、适配专属话语体系,是提升宣传教育接受度的关键举措。

促进传播载体与受众媒介使用习惯精准适配。宣教协同本身就意味着对不同受众采取不同的传播策略。群体间的媒介使用习惯差异显著,优先选择与受众接受习惯高度契合的传播载体,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开展传播活动。面向农牧区群众,可借助村级广播、流动宣讲车等传统渠道确保覆盖面;面向城市青年群体,则需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互动等新媒体形式提升吸引力。

推动教育模式向沉浸式体验转型。民族共同体认同无法依靠单向告知建立,只能在亲身体验中自然生成。设计更多需要各民族群众协作完成的实践活动,让参与过程本身成为认同培育过程。以制度保障推动实践常态化,以文化浸润增强实践情感深度,使共同体意识从认知走向认同,最终落实为自觉行动。

四、结语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多元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一体整合水平稳步提升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各类结构性动态内在统一、互为支撑,共同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不在于抑制多元发展,而在于强化一体整合层面的制度化建设,持续推动多元与一体的协调互动。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是历史形成的客观结构,也是面向未来的实践课题。多元承载着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的独特智慧与深厚情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力之源;一体则构成了各民族安危与共、兴衰相依的生存骨架,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紧要关头始终能够凝聚起来的根本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使多元文化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展示空间,使不同民族的发展路径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一体整合的制度建设也需要在新的起点上持续完善,使共同性在更高的水平上得到彰显。二者的协调互动,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统摄,而是在相互塑造中形成新的平衡、在相互成就中实现共同提升。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开创未来的必然选择,承续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交融共生的文明根脉,也回应着新征程上团结奋进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坚持在

尊重差异中凝聚思想共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价值认同,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团结力量。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1-08-28) [2026-05-06].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28/content_5633940.htm.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29(1).

[3]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3.

[4] 马知遥,常国毅. 论非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与路[J]. 文化遗产,2025(4):17-25.

[5] 王炎龙,江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逻辑:从媒体话语叙事到文化价值认同的新透视[J]. 民族学刊,2021(1):49-56.

[6] 李洋,何生海. 利益共同体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建设与实践[J]. 前沿,2024(1):52-61.

[7] 孟珍,詹志华. 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架构研究[J]. 探求,2022(3):14-22.

[8] 李秋丽,张梦潇,王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5W传播模式[J]. 青海

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5-31.

[9]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4-09-28(2).

[1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EB/OL]. (2019-11-12) [2026-05-06].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12/content_541352.htm.

[11] 祖力亚提·司马义,刘庆斌. 文化符号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2023(4):212-218.

[12] 李俊清,付秋梅. 在公共服务中感知国家: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服务路径[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3):3-15.

[13] 张耀,田姓睿. “信息茧房”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与应对[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4):47-55.

[14] 中共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0-12-18) [2026-05-06].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95931.htm.

[15] 马晓军,金炳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26-3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Generative Logic and Synergistic Pathways

WANG D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nstitutes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epochal conditions concerning four dimensions, namely cultural identity, interest linkag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ublicity-education,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They share a common developmental feature: pluralism has been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e new era, whereas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or integral integration has not kept pace synchronously, giving rise to an imbalance in their development rhythms.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generative logic behind such imbalance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four dimensions and explores effective pathways for integral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vide academic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grassroots ethnic governance practices.

Keywords: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generative logic; synergistic pathways

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职能的规范构造

——以上市公司为例

杨国平,李茂源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部,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在法律层面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从传统的“双层制”转向“双层制”和“单层制”并存。审计委员会成员应满足独立性的标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审计委员会不实施审计业务,只监督审计活动,是对董事会负责的监督监督者的机构。为保障审计监督效果,应当健全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保障制度,重构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监督职权,构建审计委员会的信息直达机制,完善审计委员会与内外审计的衔接机制,合理配置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责任。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职能;规范构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7

中图分类号:D923.9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41-06

一、引言

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首次在法律层面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允许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行使监督职权。这一制度设计,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我国公司治理从传统的“双层制”转向“双层制”和“单层制”并存。该制度变革并非公司组织结构的局部微调,而是对公司内部监督权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自2002年起,我国在上市公司中逐步引入审计委员会,但彼时的审计委员会仅为董事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与监事会并行设立、协同履职,二者职能边界清晰、各司其职。原有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仅聚焦于会计审计监督领域。新《公司法》将审计委员会从“功能性专门委员会”升级为“法定型专门委员会”,明确赋予其全面承接监事会职权的法律地位,直接推动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定位发生根本性转变。新《公司法》通过在董事会内部嵌入审计委员会的单层制改革模式,能够有效降低公司组织机构设置成本,提升监督机构的专业性,破除监督环节的

信息壁垒,实现公司内部监督体系的优化升级^[1]。

与此同时,本次立法变革引发了一个问题:新《公司法》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审计委员会,在监督职能上差异悬殊,可谓此审计委员会非彼审计委员会。这导致实践中,审计委员会常被误认为是公司内部专门从事审计的机构或专门从事审计监督的机构。深入分析新《公司法》中审计委员会的职权配置会发现: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的职权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委员会的核心职能之一,并非唯一核心职能。

同时,审计委员会也并非公司内部专门的审计机构,不负责承办具体审计业务,其核心定位是公司内外部审计活动的监督主体和协调主体。

二、新《公司法》下审计委员会的组织构造

审计委员会的组织构造,是其监督职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制度基础。新《公司法》所确立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并非简单地在董事会内部增设一个专门委员会,而是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机制的根本性重塑。

(一)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的“二选一”模式

新《公司法》第6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

收稿日期:2026-06-12

作者简介:杨国平(1971—),男,河南信阳人,法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可以成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第 121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新《公司法》第 69 条与第 121 条的核心逻辑,在于赋予公司选择权,这打破了以往监事会作为法定监督机构的单一格局,形成了监督机构的“二选一”模式。

韩国、日本分别于 1999 年、2002 年引入“一元制”及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强制推行监督机构“二选一”。我国本次公司法修订关于“二选一”的规定,基本上与日本、韩国的做法一致^[2]。《韩国商法》第 415-2 条第 1 款、第 2 款规定:“设置根据第 393 条之 2 规定的委员会即监查委员会,以代替监事。设置监查委员会的情况下,不得设监事。监查委员会不受第 393 条之 2 第 3 款约束,由三名以上董事组成。但独立董事需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韩国商法》第 542 条之 11 第 1 款规定:“考虑资产规模等情况,总统令规定的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监查委员会。”除总统令规定的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监查委员会外,对于总统令规定的上市公司以外的上市公司,以及非上市公司,设立监查委员会不是义务。

根据我国新《公司法》的规定,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不是强制性的,但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 年修订版)第 133 条规定:“公司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202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25 年修订版)第 44 条也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综上,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置实际上是强制性的。

(二) 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要求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其监督职能的有效性。追本溯源,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制度起源于美国公司治理体系。由于大型上市公司的财务丑闻,美国于 2002 年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以强化公众公司的财务监督。《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第 301 条规定了审计委员会的设立、独立性要求和主要职责。依据该法,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主要集中于财务会计领域的监督^[3]。审计委员会成员必须满

足独立性标准,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交易所的规则进一步要求其必须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新《公司法》对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规定,因公司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针对股份公司,新《公司法》规定审计委员会“过半数成员不得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得与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这一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职务隔离,即过半数成员不得兼任公司高管等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二是关系隔离,即不得存在可能影响独立判断的利益或人情关系。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则未作类似规定。这种区分规制的立法模式,体现了立法者在强制性干预与私法自治之间的审慎平衡,也为审计委员会制度留下了必要的制度弹性与自治空间。

与独立性相比,新《公司法》并未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业背景作出任何强制性规定。虽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要求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由会计专业人士担任,但这一要求仅适用于上市公司,且仅针对召集人。在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全面监督职权的背景下,其监督范围已超越财务会计领域,涵盖业务监督、人事监督、合规监督等多元事项,对成员专业能力的复合性要求显著提升。从组织法角度看,监督能力并不是一种可以通过制度标签简单移植的属性^[4]。从监督职能的需要出发,审计委员会成员应该具有专业背景,会计专业能力是核心要求。审计委员会的核心职能之一是监督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要求部分成员具备财务会计方面的专业知识。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第 407 条要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一名财务专业人士,若没有则需解释原因。

(三) 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任模式

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任是保障其独立性和专业性的核心环节。新《公司法》对审计委员会成员如何产生未作明确规定。结合立法精神与商事实践,目前主要存在三种选任模式。第一种是股东会选任模式。该模式主张审计委员会成员应由股东会直接选举产生。理由在于:审计委员会代行监事会职权,应类比监事的产生方式由股东会选举;审计委员会负有监督董事会的职责,若由董事会选任,将形成“被监督者选任监督者”的困局。由股东会选任可使审计委员会摆脱董事会的控制,保障其独立行使职权。第二种是“董事会提名成员、股东会确认”的方式^[5]。这种模式在操作层面较为可行,既尊重了董事会在人事提名方面的专业判断,又通过股东会的确认程序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提供了权力来源

保障。该模式兼顾了效率与独立性的平衡,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第三种是职工民主选举模式。若职工代表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该成员应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其他民主形式选举产生,这与新《公司法》关于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产生方式一致。

三、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职能的定位与边界

新《公司法》实施后,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在新的治理架构下对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职能进行重新审视和定位。

(一) 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职能的定位

审计委员会实质上不是内部审计,它不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体系,而是构成公司治理的核心要素;审计委员会是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对董事会负责的监督监督者的机构^[6]。新《公司法》实施前,审计委员会仅存在于上市公司中,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委员会之一,此时的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并存。新《公司法》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订版)第39条规定:“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1)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提议聘请或者更换外部审计机构;(2)监督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3)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4)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5)负责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项。”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新《公司法》实施前,审计监督是审计委员会的核心职能。

新《公司法》实施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25年修订版)第45条规定的审计委员会的职责依然包括上述五项,但在上述五项的基础上加了一项,即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对于上市公司以外的公司,如果选择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同样承接监事会或监事的职能。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的职权,从监督阶段和多维监督的角度,更有利于审计监督的效果。首先,审计委员会能够实现事前事中监督。在单层制公司治理模式下,董事会集决策权与监督权于一体,审计委员会成员兼具董事与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审计委员会成员在参与董事会决策过程中,能够直接获取决策信息,在决策形成前提出质疑和建议,从而实现在决策中监督。其次,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的职权,使内部审计不再局限于对财务报表的传统审查,而是形成了一个多维度的监督体系,这种融合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单一监督职能的执行,而且强调不同监督职能之间的协同作用,以实现对公司治理的全面

优化^[7]。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这种变化使审计委员会的职能从传统的财务审计监督领域,扩展到了监督董事和高管履职、提议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等更广泛的监督领域。但不可否认,审计监督依然是审计委员会不可或缺的核心职能之一。

(二) 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职能的边界

审计委员会本身不实施审计业务,只监督审计活动,内部审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等才是实施审计的主体。审计委员会不做账项核查、不编制审计底稿、不出具审计报告,它仅监督、评估、协调审计工作。审计委员会不亲自执行审计程序,这是其最基本的边界。所谓亲自执行,是指依据审计准则实施的具体核查活动。审计委员会成员虽可能具备财务或审计背景,但并非以审计师身份履职。审计委员会通过审议年度审计计划、听取审计工作进展报告、核查审计发现问题及督促整改的方式来行使职权。

审计委员会成员不承担审计保证责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职责源于其监督失职,例如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未发现显而易见的财务异常、未对会计师的明显不当行为提出异议。这与会计师的出具不实报告责任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审计委员会成员承担的责任是监督责任,而非执业责任。这一权责边界意味着: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责任认定应当以是否履行了监督职责为标准,而非以财务报告等是否存在虚假陈述为标准。

四、完善审计委员会履行审计监督职能的路径

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五个维度的制度条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否足以支撑审计监督的客观性;审计监督职权的配置是否清晰具体;公司财务等信息是否能够直达审计委员会;审计监督与内外审计的衔接是否顺畅;审计监督责任的配置是否合理。

(一) 健全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保障制度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是影响审计监督效果的基础性条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要足以支撑审计监督的客观性。与监事会作为独立于董事会的监督机关不同,审计委员会从制度设计之初即面临不可回避的结构性张力,审计委员会成员作为董事,其监督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董事会集体决策的影响。在集体决策结构下,监督判断易于趋向温和化、程序化,难以做出具有纠偏效力的决策^[4]。若审计委员会成员直接参与董事会业务决策或业务执行,如何履行对董事的监督职责?若其不参与董事会业务决策或业务执行,又为何需要称其为“董事”?^[8]这一悖

论直指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制度困境。

改革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任机制,将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任权由董事会转移至股东会,明确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资格限制,对保障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固然重要,但从公司法的角度看,独立性不只是成员身份问题,而是能否在制度框架下独立形成判断。独立性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谁来监督”,而在于“监督判断是否必须与经营判断保持一致”。若监督判断在制度上必须服从董事会整体决策逻辑,则其独立性即便在形式上存在,也难以转化为实质约束^[4]。

(二) 重构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监督职权

新《公司法》规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的职权”,实现了监事会监督职权的移转。然而,这一移转更多表现为职权的简单承接,缺少配套实施细则作为支撑。审计委员会承接了监事会检查公司财务的职权,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的职权,这些也是审计监督权的体现。职权简单平移,不仅会导致自我监督的逻辑悖论,还会导致权力与责任的错配和失衡。

要重构审计委员会职权体系,从规范移植转向组织法重构,重点在于明确职权边界以及配套责任机制。应当通过《公司法》修订、配套行政法规或监管部门规章,逐条细化审计委员会各项法定职权。审计委员会的职权并非新《公司法》实施前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权与监事会职权的简单相加,需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合理配置包含审计监督权在内的全部监督职能。

(三) 构建审计委员会的信息直达机制

审计委员会行使审计监督职权,负责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监督内外部审计、监督内部控制,必须完整掌握公司真实经营全貌,不能仅获取管理层筛选、加工后的过滤信息,否则将直接削弱审计监督质量。为破解管理层与监督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有必要从制度层面构建审计委员会的信息直达机制。

新《公司法》修订实施前,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并存,监事会有权检查公司财务,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这些规定保障了信息能够直达监事会。新《公司法》施行后,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会职权,制度化的信息直达保障机制得到根本性强化,但原监事会制度下固有的权利救济短板并未随之消除。例如:监事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要求进行调查,但公司管理层不予配合,或者监事会其他成员不予配合,监事是否可以起诉公司

要求配合调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予支持。在(2018)沪01民终5998号案件中,二审法院认为:“监事在发现公司经营异常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进行调查。但诉讼是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另一方要求解决纠纷的方式,诉讼双方在利益上具有矛盾性。而监事行使职责本就是为了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其与公司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故监事行使相应职权系公司内部自治范畴,该权利并不涉及监事个人的民事权益。况且,公司法亦未对监事监督权的行使受阻规定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因此,监事要求行使监事监督权不具有可诉性。”类似判决很多,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该判决适用法律没有问题,但结果实际上阻碍了监事的知情权和调查权。因此,应突破民事诉讼法的规则,在公司法中赋予审计委员会成员此种情形下的诉权,以保障其调查权及信息获取权的实现。

(四) 完善审计委员会与内外审计的衔接机制

审计委员会不是内部审计机构,而是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沟通的机构。属于治理层次的审计委员会和属于管理层次的内部审计具有相互嵌合的关系,离开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就没有完整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内部审计方面的成功;同样,审计委员会也离不开内部审计,如果没有完善的内部审计做支撑,审计委员会所追求的安全、公平与效率的目标也必然不能实现^[9]。从历史演进看,审计委员会制度是因应外部审计独立性问题而产生的。审计委员会实质上是公司当局与外部独立审计师之间矛盾的隔离缓冲主体,主要目的在于减少管理当局对外部审计师活动的影响和干扰,提高审计的独立性^[6]。

审计委员会作为内外部审计的枢纽,应当构建系统化的衔接机制,形成审计监督合力。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工作。审计委员会应通过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督促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审阅内部审计工作报告,评估内部审计工作的结果,督促重大问题的整改等方式指导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给管理层的各类审计报告、问题整改方案及整改落实情况,必须同步抄送审计委员会。该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审计委员会及时掌握内部审计排查出的重大风险事项,而不受管理层信息过滤的影响。

审计委员会应当全程参与外部审计机构的选聘,评估其独立性、专业性。审计委员会与外部审计机构须经常召开无管理层参加的沟通会议。在沟通中,审计委员会应重点关注:外部审计机构在审计中

发现的重大会计和审计问题、内部控制缺陷及其整改建议、管理层对审计调整的态度和配合程度等。通过这一机制,外部审计机构可以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审计发现,避免审计意见受管理层的不当干预。

(五)合理配置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责任

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责任并非执业责任,而是监督责任,包括审计监督责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同时承担董事的决策职能与监事的监督职能,在责任认定上面临双重标准的适用问题。新《公司法》虽在忠实义务主体上将监事与董事统一,但在勤勉义务的具体适用上仍存在差异。审计委员会成员因参与董事会决策而对经营事项负有管理者合理注意义务,又因承接监事会职权而对监督事项负有发现与制止的监督义务。二者的义务标准、注意程度和免责条件均不相同,必须在责任配置中实现协调。

根据新《公司法》,审计委员会由董事组成,其成员理所应当按照董事的要求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按照规范承担董事的责任。不能因为其承接了监事会的职权,就让审计委员会成员按照监事的责任规范来承担责任。但在审计委员会内部,可以区分不同成员的责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能力,应该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就审计监督责任而言,具有财务、会计专业背景的成员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例如在2025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超华科技案中,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负责人因具备财务专业背景,但未对异常情况保持审慎关注,进而承担了行政责任。

除了专业背景之外,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的注意义务标准也不相同。执行董事因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掌握一手经营信息,在商业决策领域负有更高的勤勉义务标准。而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具有较低的勤勉义务认定标准。因此,在责任配置上,应当设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为避免审计委员会成员承担过高的民事责任,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规定,设置董事的民事责任限额制度。日本《公司法》规定了董事的责任限额制度,该制度只适用于对公司的赔偿,对第三人的赔偿不在此范围,且是在董事无恶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下适用。韩国商法第400条规定了独立董事的责任限额。

为保障审计委员会成员充分履职、保障审计监督效果,应当引入商业判断规则。商业判断规则为

审计委员会成员提供了一项诉讼上的抗辩手段。商业判断规则形成于美国的司法判例,董事常常需要对公司经营作出各种各样的商业决策和判断,难免出现失误导致公司损失的情形,董事享有商业经营判断的自主裁量权,若董事在决策时已尽到注意义务,对于纯粹的商业判断失误,应当免责。但是,商业判断规则在中国的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很早以前就有人建议以成文法的形式引入商业判断规则,但一直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司法实践中,很早以前就有法院运用商业判断规则判决董事免责。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在适用该规则时存在诸多疑虑。

五、结语

审计委员会不是公司内部的审计部门,不承担具体审计业务,审计委员会肩负审计监督的职能。审计委员会成员在履行审计监督职能时,承担的并不是审计执业责任,而是审计监督责任。

新《公司法》首次在法律层面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赋予其全面承接监事会职权的法律地位,这一变化导致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发生重大变化,审计监督职能也得到进一步强化。但同时,新《公司法》将监事会职权简单平移给审计委员会也引发诸多问题。必须重构审计委员会的规范构造,完善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监督职能。

参考文献:

[1]刘斌.中国式审计委员会:组织基础与权责配置[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學学报),2024(4):114-125.
[2]余兴喜.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与公司监督[J].董事会,2024(9):22-30.
[3]赵旭东,刘斌.新公司法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4:341.
[4]杨大可.公司组织法视角下审计委员会监督能力的制度建构[J].政治与法律,2026(5):161-176.
[5]叶林,钱程.新《公司法》下审计委员会的规范阐释与制度构建[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25-36.
[6]乔春华.我国审计委员会的科学定位[J].审计研究,2003(6):31-33.
[7]赵景琛.公司治理“一元制”视角下新《公司法》中审计委员会的功能解析[J].法治论坛,2025(1):177-193.
[8]蒋大兴.新《公司法》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规则的执行困境[J].中国法律评论,2024(2):68-83.
[9]张世敏.内部审计与审计委员会互动关系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2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Audit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the Audit Committee: A Case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YANG Guoping, LI Maoyuan

(Faculty of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statutory level, the new *Compan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roduces the audit committee system, marking that China's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evol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wo-tier board structure to the coexistence of two-tier and one-tier structures. Members of the audit committee shall satisfy independence criteria and have appropriat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The audit committee does not perform audit business itself; it only supervises audit activities and serves as an institution for supervising supervisors, which is accountable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o guarantee the effect of audit supervision, we shall improve the safeguard system for the audit committee's independence, reconstruct its audit-supervision authority, establish a direct-access information mechanism, optimize the connection-and-docking mechanisms between the audit committee and internal as well as external audits, and reasonably allocate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liabilities of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Keywords: audit committee; audit supervision; functions; normative construction

(上接第 19 页)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YU Yang^{1,2}, ZHANG Zhongjie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Lanzhou, Gansu 730101, 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1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5 Chinese cities from 2012 to 2023,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evaluation model and the modified 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t measures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Further, this paper adopts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its decomposition approach, global Moran's I index, and the interactive detection module of Geodetector to analyze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remains generally stable and reaches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level. Although the urban-level coupling-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maintains a relatively stable trend, intra-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persist, and overall differences present an upward tre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pulation density exert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coupling-coordination degree.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are markedly stronger than single-factor effects, mainly reflected in nonlinear enhancement and two-factor enhancement.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nabl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s marked by prominent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multi-factor interactive-driving features.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spatial difference; Gini coefficient

先秦时期的追赶意识:思想源流、伦理转化与实践维度

陈智勇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先秦追赶意识是中华文明早期精神内核的集中彰显,融汇时代忧患、道德求索、求知热忱与治国理想,贯穿上古神话、诸子哲思与先民实践。该意识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质,既塑造出中华文明锐意进取、珍视时序、躬身入世的精神底色,又以其蕴含的内在思想张力与丰厚文化内涵,对后世民族文化心理、社会行为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先秦;追赶意识;神话想象;哲学思辨;积极进取;敬畏时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8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47-06

先秦是中国思想文化由萌芽走向蓬勃兴盛的关键阶段。彼时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思想界形成百家争鸣之盛况,这一阶段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精神传统。身处这样一个社会动荡又思想迸发的时代,追赶意识作为深层内在心理驱动力,深度融入先民对时间的认知、道德修持、求知探索与治国理政实践之中。此处所言“追赶”,并非单纯指竞速角逐或利益纷争,而是先秦先民面对生命有限、光阴流转、历史大势,为实现道德完善而生发出的深刻自省与主动践行。本文拟从先秦追赶意识的多元形态、思想流变及历史效应三重维度展开探析,以求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文明早期精神内核的认知。

一、先民追赶意象的历史溯源

在哲学理性尚未充分发展的先秦早期,追赶意识主要依托神话叙事与文学意象得以生动呈现。此类文本自带象征色彩、情感张力与原型价值,承载着上古先民面对自然伟力、生命局限与理想境界作出的本能回应。

(一)“夸父逐日”是《山海经》中极具震撼力的上古神话,也是中华民族早期精神谱系的重要篇章

书中两处原文记载如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

外北经》)^{[1]214};“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山海经·大荒北经》)^{[1]318}从表层情节看,文本讲述了夸父追逐太阳、最终渴死途中的故事。但若深入文本内涵便可发现,夸父追逐的“日”早已超越天体本身,象征永不停歇的时序、普照万物的光明,以及人类难以企及的终极力量。这则神话不仅是先民挑战自然伟力的艺术想象,更寄寓着人类直面生命固有桎梏时不屈抗争、虽败犹荣的崇高精神。世人眼中夸父“不量力”的行为,恰恰凸显了追赶意识悲壮而崇高的内核:即便深知目标遥不可及,追逐的过程本身以及身后留存的邓林,已然赋予生命完整的价值。《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大量拥有极速奔行能力的人、兽与灵草,折射出先民突破空间束缚、提升行动效率的朴素向往。如:“有兽焉,……食之善走”“有草焉,……名曰杜衡,可以走马”(《山海经·西山经》)^{[1]21};“林氏国有珍兽,……乘之日行千里”(《山海经·海内北经》)^{[1]254};“钉灵之国,其民……马蹄善走”(《山海经·海内经》)^{[1]336}。这类记载是追赶意识在物质与生存能力层面的具象表达,反映先民在恶劣生存环境下突破地域限制、加快行动节奏的现实诉求。先民对速度的渴求,与夸父逐日拥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二者均植根于人类超越肉体局限、拓展生存与实践边界的原始冲动。

收稿日期:2026-05-11

作者简介:陈智勇(1970—),男,河南郑州人,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

由此,夸父逐日神话与书中散见的极速叙事,共同构成《山海经》追赶神话的双重维度:前者是饱含悲剧色彩的宏大精神叙事,叩问人类命运与终极存在意义;后者立足现实生存,记录先民提升行动能力的实用智慧。二者交织,催生了上古先民独特的“速度崇拜”——它既指向现实层面对奔行速度的追求,更代表人类不断拓宽生命尺度与精神疆域的永恒渴望。这份崇拜本质上是对生命主观能动性的赞颂,塑造出华夏先民仰望天地、追逐光明的经典精神原型。

(二)《楚辞》蕴含的追赶意象

《楚辞》中的追赶意象完成了内在化转型:神话中外在的竞速追逐,沉淀为屈原内心深处的时序忧患与精神求索。《离骚》集中抒发了诗人与光阴赛跑的焦灼心绪:“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楚辞·离骚》)^{[2]6}一句“不及”,道尽目睹岁月流逝的切肤痛感,藏着与时间竞速的迫切心境。这份焦灼并非单纯畏惧生命衰老,而是源于诗人对美政理想的执着坚守;他唯恐年华虚度,最终错失振兴楚国、实现清明治世的抱负。因此,屈原笔下的追逐,本质是一场对抗光阴的精神跋涉。他畅想“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2]6},期盼驾驭千里马奔走在前,为君王指引治国正道。此处的骐骥与驰骋,脱离了《山海经》中提升行动效率的实用内涵,升华为追逐理想、引领时代的精神符号。这场追逐的终点不在于物理层面的超越,而在于完善道德人格、实现政治抱负。残酷现实却为这场追逐笼罩上一层浓厚的悲剧张力:诗人上下奔走屡屡受阻,身处“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困顿境遇,追逐的内核发生深层转变——从对外事功业的急切求索,转向“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内在精神修行。“上下求索”四字,饱含诗人对真理、清白人格与精神高度永不停歇的追寻。最终,屈原笔下的追赶意象凝练成一种超越时间桎梏的精神姿态:纵然肉身难以追赶流逝的年岁,其永不妥协的求索意志与高洁人格,却在与浊世的对抗中获得永恒,铸就中国文学史上悲壮而光耀千古的精神求索图景。

(三)神话文学中追赶意识的核心思想基调

上古神话与楚辞文学构建了先秦追赶意识的原始底色与思想深度。从《山海经》中夸父悲壮追日,到《楚辞》里屈原为光阴、理想不懈求索,两类文本的核心意象始终交织着对超越性力量的敬畏与抗争。一方面,这种精神外化为先民渴求获得极速能力、打破生存局限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更深层地内化为人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奋力追寻理想价值

的精神自觉。夸父道渴而亡、屈原忧惧年岁不待,共同揭示追赶意识与生俱来的悲剧性与崇高感:它起于唯恐“不及”的时序焦虑,终于对生命价值的自我完成。无论追逐成与败,追逐行为本身即是消解虚无、确证个体存在意义的路径。

这批充满象征意蕴的文学叙事,跳出浅层的速度崇拜,将追逐升华为稳定的精神范式,为先秦诸子哲学对“追”的伦理边界、“赶”的价值旨归展开深度反思提供丰厚文学资源与思想原型。譬如孔子观水慨叹“逝者如斯”,借时序之警督促修身立德;道家循守大道、从容行道,二者均是对这一早期精神原型的深化阐发。

(四)甲骨文辞所载的早期追逐图景

夏商两代,先民对“追逐”的理解早已超越狩猎、征伐等具象行为,演变为融合生存需求、王权秩序与天命信仰的复合文化意象。甲骨文辞作为商代一手文字史料,以简洁古朴的契刻文字留存下彼时的追赶意识:既有狩猎时追逐野兽、战事中追剿敌方的记录,也有先民在原始鬼神观念下,追溯天命、探寻灾异根源的精神活动。整体来看,商代追赶意识可分为三层内涵:其一,生存之逐:田猎活动中的节奏把控与秩序规划。商王田猎类卜辞频繁出现“逐”字,多搭配鹿、兕等猎物,体现具有组织性、策略性的围猎行为。如:“多马逐鹿,获?”(《乙》4615)^{[3]45}，“逐鹿”并非盲目直奔,而是对特定猎物的有组织围捕。“壬午卜,王其逐兕,获?允获。”(《合集》10405)，“乙未卜,今日王狩光,擒?允获虎二、兕一、鹿二十一、豕二……”(《合集》10198)以上卜辞中的“逐鹿”“逐兕”并非漫无目的地奔袭,而是有计划的集体围捕。商王占卜问询能否擒获猎物,实则是预判人力与野兽角逐能否借天时地利达成目标。这种“追逐—捕获”的叙事结构,暗含人类干预自然节律的诉求:追逐不只是体力对抗,先民更借助占卜预判得失,将偶然的狩猎活动纳入可控秩序。现代考古发掘的商代车马坑及成套车马器具,可视为追逐意识的物质载体,战车不仅是作战工具,更是仪式化速度的象征。从文字字形演变来看,甲骨早期“逐”字从豕、从鹿,专指追猎野兽,例如“戊辰卜,在羌贞,王田,衣逐,亡灾”,到晚期或从“彳”(道路)^{[4]1629}。字形演变清晰印证,追逐概念从具象狩猎行为向抽象行动概念拓展,是文明演进的细微佐证。其二,权力之逐:军事征伐中的王权威慑与部族臣服。商代边境并非静态界限,而是持续发生追逐和征伐的动态场域。卜辞中“追”“及”

“踵”等字大量出现,凸显军事行动的紧迫性。例如“辛酉卜,争贞:呼自(师)往追召方,及?”(《合集》33029)“癸酉卜,王敦戡方,执?”(《合集》20449)其中“及”是追逐的核心目标,意为追上、击溃敌族;“敦”字字形为持械攻城,带有暴力征服的意味。此类卜辞常伴随“执”(擒获首领)、“翦”(剿灭部族)的占问,本质是将军事追逐转化为王权向外辐射、确立统治权威的仪式。其三,神意之逐:面向未知灾异的精神溯源。商代最深刻的追赶意识,体现在先民对不可控神秘力量的探寻。商人认为疾病、水旱、奇异天象等灾异,是神灵、先祖对人的逼迫,需依靠占卜追溯灾祸源头。卜辞载:“癸卯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巳有祟,单丁人丰于录……”(《合集》137反);“贞:疾齿,御于父乙?”(《合集》13652)。商人占卜“旬亡祸”,本质是主动追寻尚未降临的厄运。在他们的认知中,病痛是先祖神灵施加的追扰,必须通过祭祀禳除灾祸。这种追溯灾源的行为,如同于黑暗中追逐无形的对手,代表先民主动探寻无常命运的尝试;即便无法规避灾厄,也要以甲骨契刻留下追问天命的痕迹。

二、儒家伦理体系中的追赶意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神话、文学中较为朴素的原始追赶冲动加以系统吸纳、转化与升华,构建起一套完备严谨的伦理修养路径与价值追求体系。《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典籍,蕴藏着丰富且深刻的追赶意识,集中体现在为学、修身、行道三个层面。

(一)为学之道:“学如不及”的进取紧迫感

儒家治学的核心要义,可凝练为《论语·泰伯》所言“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5]83}一语。短短八字,精准道出贯穿君子修身全过程的追赶精神。孔子以“如不及”设喻,鲜活描摹出求学者的精神状态:面对广博无尽的知识与永无止境的道德境界,心中常怀唯恐落后、奋力追赶的紧迫心态。这份紧迫感并非外力逼迫而生,而是源自成就仁德的内在理想与探求大道的本心渴求,鞭策读书人如逆水行舟,须臾不敢松懈。与此同时,“犹恐失之”为这场精神求索增添另一重内涵:时刻警醒、守护已然习得的学识与持守的德行。一追一守,形成治学路上永不停歇的内在张力。“学如不及”的紧迫感,正是儒家君子在趋近仁德境界的漫漫征途中,发自本心、深沉持久的精神驱动力。

(二)修身之要:“见贤思齐”与“见善如不及”

儒家修身理论的核心,是将外在道德准则内化

为人的本能自觉,外化出“见贤思齐”“见善如不及”的生命追求,本质是以道德楷模为标杆、主动且终身践行的精神追赶。《论语·里仁》载孔子之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5]39},一语点透修身的关键。“思齐”,是目睹贤德之人时,心底自然生出向其靠拢、奋力追慕的意愿;与之相对的“内自省”,则是以品行不端者为参照,反向警醒自身。一趋一戒的即时心念,把抽象的求仁理想转化为日常可践行的道德自觉与行动能力,让追赶意识融入人格成长的每时每刻。而“见善如不及”的心境,更进一步将这份追赶的紧迫感推至极致。君子面对一切善言善行,始终心存唯恐错失的警醒,生怕稍有迟疑便与善擦肩而过,离理想人格愈发遥远。这份生怕不及的焦灼,并非攀比他人带来的外在压力,而是内在良知向善的本能趋向,是士人将行仁作为终身使命后,自然生出的精进动力。

(三)行道之志:“任重道远”与“士不可以不弘毅”

儒家追求的大道,不局限于个体修身,更指向家国天下的安顿。将仁德之道推行于世间,是儒者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也让追赶意识具备宏大的社会历史格局。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5]80},所谓“任重道远”,本身便是一场漫长且艰辛的追逐——追逐仁政理想落地现实。面对富贵财利,儒家同样确立了以道义为标尺的取舍准则:“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6]69}《孟子》原文虽未直接出现“追赶”字样,但其思想饱含鲜明的动态进取品格,同样属于根植道德自觉、承载社会责任的追赶意识。孟子周游列国,本质是引导各国君主追慕复兴三代圣王之治,奔走践行社会理想。他以古圣先王为价值标杆,提出“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离娄上》)^{[6]162},将尧舜圣王之道确立为始终追逐的终极目标。

三、诸子思想对追赶意识的多维反思

先秦其他学派对“追赶”各持不同立场,与儒家思想形成对话、互补关系,共同丰富了“追赶”意识的思想内涵。

(一)道家的批判与超越:无为和逍遥

在先秦思想谱系中,道家思想独如一汪清流,对儒家倡导的积极入世式追赶意识展开深刻批判,并实现根本性的精神超越。道家的核心立场,是舍弃向外追逐外物的执念,转而主张向内复归自然本真,

抵达“无为”“逍遥”的精神境界。老子以“道法自然”为立论根基,从根本上质疑人为的竞逐行为。他警示世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在外在声色名利中不断求索,非但不能趋近大道,反而扰乱感官、迷失本性,使人陷入目盲、耳聋、心神狂乱的异化状态。因此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倡导“不敢为天下先”。这一主张绝非消极避世、退缩不前,而是源于对“反者道之动”规律的体认:刻意争先、竞相有为,只会诱发纷争,背离清静自持的本根。庄子将道家对世俗追逐的批判推向极致,勾勒出超越功利追逐的理想精神图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心执着于世俗价值的人,皆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7]408}。在庄子看来,人生须臾短暂,“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7]570},若将转瞬即逝的生命耗费在永无止境的功利追逐中,便是最大的精神迷失。而他推崇的“逍遥游”,正是对这种世俗困局的彻底超脱。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在世俗既定赛道上奋力争先,而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顺应宇宙运化的根本法则,超脱一切相对、有限的束缚,达成与大道相融、无所依凭的绝对精神自由。由此可见,道家实则提出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追赶”:这种“追赶”完成了境界与价值方向的彻底转换,从追逐外物转向体悟大道、从刻意竞逐的“有心”走向自在无拘的“无心”逍遥;它不再锚定任何外在、有限的目标,而是以回归、契合内在生命本真与宇宙大道为终极指向。

(二) 墨家的功利主义追赶:兼爱与尚用

先秦诸子之中,墨家思想特色鲜明,其思想核心孕育出一套极具实践品格、以功利为底色的追赶意识。墨家所言的“追赶”,既不指向内在德性的抽象完善,也不追求个体精神的超脱,而是紧紧围绕“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一社会目标展开,带有强烈的现实干预诉求与效率追求。墨子提出的“三表法”,是其功利思想的核心方法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8]241},意在从历代圣王的治理经验中提炼行事准则;“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要求立足民间现实体察民情;“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主张将一切言论、制度付诸施政实践,以能否切实增进万民福祉作为唯一、最终的评判标尺。这套“考史—察民—实效”的完整逻辑链条,将墨家的追赶意识扎根于历史经验、现实民情与实际功用三重基础之上,构筑起一套高度理性、目标明确的社会实践方案。

墨家奋力求索、竭力追赶的,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一系列理想社会秩序。墨子深知,脱离实践的理想毫无意义,故而强调“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8]10},认为坚定的心志是智慧落地的前提,言行相顾是行动成事的保障。相较于儒家对道德境界的恒久求索,道家对自然本性的精神复归,墨家的追赶带有鲜明的工具理性特质:以“利”为根本旨归,以“用”为评判尺度,以“践行”为实现路径,力求在现实社会中高效落地功利化的公共理想,为先秦思想史留下一套重实效、重民生的独特追赶范式。

(三) 法家的制度驱动追赶:变法与耕战

法家将“追赶”意识落脚于国家综合实力竞争与行政制度效能提升上。商鞅直言:“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9]17},明确主张制度应当随时代变迁调整革新。在法家的认知中,推动国家向前追赶的核心动力,源于外在的法、术、势制度体系,而非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韩非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10]570},又言:“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10]566}。这种不盲从古制、不拘泥旧规的变革思想,把法家的追赶意识提升至历史哲学层面。战国已然进入以国力、军力相争的时代,法家主导的变法运动(如商鞅在秦国推行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建立郡县制等举措),旨在调动全国人力物力,集中投入农耕、征战两大关乎国家存亡的核心追赶任务,依托制度优势实现对他国的跨越式赶超。

(四) 兵家的战场追赶:逐鹿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追赶意识脱离了商代依托占卜祭祀的神秘求索,演化成一套冷静理性、兼具艺术特质的战略哲学。这种追赶不只体现为两军对阵时的追击进退,更贯穿列国之间对霸权、战机、生存主动权的长期博弈,可分为四层维度:其一,战场层面的追逐:平衡“全胜”与“歼敌”的辩证关系。兵家看待战场追击,始终秉持辩证思维。孙子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追击:“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11]87}这绝非怯战,而是基于“兵以诈立”的战略判断:陷入绝境的敌军会迸发殊死战力,贸然追击极易落入埋伏、打乱己方阵列,这也正是“饵兵勿食”蕴含的作战智慧。

其二,战略层面的追逐:争夺“先胜”与先机。兵家的追赶在两军开战前便已启动,核心是抢占战略主动权。“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子兵法·计篇》)^{[11]4}。战前于朝堂全面推演道、天、地、将、法各类条件,本质是在谋略层面抢先压制、超越对手,追求“先胜而后求战”。其三,伐谋伐交:超越正面厮杀的高阶博弈。最高明的追赶,不必诉诸兵刃交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11]31}在敌方图谋初现时便加以遏制,是从根源上消解战争隐患的“源头追击”。其四,兵学深层哲思:永恒追逐“势”与“变”。兵家思想的核心精髓,在于持续把握两大无形核心要素:“势”与“变”。“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孙子兵法·势篇》)^{[11]57}所谓“势”,是积蓄完备、一触即发的作战势能,是赢得战事的关键推力。善战者善于创造、运用有利态势,如同从万丈高山滚落圆石,追击溃敌的全部动能皆由此而生;追逐“势”,便是掌控战场乃至天下格局的力量走向。

春秋战国兵家的追赶意识完成了三重关键升华:由单纯体力层面的兵马追逐,转向谋略层面的脑力博弈;由沿着对手既定路线直线竞速,转向依托诡道开辟全新竞争赛道、迂回制胜;由紧盯敌军的浅层追逐,上升为把握战争天道、运行规律的深层求索。兵家眼中最高层次的追赶,是通晓贯穿战争始终的兵道,掌握战事恒定不变的底层逻辑与瞬息万变的应变法则。

因此,兵家的“追赶”图景,既包含沙场之上骑兵奔袭、追击溃敌的激烈场面(譬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形成的机动作战追击),也涵盖朝堂密室的战略筹算、各国之间的外交斡旋,更藏于竹简兵书之中对战争本质的冷静思辨。

四、政治实践中的追赶意识

先秦追赶意识不仅体现于诸子学说,更贯穿于列国纷争的现实政治进程。从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国兼并,到秦统一天下,数百年历史本质上是一场涵盖政治、军事、经济与制度的全方位追赶竞赛。

(一)诸侯争霸:实力与地位的竞逐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主相继崛起,其争霸的核心,便是追逐并超越最高政治权威与天下影响力。孔子虽批判诸侯僭越礼制的行为,但其“尊王攘夷”的主张,亦暗含对理想治世秩序的追求。梁惠王初见孟子便询问强国之策,直观

反映出战国君主追逐国家实力的迫切心态。各国通过合纵连横展开外交博弈,频繁发动战争争夺疆土,皆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积蓄实力、抢占先机。

(二)变法图强:制度与效率的革新

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是追赶意识最集中、最激烈的实践体现。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秦国商鞅相继推行改革,形成时代浪潮。变法的核心逻辑,是各国意识到旧制度难以适应乱世竞争,主动构建资源集聚力更强、行政效率更高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中商鞅变法最为彻底,通过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举措,最大限度调动秦国人力物力,使全国资源向农耕与作战两大核心任务倾斜。“利出一孔”的制度设计,将个人富贵与国家功业紧密结合,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制度性追赶动力。

(三)天下一统:空间与秩序的终极整合

战国中后期,各国的追赶目标逐渐从称霸诸侯转向兼并六国、建立郡县制的统一王朝。此时的追赶已不再是争夺霸主名号,而是致力于构建全新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秦国自秦孝公至秦始皇百余年间,政策一脉相承、持续推进,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吕不韦组织编撰《吕氏春秋》,融汇诸子百家思想,旨在为统一帝国奠定理论基础,属于思想文化层面的前瞻性布局。秦以武力实现疆域统一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等政策,进一步在文化与制度上完成天下整合。

五、先秦追赶意识的思想史意义与现代启示

先秦追赶意识是多元且充满张力的精神复合体,源于先民原始想象,经儒家伦理化、理性化后,形成勤学、修身、行道、追远的智慧;同时驱动列国争霸、变法与统一,深刻改变了中国政治地理与社会制度格局。

(一)先秦追赶意识的思想史意义

一是塑造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先秦追赶意识强调崇德修身、积极进取、敬畏时间、慎言笃行,奠定了中华文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核心精神品格。二是促进思想文化的多元对话。儒、道、墨、法等学派对“追赶”的不同阐释,形成思想史上的对话与争鸣,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包容性。三是推动制度创新与社会变革。战国变法运动所彰显的“不法常可”精神,为后世制度革新提供了历史范例与思想资源。四是奠定统一国家的历史基础。政治实践中的追赶意识最终导向天下一统,为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根基。

(二)先秦追赶意识的现代启示

一是平衡时间焦虑的生存智慧。在科技高速发展、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孔子“逝者如斯夫”的时间焦虑以新的形式重现。先秦思想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积极态度与“与时俱化”的灵活智慧,启示我们在追求效率与追寻生命意义之间寻求平衡。二是坚守道德追赶与精神引领。在物质丰裕而精神迷茫的当代社会,“见贤思齐”的道德追赶意识昭示我们,经济发展应与道德建设同步,物质追求需以精神价值为引领。三是秉持知识学习的系统思维。在信息爆炸、知识碎片化的数字时代,“学如不及”的专注精神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系统治学方法,对当代教育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四是践行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和谐。在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之际,夸父神话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提醒我们在追求发展目标时须尊重自然规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五是涵养历史眼光与战略耐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中,“来者犹可追”的实践智慧激励我们既要勇于直面挑战、积极作为,又要保持深远的历史眼光与坚定的战略耐心。

先秦追赶意识贯穿神话想象、哲学思辨与政治实践,形成时间、道德、知识、实践等多重维度的表达。它既是中华文明早期精神动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塑造中国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的重要源泉。神话的悲壮、文学的激昂、哲学的深邃、政治的务实,共同

构筑了先秦追赶意识的丰富图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道德与功利的权衡、继承与变革的张力,构成了这一思想的内在矛盾与活力之源。梳理与阐释先秦追赶意识,既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早期精神结构的认知,也为当代社会应对快速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东方智慧。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其崇德向善、奋发有为、敬畏时序、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仍具有重要的创造性转化价值与跨时代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袁珂. 山海经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2]董楚平. 楚辞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李氏. 殷商社会生活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4]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 甲骨文精粹释译[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 [5]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7]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周才珠,齐瑞端. 墨子全译[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 [9]高亨. 商君书注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高华平,王齐洲. 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1]黄朴民. 白话孙子兵法[M]. 长沙:岳麓书社,199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re-Qin Pursuit Consciousness: Intellectual Origins, Eth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CHEN Zhiyo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ursuit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Qin Period epitomizes the spiritual core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Integrating the sense of era-related anxiety, moral pursuit, intellectual zeal and ideals of state governance, it runs through ancient myths,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f the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 practical endeavors of ancient ancestors. Distinctive of the times, this consciousness has shaped the fundamental spiritu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nterprising spirit, cherishing the order of time, and devotion to worldly practice. Meanwhile, its inherent ideological tensions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have exerted enduring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on the national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social-behavior paradigms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Pre-Qin; pursuit consciousness; mythological imagination;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enterprising spirit; reverence for time

历史地理视阈下“岳飞《满江红》”作者考辨

吴娜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对“岳飞《满江红》”作者问题的争论,已持续近一个世纪。从历史地理视域看,明朝北边防御体系在景泰年间完成了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的调整,贺兰山因此成为“诸夏屏藩”;正统年间,明廷在宁夏设兵车厂,试造数百辆兵车并推行车战之法;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朝臣和边将无不立志洗雪前耻。这些都为“岳飞《满江红》”的创作提供了时代背景。土木之变后,于谦与徐有贞因朝廷迁守之争而结下嫌隙;“夺门之变”后,徐有贞因拥戴之功权倾朝野,于谦则以“谋逆罪”被杀,这使得可能是于谦为抒发冤屈而作的《满江红》,被徐有贞及其追随者托名为“岳飞《满江红》”。由此可见,文学作品被托名流传,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环境与人际纠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岳飞《满江红》”;土木之变;防御地理;贺兰山;于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09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53-06

目前见到“岳飞《满江红》”年代最早的实物,为河南省汤阴县岳忠武王庙现存“岳飞《满江红》”碑。碑上刻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二月吉日,庠生王熙书。”天顺二年即1458年。自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质疑“岳飞《满江红》”作者以来,相关争议未曾停歇^①。2023年电影《满江红》热映后,争议再度升温。尤其是片尾全军复诵《满江红》的情节渲染,强化了公众对“岳飞创作”的情感认同,也促使更多人追溯该词作的源流。目前,学界对《满江红》为岳飞所作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宋元传世文献未见相关记载。王霞、涂秀虹、张廷和、葛畅等人解析《满江红》词作内容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多有创见^②。二是地理矛盾。关于贺兰山问题,学者们也多有讨论^③。三是风格差异。张政烺开研究之先^④,辛德勇亦有所论及^⑤,朱志远更是从词意主旨方面进行讨论^⑥。肖鹰认为伪托的肇始者,是以编纂《精忠录》而使该词“突出于明之中叶”的汤阴县教谕袁纯^⑦。这为《满江红》作者的讨论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未能指明袁纯所发起的伪托究竟假借何人之名。惠康祐

提出“岳飞《满江红》”的作者系于谦^⑧,但解读不够透彻。新文本的产生,不仅是文本间的承袭和流变,更是社会环境的产物。笔者拟从明朝防御地理认识的深化、车战在宁夏战场的运用、土木之变对朝臣心态的影响,以及人际纠葛等角度出发,探讨人地互动视域下“岳飞《满江红》”可能的作者。

一、“贺兰山缺”:防御转向与“诸夏屏藩”

《满江红》词中最具争议的地理标志是贺兰山。有研究者根据地方志文献指出:“《满江红》中的贺兰山当在河北磁县。”^⑨此说从方位上契合了宋金战场的分布,然不足为据^⑩。辛德勇认为,岳飞兵锋所指向的金人疆域最北之处为“辽燕京城”,他会把攻取燕然山作为抗金取胜的标志,若要选取标志性山脉,用“燕然山”可能更合理^⑪。由此,贺兰山成为定位词作者的关键因素之一。

明前期贺兰山的防御价值逐渐提升。从地缘结构看,贺兰山构成河套平原西侧的天然屏障,是这一区域得以存续的重要地理条件。从防御格局看,“如果把南北走向的祁连山、贺兰山、吕梁山这三座山和东西走向的秦岭连在一起,就呈现出一个‘山’

收稿日期:2026-03-03

基金项目: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河南古代名医懿行研究”(2024XWH020)

作者简介:吴娜(1977—),女,河南汝南人,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字,贺兰山就是这个‘山’字中间竖写的那一笔,这一笔,注定了贺兰山在中国内陆山形格局中的独特地位”^[8]。学界借用农牧交错带、400毫米等降水量线、15英寸雨线等概念^{[9]25},阐释明朝北边防线的地理属性,温俊轩更是将北纬42°线称为“大明生死线”^{[10]8},他们都旨在说明贺兰山所在的这条线是抵御蒙古袭扰的天然东西向屏障。

明朝对蒙古的态度颇为复杂,总体上处于戒备状态。元末农民起义时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11]303};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强调:“自古及今,胡虏为中国患久矣……故朕于北鄙之虑,尤加慎密。”^{[12]3658}而蒙古势力并不甘心退出中原地区,“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开平,数遣其将也速等扰北边”^{[13]8463},致使北边烽火连年。明成祖数次亲征漠北,得以熟悉蒙古人活动区域的地理环境。宣德初年,明朝奉行“不启边衅,严其防御”的方针,瓦剌脱欢部乘势崛起,占据漠北。宣德末年,和宁王阿鲁台残部频繁侵扰河西走廊。英宗即位时,脱欢成为瓦剌盟主。正统元年(1436),宁夏镇不断发出受到瓦剌威胁的警报,明廷派丁信、老将史昭前往宁夏。正统二年(1437),蒙古部深入甘州、凉州掳掠,守将蒋贵、赵安多次带兵出塞追剿。由此可知,正统初年蒙古部已跨越大漠频繁袭扰,以甘肃和宁夏最为严重。此二镇正以贺兰山、黄河作为地理分界。蒙古人的频繁侵扰,不断深化明朝对西北地区防御地理的认识,明廷也着力提升西北的防御能力。正统年间,明廷开始修建边墙;成化年间,扩大修筑规模。蒙古人则迅速调整其扰边策略:“因筑边墙,蒙古诸部‘知套内乃中国弃地,不事兵革,公然而为巢穴。居比邻之地,排数尺之墙,小寇大举,无日无之’。”^{[14]258}明廷的防御地理认识也随蒙古人活动范围的变化而调整,当南北向防御收效甚微后,东西向的防御屏障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防御地理上,贺兰山经历了从北伐通道到“诸夏屏藩”的转变。明初,贺兰山是明军北进的通道。洪武九年(1376),“复设宁夏等伍卫于上郡,东南距河,西北抵贺兰山……所隶贺兰山后,虏贼出没无时”^{[15]320}。永乐年间,总兵不时向朝廷奏报蒙古进犯的讯息,宁夏镇在明蒙防御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其地理基础被细化和强调:“黄河绕其东,贺兰耸其西。西北以山为固,东南以河为险”^{[16]10};“宁夏则跨有贺兰山黄河之险。虏难驰骤,故为备差易”^{[17]1862}。成化六年(1470),都御史张礪立重修儒学碑载:“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其形势之重如此。”^{[16]56}

宁夏在坤舆西北,为风气严凝所始。贺兰拱秀,黄河环流,自古为诸夏藩屏。宁夏镇成为“御外夷”的前沿阵地,贺兰山亦成为“诸夏藩屏”。

防御价值的提升,催生出贺兰山在诗词中的象征意义。叶晔认为,诗中“贺兰”,盛唐已有王维“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词中贺兰,金人折元礼《望海潮》“六郡少年,三明老将,贺兰烽火新收”有涉及,诗词中的贺兰山均为实指。明初,庆靖王朱栴、安塞宣靖王朱秩炅等人词中均用到贺兰意象。此后无论写实之作,还是寄寓之作,以贺兰山实指宁夏边塞的写法,贯穿了整个明代^[18]。金幼孜赞曰:“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16]170}贺兰山不仅在现实防御中具象化,更在诗词中成为边塞防御屏障的指代,这为朝堂上君臣将贺兰山符号化运用奠定基础。由此看来,明代用“贺兰山阙”泛指边塞,在情理之中。

二、“驾长车”:宁夏战场与兵车之用

“岳飞《满江红》”中,与宋朝战争形势不相符者,还有“驾长车”一例。明代战车用于战场已不鲜见,宁夏镇更是大规模使用的典型。朱志远指出,“土木堡”一战,面对也先的劲捷虏骑,举朝文武一致认为惟造战车之法可以应对,“自是,言车战者相继”^{[19]3975}。战车在宁夏战场上的使用,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产生的现实基础。

宁夏战场防御形势变化促使技术提升成为必须。宁夏在明初就是蒙古兵锋南下的要冲,建文帝时设宁夏镇。^[20]正统元年(1436),宁夏总兵史昭上言:“所辖屯堡,俱在河外,自河迤东至察罕脑儿,抵绥德州,沙漠旷远,并无守备。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13]2337}宁夏镇的防守渐趋完善。至正统末,明朝控制范围内缩,“宁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虏境,烽火四时不绝”^{[21]63}。明蒙关系及河套等地区防御形势的变动,使宁夏成为前线,提高防御技术迫在眉睫。

土木之变前后宁夏已使用战车。正统十二年(1447)九月,朱冕、沈固因也先逼近而上疏,其六议车战:“预计所有步阵合用车八百五十辆,先已造完小火车三百八十六辆,呈样至京实验。”结果“上善其意,命所司悉从之”^{[22]3078}。正统十四年(1449),“给事中李侃请以骡车为战车。帝命造一千辆,下车式于边境,用七马驾。然宜于平原遏敌。宁夏多沟,总兵官张泰请更制,用独马小车,中藏兵器,遇险则以人力举而越之”^{[23]1192}。有学者认为,明代战车“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24]。但刘利平认为,明代战车不仅参加过实战,并且取得过不少战果^[25]。宁夏在巩昌王府东设兵车厂,“正统间,总兵

官张泰奏置。兵车皆双轮大厢车,原造六百辆,建是厂贮之”^{[16]55}。成化年间,余子俊上书言边务:“追忆天顺年间,臣守西安,曾办车料,送至宁夏,成造兵车,用无不利,至今赖之。”^{[17]490}宁夏兵车之用具有连续性。时人评张泰所定:“车战之法,对旗为要……故以对旗之法致之。此总兵官张泰兵车之制,有可取者。”^{[16]55}张泰墓志也强调其在技术上的改进:“公在戎帐,增损古制,造战车若干乘,出己意制旋铜风炮,为治虏长技。”^[26]宁夏大规模制造兵车并投入实战使用,应无疑义。

贺兰山前相对平坦的地势,符合战车使用的地形需求。贺兰山众多隘口是蒙古人进犯的捷径,谿径可驰入者数十处,“其山口大者三十有七,小者十许处”^{[27]305}。宣德七年至正统八年(1432—1443)间,总兵官史昭在山口建关隘布防,“山后之虏梯山斩关,贺兰山之险与之共矣”^{[28]50}。贺兰山隘口与山前平原,构成车战的试验场。正统至景泰年间,前线官兵与兵部官员最有机会掌握明蒙战场的实时信息。1962年,夏承焘提出该词作者是首任三边总制王越或其幕下文士^[29]。其首次任职时间为成化十年(1474)。1981年沈尼克也持此推测^[30]。1981年汤阴岳庙相关碑刻的出土,将该词的写作下限定于天顺二年(1458),推翻了此前的推测。而当时防御地理的变化和战车使用情况的传播,使战场写实成为一种常识。对于正统、景泰时期的边将与兵部官员而言,他们兼具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是推测其为《满江红》词作者的重要依据。那些熟悉明蒙前线形势的书写者,身居庙堂时自然会产生“驾长车”的军旅豪情;想象明军在贺兰山前的广阔战场上,势吞“胡虏”,气壮山河,为国“雪耻”。故而,《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既是边塞豪情的抒发,亦是基于宁夏战场的实景书写。

在此背景下,该词作者需要具备多个条件:其一,对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之事深感激愤;其二,应有扭转局势的抱负和能力;其三,人际关系不睦;其四,拥有一以贯之的文风。唯有满足上述条件,其人方有能力创作此词,也才会成为修庙者、典籍编纂者托名岳飞的合适对象。此前惠康祐曾从于谦的身份、心境及其诗词的意境风格等角度展开讨论^[5],但未充分考量相关历史背景与人事纠葛。

三、“靖康耻”:土木之变与“报仇雪耻”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的土木之变,是明朝最后一次皇帝亲征蒙古。是役明朝官军损失达数十万(明代史籍记载),文武官员数百人殉难。最让满朝文武意难平的是英宗被俘,因同样被掳至漠北,人们

很自然地将其与“靖康之耻”联系起来,“徽、钦之祸,复见于兹,雪窖冰天,魂终漠北矣”^{[31]474}。同月,郕王朱祁钰监国,旋即于九月即位(代宗),“乃命侍讲臣理等十有五人,分镇要地,遏乱略,纠义旅,以为京师声援”^{[32]423}。理,即后来更名的徐有贞,朝廷拟派其出守彰德府,该府管辖岳飞故乡汤阴县。国耻当头,徐有贞倡议修建汤阴精忠庙,朝野响应;县教谕袁纯辑录《精忠录》。汤阴精忠庙的倡建、《精忠录》的辑录,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土木之变带来的国耻刺激,而《精忠录》的刊刻则晚至景泰年间。涂秀虹综合古籍书目考察,明清两代刊刻的岳飞文集和相关资料选辑不少于二十种^[33],《精忠录》类文献的辑录和刊刻与边疆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而岳飞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也缘此得以大振。王霞认为,《满江红》词是借鉴、改写《女冠子》唱词创作而成^[34];肖鹰进一步提出,该词由《女冠子》曲与元杂剧演绎的岳飞独白改写而来^[4]。若此说成立,那么在土木之变后朝堂之上群情激愤者当中,谁是岳飞精神的追随者,并怀着相似心境创作了《满江红》?于谦被视为可能性人选。

土木之变后,于谦是朝堂之上最为坚定的抵抗派。国难骤至,朝堂之上群情激愤,身处风暴中心的一众重臣之中,于谦挺身而出。英宗被俘后,郕王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理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13]4545}于谦在惊涛骇浪中首先想到“宋南渡事”,斥责徐理,坚定太后和郕王守卫北京的决心。此后,于谦与王直等大臣力请郕王即位为代宗,调动将士勤王、坚定朝廷防守决心等举措,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成为危局之中的核心支柱。土木之变激起了明朝统治阶层对蒙古部的仇恨,于谦直言:“中国与寇虏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则背君父而违大义。”^{[17]229}在他的驳斥与带动之下,边关将领纷纷转向主战,“自是边将人人主战守,无敢言讲和者”。于谦救朝廷于水火,朝野遂有“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之叹。

于谦将“报仇雪耻”视为自身的责任。任兵部尚书后,他反复强调,“报仇雪耻,臣等职也”^{[31]3452},并反思两宋议和的危害。景泰三年(1452),瓦剌也先和脱脱不花自相残杀,于谦上疏:“臣谦备员总督,臣亨叟在总兵官,日夜兢惕,思所以报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耻,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复仇之机,而不可失也……苟于此时而不奋忠义之气,竭涓埃之报,则是负天地生成之恩。”^{[17]240-241}于谦不断强调要洗雪

国耻，“万一虏寇复有大举入寇之谋，则我兵操守有素，加以将帅思奋，臣等当尽死效力，以图剿灭，以雪国耻”^{[17]229}。于谦期待明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否则“国耻未雪”^{[13]4545}。

于谦具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能力。他下令各地操练军队，严守边防，“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剿杀”^{[17]229}，为洗雪国耻做积极准备。也先送还英宗后，于谦告诫边将：“中国之驭夷狄，不论彼之强弱，顾我备之有无。”^{[22]4221}为此，他亲自督促操练士卒，提升作战能力；调整军事部署，着力加强偏头、独石等边防要地的防御；部署兵力剪除也先的同党，抑制其扰边活动。在于谦的组织下，明军对也先部进行有效的打击，使其不敢轻易南下，北部边防形势趋于稳定^[35]。

于谦具有担当精神。他愿承担不效之责：“至于军旅之事，臣请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13]4545}于谦的忠肝义胆在朝堂之上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忠贞之志屡见于其诗文，如“一寸丹心图报国”。后世有少数研究者推测《满江红》或出于于谦之手，认为从词中“臣子”自称、“朝天阙”的表述来看，对国耻有切肤之痛、总揽军事全局的兵部尚书于谦，与词作抒发的心境高度契合，但该说尚缺乏直接文献证据支撑。

四、“臣子恨”：“夺门之变”与于谦之悲

部分研究者提出，土木之变很可能是《满江红》一词产生的现实机缘，此说尚存在争议。如前所述，于谦调整防御格局，积极训练士兵，为报仇雪耻作准备。从个人情感看，于谦对岳飞等名将深怀敬意，诗作中对岳飞和韩琦的敬仰溢于言表：“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36]652}；“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37]66}倘若《满江红》确出于于谦之手，定能与其致敬韩琦的诗作并肩。于谦对历史上北边民族活动的认识和意欲建功边疆的志向跃然纸上：“三军锐气能如此，会缚戎王献玉京。”^{[37]67}其欲雪国耻的思想一以贯之。

从诗词风格看，“岳飞《满江红》”的风格与于谦的文风颇有相似之处。于谦向来以儒者之楷模与爱国诗人学界所重。四库馆臣曰：“至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之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38]1486}王世贞说：“少保负颖异之才，蓄经纶之识，诗如河朔少年儿，无论风雅，颇自奕奕快爽。”^{[39]93}钱谦益承袭此说：“文如云行水涌，诗顷刻千言，格调不甚高，而奕奕俊爽。”^{[40]2355}《满江红》的慷慨词风，与于谦诗作的艺术风貌如出一辙。然于

谦独特而悲壮的人生际遇，让他的诗才不能彰显，在明中期主流诗坛并未获得足够重视^[41]。

于谦的性格及人际关系，使他在政坛举步维艰。首先，英宗和代宗与于谦关系均不和睦。于谦虽为一代忠臣，但他坚持的“社稷为重，君为轻”理念，抑制了君权。他拒绝也先的和议，致使英宗流落漠北达一年之久，英宗对其不满可想而知。而在易储问题上，代宗与于谦产生嫌隙；代宗任用亲信仪铭为协理兵部尚书，分解兵部事权，君臣关系更加冷淡；在朱见济夭折后，两人关系恶化。其次，在同僚间，于谦树敌众多。他在处理王振及其党羽事件上，遭到相关官员的嫉恨。经他保全、举荐的石亨、罗通，后来皆因私怨与其反目。于谦虽一心为国，却因性格刚直而使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而促成于谦蒙“谋逆罪”被杀，并引发后世出现于谦词作被托名现象的主谋，是徐有贞。徐有贞在朝堂闻名，始于其“南迁”之论。彼时他还叫徐理，土木之变期间因倡言南迁，遭到于谦当众严厉斥责，由此心生嫌隙。此后，“理不知谦之荐之也，以为沮己，深怨谦”^{[13]4561}，二人矛盾加深。于谦呼风唤雨之际，徐有贞受命赴山东治理黄河，期间上疏奏请为岳飞建立精忠庙，获得朝廷赐额。汤阴县教谕袁纯辑录岳飞相关诗文，编成《精忠录》，并无史料证实此举出于徐有贞的倡导。景泰八年（1457）正月，徐有贞参与石亨等人发动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因拥立之功，“即日命有贞兼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明日加兵部尚书”^{[13]4561}。在石亨的建言下，徐有贞权势日隆，“有贞遂诬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杀之”^{[13]4561}。徐有贞进言使于谦等人被陷入狱，数天后于谦被以“谋逆罪”处极刑，籍其家，家属戍边。英宗虽认为“于谦实有功”，但迫于徐有贞的“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乃斩于谦。以徐有贞的气度看，设若景泰间于谦作《满江红》，作为建庙、集文活动的主导者，自不愿传于谦之美名。因“谋逆”被处刑的于谦，更是朝野避谈的对象。成化年间，于谦案被平反，家属赦免；万历年间，朝廷追谥其“忠肃”。于谦声誉虽得以恢复，但距其被害已百年有余。

于谦的诗词作品缺乏传播的路径。于谦性情刚直，为官期间酬答交游甚少，“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视诸选奕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13]4549}。于谦虽居官有俸，但遭祸之后家属被流放，丧失整理刊刻遗稿的条件；而在官场的冷遇，使其词作失去被友朋同僚传唱的机会。倪岳为于谦写神道碑，称“‘谦平生著述甚多，仅存《节庵诗文稿》《奏议》各若干卷。祸变

之余,盖千百之什一’云云,是其歿后遗稿已多散佚”^{[38][1486]}。基于此,于谦诗词散佚应属常见。

于谦的人生际遇,使他去世之后词作失去了恢复原貌的机会。徐有贞作为汤阴岳飞庙的倡建者、推动《精忠录》编纂的关键人物,具备了使于谦之名不出现在《精忠录》中的可能性。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于谦蒙祸之际家属流放,缺少得力的故友门生为之传播;平反之后,其子于冕整理遗稿,亦未将此词归于于谦,《满江红》一词始终没有机会和于谦之名联系在一起。设若如已有研究所言,伪托的肇始者为袁纯,其伪托的原作究竟出自何人?种种迹象表明,“岳飞《满江红》”一词,本为于谦之作而遭托名,其可能性远大于同时代的其他人。

五、余论

自岳飞遇害至《精忠录》编纂,前后约三百年。岳飞之子岳霖、孙岳珂汇编的《鄂国金佗粹编》、住山僧可观录的《岳忠武王庙名贤诗》现世,崖山之战等激荡民族情绪的重大历史事件亦曾发生,均未见“岳飞《满江红》”流传于世,这也可以反证该词在此时尚未出现。天顺二年(1458)刻于汤阴岳庙的“岳飞《满江红》”,作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实物,可视作为该词出现的最早时间节点。

明朝立国至正统年间,明蒙双方冲突不断,明廷多次出兵深入漠北,其北边防御地理认识也随之清晰。随着北疆防线逐步内移,明朝北边防御由主动北伐的南北向进攻模式,转向沿边镇戍的东西向守御模式,九边防御体系渐次发展。但防御模式的转换并未立刻消弭边患,蒙古各部侵扰沿边、甚至深入内地的频次不断增加,这成为土木之变发生的重要时代背景,而事变的直接诱因则是英宗轻率亲征。贺兰山作为明朝北境东西方向上最重要的界山之一,为明蒙双方共同看重的天然屏藩;该山在明朝防御战略由南北征伐转向东西戍守之后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成为明代北疆防务变迁的见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征伐想象可投射于此,使之成为时人抒发家国情怀的象征符号。土木之变后,于谦挽大厦于将倾的胆略和救世护主的谋略,使其人生气节与《满江红》中“壮怀激烈”“臣子恨”“朝天阙”的情感内涵高度契合。而他忠于明朝而非英宗、代宗的选择,以及刚直的性格,使他成为皇权政争的牺牲品。倘若《满江红》本为于谦述怀之作,则在其蒙祸之后,该词便被托名于岳飞流传。百余年后于谦沉冤得雪,但其词作却失去了还原真相的历史机遇。

简言之,在明蒙冲突加深的背景下,明朝君臣对北部边疆防御地理认识的深化,为《满江红》的产生

提供了可能性,土木之变带来的国仇家恨则为其提供了契机。推动汤阴岳飞庙修建、促成《精忠录》编纂的徐有贞,因与于谦政见不合而成宿敌,使《满江红》被托名成为可能;而于谦被强加的“谋逆罪”,使《满江红》失去了恢复其原作者真相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高度认同“岳飞《满江红》”的精神价值,而对其更具可能性的作者进行探讨,仍是值得推进的研究方向。

注释:

- ①邓广铭、王曾瑜等多肯定岳飞的民族气节和精神象征,余嘉锡、夏承焘等多从文本传递、岳飞的经历等方面质疑。总体上看,讨论作伪的论据日益多元化。
- ②参见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涂秀虹《〈精忠录〉: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文献》2014年第3期)、张廷和《〈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流传》(《文献》2022年第6期)、葛畅《“虚实之间”的限度与可能:岳飞〈满江红〉词辨伪路径评述》(《中国诗学研究》第25辑)。

参考文献:

[1] 张政烺. 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2] 辛德勇. 贺兰山招谁惹谁了?——从所谓岳飞《满江红》说起,澎湃新闻[EB/OL]. (2023-02-27)[2025-03-28].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84869.

[3] 朱志远. 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C]//中国诗学(第29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4] 肖鹰. “岳飞《满江红》”伪托新考:袁纯是“岳飞《满江红》”肇始者[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24-132.

[5] 惠康祐.《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54-56.

[6] 王云峰,赵金元,赵志和.《满江红》中的贺兰山当在磁县[J]. 中国地名,1999(5):32.

[7] 袁士坚. 岳飞名詞《满江红》中的贺兰山在河北磁县? [J]. 乡音,2011(7):48-49.

[8] 陈育宁. 那山,名叫贺兰[N]. 光明日报,2022-08-24(16).

[9]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 温俊轩. 大明生死线[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

[11] 高岱. 鸿猷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Z].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12] 明太祖实录(卷253)[Z]. 北京:中华书局,2016.

[13]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周伟洲. 陕西通史·民族卷[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 出版社,1997.
- [15] 魏焕. 皇明九边考·宁夏考(第8卷)[M]. 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9.
- [16] 胡汝砺. 宁夏新志(嘉靖)[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 [17]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8] 叶晔. 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J]. 文学遗产,2019(3):92-104.
- [19] 王圻. 续文献通考·兵考(卷132)[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20] 薛正昌. 明代宁夏军事建制与防御[J]. 西夏研究,2014(1):90-109.
- [21] 焦竑. 玉堂丛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2] 明英宗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3] 龙文彬纂. 明会要·兵五·战车(卷62)[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4] 杨业进. 明代战车初探[C]//文史(第29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8:255-261.
- [25] 刘利平. 明代战车“未尝一当敌”“亦未尝以战”质疑[J]. 广西社会科学,2008(3):126-130.
- [26] 王琨. 明代宁夏总兵官张泰墓志铭考释[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53-58.
- [27] 梁份. 秦边纪略[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 [28] 张雨. 边政考[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 [29] 夏承焘. 再谈岳飞满江红词[N]. 浙江日报,1962-10-21.
- [30] 尼克.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谈《满江红》不是岳飞所写[J].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1):45-46.
- [31]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 [32] 杨世达. 汤阴县志·创建精忠庙碑(乾隆)[M]. 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13.
- [33] 涂秀虹. 《精忠录》: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J]. 文献,2014(3):128-142.
- [34] 王霞. 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C]//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74-194.
- [35] 刘祥学. 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72-76.
- [36] 魏得良,点校. 于谦集·拾遗·钱塘岳忠武王祠[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 [37] 林寒,王季,选注. 于谦诗选[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58.
- [38]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0)[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9] 王世贞. 明诗评(四)[C]. 北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7.
- [40] 钱谦益. 列朝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1] 左东岭. 论于谦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史地位[J]. 北方论丛,2010(4):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Study on the Authorship of "Yue Fei's *Man Jiang H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WU Na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 concerning the authorship of "Yue Fei's *Man Jiang Hong*" has lasted for nearly a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the northern frontier defens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ccomplished its readjustment from a north-south to an east-west orientation during the Jingtai reign, whereby the Helan Mountain became "a barrier protecting the Chinese realm". During the Zhengtong reign, the Ming court built a chariot workshop in Ningxia, where hundreds of military chariots were trial-manufactured and chariot-fighting tactics were popularized. In the wake of the Tumu Crisis, in which the Yingzong Emperor was captured, court ministers and border generals were all determined to wipe out the national humiliation. All these factors form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creation of "Yue Fei's *Man Jiang Hong*". After the Tumu Crisis, Yu Qian and Xu Youzhen fell out over the court dispute on relocating versus retaining the capital. Following the Duomen Incident, Xu Youzhen seized supreme power for his meritorious role in the emperor's restoration, while Yu Qian was executed on the charge of "treason". As a result, *Man Jiang Hong*, which was likely written to voice Yu Qian's personal grievance, was falsely attributed to Yue Fei by Xu Youzhen and his followers. It can thus be seen that the pseudonymous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s no accident, but stems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human-political entanglements.

Keywords: "Yue Fei's *Man Jiang Hong*"; Tumu Crisis; defense geography; Helan Mountain; Yu Qian

李泽厚“三大思想史论”的思想史主题

韩博韬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思想史主题亦是时代课题。在“三年徘徊”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旨在“以马克思主义探求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文化热”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中国智慧”为题,表达了对传统的温情。1986年,“文革”结束已届十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提出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思想史时代的结束”,而“三大思想史论”则成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学术遗产之一。

关键词:李泽厚;三大思想史论;马克思主义;中国智慧;新启蒙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0

中图分类号:B261/B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59-05

李泽厚过世前自谓“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仅有三句话:“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截至目前,关于李泽厚的研究已有相当大的规模:1981—2020年的报刊论文逾六百篇,硕博论文逾百篇,学术专著三十余部^[1]。学界却尚无人回答李泽厚“三大思想史论”的思想史主题是什么。李泽厚80年代的“三大思想史论”分别有三个主题,《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探求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谈“中国智慧”,《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则通过论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呼唤启蒙。

一、三年徘徊时期:以马克思主义探求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可以具体分为三段,“一是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此时期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主要矛盾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观念博弈,通常所说的‘思想文化界’的确尚未形成,最为醒目活跃的是所谓的‘理论界’。从1984年开始至1986年底,构成了‘八十年代’的第二段,突出的主题是‘文化热’,是‘反传统’,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

文化界’基本形成,但活跃的‘理论界’仍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从1987至1989年春夏之交,构成‘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段,主流思潮除继续‘反传统’‘全盘西化’外,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思想博弈又重新浮出水面,并酿成巨大的政治事变”^{[2]284}。

(一)《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问世条件

李泽厚“近代史论”的间接目的是讨论“四人帮”问题。其备受争议的“西体中用”^[3]最初由黎澍提出,“如果说翦伯赞是‘文革’前史学主潮(历史主义思潮)的代表,那么黎澍则是‘文革’后史学主潮(回到马克思去)的代表”^[4]。黎澍《“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骗局》《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1977年第5期、1979年第1期)直到21世纪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正是因为他拈出了所谓的“反封建”问题^[5]。他在20世纪80年代希望“弄清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近代中国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其结论是“现代化”^[6]。将80年代置于70年代前中期的现代蒙昧主义语境中,才能理解三年徘徊时期《驳“四人帮”在农民战

收稿日期:2026-04-02

基金项目:2026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学术—社会’互动视域下的李泽厚学术思想研究”(3132026310)

作者简介:韩博韬(1992—),男,河北唐山人,博士,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

争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与《论“四人帮”的出现和灭亡》(《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这些文章的意义。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写作十分仓促,李泽厚自述:“写于五十年代的大体分析稍细而略繁琐,写于七十年代的则又失之过粗,基本是些提纲性的东西。”^{[7]499} 三年徘徊时期的李泽厚,没有王汎森撰写《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条件,没有桑兵撰写《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的条件,甚至没有陈旭麓钻研《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那样的条件。直到2021年,桑兵依旧称:“就现状而论,中国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很难说哪一块已经研究到了穷尽的程度,无法继续深入扩展,可以束之高阁。与相对成熟的古代史相比,更加显得薄弱。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开始研究者较少,且多从其他方面转入,有些研究者的素质和意识略受限制。后来虽然人数迅猛增加,却又有趋易避难之嫌。”^{[8]34} 难就难在遍览材料之不易。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思想史主题

“近代史论”的主题是:“如何在深刻理解多年来深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某些‘规律’。”^{[7]499} 唯物史观是要探求规律,而“四人帮”的封建主义多是靠歪曲历史实现的;“文革”十年在李氏心灵上的烙印,是要好好考虑“斗争”“革命”就是哲学的一切,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极大热忱和关心,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已被糟蹋得真可说是不像样子的時候”,依然坚持用马克思的观点探求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文章大量出现,到1982、1983年形成一股热潮。而李泽厚不赞成“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探求规律的建设性哲学^{[9]212}。基于这个主题,才能理解李氏论及太平天国思想时说的:“资本主义也是剥削制度,但它比封建主义要进步,比小生产者的空想要现实和优越,‘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就是故意抹杀这一点。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大肆宣扬平均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把革命领袖神化,大搞变相的宗教迷信、宗教仪式……而这些东西居然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蒙蔽人们,甚至俘虏众多知识分子,原因之一与中国长久广泛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的传统影响有关。”^{[7]26} 才能理解通过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得出“科学与民主这个

中国民主革命所尚未实现的目标,仍然是今天的巨大任务”^{[7]320}。才能理解李泽厚剖析章太炎时说“如何彻底改变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尽快实现现代化,倒也正是使唯物主义扎下根来的重要方面,章太炎的哲学正留下一个很好的借鉴”^{[7]428}。才能理解梁启超、王国维“两人的代表地位和时代意义在康、孙、章等巨大身影的遮掩下,显得暗淡得多,数十年来许多论著因此而完全忽视和否定他们,则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7]447}。这个近代社会发展规律几近于日后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四大自救运动。

二、“文化热”时期: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解说“中国智慧”

加入“中国文化书院”、撰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让李泽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温情。“三大思想史论”中,李泽厚最看重“古代史论”,此书的方法是“六经注我”。以历史的后视之明,他用以注“儒墨道”的便是“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即“文化热”时期的时代主题“中国智慧”。

(一)儒学智慧的三个阶段:仁的结构—儒道融合—宋明理学

李泽厚论及“仁”的结构之前,对“礼”做出了界说与概括。第一,“礼”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第二,“礼”的起源和核心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在他看来,“周礼”有一个历史形成的基础,“即原始巫术、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未成文的习惯法”;“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礼仪’的专职监督保存者”^{[10]3-5}。“宗教性的、神秘性的”到“世俗性的、日常性的”转变,便是“礼”从外在变为内在的“仁”的儒学秘密,孔子的“礼”使“儒学既不是宗教,又能替代宗教的功能”^{[10]16}。“仁”的结构有四,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个体人格,整体特征是实践理性。其一,血缘基础,可以视为对“原始亲情”的同义转换。其二,心理原则,即从外在“礼”到内在“仁”的儒学秘密。在他看来,“强调这种内在的心理依据,‘仁’不仅仅得到了比‘仪’远为优越的地位,而且也使‘礼’实际从属于‘仁’”^{[10]17}。之所以“仁”能得到比“仪”远为优越的地位,是因为“仁”可以管控“礼”难以管控的人的内心因素。其三,人道主义源于原始民主,即“中庸”。“孔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既竭力维护氏族统治体系的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强

调这个体制所仍然留存的原始民主和原始人道主义,坚决反对过分的、残暴的、赤裸裸的压迫与剥削。”^{[10]18} 其四,个体人格因素指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即修身。“孔子把本是宗教徒的素质和要求归结为这种不需要服从于神的‘仁’的个体自觉。”^{[10]24}

总之,李泽厚将“血缘基础”视为不证自明的“原始亲情”,将“心理原则”视为普适的“族群共性”,将“人道主义”视为“孔式热忱”,将“个体人格”视为“个体法则”。“原始亲情”是局部的存在,“孔式热忱”也是个体的存在,他将两种局部的、个体的因素,阐释、推广到整个社会并希望每个社会个体都以此为准则,由此完成了“仁学结构”的基本解析。至于整体特征“实践理性”,“首先是一种理性精神或者理性态度,其次是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功能的特点”,不神秘、不狂妄、不禁欲、不纵欲、不需要上帝的命令、不盲目服从非理性的权威。“血缘、心理、人道、人格终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10]27}

《荀易庸记要》一反哲学史一般看法“《荀子》晚于《易传》,《孟子》晚于《中庸》”,提出《易传》《中庸》均是儒家智慧与道家智慧的融合(第二阶段)。对《荀子》《易传》《中庸》的新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人的族类特征出发解释荀子的“隆礼”“性伪”“劝学”“天人相分”。二是采取《易传》与荀学有关的学说,提出《易传》的最大特点在于沿袭了荀学中的刚健奋斗基本精神。三是提出“中庸”将《易传》的世界观转为内在论,“《易传》接着荀子,吸收了《老子》‘道’的思想,从外在历史眼界建立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中庸》承续《孟子》,也吸收了‘道’的思想,从内在心性探讨建立了同样的世界观”^{[10]134}。宋明理学是第三阶段。李泽厚认为,宋明理学在吸收和批判释道哲学之后,将伦理提升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最高理想是“孔颜乐处”,是一种“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天人合一’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由于不能根本摆脱感性,造成‘道心’‘人心’二重化;它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便必然引出‘天理从人欲中见’等观点而走向近代的自然人性论”^[11]。有论者指出,李泽厚“认为张载哲学中心范畴‘气’,标志着宇宙论转向伦理学的逻辑程序和理学起始;朱熹哲学的中心范畴‘理’,标志着理学体系的全面成熟和精巧构造;王阳明哲学的中心范畴‘心’,则是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的理学末端”^{[12]122}。

(二)墨学的智慧:“交相利”所以“兼相爱”

分析和评价李泽厚阐述的墨学智慧,需以 20 世

纪研究墨子“十论”的名家为参照,依据郑杰文《20 世纪中国墨学史》对近代墨学的评价,需对比梁启超、胡适和郭沫若研究墨子“十论”的主要特点。墨学研究者的共性在于,均需对墨子“十论”进行体系建构,但各自所确定的“十论”核心各不相同,原因在于这些名家均出于独特的政治目的或文化目的。在梁启超这里,墨学义理系统的核心观念是兼爱^{[13]140},而他对墨学义理的阐释,无不带有特殊的时代印记,罗检秋认为,梁启超在墨学研究中倾注了许多主观思想以重塑墨学形象,所以总体而言,“他宣传墨学的影响和作用甚过他研究墨学的创见”,“在报刊、讲演、教学活动中颂扬墨学”以引起人们关注墨学、重视墨学^{[13]144}。在胡适这里,墨子政治主张的根本是“天志”,如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只是“天志”的应用^{[14]31}。胡适墨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在于“把哲学方法作为理解思想学说体系的根本来研究”^{[14]27},目的是服务于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志向^{[14]35}。至于郭沫若,在其早期研究墨学的作品中,以“明鬼为墨子十论的中心思想”^[15];而在《十批判书》中,是以“天志”为中心^[16]。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墨学分析与近代学人的研究几乎都不一样^[17],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坚守“人民本位”的立场。

李泽厚认为墨子思想体系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劳动生产创造财富是思想基础,建立在“交相利”之上的“兼相爱”(即“大同”空想)是思想中心,人格神的专制主宰是墨子思想的第三支柱^{[10]2}。在他看来,墨子首先和直接强调的是老百姓的食饱衣暖。作为“为政之本”的“尚贤”,是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以满足人民生存需求这一目的的。至于其他,如礼乐等,都是次要的,应直接从属于这个根本目的而不应违反它。由此,非乐,反对厚葬。李氏依据“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来抽绎墨子非命、节用的思想主张,尤其是他对“非命”的解释,与一些哲学通史的看法不同。墨家的“爱”是有条件的,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根基;它不是出自内在心理的“仁”,而是来自外在互利的“义”。墨子的“兼爱”从“交相利”出发,因此不主张甚至反对爱有差别等。但在李泽厚看来,这种主张带有空想色彩。关于第三支柱,墨子主张“天志”“明鬼”乃至“尚同”,要求统一意志、统一观念、统一行动^{[10]53}。

(三)老庄学发展了兵家辩证法,也创造了中国直观思维

李泽厚认为:“中国辩证法应当源于兵家,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A)高度冷静的理

智态度,(B)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C)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老子将军事辩证法提升为‘君人南面术’”“老子辩证法并非对自然的认识而是生活的智慧”“由老子的非情感的特征发展而来的韩非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对世事人情的周密计算。政治犹军事,人生乃战场,揭穿了一切虚仁假义而‘益人神智’”。在孙、老、韩这一思想序列中,关键不在于认识真理,而在于如何运用知识,“这种军事—政治—生活的辩证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维结构”^{[10]2-3}。这一论断得到何炳棣的赞赏,他在1990年撰写了三篇考证文章:《〈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从司马谈、司马迁考订老子年代之“晚”》《辩证思维:〈孙〉为〈老〉祖》^[18]。李泽厚的《漫述庄禅》在80年代即产生较大影响,钱学森看到此文后写信给李泽厚,称赞其对中国“直观思维”的揭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庄玄禅宗漫述》与80年代的《漫述庄禅》内容大体一致。相较于新增补的“魏晋玄学”内容,“庄子禅宗”部分更具创新性 & 独到之处,其内容与贡献主要有三:一是提出庄子最早在中国提出“反异化、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个体身心绝对自由”。二是提出,虽然老庄并称,但老子讲权术、重理智;而庄子看似说了诸多超脱与冷静的话,实际上却流露出对人生、生命和情感的眷恋与热爱。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才是对儒家的补充,且开拓了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心灵哲学”。三是提出“庄禅思维”是一种直观思维方式,“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思维更着重于在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10]229}。刘梦溪认为,“庄禅思维”从哲学层面揭示了禅宗顿悟的秘密,堪称对禅宗哲学的一大发现,理论意义重大^{[12]146}。

《老子》是一部兵书的说法并非李泽厚原创,然而,将孙、老、韩合而为一,梳理中国实用辩证法思想谱系的做法,却在李泽厚这里得到首次实践。同样,在思想史上同时谈及“庄玄”并不鲜见,但通过“直观”建立起庄子与禅宗同一性的观点,却是李泽厚首先揭示的。《二十世纪中国庄学》评价此文“独辟蹊径”,并指出庄学的特色在于,它既不同于儒墨老韩的社会政治哲学,也不同于秦汉的宇宙论哲学,而是表现为一种追求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本体论哲学。李泽厚认为,人与自然精神合一,“它所描述和追求的只是具有这种心理—精神的理想人格。庄子哲学并不以宗教经验为依归,而毋宁以某种审美态度为指向。实质上,庄子哲学即是一种美学”^[19]。

三、“文革”结束 10 年后的 1986 年:提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发表于1986年。用李泽厚的话说,此文“离1916年整七十年,离‘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十年,离‘四人帮’垮台也近十年”^{[8]46}。此论不仅风靡学界,而且被众多学人作为阐释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框架加以使用^{[2]289}。由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对传统所持的温情态度,李泽厚一度遭到某些“狂人”式学者的挑战。在80年代“反传统”的强势论调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发表使学界感到“李泽厚又回来了”。

李泽厚将鲁迅置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终章,同时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开篇人物之一,意在突出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按李大钊的说法,“救亡压倒启蒙”的理论依据在于“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罗岗认为,李泽厚探索“五四反传统”背后的深层原因时指出,“打倒孔家店”不等于“打倒孔子”,其动力源于现实政治环境的激荡^[20]。李泽厚“重唤启蒙”是一种未来性指引,因此他提出“转换性创造”及“补课”之说,以作为未来启蒙的实践路径。他揭示出“现代史上反封建的不彻底”：“封建主义的东西往往披着反资本主义的外衣出现……与西方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相适应的近代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观念,在五四及以后并未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也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分析探讨,而是在救亡—革命的浪潮下,一概作为资产阶级的破烂被简单否定。”同时,他亦对西方启蒙思想作出客观而学理的评估:“西方自由主义的大量文献表明,自由、民主都不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也并非某种完美的理想事物。它们本质上是对人与人之间权限的明确限定与法律规范。”^{[9]42}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并非旨在考证和陈述三次学术论战的具体史实,其核心主题是“启蒙与救亡”。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实际上是主张以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玄学派则主张以非科学的形而上学作为意识形态”;“‘救亡’课题更容易接受一种有客观规律可循的‘科学’解释和指导,于是‘救亡’又一次压倒了一切”。在“社会性质论战”中,李泽厚在“提要”中直接挑明立场:“陶希圣等人的‘新生命派’和托派《动力》都强调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则强调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前者主张反帝,后者主张反帝反封建。”李泽厚基于为现实革命服务的史学追求,在整体把握的宏观视角、理论解释能力及主题分析的深入性上,显示出“无可辩驳的吸引力和优胜处”。与

论战几乎同时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及《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将20年代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挤至次要地位。至于“民族文艺形式论战”，李泽厚认为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是其理论成就最高的一篇，原因就在于它“坚决维护五四的启蒙传统，反对简单地服从于救亡斗争；强调应把启蒙注入救亡之中，使救亡具有民主性的新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性水平”^{[9]56}。而当时的民族任务是抗日救亡，政治斗争形势是解放区的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增强、中共领导的广大农民和农村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使文艺为农民、士兵服务才成为焦点所在。只有立足于这一具体历史背景，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与地位。

在知识分子研究中，李泽厚将毛泽东、胡适、陈独秀、鲁迅置于突出位置，指出：胡适曾试图将启蒙与救亡分离开来，但这不仅未能实现，也说明他并不了解白话文运动及其倡导者能在思想史上占据如此地位的真实历史原因^{[9]94}。李泽厚所揭示的，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冲击旧学术传统、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哲学方法论的启蒙意义；陈独秀从政治角度看待文学革新、突破胡适的“八不主义”、反对将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混为一谈的启蒙意义；在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史的视域下，揭示鲁迅一贯的孤独与悲凉所蕴含的启蒙意义。同样，李泽厚揭示了青年毛泽东的启蒙意义——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唯一能与各阶层打成一片者，其“奋斗”的宇宙本体与人格本性、“实现自我”的道德律，以及“通今”（重视现实经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均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

《试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均首刊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两篇文章分别可视为“简短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简短的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它们似乎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和文艺工作者均从“启蒙”转向了“理论救亡”与“文艺实践救亡”。两篇文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看出作者的意图。李泽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来贯穿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行动。其论断有六：第一，在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已有知识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朱执信；而清末的谴责小说缺乏新意，苏曼殊的创作反倒呈现出黎明前的清新状态。第二，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号召“到民间去”、强调“改造精神”，是早期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代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最具“敏感主义”特色，兼具新鲜性、多样性与朦胧性，如冰心对母爱的书写、郁达夫对性爱的描写、郭沫若对“力”的赞颂、许地山对哲理的探求。第三，在年代与理论意义上承上启下的是瞿秋白，他介绍和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而“三十年代创造具体模式的一代”——即现代文学具有了现实生活的客观性，其代表作家主要有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夏衍。第四，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为革命的战略学说，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日益成熟；同时期的红色作家走向工农兵，如艾青、路翎、赵树理。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与“政治挂帅”；颂歌（以贺敬之为代表）与忏悔（以张贤亮为代表）成为解放一代的文学特征。第六，新时期则出现了人道主义的呼声，但人道主义不能成为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才是历史观；同时期苏醒的文学界表现出彷徨、愤慨、寻求与否定等情绪，其代表诗人与作家从舒婷、北岛到刘索拉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两篇文章最能体现李泽厚“历史构建理性”方面的具体追求，即通过中国现代的历史经验来寻绎中国未来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韩博韬. 中国大陆人文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李泽厚研究四十年[J]. 东吴历史学报, 2023: 97.
- [2] 王学典. 良史的命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 [3] 韩博韬. 中西体用之辩的终结：庞朴的“中体西用”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J]. 开放时代, 2025(6): 115.
- [4] 王学典.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0: 463.
- [5] 王学典. 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52.
- [6] 黎澍. 再思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90.
- [7]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8] 桑兵. 承接与延续[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1.
- [9]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0]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1] 李泽厚. 宋明理学片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82(1): 31.
- [12] 杨斌. 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M]. 贵阳：孔学堂书局, 2021.
- [13] 罗检秋. 梁启超与近代墨学[J]. 近代史研究, 1992(3).

(下转第116页)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

李姿萱,何云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玩弄和谈阴谋,三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这一抉择体现出中共的大智大勇,让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主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既在解放区政权等核心问题上坚持原则,又在谈判议题上展现灵活性,以高超的斗争策略维护中共根本利益;与此同时,他指挥上党战役粉碎国民党的军事施压,以军事上的胜利提升中共在谈判桌上的话语权。谈判场外,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借《沁园春·雪》等诗词作品传播政治主张,构建起反对独裁的舆论阵线。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展现的高超斗争艺术,不仅在当时具备重大历史意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类复杂挑战提供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重庆谈判;毛泽东;斗争艺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1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64-06

重庆谈判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关键节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决定国家前途的重大事件。这场历时43天的政治较量,既是毛泽东与蒋介石政治智慧的巅峰对决,更是中国共产党由执掌局部政权成长为全国性政治力量的重要里程碑。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应对了各种复杂局面,为中共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同时也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时隔八十余年再度回望这场复杂的政治博弈,这段历史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决策的权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希望结束多年的战乱,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美苏出于各自战略利益,同样希望国共通过和谈组建新政府,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企图凭借自身军事优势伺机发动内战,消灭中共及其人民力量。在此背景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名义上是

“共定大计”,实则暗藏玄机。中共应当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以避免陷入被动,考验着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一)国际压力与国内舆情双重奏下的政治博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通过雅尔塔会议重构全球秩序,中国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支点。苏联在形式上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同时借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约国民党对东北的实际控制权。苏联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其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另一方面也主张中共放弃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方针。美国则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既不愿放弃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又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以免消耗其远东战略资源。两大阵营的相互制衡,将国共矛盾限定在冷战初期“斗而不破”的格局之内。

在此背景下,受制于国际形势与国内民众的反内战舆论压力,蒋介石只得暂时做出表面妥协。1945年8月,他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营造国共“共

收稿日期:2026-05-16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历程、生成逻辑和推进路径研究”(2023BKS006)

作者简介:李姿萱(2002—),女,河南许昌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何云峰(1972—),男,河南洛阳人,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研究。

定大计”的假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若毛泽东不来，便宣称中共拒绝谈判、蓄意挑起内战，将内战责任完全推给中共；若毛泽东赴渝，便以部分内阁职位利诱中共，胁迫中共交出军队与解放区政权，一旦中共拒绝，依旧可将内战责任归咎于中共。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可借谈判窗口期调兵遣将，为全面内战争取备战时间。显然，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本质是军事压迫与政治欺骗的双重手段。国民党著名“高参”陶希圣曾直言不讳地对下属表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1]603} 国民党当局彼时正观望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举措。

（二）中共中央的战略考量与内部决策

对于蒋介石玩弄和谈花招的真实意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得非常清楚。中共的《新华日报》在1945年8月22日发表社论指出：“象目前这样一只手叉住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浮着奸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团结得拢来的。”^{[1]22} 这样的比喻可谓一语中的。

根据蒋介石不讲信义的一贯表现，毛泽东赴渝谈判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但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去重庆。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阐明了他决定去重庆的原因：“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2]15} 同时他明确指出：“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2]15-16} 毛泽东对国共和谈还是持有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他认为美苏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的。同时，国民党跟过去相比实力虽有所加强，但仍然千疮百孔，内部矛盾甚多。在国内外巨大压力下，有可能会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成就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所以毛泽东的总体判断是：“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这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2]16}

毛泽东最终做出亲赴重庆参加和谈的决策，实际上包含了三重政治考量：第一，占据道义制高点：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时发布《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明确“绝对避免分裂，但不承诺放弃自卫”

原则，既向国内外展示中共追求和平的诚意又保留军事自卫权。第二，巧妙利用国际力量：毛泽东之所以延迟到8月26日才回应蒋介石的三次电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想借美国特使赫尔利赴延安斡旋的机会，由赫尔利陪同赴渝，为重庆之行作“安全担保”，降低途中出意外的风险。第三，以军事的威慑机制为后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和谈期间对于“来犯者”只要好打，就“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3]1154}。

（三）以弥天大勇赢得政治主动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不仅跨越了地理上的千山万水，而且牵动着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毛泽东身着延安特制的深灰色中山装，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登上美军C-47运输机，随行的有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当日下午5时许，飞机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在中外记者的瞩目下，毛泽东稳步走下舷梯，这一画面通过美联社记者的镜头传向全世界。

驻渝中外记者纷纷发出专电，盛赞毛泽东的气魄、胆识和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8月29日，《大公报》记者子冈在报道中说：“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新的体验……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1]52}《新华日报》刊发读者胡其瑞等四人的来信：“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老百姓的要求。”^{[4]743}《华西晚报》在社评中发出预言：“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1]66} 诗人柳亚子更是即兴挥毫，以“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相赠，将毛泽东比作解民倒悬的“弥天大勇”之士。

毛泽东在反复权衡之后做出赴渝谈判的决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这一选择，是对国内外舆论的积极回应，是对中国人民和平诉求的积极回应，是赢得国内外舆论同情和支持的明智之举，不仅彰显了中共对和平的真诚追求和民族大义担当，也体现了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的远见卓识。

二、谈判的策略：既要善于斗争，又要善于妥协

重庆谈判是毛泽东斗争艺术的经典实践，其斗争策略的核心在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谈判中毛泽东既坚守核心利益，在次要问题上也做出适当让步，从而以高超的智慧掌握了政治斗争的

主动权。

(一) 坚守核心利益,体现斗争的原则性

毛泽东始终将国家主权、人民利益和解放区基本权益视为不可退让的“红线”,在涉及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抗战的胜利果实应当归人民所有。他把抗战胜利果实比作“桃子”,形象地指出:“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3]1128} 针对蒋介石大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对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无耻行径,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应对方针。他明确宣布:“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3]1127} 这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绝不拿原则做交易的坚定立场。

谈判期间,毛泽东严正驳斥了蒋介石“中国没有内战”的说法。蒋介石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有内战,坚持把中共的武装叫作“匪”,把国民党攻击中共的军事行动叫作“剿匪”,核心就是既不承认解放区存在的事实,也不承认中共拥有武装的事实。毛泽东明确指出,十年内战及抗战以来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抗日战争中的反共摩擦,大量事实都证明内战不但存在,而且一直没有停止。

在涉及人民军队与解放区政权等实质性问题上,国民党借口“军令政令之统一”,要求尽力缩减中共军队,取消全部解放区,拒不承认在抗战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解放区是人民的选择为法理依据,坚决维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提出“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方案,坚决维护共产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拒绝单方面裁军。毛泽东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3]1161}

(二) 在次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体现斗争的灵活性

为了使和谈能够顺利进行,毛泽东在谈判几近僵局的情势下,深思熟虑后向我党谈判代表发出指示:在确保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于非原则性的议题,应当展现出必要的灵活性,主动且先行作出合理的让步。首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中共承认了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的领袖地位和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其次,中共主动放弃了联合政府方案及召开解放区代表大会的主张。最后,主动提出将中共领导的军队进行缩编,从原有的四十八个师规模缩减至二十四个师,甚至可以接受二十个师,并决定让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

南、皖南、湖南、湖北、河南等八个解放区。为什么要让出这八个解放区?毛泽东讲得很明白:“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3]1160}

实际上,毛泽东的策略遵循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传统智慧。让出南方的八个解放区暗含三重战略考量:第一,通过收缩南方战线,完成“向北发展”的战略转型,为后续解放战争奠定地理优势;第二,以“维护国家统一”,承认国民党法统地位,换取《双十协定》对解放区民选政权“应予维持”的合法性确认;第三,43天谈判期为东北局控制54座城市争取关键缓冲期,形成“空间换时间”的资源配置优势,便于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内战。

在去重庆谈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向党内同志交了底:“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3]1154}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动让步打破了谈判的僵局。国民党方面逐渐放宽了一些条件,将中共军队的整编数目从最初的十二个师增加至十六个师。在人事安排方面,国民党同意中共方面的人选可以酌量增加,并且在县以下行政人员的民选权利上也有所放开,为更广泛的和平合作创造了可能。

三、打与谈的配合: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对于蒋介石这个狡猾的老对手,毛泽东看得是非常透彻的。蒋介石邀请他到重庆谈判,实际上玩弄的是和谈骗局,目的在于欺骗舆论、麻痹甚至诱降中共,同时利用和谈做掩护,为发动大规模内战做准备。针对蒋介石的两手策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精心策划,也做了两手准备:坚持以谈判争取和平,同时坚决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打促谈,毛泽东称之为“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一) 临行前的安排部署

毛泽东基于他一贯强调的底线思维,在出发前通过系列讲话与部署对重庆谈判做出了准确的战略预判,对如何应对意外状况做了精心的安排和布置。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鲜明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揭露了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本质,并警示全党“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3]1134}8

月24日,毛泽东对新四军作出密令:“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2]¹⁴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离开延安飞回太行时,毛泽东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5]¹³对于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中共力量发展较为困难的省份,毛泽东特别告诫:“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3]¹¹⁵⁴

毛泽东赴渝前,于8月24日深夜密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20位高级将领紧急奔赴前线,单人前往,不得携带随从。次日清晨,将领们搭乘美军运输机经4小时飞行,安全降落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山西黎城县长宁机场。同日,叶剑英确认飞机安全抵达后,毛泽东随即于8月28日启程赴重庆谈判,形成军事与政治的双线联动。这一战略部署,成功将晋冀鲁豫、东北、华中三大战略区的主帅送往前线,既避免因交通滞后导致战略被动,又确保解放区军事指挥系统的快速响应。战略预判与战前部署直接推动了上党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边打边谈”的军事讹诈,为重庆谈判争取了政治主动权。

(二)谈判期间军事斗争与政治谈判的密切配合
谈判期间,蒋介石表面维持着谈判的“和平游戏”,实则暗藏“桌下踢脚”的对抗本质。一方面,蒋介石重新秘密印发1933年在“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将中共定性为“匪”,妄想构建内战合法性;另一方面,不断调集军队进犯华东、华北解放区,妄图逼迫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为了应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决定“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3]¹¹²⁷,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斗争为政治谈判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全面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9月上旬,蒋介石调集阎锡山部13个师的兵力向山西解放区疯狂发动进攻。为了给阎锡山一个教训,也为了给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壮壮胆气,毛泽东适时地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上党战役计划。八路军3万余主力及5万民兵采用灵活的“围城打援”战法,歼灭晋绥军3.5万人,俘敌军长、师长数人。不仅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使其不敢在重庆轻举妄动,还为中共在谈判桌上争取了更多的筹码,共产党在谈判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强。同期,解放区军民在平汉线、平绥线发起自卫反击,歼灭国民党军11万人,延缓其进军东北的计划,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争取时间。通过战场胜利向国民党传递“军事冒险代价高昂”的信号,蒋介石损兵折将,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军事斗争为政治斗争提供“硬支撑”,政治斗争为军事斗争创造“软环境”。毛泽东的战略设计在重庆谈判期间形成闭环:国民党在谈判期间密令阎锡山进攻上党地区,印证了毛泽东对“桌下踢脚”策略的预见;中共通过上党战役等军事胜利击退国民党的挑衅,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政治主动权;中共在军事斗争中的胜利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迫使蒋介石签署《双十协定》,最终实现“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的目标。

四、谈判会场外的统战工作:通过广交朋友提升中共影响力

谈判桌上的政治斗争为中共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在谈判会场外,统一战线工作为中共凝聚了强大的道义力量。毛泽东非常看重统战工作,也擅长做统战工作。重庆谈判期间,通过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毛泽东团结了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努力赢得人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和社会影响力。

(一)争取中间势力,广泛团结爱国人士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民盟领袖张澜。1945年8月30日,毛泽东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访问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张澜提醒毛泽东勿被蒋介石的“假戏”蒙蔽,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5]¹⁸9月2日,毛泽东再赴特园出席民盟宴请。踏入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们聚会‘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5]²⁰这句话将民主同盟与中共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结在一起。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赴特园,主动向张澜谈及谈判的进展和细节。张澜随即于18日在《新民报》上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借助媒体公开呼吁停止内战、实现民主,既揭露国民党拖延谈判的伎俩,又放大中共“求和平反内战”的声音。毛泽东与张澜的三次“特园会”将民盟等中间势力转化为中共政治主张的传播者,使和平民主的舆论浪潮成为制衡国民党军事独裁的重要砝码。

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工商界人士,高度赞扬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在艰难时局中为振兴民族工业所做的努力,深入剖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长期落后的根源,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保护和支 持民族工商业的方针。这一表态安抚了工商界人士的情绪,拉近了他们与中共的心理距离。

毛泽东还会见了文化界的精英人士。9月3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周

谷城等人。交谈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强调:“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我们还要走一段‘之’字路。”^{[1]108}9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大公报》午宴。席间《大公报》一位负责人重谈“不要另起炉灶”的老调。毛泽东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5]29}这句话有力地回击了《大公报》负责人的错误言论。毛泽东还为大公报社题词“为人民服务”,希望他们今后站在人民的一边。这一对话不仅是国共谈判期间舆论博弈的缩影,更折射出双方政治立场的根本分歧与中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智慧。

(二)会见国民党各方面人士,让其充分了解中共立场

在重庆期间,除与蒋介石会谈外,毛泽东还主动接触国民党各派系,包括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以及国民党军政要员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孙科、于右任、陈诚等。毛泽东同他们分析了全国人民反内战、求民主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并就国共关系、政治民主化等问题深入交流,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党高层的疑虑,增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了解。其积极效应很快就呈现出来:当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后,张治中等人的中立态度削弱了国民党的道义优势,部分军官在随后爆发的国共内战中消极应对,甚至在战场上起义投诚。

除此之外,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还设宴招待了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各国友好人士。席间毛泽东发表致辞,感谢各方人士对边区以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表示希望能继续得到这种帮助。9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三名美国青年士兵,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毛泽东还接见了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以及美、苏、英、法、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以及韩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阐明了中共的国内外政策,毛泽东的谈话艺术和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五、谈判期间的诗词较量:以文化软实力助力政治斗争

1945年秋,毛泽东飞抵重庆不仅掀开国共谈判的帷幕,而且在文化界引发了一场颇为热闹的诗词较量。借助诗词和媒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既塑造了中共的和平民主形象,又瓦解了国民党的宣传攻势。

(一)初抵山城:文化界的热情礼赞与诗坛互动

重庆谈判帷幕初启之际,文化界的诗笔便与政

治风云激荡相和。1945年9月2日,《新华日报》率先刊发柳亚子《赠毛润之老友》一诗,以“弥天大勇诚堪格”称赞毛泽东亲赴险地的胆魄,以“霖雨苍生新建国”勾勒和平建国的理想图景,更以“中山卡尔双源合”隐喻国共合作当承孙中山遗志并与马克思主义真理交融。9月9日,臧克家以《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续写诗坛礼赞:“从你的声音里,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从你的目光里,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1]80}这首诗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升华为时代强音,将中共的未来愿景投射为全民共识。这些诗作既是文人个体的心声,亦是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时局的集体回应,字里行间跳动着对中共领袖的赞誉,更承载着对民族命运的深切期许。

(二)《沁园春·雪》轰动山城,引爆舆论场

长期以来,国民党宣传机器刻意诋毁和丑化中共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使得国统区广大民众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和偏见。但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一首《沁园春·雪》不仅以其深邃的意境和磅礴的气势震撼山城,更在舆论场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较量与交锋。

《沁园春·雪》原是毛泽东在1936年2月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所作,重庆谈判期间他把《沁园春·雪》录赠给了柳亚子。后被重庆《新民报晚刊》的编者辗转抄得,在新民晚报上用《毛词沁园春》的标题刊登了出来。刊出以后,山城轰动,万人争诵。《沁园春·雪》的广泛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更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卓越文学才华的诗人。毛泽东的形象在国统区知识分子心中得以重新塑造和确立,国民党对毛泽东的种种诋毁之词,顷刻间烟消云散。

蒋介石在得知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大为震惊,认为这首词的传播会大大增强毛泽东和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对国民党非常不利。遂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策划了一场针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宣传攻势:秘密召集一批擅长诗词创作的幕僚,让他们大量创作和词在报刊上发表,意图在重庆文坛压制住毛泽东这首词的势头。当时决定此事由《中央日报》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负责组稿,然应征者寥寥,计划落空。当年参与此项活动的国民党官员、台南神学院教授孟绝子回忆说:“遗憾的是,国民党虽党徒众多,但大多是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和贪官;要么就是只会写些党八股文章的腐儒和酸丁。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能与毛泽东《沁园春》相媲美的作品都未能写出。”^[6]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诗词较量,实为一场文化领导权争夺战。他以诗词为“软武器”,将中共意识形态诉求编码为“江山多娇”“风流人物”等传统意象,突破国民党舆论封锁;通过与柳亚子、郭沫若等文化精英的诗词唱和,以文学共鸣争取中间派;同时为解放战争奠定“得道多助”的舆论基础,印证“文化的军队”与“拿枪的军队”同等重要。这场以笔为剑的诗词较量,不仅为中共赢得了舆论高地,而且成功塑造了“文治武功兼备”的政党形象,为中共在重庆谈判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六、结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斗争艺术得到了充分展现:他以“弥天大勇”赴险破局,在“去与不去”的抉择中彰显战略胆识;以“让而不退”的博弈平衡,在军队整编与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寸土必争;以“谈打结合”的双轨联动,借上党战役的军事胜利打破谈判僵局;更以民主统战、媒体交锋、诗词唱和的复合策略,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政治硬通货。这场较量不仅为中共赢得和平建国的道义高地,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和平民主的机会,同时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斗争艺术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挑战提供了深刻启示:第一,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既

要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又要善用多边合作与弹性策略拓展战略空间;第二,掌握舆论叙事权,讲好“中国故事”,有效回击对中国的污名化和妖魔化;第三,强化统一战线思维,从经贸往来、科技合作到气候外交,以共同利益凝聚全球伙伴;第四,增强文化自信,努力提高文化软实力,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助力民族复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斗争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在百年变局中努力完成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

参考文献:

[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谈判纪实[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2] 毛泽东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第2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毛泽东年谱(1893—1976)(第3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6] 张家康.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纪实[J], 党史文苑, 2003(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Mao Zedong's Superb Art of Struggle during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s

LI Zixuan, HE Yun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45, Chiang Kai-shek resorted to peace-talk stratagems and sent three invitations for Mao Zedong to attend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s. After repeated deliberations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resolved to travel to Chongqing in person. This decision embodied the CPC's extraordinary wisdom and courage and secured the political initiative for the Party. During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s, Mao Zedong adhered to principles on core issues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power in the liberated areas while exercising flexibility over negotiation agendas, and safeguarde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PC through sophisticated struggle strategies. Meanwhile, he directed the Shangdang Campaign to counter the military pressure exerted by the Kuomintang, boosting the Party's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with military victories. Beyond formal negotiation sessions, Mao Zedong engaged extensively with democratic parties and eminent public figures. He disseminated political propositions through literary works such as *Qinyuan Chun · Snow*, forging a public-opinion front against dictatorship. The superb art of struggle demonstrated by Mao Zedong in the Chongqing Negotiations bore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at period and provides valuabl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PC to cope with various complex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ongqing Negotiations; Mao Zedong; the art of struggle

新中国建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价值与当代镜鉴

孙娜, 杨晋娟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面对公共卫生基础薄弱、疫病肆虐、缺医少药的严峻困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以抵御美帝细菌战为重点、以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为目标的群众性卫生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的公共卫生实践, 更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并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社会工程。各民族在卫生实践中增进了解、凝聚合力, 为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社会根基与心理基础。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民族平等原则、持续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关键词: 爱国卫生运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 党的领导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2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6)04-007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序推进,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卫生危机的重要实践举措。这场以“爱国”为精神旗帜、以“卫生”为实践抓手的群众性卫生运动, 凭借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以及平等包容的政策实践, 不仅有效改善了全国范围内的卫生状况、增进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 更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场爱国卫生运动中, 各民族人民同心同向、互帮互助, 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与此同时, 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进一步强化, 为后续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场运动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 百废待兴, 频发的疫

病问题和恶劣的卫生环境严重威胁国民的身体健康, 制约着国家建设的推进步伐。在此背景下, 改善卫生环境、防控疫病蔓延, 成为保障民生福祉、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 以及粉碎敌人细菌战的紧迫任务。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公共卫生困境

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面, 全国各地医疗卫生基础普遍薄弱, 基础设施匮乏且空间分布失衡。据1949年相关统计数据, 全国2000多个县中仅设有1300多个卫生院, 这些卫生院普遍存在设备简陋、诊疗能力有限的问题, 平均每所卫生院病床数量不足10张; 医疗技术水平亦处于较低水平, 仅能开展一般常见病的诊治工作, 能够独立完成下腹部手术的卫生院寥寥无几^[1]。全国医疗卫生资源普遍匮乏、药品供应短缺的状况尤为突出。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因地理与发展条件限制, 这一问题表现得更为严峻, 民众的生命健康权益缺乏有效保障。

在疾病防控方面, 烈性传染病与地方病肆虐蔓

收稿日期: 2026-04-14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联合基金项目沂蒙精神与革命文物研究专项“山东根据地红色医疗文物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2023-LHYM-09)

作者简介: 孙娜(2001—), 女, 山东临沂人,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共医疗史; 杨晋娟(1984—), 女, 山东临沂人, 博士,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党史研究。

延,血吸虫病、疟疾等疫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对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据统计,当时全国血吸虫病患者达 1000 余万人,其中晚期患者 60 万人,受疫病威胁人口超过 1 亿,疫情重灾区的人口感染率甚至高达 60%至 90%^[2],部分地区出现整户整村人口死亡的惨剧,导致局部区域人口锐减。这种卫生现状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导致劳动力大量流失、劳动能力显著下降,制约着新中国初期社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1954 年,江西省玉山县农业生产几乎陷入瘫痪,据记载:“因劳动力缺乏,耕作粗放,上田已成中田,中田已成下田,下田已接近撂荒,减收率分别为 59%、55%、53%。”^[3]

在生活环境与卫生意识方面,当时的人民群众普遍缺乏基本卫生知识,农村地区“人无厕所畜无圈,粪便垃圾巷道满,人畜同饮一个泉,锅头连炕真难看”的现象极为普遍;若发生不明原因的传染性疫病,民众乃至一些地方干部皆将其视为“天灾”,转而祈求“观音”、呼唤“胡大”以求解救^{[4][5]}。《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1951 年)指出:“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5][24]} 因此,开展一场全民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保障民众身体健康,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必然选择。

(二)全民参与的爱国行动

1952 年 1 月,美国为扭转在朝鲜战场上的不利局势,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蓄意发动细菌战。美军投放的带菌昆虫及媒介物携带鼠疫、霍乱、脑膜炎、沙门氏菌、回归热等多种病原体,其投放范围不仅覆盖朝鲜战场周边区域,还延伸至我国东北及沿海等多地,这极易引起大范围的疫病爆发。这一恶劣行径严重威胁我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激发了中国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筑牢防疫屏障的决心。

爱国卫生运动是将爱国精神具象化、卫生治理全民化的伟大社会实践。广大群众逐步领悟“讲卫生就是爱国”“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6]的道理,他们将爱国情怀转化为“人人动手”的卫生行动。各民族同胞主动清理家庭、街道卫生,自觉养成良好卫生习惯,不仅提升了个人身体素质、有效阻断了疾病传播路径,还成功挫败了美国意图扰乱国内社会秩序的图谋。由此可见,爱国卫生运动的直接动因是应对美国细菌战,兼具保卫国家的政治属性与解决卫生困境、适配国家发展需求的社会属性。

在运动推进过程中,各族群众并肩作战,爱国力量不断凝聚、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爱国卫生运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价值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这种跨越数千年的血脉与文化交融,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坚实基础民族实体,也铸就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格局^[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观,依托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逐步形成并深化,爱国卫生运动便是重要实践形式之一。各族人民在共同改善环境卫生、防控疫病的过程中加强了民族联结,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中,党的组织领导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面向偏远及民族地区的医疗援助筑牢了民生根基,全社会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则搭建起各民族情感沟通的重要桥梁。

(一)党的领导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保障

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零散、自发,虽然在局部地区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公共卫生本身缺乏完整性、系统性”^[8]。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卫生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1951 年,中共中央指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5][395]},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专业任务,更是党的政治任务。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各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1950 年,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卫生工作计划,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卫生工作原则。1952 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提出了“卫生工作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9]。这几项工作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实践方向,逐渐扭转了旧社会卫生资源失衡以及重治轻防的局面。这些会议文件确定的原则、方针,为后续爱国卫生运动的全面开展、疾病防控体系的初步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健康、维护民族利益的本质属性。

1952 年 3 月,为抵御美军细菌战,我国政务院迅速成立防疫委员会,统筹领导各级爱国卫生运动领导机构(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面推进反对美帝细菌战工作及群众性卫生运动。同期,政务院也发出《关于 1953 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要坚持反细菌战、环境整治与病媒防控、重点领域攻坚、卫生宣传与行为养成、检

查评比与模范建设、春季突击行动等工作内容^{[10]145}。在该指示的动员引导下,全国上下迅速掀起防疫阻击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级组织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工作执行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能。例如,1952年,东部沿海地区各级领导组织军民封锁海岸,全面开展带菌媒介物的捕捉、收集、焚烧与填埋工作,并在各级政府及村级组织中普遍建立防疫委员会^{[11]1384},当地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投身以反细菌战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再如,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宣传工作,重点阐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反对细菌战、搞好环境卫生、消灭“五毒”、保障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4]52}。这种跨区域、跨民族的组织动员,既推动各族群众在共同行动中凝聚思想共识,也让其在惠民政策的实效中感受到来自党和国家的情感关怀,引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广泛共鸣。

在爱国卫生运动推进过程中,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主动参与各项清洁防疫工作,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的群众号召力。比如山东省日照县(今日照市)后村镇党委委员王善业便是这一时期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在爱国卫生运动“五改造”(改造厕所、猪圈、牛棚、鸡窝、污水坑)、“六统一”(人粪尿、猪粪、畜粪、鸡粪、污土、干灰统一管理)工作初期,部分村民不愿配合,一些干部敷衍塞责,改造工作一度受阻。王善业主动请缨驻点帮扶,坚持吃住在村,逐户上门走访,耐心宣讲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逐步打消村民疑虑。面对清理污水坑、改造猪圈等脏累活,他始终冲锋在前,带领党员突击队率先完成12处污水坑的清淤回填,建成3处集中式粪污处理坑,完成86户厕所改造和42处畜禽圈舍规整^[12]。坚持党员带头、示范引领,当地“五改造”“六统一”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58年,日照县被国务院授予“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单位”称号^{[11]1384},这些成果的取得充分印证了党的组织领导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政治保障中的核心作用。

(二)医疗援助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生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落后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与健康福祉,将保障群众的健康、改善其生存发展条件作为重要工作。为有效防控疟疾、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积极推行多项免费医疗及费用减免政策,引导各民族守望相助、协同作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培育奠定了稳

固可靠的民生基础。

为改变民族地区医疗卫生落后的面貌,突破缺医少药、疫病频发的困境,1951年8月,全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合理配备并重点培养少数民族卫生干部,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与疾病流行特点,灵活实行收费、减免、免费相结合的差异化医疗政策。这些惠民举措精准对接少数民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让少数民族同胞切实享受到国家政策的实惠。据统计,截至1983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医药卫生机构已由1952年的1176个发展至28800个,增长幅度达24倍有余^{[13]54},旧时民族地区疫病肆虐、人口锐减的悲惨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医疗卫生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联防联控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这在跨区域传染病防治实践中尤为重要。以青海省鼠疫防治工作为例,1954年该地正式大规模开展地方病防治工作,1955年青海省鼠疫防治站正式成立,但受限于当时省内医护专业人员匮乏、技术力量薄弱的现实困境,该防治站难以独立承担全省范围内鼠疫调查与防治的艰巨任务。为此,国家卫生部自1956年起至1980年,期间累计有10年时间调派其他省、区的专业医疗人员赴青海支援工作,这些医疗人员深入青海偏远乡村、山区,开展鼠疫患者诊断治疗、疫情排查等各项工作^{[14]99-104}。这种跨越千里的医疗支援与卫生协作,不仅为青海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与紧缺药品,还让各族人民切实体会到“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根基。

(三)宣传动员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纽带

面对建国初期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共中央立足国内外形势,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5]的号召。该号召将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卫生治理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联系起来,为各族人民提供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1952年,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闾门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当地村民在大通驻军部队的带动下成立“军民联合会”,广泛发动各族村民投身爱国卫生运动。至当年年底,该村累计修路2公里,拉砂子230车,垫平了污水池、水坑,捕杀老鼠1000多只^{[14]57},家家户户都贴卫生标语和卫生公约,将卫生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该村不仅形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风尚,还在军

民联合会的组织协调下,深化了各族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结。

为普及科学卫生知识、推动爱国卫生理念深入人心,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开展了全方位、多样化的宣传动员工作。1950年至1952年,青海省卫生处先后组织分发《预防伤寒及副伤寒》《种牛痘、防天花》等卫生宣传标语25228张;1953年,西宁等18个市、县举办以预防夏秋季传染病、性病防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卫生科普展览46次^{[14]309},提升了全民卫生认知水平。除此之外,爱国卫生运动还采用报纸、广播、宣传画、文艺演出等形式,相关医务人员结合各民族的文化习俗与语言特点,以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卫生知识。例如,部分卫生工作人员将防疫知识与地方戏曲、民间故事相结合,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生动活泼的舞蹈,在集市、庙会等人流密集场所进行表演,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高效传播了卫生知识,让卫生宣传工作更接地气、更易被各族群众接受。此外,学校将卫生教育融入日常管理,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等多样化形式,培育学生的卫生意识与良好习惯,让这些掌握了卫生知识的学生主动向家长、亲友分享相关内容,成为家庭与社区的“小小卫生宣传员”,进一步扩大了卫生知识的普及覆盖面,推动形成全民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氛围。

爱国卫生运动通过批判封建迷信、摒弃不卫生陋习、倡导文明健康新风尚,推动各族人民逐步形成了文明的生活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各族人民守护家国健康的责任担当,促使各族群众在共同的卫生实践中形成文化层面的共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效果与共同体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实践成效显著,原本脏乱差的城乡面貌实现了根本性转变,各地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卫生知识普及范围不断扩大、全民卫生意识逐步提升。这些转变,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健康劳动力,同时也凝聚起各民族共抗风险、共促发展的民族向心力,为新中国初期各项事业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一)改善公共卫生条件

以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为目标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这场覆盖全国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始终以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为根本导向,坚持“预防为主”的核心原则,通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

制、清理环境卫生死角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有效破解了旧中国遗留的公共卫生顽疾,还显著改善了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条件。

在这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卫生实践中,“预防+治疗”相结合的防控传染病方式是改善公共卫生条件的重要经验之一,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便是其中一个成功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余江县群众长期饱受血吸虫病困扰,“疫区人民生育率大大降低,死亡率年年增加,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田园荒芜”^[16]。1951年,余江县被确认为血吸虫病流行县后,明确了积极防治的工作方向,从中央到地方综合施策,全面推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党中央派遣医疗专家前往余江县马岗乡开展血吸虫病重点实验研究;江西省卫生厅先后两次从省级医院抽调10名骨干医护人员赴余江县支援,免费为疫区群众开展诊疗服务。经过反复实验与实践探索,余江人民最终摸索出“填旧沟、开新沟、彻底消灭钉螺”等科学有效的血吸虫病根除措施,实现了对血吸虫病的系统性防控。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向全世界宣告余江县成功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闻讯后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盛赞这一保障民生的伟大壮举^[17]。余江县的宝贵经验,为全国以传染病防治为抓手推动公共卫生条件改善工作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借鉴。

全民参与、全域推进,是这场卫生革命的鲜明特征。在党中央的号召与引领下,全国各地群众积极响应,掀起“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行动热潮。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52年8月,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国累计清除垃圾7400余万担,疏通沟渠28万千米,改建厕所490万个,改造水井130万眼,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等病媒害虫数量可观^[18],有效阻断了疫病传播路径,从源头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经过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成功粉碎了美军发动细菌战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与人民健康,更推动各地城乡面貌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昔日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落后景象一去不复返。这一实践成效进一步增强了各族人民的自信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大力量。

(二)提升人民卫生意识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后,卫生知识普及工作覆盖城乡及偏远民族地区,使医疗卫生知识广泛渗透到各民族群众中。在卫生知识学习和良好习惯养成的

过程中,各地广泛组织各类卫生评比活动,引导群众主动参与,逐步养成良好卫生习惯。1952年山东省烟台市的实践便是生动例证,当地各级人民政府开展反细菌战的宣传工作,要求小贩及食品店的食物必须加盖玻璃罩,保护水源,加强自来水管管理,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学校师生和街道邻居纷纷组织“灭虫队”,户户动员,人人动手,发动了捕鼠灭鼠的红旗竞赛活动^[10]¹⁴⁵。这些实践行动在潜移默化中重塑了全民健康认知与生活方式,凝聚起全民讲卫生、爱健康的思想共识。

旧社会由于卫生知识的匮乏与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各族人民长期遭受瘟疫、病虫害的摧残与折磨。民众患病后多依赖求神问药、请巫师作法等封建迷信方式,不仅无法治愈疾病,还延误了最佳救治时机,致使许多患者不治身亡,这种落后的卫生状况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隐形枷锁。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后,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诸多传染性疾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防治,民众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各族群众逐渐认识到传统土方与迷信做法的弊端,摒弃了落后的生活方式,主动学习科学卫生知识,积极投身环境治理、病媒消杀等实践活动。这一转变既彰显了民众思想的进步,更凝聚了民族情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筑牢了坚实群众基础。

(三)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劳动力是国家建设的核心要素,而良好的卫生条件则是保障劳动力健康、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支撑。毛泽东同志曾明确强调:“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健,环境清洁。”^[19]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卫生工作与生产发展、国家建设的内在关联,推动形成了“以卫生促生产”的工作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全国广泛开展“除四害”“改水改厕”等群众性卫生整治活动,显著提升了全民健康水平。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抚顺市职工休工人数较1951年下降66.6%^[20],有效保障了工业生产的人力供给,为抚顺工业恢复与国家工业化初期建设筑牢人力支撑。1952年,江苏省南京市朝阳区五老村,运走上千吨垃圾,填平37个污水塘、3条240米长的臭水沟及29个大粪坑,逐步平整了土地、清除蚊蝇滋生场所^[21],大幅降低了田间劳作的健康风险,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有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切实保障工业区工人返岗复工、田间农民春耕秋收,为国家建设注入了强劲的生产力

动能。正因如此,爱国卫生运动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22],充分彰显了新中国卫生治理的实践成效。

民众健康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场跨越城乡的卫生革命,从根本上提升了全国劳动人民的身体素质,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的健康劳动力。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爱国卫生运动以“两管五改”作为核心抓手推进农村卫生建设。通过管水、管粪、改水井等一系列的举措去严格把控饮水安全与粪便污染源,从而有针对性地去补齐农村卫生短板、改善农村卫生状况。在党和人民的协同推进下,爱国卫生运动取得显著成效,降低了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持续提升全民健康水平,这一实践成果凝聚起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底气。

四、爱国卫生运动对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当代镜鉴

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载体,实现了民生改善与民族发展的有机结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守护健康、改善卫生环境的实践中凝聚共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奠定了深厚的健康基础。

(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认同

为人民服务、守护人民健康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根本宗旨。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党卫生工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并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3]。正是这份坚守,让爱国卫生运动在新中国初期经济落后、卫生基础薄弱的国情下有序推进,真正实现了造福各族人民、守护全民健康的目标。

针对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缺医少药困境,党和政府精准发力,先后组织多批医疗队奔赴各少数民族地区,帮助他们恢复和建立医疗机构,向当地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培养当地的医疗卫生人员。这些派往民族地区的医疗队、卫生工作队,既是专业的医疗技术服务队,也是党的政策宣传队、民族团结工作队,他们的职业素养和奉献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认可。正如畲族民歌唱道:“树叶连根根连藤,山哈和党心连心,树木靠山山靠树,山哈靠党把身翻。”“共产党,像太阳,照进畲家好田庄。”^[24]这些歌谣表达了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情感与坚定拥护。

政治认同是凝聚社会共识、维护国家稳定、推进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精神纽带,是指个体或群体对特

定政治体系、制度、价值观念及政策的认可与接纳,体现为主动服从政治规范、参与政治生活的自觉。在爱国卫生运动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各族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着力整治长期战乱遗留的公共卫生“烂摊子”,系统性改善了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各族人民在这场守护生命健康的伟大实践中,切身感受到新生人民政权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逐步增强了对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信任,强化了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了政治根基。

(二)坚持民族平等,同心共建共享

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准则,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准则始终贯穿国家发展与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的民族观,成为凝聚各民族力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旨归。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恶劣的医疗卫生状况,党和政府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统筹整合各民族医疗力量,凝聚起全民族协同作战的强大合力,形成了“上下同心、各族联动”的实践局面。这种共同抵御疫病、守护共同健康的实践,进一步拉近了民族距离,深化了民族情感。

爱国卫生运动将民族平等理念转化为保障生命健康权的具体实践。首先体现在卫生防疫资源、医疗队派遣、药品物资的平等分配上。党和政府力求在政策层面实现对所有民族地区的全覆盖,平等保障各民族成员生命健康权。针对发展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国家组织医疗队伍深入基层,开展医疗救治与防疫工作,如解放初期,政府就派遣巡回医疗小分队,深入鄂伦春族聚居区,开展疾病普查普治,到1958年,严重威胁鄂伦春人民生命的天花、伤寒已经绝迹,麻疹也得到了控制^{[13]5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多种免费治疗政策,如少数民族免费医疗、贫困灾民免费医疗、贫苦烈军属免费医疗、免费接生、难产补助等医疗项目^[25]。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结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体现为政策层面上的精准倾斜,此种平等并非绝对的形式平等,而是兼顾发展差异的实质平等。这些普惠性民族医疗政策,立足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秉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方针推进民族平等的真正落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的初心与坚守。

我国在推行医疗卫生举措时,注重与各民族沟通交流,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据此制定灵活适配的

民族政策,拉近了党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联系。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全民参与的群众性实践,为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事务、共建共享美好家园搭建了重要平台。各族群众在参与中明确了作为国家平等一员的责任,“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深植人心,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发展。

(三)夯实健康之基,共创复兴伟业

没有全民健康,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紧密结合,自1952年该运动正式发起以来,党和政府牵头引领,先后组织开展“除四害”“两管五改”“五讲四美三热爱”、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卫生城镇与健康城镇创建等系列举措,循序渐进破解卫生健康领域难点堵点。在长期实践中,党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带领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久久为功,既显著改善了城乡人居环境,又大幅提升了全民健康水平,让各族人民以强健体魄投身生产生活。

爱国卫生运动依托高效的社会组织与群众动员机制,将我国的政治、制度、组织优势转化为惠及全民的健康工程,进一步夯实民族复兴的健康基石。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26],它已成为守护全民健康、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实践载体。七十余年来,爱国卫生运动早已超越单纯卫生工作范畴,成为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夯实国家发展根基的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27]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与根本利益所在。从“讲究卫生、移风易俗”的初期实践到“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升级,爱国卫生运动始终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深度融入健康中国行动发展脉络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在各民族共同守护健康的持续行动中不断巩固深化。

参考文献:

- [1] 孙隆椿. 毛泽东卫生思想研究论丛[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
- [2] 陈海峰. 中国卫生保健史[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20.
- [3] 李洪河. 新中国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02.
- [4]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卫生志编纂委员会. 大通卫生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南昌市兴起“光荣卫生户”运动[J].江西中医药,1960(5):3.
- [7]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24-30.
- [8]张晓丽.爱国卫生的发展与挑战[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13.
- [9]赵敏捷,宗家瑱,杨礼干,等.中国公共卫生制度文明:历史演进与价值启示[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25(11):1295-1301.
- [10]烟台卫生志编委会.烟台卫生志[M].内部资料,2010.
- [11]临沂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临沂地区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2]日照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日照市志(1989—2005)[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876.
- [1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14]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医药卫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5]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617.
- [1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人民政府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江西血吸虫病防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
- [17]钱守云.毛泽东保障农民利益思想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264.
- [18]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家国同行,共建共享:爱国卫生运动70年史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6.
- [1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0.
- [20]“煤都抚顺”编写小组.煤都抚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9:203.
- [21]人民卫生出版社.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4.
- [22]杨丽娟.久久为功[N].北京日报,2020-06-16(009).
-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
- [24]施联朱.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546.
- [25]《民和卫生志》编辑办公室.民和卫生志[M].内部资料,1988:224.
- [26]邓小平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9.
-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3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Constructive Value of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Forging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Reference

SUN Na, YANG Jinjuan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fronted with grim challenges including a fragile public-health system, rampant epidemics and shortages of medical resourc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a mass-based health campaign focusing on resisting U. S. biological warfare and improving public health literacy. The campaign was not merely a public-health practice for bettering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anitary conditions, but also a vital political-social project through which the CPC forged and consolidated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Through health-related practices,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deepen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pooled joint efforts, laying a soli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un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demonstrates that building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requires uphold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thnic equality, 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for people's health.

Keywords: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the Party's leadership

社会化阅读痕迹的知识生产逻辑及出版价值转化

——以微信读书平台为例

张鑫彤¹, 李 洁²

(1. 国防大学出版社, 北京 100091;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京 100020)

摘要:立足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头部社会化阅读平台微信读书为研究样本,系统梳理社会化阅读完整运行逻辑,提炼形成“个体外化—群体共建—筛选沉淀—二次创作”四层闭环知识生产逻辑链条。在此基础上,从需求洞察、内容供给、传播裂变、版权孵化四个维度,深入阐释阅读痕迹驱动出版价值转化的内在运行机制。当前该模式仍存在内容生产异化、行业数据壁垒、版权规制缺失等问题。为破解上述发展困境,需依托人机协同内容治理、三方价值共享激励、人本导向技术伦理建设,重塑读者、数字阅读平台、出版机构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为数字出版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社会化阅读痕迹;知识生产逻辑;出版价值转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3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77-06

在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数字阅读正从“内容传播”转向“关系构建”,社会化阅读凭借多元社交场景优势成为全民阅读主流。据2025年度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国民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升至80.8%,数字阅读时长大幅超越纸质阅读时长^[1]。微信读书依托微信社交生态,整合优质内容与多元交互功能,月活跃用户规模突破1.38亿,成为头部社会化阅读平台。批注等阅读痕迹已突破传统工具属性,转化为承载情感、思想交流的媒介载体,依托动态用户数据重构社会化知识生产逻辑,推动阅读从个体独享迈向群体共建,助力行业盘活数字资源、挖掘多元价值,为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注入动能。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一) 文献综述

互联网普及之前,学界针对阅读痕迹的研究多以纸质文本为研究对象,聚焦批注、圈点、读书笔记等呈现形式,重点探析其史料价值、文本阐释价值与

个体认知塑造功能;相关研究尚未涉足线上社交互动场景,但初步奠定了阅读痕迹作为知识外化与意义建构载体的理论基点。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化阅读中的“痕迹”现象。2020年,王子舟等学者正式提出“阅读痕迹”概念,将其界定为“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留存下来的有一定含义的原始标记”,明确其具备记录阅读行为、实现文本增值等功能,能够反映社会阅读环境与大众文化变迁,将阅读痕迹从日常经验提升为具有学术价值的理论对象^[2]。伴随数字阅读全面普及,研究者开始将“阅读痕迹”概念引入数字场景,指出其功能正从个人备忘工具向社会交往媒介演变,阅读不再是个体私密行为,而是嵌入社交网络的可视化实践^[3]。刘艳从社会学视角拓展社会化阅读痕迹研究,区分了主动与被动数字足迹,指出“去身体化”“匿名性”的网络身份虽给予读者广阔话语空间,但也带来了阅读浅表化、思考懒惰化、推送同质化等风险^[4]。痕迹研究逐渐从形态描述转向功能机制分析,“阅读痕

收稿日期:2026-05-06

作者简介:张鑫彤(1993—),女,辽宁沈阳人,出版硕士,国防大学出版社编辑,研究方向:出版理论;李洁(1976—),女,北京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任编辑,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迹如何实现知识价值”成为新的研究焦点。隗静秋等研究者将社会化阅读批注归纳为感悟式、阐发式、评价式、跨越式、疑问式五种类型,揭示了批注行为与知识建构的内在联系,表明碎片化、非正式的读者批注同样具有知识生产潜力^[5]。国外学者同样关注这一议题,Liu 和 Almeda 提出了“阅读活动痕迹”,主张将阅读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认为阅读痕迹既是知识生产的副产品,其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形式^[6]。

(二)核心概念界定:社会化阅读情境中的知识生产

知识指代人类对客观事物形成的系统性认知与实操技能。200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知识生产界定为“个人、团队或组织成功地生产新知识和实践的境况”。孙正聿进一步指出,知识生产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其积极成果是“赋予已有知识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构建新的知识体系”^[7]。传统意义上,知识生产主要指专业化、建制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具有生产主体的专业性、生产过程的规范性、生产成果的体系化等特征,是一种“集中式”模式。然而,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的普及,“弥散式知识生产”逐步兴起——普通个体在日常活动中的认知参与,经由数字平台的聚合与沉淀,同样能够产出具有公共价值的知识资源^[8]。杨逐原进一步指出,社交化阅读中的知识生产具有“众包”特征,大量用户以分散、协同的方式参与知识内容的创造与完善^[9]。

基于上述理论辨析,本文将“社会化阅读情境中的知识生产”操作化定义为:读者在数字阅读过程中,通过划线、批注、评论等痕迹生成行为,将个体化的阅读体验、理解与反思,转化为可供他人观看、讨论、引用和再创造的公共性知识资源的过程。这一定义包含四个核心要素:生产主体为普通读者;生产媒介为平台的痕迹功能;生产过程为从个体认知外化到群体互动整合的动态演进,其核心机制是“社会标注”,即用户通过公开标注实现知识的协作建构;生产成果为具有公共可及性、可交互性的碎片化知识单元,此类知识单元可依托社交网络流转,并在读者社群内部共享传播。

二、微信读书社会化阅读痕迹的知识生产逻辑与价值转化机制

(一)微信读书社会化阅读痕迹的核心形态

微信读书的社会化阅读痕迹,是指用户在阅读过程中主动留存或客观生成的,能够反映其阅读思考、认知状态、阅读行为与动态的各类符号与数

据^[3]。依据呈现形式与功能属性差异,可划分为显性、隐性两大类型。显性阅读痕迹具备公开、双向互动特征,主要包含四种形态:其一为划线痕迹,用于标记文本核心观点,2025 年微信读书平台热度排名前十的文本累计划线量达 145 万次^[10];其二为批注痕迹,依附原文生成碎片化短文本,包含文本解读、阅读感悟、观点质疑、内容补充等多种类型;其三为独立“想法”模块,发布脱离原文的短篇评论,可对外公开展示于平台“想法圈”;其四为共读痕迹,以阅读打卡、社群留言为主要形式,伴随共读社群规模扩张持续活跃,是群体协同阅读的具象载体。隐性阅读痕迹是指用户在平台留存的可追溯行为数据,涵盖阅读时长、阅读频次、内容偏好等量化指标,不直接承载用户主观观点,但可搭建精细化用户画像,为平台社交功能迭代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相较于纸质时代私密阅读痕迹,显性痕迹依托公开交互凸显社会化协作属性;隐性痕迹依靠大数据赋能平台运营,两类痕迹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大众知识生产、出版价值转化的底层基础载体。

(二)微信读书 APP 社会化阅读痕迹的知识生产逻辑

1. 生产起点:多元动机驱动下的个体认知外化

微信读书社会化阅读痕迹的知识生产以个体认知外化为逻辑起点,所有显性痕迹的生成均由用户多层级内在动机驱动,将抽象阅读思考转化为可视化公共文本。信息获取、兴趣偏好等认知动机是驱动社会化阅读行为的基础性因素^[11],不同读者群体产出痕迹的特征差异明显:学生群体阅读教材时,侧重对知识点划线批注,工具性突出;职场群体聚焦实用类书籍,多撰写结合工作场景的感悟;深度阅读群体则结合社会语境对文本进行深度解读。阅读的价值从不只局限于文本本身,用户的阅读体验同样具备独特研究意义^[12]。社交动机推动阅读体验的分享与同好联结:青年用户热衷在想法区分享感悟,通过点赞评论维系社交;中年读者倾向加入共读社群,围绕书籍观点开展深度交流,实现精神共鸣。成就动机是用户持续产出的关键:普通用户关注点赞、引用等基础反馈,优质用户追求专业认可,其深度解读常获海量传播,部分批注还被出版方引用,创作者可获得官方认证、领读人邀约等激励,形成“正向激励—优质生产”的良性循环。

2. 生产过程:社交互动下开展的群体知识共建

社交互动是串联个体知识外化与公共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平台互动功能与智能算法协同发力,推动分散的个体思考整合为群体知识成果。其互动形

式呈现明显群体差异:深度读者围绕经典著作核心命题展开辩论,深化多元解读;功利性读者侧重点赞、收藏实用痕迹,便于后续复用;青年用户将优质想法转发至社交平台,扩大传播范围。群体共建遵循“个体痕迹—群体共识—公共知识”的递进逻辑,单一用户的批注与想法经他人补充修正形成小范围共识,平台通过聚合功能提炼为公共知识资源,算法结合用户偏好推送优质内容,加速同好阅读圈层聚合。在技术支撑层面,算法综合内容质量、用户画像等维度推送,摒弃唯流量导向。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痕迹分类筛选、精准匹配受众,同步记录互动数据迭代推送规则,引导群体产出高质量协同知识。

3. 生产闭环:价值导向下的知识沉淀与再生产

知识沉淀与再生产是知识生产的延伸,依托平台筛选、反馈机制,形成“筛选—反馈—迭代”闭环,既实现知识增值,又衔接出版价值转化。知识筛选采用“算法初筛+人工复核+用户反馈”模式:算法优先筛选高互动、高相关优质痕迹,过滤低质同质化信息;人工复核把控内容质量与思想导向,剔除不当内容;依托点赞、引用、举报等用户反馈动态优化筛选标准,结合不同群体需求定向分发内容,提升内容匹配度。价值反馈实行分层激励,普通用户获点赞、首页推荐等基础认可,优质创作者可获得现金激励、版权分成等高阶权益;优质痕迹经反复引用完善,形成正向循环,放大知识价值。再生产环节中,读者通过互动商榷、补充修正,在非线性交互中产出新内容;平台沉淀的公共知识基底为二次创作提供支撑,新痕迹推动文本解读迭代,最终形成“个体外化—群体共建—筛选沉淀—二次创作”的完整闭环,实现知识资产持续增值。

(三) 微信读书社会化阅读痕迹出版价值转化机制

1. 基于“个体外化”数据的需求洞察

个体外化的阅读痕迹是用户真实阅读需求、兴趣偏好的直接映射,可为出版机构搭建精细化用户需求画像,推动出版模式从“B2C”(网上零售)向“C2B”(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型。微信读书与出版机构的合作流程可分为三步:第一,数据授权与脱敏提取,出版机构提交合作申请并与平台签订保密协议后,平台通过大数据工具提取目标书籍的用户划线、批注等痕迹数据,剔除隐私信息后形成脱敏数据;第二,需求拆解与分析。出版机构依托脱敏数据,识别用户关注的核心知识点、兴趣方向与潜在需求,形成需求分析报告;第三,搭建沟通渠道。平台开通“编辑对接通道”,将优质个体痕迹(如深度批

注、高频提问)直接推送至对应出版编辑,同时搭建读者留言板,吸纳读者意见参与图书修订、内容优化,实现需求与出版生产精准对接。

人民邮电出版社依托微信读书进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转型尝试,打造爆款图书《我的外婆,从不内耗》(纸书《你不必是一朵花》)。出版社与微信读书合作,提取同类心理成长书籍的用户划线、高频批注等脱敏痕迹,锁定“反内耗、长辈治愈”核心需求,结合数据提炼“外婆式松弛感”等卖点,优化全书叙事结构并确定书名。该书2024年4月上线电子版,3天登上平台飙升榜,一周稳居榜单首位,累计电子书阅读量突破5万人次;纸质书承接电子书热度上市10天完成3次加印^[13]。图书现已输出繁体中文、韩国、新加坡三类海外版权,实现短期流量向长期品牌价值转化,充分印证阅读痕迹反向赋能C2B出版的实践可行性。

2. 基于“群体共建”内容的供给服务

社交互动催生的群体公共知识,包含热门批注、优质读者想法、原创文本解读等,是社会化阅读痕迹核心产业价值载体。完整转换路径为“筛选—加工—复用”,以此丰富全媒体出版内容供给。具体措施如下:平台联合出版机构组建专业痕迹筛选团队,以点赞量、引用量、互动率为核心评价指标,采用算法初筛与人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精准筛选优质群体痕迹;对筛选后的优质内容进行标准化、颗粒化拆解,适配多元出版场景需求;最后实现内容二次复用,联动短视频、公众号等多载体传播,构建全方位的出版供给体系。

微信读书联合长江文艺出版社,依托《繁花》读者群体共建痕迹拓展配套出版内容。双方组建专项筛选团队,依托点赞、互动数据筛选贴合海派文化、人物解析的优质读者批注;将优质痕迹拆解为沪语注解、情节解读等标准化知识颗粒,适配多元传播场景;联动出版社公众号推出“显微镜下看《繁花》系列解读”专栏,同步制作配套短视频分发至短视频平台,搭建全媒体内容供给矩阵。该案例有效激活群体共建知识价值,验证“筛选—加工—复用”转化流程具备落地可行性。

3. 基于“社交沉淀”的传播裂变

依托微信原生社交生态,阅读痕迹具备天然社交传播属性,实现传播裂变分为三层落地路径:第一,激活用户自主分享行为。平台优化痕迹一键分享功能,支持读者将划线、批注、想法转发至微信朋友圈、社群,分享内容附带书籍跳转链接,实现痕迹与图书一体化传播;第二,口碑可视化展示。在图书

详情页增设“热门痕迹展示专区”,集中呈现优质批注、共读评价,帮助潜在读者直观感知图书内容,降低大众阅读选择试错成本;第三,定向圈层运营。平台联合出版机构依托用户画像筛选核心兴趣读者,开展共读打卡、优质痕迹征集大赛等线上活动,推动圈层内部口碑裂变。

微信公众号“现代食品科技”(学术期刊账号)的实践,为传播裂变提供了典型参考。该账号利用用户的阅读行为痕迹(历史阅读偏好、点击数据),构建用户画像标签,将隐性阅读痕迹转化为显性的精准分发策略。根据其阅读痕迹标签进行分组,将用户分类,针对特定标签用户推送匹配的期刊推文。数据显示,定向标签推送仅覆盖100名目标读者,分享阅读量达824次;全量泛人群推送覆盖1880人,分享阅读仅23次,证明基于阅读痕迹的精准分发能够形成“点—线—面”社交裂变。

4. 基于“再生产”成果的版权IP孵化

知识再生产产出的二次批注、延伸解读、话题讨论等内容具备优质IP开发潜力,完整IP孵化流程分为四大环节:一是优质内容筛选,平台联合出版机构建立“UGC(用户生成内容)内容筛选标准”,重点遴选观点新颖、互动性强、具备长线开发潜力的二次创作内容;二是多形态IP落地开发。结合内容题材特质,开发短篇图文、漫画、线上课程、有声书等多元IP产品;三是规范化版权管理与三方收益分成。建立完善UGC版权管理机制,清晰界定著作归属、商用收益分配规则,推行“平台+出版机构+原创用户”三方分成模式,创作者依据内容引用量、IP转化收益获取对应报酬;四是风险化解机制。针对IP开发同质化、版权纠纷两类问题,设立内容差异化审核标准,鼓励个性化深度创作;搭建第三方版权调解平台,及时化解用户、平台、出版机构之间的版权争议。

微信读书联合黄河出版传媒集团,以宁夏本土作家经典作品为核心,探索版权IP孵化新模式。平台与出版机构从读者对宁夏本土作品的二次批注、延伸解读等再生产内容中,精准筛选贴合地域文化特质、具备传播潜力的优质内容,改编开发系列有声书。相关作品同步在微信读书、喜马拉雅等主流音频平台上线,实现多渠道传播。据统计,该系列有声书累计收听量突破500万次,为地域文学IP孵化提供可复制实践样本。

三、社会化阅读痕迹价值转化的现实困境

尽管社会化阅读痕迹在知识生产、出版价值转化领域具备突出应用优势,但落地实践过程中,受技术条件、制度体系、市场逻辑等多重因素约束,价值

转化仍存在多重现实困境与内容异化风险,制约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整体质量与运行效率。

(一)生产的异化:优质痕迹供给不足

微信读书的点赞、引用、官方推荐等激励机制,在激发用户生产痕迹的同时,也导致部分用户阅读行为与痕迹生产出现异化,从“为己阅读”转向“为平台生产”。这种异化是平台、用户、行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平台层面看,算法激励过度侧重流量指标,忽视内容质量导向,间接诱导用户追求短期流量收益;从用户层面看,部分用户阅读素养不足,缺乏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能力,难以生产有思想、有价值的痕迹内容,只能通过复制、刷数据等方式获取流量;从行业层面看,缺乏统一内容规范,对功利化、同质化痕迹的界定与约束不足,难以形成正向引导。具体而言,部分用户刻意迎合算法偏好,批量产出浅层、同质化阅读痕迹,整体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优质原创内容占比持续走低。内容异化会直接削弱公共知识生产质量,同时拖累出版产业价值转化成效;同质化痕迹数据无法支撑出版机构开展精细化读者需求研判,浅层批注内容难以加工为成熟出版产品,最终稀释社会化阅读痕迹协同共建知识的核心价值,制约其产业赋能作用落地。

(二)转化的壁垒:价值转化效率受限

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是制约社会化阅读痕迹价值转化的核心技术壁垒,其背后本质是“用户—平台—出版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失衡,核心矛盾集中在平台数据垄断与出版机构需求、用户隐私保护与平台数据利用之间。形成原因分为两点:第一,平台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将用户阅读痕迹视为核心竞争资源,实行数据垄断,不愿向出版机构开放数据,担心数据泄露影响自身竞争力;第二,不同数字阅读平台之间缺乏数据互通机制,行业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共享规范,导致痕迹数据无法跨平台整合利用。一方面,微信读书的用户痕迹数据属于平台私有,受商业利益与数据安全约束,仅向出版机构开放少量数据,难以满足其精准内容策划需求,制约价值转化效率;另一方面,平台算法推荐机制具有“黑箱”属性,算法的核心逻辑、数据处理过程不透明,出版机构无法了解平台如何筛选、推送优质痕迹,也难以干预算法对用户痕迹的分类与聚合,导致部分有价值的阅读痕迹,无法实现有效的价值转化。此外,不同数字阅读平台之间的数据不互通,形成各自的“数据孤岛”,进一步制约了出版价值转化的规模与效率。

(三)法律的真空:合法转化缺乏支撑

社会化阅读痕迹属于用户生成内容,但当前法

律法规对其权属划分界定模糊,配套法治规范建设滞后,形成制度层面转化壁垒,严重限制痕迹资源合法开发与合理商用。该困境深层诱因是国内数字出版产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对应版权、数据法规更新滞后,行业统一自律准则尚未完善,各方主体权责缺少清晰制度指引。现阶段我国法律条文未明确社会化阅读痕迹所有权归属,读者、数字平台、出版机构三方的权利、义务均无清晰法定边界。核心待厘清问题包括:痕迹创作用户是否完整持有对应著作权;平台作为数据存储方是否具备痕迹加工、传播、商用权限;出版机构引用用户痕迹内容时权责如何划分,上述关键问题均无明确法条支撑。产业实践中,部分平台依托市场优势擅自商用用户原创阅读痕迹,用户著作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出版机构引用痕迹内容时存在侵权隐患,不敢深度挖掘数据开发价值,束缚痕迹产业化落地。同时,平台难以平衡数据开发与隐私保护边界,少数主体无限制采集用户阅读行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引发读者信任危机,进一步阻碍痕迹价值转化工作推进。

四、构建共生共赢的社会化阅读出版价值转化体系

针对社会化阅读痕迹价值转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需结合出版行业发展需求,从内容治理、激励机制、技术伦理三个维度,构建“用户—平台—出版机构”共生共赢的生态体系,推动社会化阅读痕迹出版价值转化,助力出版行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一)构建“人机协同”的内容治理体系

针对生产异化、优质痕迹供给不足的困境,结合平台激励导向偏差、用户阅读素养不足、行业规范缺失等深层原因,需构建“人机协同”内容治理体系,实现对社会化阅读痕迹的精准筛选、规范引导与质量把控,同步强化用户阅读素养培育与行业规范建设。

(1)明晰人机协同审核分工与评判标准:算法初筛以内容原创度、主题相关性、互动质量、合规性为核心评判指标,批量过滤同质化、浅层化、违规内容;组建分品类专业人工审核队伍,按图书门类分组复核,重点核查内容原创性、价值导向,不干涉读者合理多元观点与个性化表达,保障审核公平客观。

(2)优化算法导向与用户引导:调整算法权重,提升原创性、思想性权重,下降流量指标权重,引导用户回归“为己阅读”本质。平台联合出版机构推出“阅读素养提升计划”,通过线上公益讲座、优质案例分享等形式,提升用户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能力,引导其生产优质真实的阅读痕迹。

(3)完善行业规范与监督机制:由出版行业协会牵头,联合相关平台与出版机构,制定社会化阅读痕迹生产行业规范,明确功利化、同质化痕迹界定标准;设立行业监督委员会,定期检查平台治理情况,通报违规主体,营造正向引导氛围。

(二)探索“价值共享”的激励机制

针对数据壁垒、价值转化效率受限的困境,结合平台数据垄断与出版机构需求的核心矛盾,需探索“价值共享”激励机制,细化利益分配标准,推动平台、出版机构、用户三方协同发展。

(1)建立分级数据共享机制:平台与出版机构签订分级数据共享协议,遵循“基础数据免费、核心数据付费”原则;书籍整体划线率、大众热门话题等基础数据无偿开放,精准用户画像、完整优质批注等核心数据实行年度授权付费模式,打通痕迹数据互通渠道,破除数据孤岛,提升数据利用效能。

(2)细化价值共享激励标准:构建“现金奖励+版权分成+荣誉激励”多元化体系,对优质痕迹创作者给予现金奖励,用户痕迹被采纳用于出版、IP开发的,实行用户、平台、出版机构三方收益分成;对长期产出优质痕迹的用户,授予荣誉称号,优先邀请参与书籍修订、线下分享会。

(3)搭建协同对接通道:平台设立专门对接部门,配备专职人员承接出版机构的数据需求、痕迹筛选、合作对接等事宜,及时响应出版机构诉求,破解平台数据垄断与出版机构需求的核心矛盾,激发用户参与热情,推动三方协同发展,提升价值转化效率。

(三)坚守“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

针对法律真空、合法转化缺乏支撑的困境,结合制度滞后、行业自律不足等深层原因,需坚守“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通过完善法律、强化监管、规范行为,推动价值转化规范化。

(1)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细化完善:由出版行业协会牵头,联合平台与出版机构,梳理阅读痕迹价值转化中的法律痛点,明确痕迹权属、侵权认定、隐私保护等核心问题,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填补法律空白,为合法转化提供制度支撑。

(2)完善隐私保护与全流程数据安全管控:平台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对用户痕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删除隐私信息,明确数据收集范围仅围绕阅读相关内容,用户可自主选择是否开放数据用于价值转化。

(3)搭建多主体协同长效监管体系:建立“平台自查+第三方监管+行业监督”的三重机制,平台每月自查痕迹质量,第三方机构季度核查,行业协会通

报违规行为,对功利化、同质化内容从严管控,同时通过宣传引导提升用户阅读素养,推动形成正向的价值导向,确保知识生产与价值转化的规范有序。

随着数字出版的不断发展,社会化阅读痕迹的价值潜力持续凸显。为充分释放其价值,需依托技术创新与制度完善,推动痕迹价值高效转化。搭建“用户—平台—出版机构”协同体系,打通数据共享壁垒,规范数据使用边界,兼顾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同时,强化用户阅读素养培育,引导优质内容生产,规避流量之上的功利化创作导向,让阅读痕迹真正成为公共知识传播、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实现从“数据痕迹”到“价值资产”的转变,为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第二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2025 年度) [R/OL]. (2026-04-20) [2026-04-25]. https://www.nationalreading.gov.cn/wzzt/dwjmqyddh/dhxx/bd/202604/t20260420_985575.htm.

[2] 王子舟,崔洵,谢运萍,等.《从微观中究探阅读史景象:有关“阅读痕迹”的一场讨论》[J]. 图书情报知识(6): 27-33.

[3] 陆朦朦. 数字空间中的阅读痕迹:类型、意义与影响[J]. 中国编辑,2021(9): 87-91.

[4] 刘艳. 社会化阅读主体的网络身份特点和数字足迹分析及其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 2019(10)21-30.

[5] 隗静秋, 闫蓉洁. 知识生产视角下的社会化阅读批注研

究:以微信读书 APP 为例[J]. 现代出版,2024(7): 73-83.

[6] Liu S,Almeda S G. Chasing RATs:Tracing reading for and as creative activity[EB/OL]. (2026-03-11) [2026-04-25]. <https://arxiv.org/abs/2603.11031>.

[7] 孙正聿. 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5-11.

[8] 邱泽奇. 人机互生:范式革命与知识生产重构[J]. 探索与争鸣, 2024(11): 30-40.

[9] 杨逐原. 社交化阅读中的知识生产:平台、机制及新规则[J]. 编辑之友,2021(4):40-46.

[10] 王丹阳. 微信大数据显示:广东成为“阅读大省”读书最久、买书最舍得[EB/OL]. (2026-04-24) [2026-04-30]. https://news.ycwb.com/ikimvkotio/content_54081721.htm.

[11] 李武,吴月华,刘宇. 青少年社会化阅读动机与行为之关系研究:以上海市初高中为调查对象[J]. 图书情报工作,2014,58(23):61-68.

[12] 董子铭,桂盛霖. 出版作为定调媒介:数字阅读环境中读者二次叙述能力探究[J]. 数字出版研究,2025(1): 80-87.

[13]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外婆”爆火,“花朵”出圈:一场三方协同的全媒体运营接力[EB/OL]. (2025-06-18) [2026-04-25]. <http://m.toutiao.com/group/7516964897863795235/>.

(责任编辑 林川)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Logic and Publishing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ading Traces: A Case Study of WeChat Reading Platform

ZHANG Xintong¹, LI Jie²

(1.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100091, China; 2. China Media Group, Beijing 10002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depth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is paper selects WeChat Reading, a leading social reading platform, as its research sample. It sorts out the full operational logic of social reading and identifies a four-tier closedloop chain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individual externalization-collective co-construction-screening and sedimentation-secondary creation". On this basis, it systematically illustrates the mechanism whereby reading traces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value from four dimensions: demand insight, content supply, viral dissemination, and copyright incubation. Even so, this model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alienation of content production, industrial data barriers, and inadequate copyright regulations. To resolve such bottlenecks, measures including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ontent governance, tripartite valuesharing incentives and human-centered tech-ethics development should be adopted. These efforts will rebuild a symbiotic, win-win industrial ecosystem among readers, digital reading platforms and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and offer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Keywords: social reading traces; knowledge-production logic; transformation of publishing value

解构与重塑:网络热梗视角下的青年网络思潮辨识及“六力并举”引领策略研究

张书悦

(上海市团校[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 200083)

摘要:为应对多元网络思潮对青年价值观的冲击,厘清主流网络思潮类型、传播机制与作用路径,构建科学有效的引领策略体系。本文立足当代青年“网络原住民”特征,整合多学科视角,综合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微博、哔哩哔哩、抖音等7个青年高活跃平台2019—2026年的热门内容开展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并对52名青年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创新性地将“网络热梗”作为观测社会思潮的量化指标,归纳出7类影响显著的网络思潮,构建了“心理—社会—技术—社群”四维影响模型,揭示了网络思潮传播规律。提出了“六力并举”的青年引领策略,坚持分众化、互动式原则,实现意识形态领域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引领的范式变革。

关键词:青年网络思潮;网络热梗;价值观;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引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83-06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社交媒体的全面普及,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当代青年思想交汇、价值碰撞与社会参与的核心场域。各类社会思潮依托互联网平台,突破传统时空界限,得以快速传播、持续发酵、动态迭代,深刻影响着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网络空间也由此演变为多元思潮激荡、意识形态博弈的前沿阵地。

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生态中,网络热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微粒与语言镜像,已不仅是简单的娱乐化语言符号,而且是青年群体宣泄情绪、表达诉求、构建圈层认同的主要载体,更是观测青年心态、研究网络思潮最直观、最鲜活的微观切口。网络热梗具有实时性、自发性、群体性等特征,能够更精准地捕捉青年未充分言说的潜在情绪与思潮传播的微观流向,是辨识网络思潮的天然量化指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青年处于价值观培育的关键窗口期,思维活跃但辨识能力不足。在算法推荐、

圈层文化、情感动员等多重机制作用下,各类网络思潮持续对青年群体进行着冲击与塑造。传统的、单向度的思政教育模式,因话语体系脱节、传播渠道不畅、引导效果固化等,常显乏力。因此,以网络热梗为抓手,辨识思潮类型、剖析影响路径、构建引领体系,不仅是破解青年思想引领现实难题的迫切需要,更是守护意识形态安全、夯实青年思想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培育时代新人的重大时代课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既有研究的脉络与局限

学界对网络思潮与青年互动的研究大致沿三条脉络展开。第一,网络思潮本体研究。卡斯特提出“网络社会”理论,强调算法推荐塑造了青年认知的“情感化逻辑”^[2];詹金斯以“参与式文化”揭示青年在亚文化圈层中的身份重构^[3];张志安指出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呈现日常化、娱乐化、碎片化特征^[4];郑雯等基于大数据发现网络青年亚文化正从“边缘”走向“中心”,形成“认知统一、行动对抗、结构聚集”的趋势^[5]。第二,影响机制研究。辛艳艳等分析了

收稿日期:2026-06-20

作者简介:张书悦(1998—),女,河南郑州人,硕士,上海市团校教学研究部助教,研究方向:青年思想动态与政治引领。

网络民族主义与社会心态在青年中的传播机制^[6]；余亮提出“内卷”与“出征”构成青年网络思潮的“双重节拍”，反映个体焦虑与集体行动的张力^[7]；刘晨通过实证发现青年易受泛娱乐化、民粹主义等思潮侵蚀^[8]。第三，引领策略研究。李卫红主张通过“话语转译”实现主流价值观的“圈层化适配”^[9]；廉思指出新时代青年价值观呈现“远大理想与理性选择交融”等特征，引领工作须兼顾宏大叙事与微观关怀^[10]。

既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多聚焦宏观趋势与显性内容，存在“重现象描述、轻机制分析”“宏观倡导多、微观策略少”的局限，缺乏青年视角和微观文化载体的引入，导致研究难以捕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的真实渗透轨迹与代际差异，且未能形成一套系统化、层级化、可操作的工作方案，难以凝聚工作合力。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首先，以微博、微信、

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知乎、豆瓣七个青年高活跃社交媒体平台为数据源，使用 Python 爬虫抓取各平台 2019—2026 年间的热搜榜单数据，具体采集范围包括各平台年度热搜榜单排名前十的热搜话题，并进一步爬取每个话题下热度排名前二十的评论内容。经去重、清洗与人工筛选，选定各平台每年度代表性热梗词。其次，运用 CiteSpace 工具对热梗词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与突现词检测，识别热梗的跨平台传播轨迹与情感倾向。再次，通过各平台招募 52 名典型青年（涵盖学生、上班族、待业者等类型），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量化与质化结果相互印证，共同服务于从“热梗”到“思潮”的类型识别与影响机制分析。

三、网络思潮的类型识别与特征分析

(一) 跨平台网络热梗的映射

运用 Python 爬虫抓取 2019. 1. 1—2026. 3. 31 七大平台热搜话题及评论，最终得到有效话题数据 17640 条、评论 9 万余条。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9—2026 年青年网络热梗分平台特征一览表

平台名称	平台调性	代表性热梗(节选)	主要议题领域
哔哩哔哩	圈层化、解构性,弹幕文化与共创机制,社区语境和“黑话”性质显著	AWSL、破防了、后浪、致敬、啊?	趣缘吸引、情感共鸣、圈层认同、价值重构
抖音	视觉化、娱乐化、病毒式传播	我太难了、特种兵旅游、短剧、活人感、主理人、邪修	生活体验、行为模仿
微博	公共舆论场、社会议题、政策强相关	996、内卷、小镇做题家、班味、赛博	结构性压力、公共事件态度
小红书	生活化、消费主义、情绪价值、种草属性突出	精致穷、OOTD、凡尔赛、citywalk、搭子、长期主义、老己	生活方式、好物推荐、身份塑造、情绪疗愈
知乎	理性讨论、深入探讨、社会洞察	谢邀、小镇做题家、内卷、孔乙己的长衫、精神内耗	问题意识、经验分享、结构性压力、职业转型
豆瓣	文艺批判、圈层认同、价值立场、情感共鸣	社死、精神离职、emo、内耗、氛围感、搭子、预制	兴趣小组、身份认同、情感连接、代际关系
微信	熟人社交、公私域交织、兼具深度与普适性	佛系、断舍离、PUA、数字游民、韧性、酱板鸭	日常生活、社群组织、新闻热点

分平台梳理可见，网络思潮对青年的影响绝非均质，不同平台的定位机制、内容形态与用户圈层塑造了差异化的热梗生态，也映射出网络思潮影响青年的多元路径。哔哩哔哩的弹幕热梗承载着参与式文化语境中的价值重构；抖音的热梗高度依赖视觉化传播；微博作为公共舆论发酵场，其热梗如“内卷”“班味”等直接关联社会结构性议题；小红书的热梗则明显集中映射了青年从符号消费向自我关怀的心态转向；知乎的热梗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与理性分析色彩；豆瓣小组构建圈层共同体的情绪安放空间；微信则因熟人社交的特质，呈现出更偏理性化与普适性的特征。这种差异化的思潮渗透图景要求引领工作必须坚持“因群施策、因媒施策”的分众化原则，深入理解青年在使用不同平台时的网络语境

和语言体系，才能实现有效对话与引导。

(二) 从热梗到思潮：分析路径与归类逻辑

尽管各平台热梗生态各异，但若干“出圈梗”仍能突破圈层壁垒，成为全网通用语言。

从“内卷”“内耗”到“搭子”“松弛感”，这些跨平台共性热梗揭示了当代青年热梗表达的三个核心特征：其一，解构主义与微观叙事共存，既能够用无厘头解构消解宏大叙事的权威性，又善于体察自身微小的情感体验与日常生活；其二，表达重心从现实关切向情绪疗愈迁移，从直面社会压力的集体呐喊，转向对内心安宁与情感慰藉的寻求；其三，圈层化认同与情绪消费共进，青年通过使用特定热梗获取圈层“身份证”，在虚拟的、流动的趣缘部落中寻找归属感与被理解的即时满足。

表 2 从热梗聚类到思潮归类一览表

聚类	热梗组群	语义内核	映射思潮类型
C1 结构性压力与身份焦虑	内卷、打工人、996、孔乙己的长衫、社畜、牛马	职场语境下对个体努力与回报失衡的感知与结构性归因	后真相认知偏差
C2 代际叙事与自我认同	躺平、摆烂、精神离职、全职儿女	价值观场域下退出过度竞争的抵抗性表达，拒绝过度奋斗	极端个人主义
C3 消费主义与价值重构	精致穷、凡尔赛、OOTD、多巴胺穿搭、情绪消费	生活方式中以消费定义自我价值，符号化生存	消费主义
C4 泛娱乐化与意义消解	电子榨菜、娱乐至死、尊嘟假嘟	严肃议题娱乐化，拒绝深度思考，即时满足	泛娱乐化
C5 爱国情感与集体行动	帝吧出征、小粉红、战狼	爱国情感与排外情绪交织，封闭性与对抗性	极端民族主义
C6 公共参与与态度极化	砖家、资本、精英-平民对立、韭菜	反建制、反精英的多元归因与怨恨叙事	民粹主义
C7 主流话语与青年认同	秘闻、戏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质疑宏大叙事，碎片化解构历史，消解历史严肃性	历史虚无主义

通过 CiteSpace 进行共现与聚类分析,识别出 7 个聚类主题,同时招募 52 名青年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融合量化、质性混合研究方法,提炼青年对各类网络热梗背后思潮的主观认知与意义建构逻辑(见表 2)。

深度访谈数据为上述归类提供了质性佐证。例如,在量化层面识别出“内卷”“打工人”为跨平台高热度热词后,多位受访者主动提及这类词对自身心态的精准捕捉。受访者 S12(男,研三学生)表示:“说‘摆烂’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大家懂的都懂’的诊断——问题不在我不够努力,是整个系统让努力贬了值。”受访者 S17(男,待业)谈及“躺平”时称:“我说‘躺平’也不是真躺,就是表达对不公平的不满。”这些表述表明,青年使用热梗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依托热梗完成对个体处境的认知判断与价值归因,这也是网络热梗能够精准映射社会思潮的深层依据。

(三)七类影响显著网络思潮的表现形式与性质

基于上述分析路径,本文归纳当前对青年影响显著的七类网络思潮,按其性质可分为政治立场型、认知态度型、价值取向型、生活方式型四个基本类别。

1. 政治立场型思潮

包括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两类思潮,前者构建出“精英-平民”二元对立框架,利用青年社会转型期的相对剥夺感,通过简单化归因与情绪化表达诱导非理性认同^[11];后者呈现从“温和”向“强烈”演变趋势,爱国情感与排外情绪交织,虽能增强民族凝聚力,但封闭性与对抗性挤压了理性讨论空间,损害了理性的国际关系讨论氛围与国家形象,挤压了理性温和讨论的空间^[12]。

2. 认知态度型思潮

包括历史虚无主义与后真相认知偏差两个思潮。前者常以“细节考证”“秘闻揭露”等形式解构历史,动摇青年对历史的宏大认知与主流叙事的信任,本质是削弱政治认同、历史认同与文化自信^[13];后者强调情感与个人信念高于客观事实,在算法推荐与信息茧房的加持下形成“我信即是真”的认知闭环^[14],导致认知碎片化与判断偏颇化,加剧社会共识的撕裂。

3. 价值取向型思潮

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强调“自我优先”“拒绝责任”,以“人间清醒”“独善其身”等话语包装,合理化个人对公共责任的回避^[15]。这种思潮在侵蚀社会信任、弱化集体凝聚力的同时,也使青年个体陷入更深的原子化孤立。

4. 生活方式型思潮

包括泛娱乐化与消费主义两类思潮。前者通过“万物皆可娱乐”叙事框架解构严肃议题,使青年陷入“低思考密度”的生存状态^[16],丧失对公共事务的严肃参与能力,削弱对公共议题的理性思考能力,消解奋斗精神与社会责任^[17];后者通过制造“精致穷”“符号消费”“悦己主义”等话语,将个人价值与消费能力、品牌符号深度绑定,诱导青年陷入过度消费、刺激攀比心态与身份焦虑^[18]。

网络思潮在网络环境中随处可见,当前网络思潮呈现多元化、碎片化、圈层化、隐蔽化和相互交织的新态势,因此,热梗背后所指向的思潮常不止一类,这也反映出当下社会压力与青年应对心态的复杂性,进一步加大了青年思想引领工作难度。

四、网络思潮对青年的影响机制分析

深度访谈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网络思潮并非简单地向青年灌输观念,而是通过心理、社会、技术、

社群四个维度的交互作用,形成“情感先于理性”的影响路径,从底层塑造青年价值观念与认知逻辑。

(一)心理机制:需求满足与情感动员

青年期是价值观形成关键阶段,面临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业、就业等多重压力,内心普遍存在对身份认同、情感归属、意义寻求和情绪宣泄的渴望。网络思潮常通过激发情绪共鸣实现情感动员,如“精神内耗”“破防了”等热梗直接触及青年内心的压力与无助感。受访者 S03(女,研二学生)坦言:“看到大家都在发‘精神内耗’,突然觉得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焦虑,那种被理解的感觉很治愈。”在“共鸣即认同”的情感逻辑下,理性判断往往让位于情绪共振,青年更容易接受思潮所承载的价值立场。

(二)社会机制:矛盾放大与压力宣泄

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如就业压力、教育内卷、贫富差距)通过网络被急剧放大,青年产生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挫败感,网络成为压力宣泄的“出口”。“躺平”“摆烂”等话语将个体层面的困境归结为结构性问题,是对现实竞争压力的抵抗性表达。受访者 S27(男,研三学生)表示:“说出口‘躺平’能够疏解我内心的不甘和不满。”网络思潮恰在此刻提供了看似自洽的解释框架与情绪出口。

(三)技术机制:算法茧房与认知固化

算法推荐技术是思潮影响加速的关键。平台通过技术赋权、算法推荐、精准推送等构建“信息茧房”,使青年不断接触强化其原有观点的内容,加速思潮固化与极端化^[19]。受访者 S04(女,研一学生)反馈:“刷多了那些吐槽的帖子,大数据就一直推,案例越来越多,感觉没有别的出路了。”技术不仅传播思潮,更在重塑认知逻辑,使青年在封闭的信息环境中丧失接触异质观点和进行辩证思考的机会。

(四)社群机制:圈层认同与朋辈影响

网络社群内部会通过“圈内黑话”形成回音壁效应,意见领袖通过扮演“信任代理”角色,其观点被无批判地接受与传播,形成强大的社群动员力,引导舆论走向、实现信息共享与价值传导,促使青年接受特定思潮^[20]。受访者 S25(男,职员)表示:“我刷视频就是为了看弹幕,满屏一起刷‘致敬’,给我一种真实的力量感。”

综上,四重机制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交织、递进强化:心理需求为思潮渗透提供情感入口,社会压力为思潮提供滋生土壤,技术算法加速观念固化,社群认同完成价值内化。由此,认知层面影响青年

的信息接收与解读,情感层面激发强烈情绪共鸣,行为层面转化为行动趋同和模仿,深刻理解这一影响机制,是设计精准引领策略的逻辑前提。

五、“六力并举”:影响机制驱动下的系统性引领策略

通过“心理—社会—技术—社群”四维影响模型可知,仅仅在单一维度加强思想教育、依靠技术监管无法对症下药。基于此,本文提出“六力并举”的系统性引领策略,政治力确保根本方向,引导力与主体力分别回应社群机制与心理机制,技术力破解技术机制的茧房效应,环境力消解社会机制的滋生土壤,服务力贯穿全过程提供载体支撑。

(一)强化政治引领力:构建中国式青年政治引领理论体系

政治引领力是方向盘,确保青年思想引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其核心要义转化为青年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生动话语和鲜活故事,使之成为青年观察世界、思考问题的根本遵循。一是推动理论通俗化、网络化传播,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使理论传播贴近青年生活。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引领理念,将网络思潮应对转化为青年思想政治素养提升的教育契机。三是完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从根源消解消极思潮的社会土壤^[21],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凝聚思想共识。

(二)提升引导力:推进主流话语的青年化转译

引导力直接回应社群机制中圈层认同。面对圈层化传播环境,主流意识形态不能失语,必须主动“进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转译。要有效辨析并回应各类消极舆论,将宏大叙事与个体生活经验相结合,通过青年喜爱的形式(如理论动漫、互动游戏、虚拟偶像等)来阐释深刻的理论;鼓励和支持一批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熟悉网络文化生态的“理论网红”,打造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理论产品;构建破圈平台,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平等对话”,从“我说你听”到“情感共鸣”的转变。

(三)激活技术力:运用数智手段实现精准滴灌

技术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运用,一是建立网络思潮引领资源库,利用网络技术推动“大思政课”资源下沉。二是利用 AI 建设青年思想动态监测预警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青年网络行为,实现对重点思潮、热点话题的实时追踪与智能预警,精准识别“反讽”“黑话”等形式的隐蔽性思

潮。三是优化算法推荐逻辑,打破信息茧房,优先推送主流价值内容,实现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四是建立数字画像,善用算法进行正向引导,通过优化推荐模型,增加优质、积极内容的触达率。探索开发引导性的数字产品,如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育软件、提供心理疏导的智能应用等,以“技术之善”对冲“技术之弊”。

(四)培育主体力:设计分众化、互动式引领路径

青年既是引领的对象,更是引领的力量。一是要针对不同圈层青年特点,设计分层分类的引领策略,做到“因群施策、因媒施策”。二是要建立平等对话、理性交流模式,搭建“青年议事厅”等线上公共讨论空间,引导青年围绕社会热点展开理性辩论,在“交换、比较、反复”中自主戳穿错误思潮的逻辑谬误;三是善用热梗将主流价值观融入青年语境,构建跨圈层对话机制;四是鼓励青年通过微视频、动漫、文学等形式创作正能量文化产品,实现自我教育与朋辈引领;五是设计主题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项目,引导青年在亲身体验中矫正错误思潮影响。从根本上扭转将青年视为被动“受教育者”的观念,突出其主体地位,激发其内在动能,发挥实践育人作用,提升靶向干预效能。

(五)夯实环境力:强化多主体协同工作体系

面对消极思潮的冲击,要构建“党委领导、共青团主导、学校配合、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多元协同机制。政府要提供政策保障,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强化政策配套与资源保障。以共青团为纽带和桥梁,强化网络引领职能,提升团干部网络素养与思潮辨识能力,建设“政治坚定、熟悉网络、善于引导”的青年工作队伍。高校作为主阵地,要建立网络思潮监测预警系统,将思潮教育融入日常思政教育,打造“思政主课堂+网络新课堂+社会实践课”三位一体格局,开展“网络文明志愿者”行动。家庭要提供情感支持,构建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优化内容审核与算法推荐机制,增加正能量内容权重。通过多方协同,压缩消极思潮的传播空间。

(六)深化服务力:创新内容供给与传播方式

思想问题归根结底是现实问题的反映,脱离青年真实困境的引领必然空洞乏力,只有通过真实、真诚、温暖且饱含情绪价值的故事载体,才能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价值渗透,从而在根本上增强青年对消极思潮的抵抗力。一是要建构新的网络文化空

间,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引领,实现从“说教”到“共鸣”的转变;二是要构建青年话语体系,通过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用真实故事、典型人物、共情表达激发青年情感认同,实现“硬道理”的“软传播”;三是建立全方位传播矩阵,整合各级各类媒体平台,形成协同发声矩阵;四是要培养青年意见领袖,鼓励优秀青年代表用青言青语解读政策、回应热点,扩大主流声音影响力和传播精准度^[22],真正做到触及、凝聚、服务、引领当代青年。

集理论创新、主体协同、技术赋能、分众引导、环境优化、内容升级于一体,从多个层面协同发力,系统推进,方能重塑青年思想引领的生态系统,实现引领效能的整体跃升。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当代青年“网络原住民”群体特征,以网络热梗为核心研究切口,通过混合研究方法,遵循“热梗梳理—语义聚类—思潮归因”的分析路径,识别出七类影响显著的思潮及其表现形式;构建了“心理—社会—技术—社群”四维影响机制,揭示了网络思潮传播逻辑;提出了兼具理论前瞻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六力并举”引领策略体系,强调了引领工作必须坚持分众化、互动式原则,做到“因群施策、因媒施策、因时施策”,通过激活青年主体性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引领”的范式变革。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网络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的认识,丰富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数字时代的内涵,更为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南。

网络空间是青年成长的新场域,思潮引领是时代赋予的新课题。唯有与时俱进地深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方能在众声喧哗的数字浪潮中筑牢青年一代的思想防线,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53.
- [2]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505-520.
- [3] 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 杜永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57-205.
- [4] 张志安, 聂鑫. 互联网语境下意识形态传播的特点、挑战和对策[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9): 9-13.
- [5] 郑雯, 陈李伟, 桂勇. 网络青年亚文化的“中心化”: 认知、行动与结构: 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5): 199-207.

- [6] 辛艳艳,桂勇,郑雯. 国家发展动力与青年群体认知:基于“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2009—2021)”的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2024(5):18-26.
- [7] 余亮. 出征与“内卷”:青年网络思潮的双重节拍[J]. 文化纵横, 2024(1): 24-33.
- [8] 刘晨. 互联网时代中国青年面临社会思潮影响和现实思想困惑的对策研究[J]. 大学, 2024(26): 193-196.
- [9] 李卫红. 主流价值观的圈层化适配与青年引领[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4): 56-61.
- [10] 廉思. 新时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主要特征与引导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8):133-142.
- [11] 周曦. 网络评论折射的青年社会心态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2017:25.
- [12] 温丽华. 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及引导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2020:44.
- [13] 王炳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发展及演变趋势[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61(5):75-87+166.
- [14] 廖策结. 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探究:基于社会思潮多元化视角[J]. 时代青年,2025(2):4-6.
- [15] 丛宇童,赵玉洁.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24(3):56-59.
- [16] 张书悦,马佳文,蔡爽. 当代中国青年的话语表达、存在问题及引领对策[J].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2024,(1):177-186.
- [17] 李明德,朱妍. 社会思潮的传播特征及引领:以互联网视听平台为对象[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3):1-7+24.
- [18] 李洁. 从“批判”“引领”到“治理”:新时代社会思潮研究范式的转换[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0,6(3):37-44.
- [19] 郭小聪,张志安. 算法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治理[J]. 学术界, 2023(7):45-56.
- [20] 黄晨玮. 网络圈层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与引导[J]. 青年探索, 2024(3):78-86.
- [21] 马中红. 青年发展政策与网络思潮治理协同机制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24(2):23-30.
- [22] 陈志勇. 青年意见领袖在网络思政教育中的角色与功能[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8):67-70.

(责任编辑 林川)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dentifying Youth Online Ideolo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Memes and a Study on the "Six-Pronged" Guidance Strategy

ZHANG Shuyue

(Shanghai Youth League School [Shanghai Institute of Youth Management],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diverse online ideologies on youth values, clarify the types,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and influence pathways of mainstream online ideologies, an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guidance strategy system. Based on the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youth as "digital natives", this study adopts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mixed-methods research approach. It performs keyword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analyses on trending content from 2019 to 2026 from seven youth-active platforms including Weibo, Bilibili and Douyin, and conducts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52 young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takes internet memes as a quantitative indicator for observing social ideologies, summarizes seven types of highly influential online ideologies,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psychological-social-technological-community" impact model, and reveals the dissemination laws of online ideologies. It puts forward a "six-pronged" guidance strategy for youth.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ed targeting and interactivity, it realizes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ideological domain from passive defense to active guidance.

Keywords: youth online ideologies; internet memes; values; ide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guidance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什么

——课程教学目标的深层解析

李优坤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应该教的是“历史”“思想”“政治”“思考”及“教(学生如何)成人”。“教历史”就是教“真相”,这是“纲要”教学的“基础性目标”。“教思想”教的是不同流派,特别是错误和正确历史思想的对比、分析和鉴别,目的是证明教科书所阐述的才是正确、客观的历史思想。“教政治”是“教思想”的必然结果,就是教师在教学生分析、鉴别不同历史思想的同时,让学生达成思政课教学共同的政治目标,这是“纲要”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教思考”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学会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运用辩证方法,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及贯穿始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是“纲要”更高一级的教学目标。“教成人”是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成败功过、是非得失,给大学生提供处理复杂问题的借鉴,培养大学生协作沟通能力、提升意志品质以适应和服务社会发展,是“纲要”教学的拓展性目标。

关键词:教历史;教思想;教政治;教思考;教成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5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089-07

思政课学什么,教什么,决定思政课的政治导向、发展方向、实践指向^[1],是一个具有系统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教什么,也是一个必须阐明,却一直没有被真正讲清的重大问题,是一个事关“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的关键问题。

“纲要”课教什么?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是因为教这门课的老师都清楚,“纲要”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版第9页及2023版第11页,就这门课的教学目的进行了清楚说明,并提出了五个要求。多数人以为,只要按这个“说明”和“要求”,讲清教材内容即可。说复杂,则是“纲要”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不断

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2]的背景下,并没有我们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如何在搞清楚“教什么”的基础上,完整、深入、彻底实现教材提出的目的和要求,始终是学界与教学一线有待深耕细研的重要议题。

一、教历史:“纲要”教学的基础性目标

“纲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纲要,建立在中国近现代史实基础之上,而历史是对人类过往事件、思想与行为的记录、阐释和研究。历史学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确认与认知,第二层次(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Ⅰ的理解与诠释^[3]。一般而言,历史首先是人类发展进程的客观记述,是对史实、史料的客观认定,是对历史

收稿日期:2026-05-20

基金项目:2023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人才引进项目“高校思政课热点问题教学的‘三性一力’目标管理研究”(23GC04);2025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校部共建重点培育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故事解读’教学法探究”(2025PYXM3)

作者简介:李优坤(1973—),男,河南洛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真相的还原和揭示。治史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完整地还原历史原貌,最需规避的便是史学研究有意或无意掺杂个人主观情绪、偏见与臆断。

伴随历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演进,文献学、考据学等专门史学分支应运而生。两类分支学科的出现,进一步凸显历史学的首要准则:还原真实发生的史实,亦即历史真相。其核心价值在于抵御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对历史的各类歪曲与虚构。落实到“纲要”课程教学层面,重点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歪曲篡改,辨析西方势力基于各类立场、不同动机对我国历史作出的片面曲解。

客观严谨的历史叙事,能够为当代社会与未来发展提供精准、适切的经验镜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4]2021年、2023年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同样明确本课程核心育人目标在于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但无论是“教科书”“清醒剂”,还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都建立在经过严谨考证、真实完整的历史之上,绝不会被歪曲、曲解或片面剪裁的历史,如若不然,只会适得其反。

仅从史料中截取只言片语开展片面解读,或是脱离具体历史环境苛责历史人物,是隐蔽性更强、更易混淆大众认知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网络空间中部分网民,甚至个别所谓史学从业者,存在诸多错误论调:刻意拔高晚清慈禧、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张作霖等新旧军阀的历史作用;否定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意义;将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曲解为“惠及中国人民”,借此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甚至质疑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美外交方针与战略抉择;刻意深挖、放大乃至杜撰近现代民族英雄的负面传闻,消解民族英雄的崇高形象;以改革开放后多元所有制并存的现实为依据,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步性;仅凭改革开放与新时代发展进程中的个别负面现象,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这类刻意以偏概全的叙事,本质上是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新时代发展史,进而消解全社会“四个自信”、弱化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正因如此,历史考证必须锚定各阶段时代背景,结合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历史人物的成长境遇,开展全景式、全过程的综合考证。“这种全景化历史考证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直接体现,以唯物史观抵御秉持唯心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直击要害的根本路径。”^[5]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6]党史大家胡乔木亦强调:

“客观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书写出来的历史就必须是什么样子。”^[7]“纲要”授课教师讲授历史同样应当遵循这一准则。治学审慎、穷究史实、客观全面,既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操守,也是“纲要”任课教师必备的专业素养。

“讲授真实历史”,要求教师秉持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对教学涉及的每一则史料、每一处表述、每一个词汇开展细致考证。当然,完整客观的历史考证,更要求教师将历史事件置于所处时代整体语境下,开展全景、全程的深度研判。历史史实讲解出现偏差,表述模棱两可,片面夸大或刻意贬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不仅关乎授课教师的专业公信力,更直接影响“纲要”课堂的可信度,关乎青年学生正确历史观的培育,关乎思政课全部育人目标的落地实现。由此可见,梳理、讲述历史虽非“纲要”课堂的首要任务,却是课程教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目标。

二、教思想:“纲要”教学的现实目标

历史与思想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历史是史学家依托各类史料呈现的碎片化史实,是立足特定历史观对史料开展筛选、重构与阐释后形成的认知成果,本质是研究者历史观念的外在投射。

历史事实具有客观实在性,但不同史学家受成长环境、文化熏陶、人生经历、性格特质等因素影响,形成差异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与观察分析问题的视角,致使其对史实的取舍、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存在显著不同,甚至得出完全相悖的结论。历史学各理论流派、纷繁多样的历史观念,正是研究者立足不同认知视角、依托不同价值立场在审视同一历史议题时所产生的差异化成果。

民间常有说法:“中学学历史,大学学思想。”中学阶段属于青少年成长时期,该阶段核心教学任务是夯实基础史实,掌握碎片化、具象化的历史素材。教师的核心职责是依托教材向涉世未深的学生阐释历史“是什么”。因此中学生主要依托教材认知历史、把握历史表层样貌,在认知中建立零散、具象的历史印象。进入大学阶段,授课者将立足多元研究视角,针对固化史实背后的深层动因展开层层追问,引导学生搭建完整、体系的历史认知框架,实现对静态史实的深度解读,这便是具备生命力、思辨性的历史观念。由于个体解读历史的视角、价值、立场各不相同,历史相关观念天然具备多元属性。中国古代三大史家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对汉武帝的叙事呈现截然不同,足以证明:即便在推崇“独尊儒术”、倡导学术统合的古代社会,史家的历史认知同样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历史观念的多元性,是所有历史

类课程教学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同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励学术领域不同观点、不同流派开展自由研讨。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学界普遍形成共识:不同研究者拥有差异化的学术背景、成长经历、研究路径与思维范式。引导学者立足多元视角探究历史议题,是催生全新历史观念、学术流派与研究范式的核心路径。与此同时,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流派观点的碰撞、研讨与辩驳,能够持续丰富史学理论体系,推动历史学科整体发展,更能促使历史真理在思想交锋中愈辩愈明。因此,大学阶段历史教学的核心重心,应当落脚于梳理不同学者基于多元视角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史实形成的差异化阐释。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历来都是不同学术背景、文化环境、研究特长的学者秉持“双百方针”开展学术探索后的必然成果。

从另一个维度看,伴随多媒体、自媒体依托信息化快速普及,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各类价值观、历史观与社会思潮交织涌入、良莠混杂。大学生步入高校后,极易通过网络、自媒体等接触到大量与教材表述不一致,甚至完全对立的历史观点。加之部分西方媒体与境外学者刻意输出歪曲历史的片面论调,青年学生极易在多元价值冲击下产生认知迷茫,这就要求高校强化思想价值引领,帮助学生树立契合国家发展需求的科学历史观。基于此,思政教学必须坚持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在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学生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有力批判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做到以批判夯实建设根基、以建设校准批判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8]何为历史教育领域的“正确思想”?针对“纲要”在内的全体思政课程而言,就是要直面信息化、全球化浪潮下海量繁杂、形态各异的网络历史思潮,持之以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9],筑牢青年学生的思想根基与理论根基。“纲要”授课教师的核心职责之一,便是带领学生对比、甄别、研判各类社会思潮,引导学生认同、接纳并坚定信奉课程传递的科学历史观念。作为核心思政课程之一,“纲要”教学必须树立鲜明斗争意识,在多元思潮并存的当下,引领学生认清本课程所承载的历史认知才是科学、正确的历史观念。

三、教政治:“纲要”教学的最重要目标

历史学层面的历史观念本身与政治深度关联,

二者甚至密不可分。无论历史观念呈现出何等多元繁杂的样貌,无论身处不同文化语境的史家如何标榜客观、公正治史,能够形成广泛传播的历史叙事,始终承载特定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与利益诉求。中国二十四史的编撰初衷,便是为历代统治者提供历史镜鉴,西方史学发展脉络亦是同理。步入近代民族国家兴起阶段后,历史观念又承载起不同时代、不同政权下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诉求。部分西方史学家刻意塑造本民族的道德叙事,并以此套用来贬抑其他民族的道德体系^[10],叙事之中难免带有浓厚的文化偏见与历史短视,这也是西方史学研究中“东方主义”偏见滋生的深层根源。由此可见,历史无法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所有历史书写本质都内嵌政治立场。

相较普通“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增设“纲要”二字,本身表明课程侧重梳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核心纲领与整体框架,核心指向是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课程教学目标在于,通过厘清历史线索、框架与发展规律,引导学生理解多层核心历史内涵与价值:一是把握近代各阶层先进分子、各族人民为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不懈求索、奋勇抗争的历程与时代意义;二是读懂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三是明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脉络与历史价值;四是深刻认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五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必然;六是透彻领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基本道理;七是清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八是深刻体悟红色政权、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九是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自觉“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11]。上述目标已超越单纯历史教学范畴,属于完整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纲要”兼具历史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是课程的第一属性。“纲要”坚持以史说理、以史明政,依托历史叙事巩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筑牢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政治灵魂,具备鲜明突出的政治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阶级、政党与社会团体遵循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依托系统思想观念、政治立场、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开展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价值塑造,培育契合特定社会与阶级需求的思想品格、道德素养与政治认同的社会实践活动^[12]。价值引领与政治导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要求,塑造正确思想品德、筑牢政治立场是核心育人目标。无论是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还是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均明确:高校六门思政必修课开设的根本目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8]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理论知识传授为载体的三观培育与意识形态引领工作,其根本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实现路径涵盖理论阐释、现实观照、历史佐证等多重维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真相亦是检验政治理论真理性最有力的佐证。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3]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核心思政课程,“纲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脉络、核心主线与关键要义,阐释历史发展内在规律,于潜移默化中达成思政育人目标。

“纲要”任课教师应当依托鲜活一手史料,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人民抗争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讲透彻、讲真实,引导学生生发对党、人民、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自豪感,最终达成课程核心政治目标,培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阐释政治立场、传递价值导向,既是“纲要”课程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课程教学的核心目标。

四、教思考:“纲要”教学的更高级目标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4]落实到“纲要”课程教学中,“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核心要义正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重点是培育学生独立思考、深度分析、精准鉴别历史问题的核心能力。

历史是永续发展、永无止境的演进进程。对历史事实的解读,会随着史学研究的推进、学者认知的更新以及研究者思想观念的迭代而不断丰富深化。但受制于课程学时与教材体量,“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容量始终有限。因此,相较于单纯的历史知识讲授、思想理论灌输或政治观念宣讲,培育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自主分析的思维、辨识和甄别各类历史思想与学术流派的能力,是“纲要”教学更高层级、更为核心的育人目标。

当前中国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持续蔓延,在此时代背景下,国内外“左”右各类错误思潮,常常假借“言论自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名义,截取历史片段、模糊历史全貌、放大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将其歪曲炒作,进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炮制传播历史谣言。这类纷繁复杂、良莠不齐的错误思潮,无法依靠教师在有限课堂时间内逐一拆解、逐一击破。如何在有限教学时长内,引导学生甄别、剖析、辨明各类极具迷惑性、真假难辨的错误历史思潮与观点,是新时代“纲要”教学必须直面的核心难题。在信息传播渠道多元、传播方式便捷高效的当下,这一教学困境愈发突出。因此,通过课堂引导与价值引领,促使学生在持续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练就洞察复杂世界、辨析多元价值的能力,形成科学、理性、独立的价值判断,是“纲要”课程育人的关键所在。

大学阶段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关键窗口期。在此阶段,长期专注学业、较少接触社会的大学生,开始直面社会的多元复杂、成长的现实烦恼与人生的诸多困惑,其思想的成熟、认知的进阶、三观的完善,都需要在独立思考中逐步完成。同时,大学是青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也是三观尚未定型、最易受到外界影响的特殊阶段。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叠加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与成长困惑,使得大学生对各类历史观点、社会思潮的辨识能力相对薄弱,极易被歪曲历史、解构主流的错误思潮误导。这也意味着,单一的历史知识灌输、被动的理论宣讲,完全无法适配新时代“纲要”课程的育人需求。

与此同时,“纲要”课程蕴含大量与国家建设、

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紧密相关的历史热点与争议问题,亟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认知、形成科学判断。例如:殖民帝国主义侵华给中国带来的究竟是灾难沉沦,还是所谓的“现代化机遇”?林则徐为何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非被个别言论曲解的“历史罪人”?如何客观辩证评价洪秀全、石达开等存在历史局限性的近代历史人物?如何准确把握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驱的历史定位?袁世凯、张作霖、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虽存在部分符合时代底线的行为,为何不能被冠以“历史英雄”称号?“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在黑暗中摸索数十年”的科学论断,是否违背“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曲折负有领导责任,为何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如何客观、辩证、全面看待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的美国、苏联等外部因素?诸如此类的历史热点与争议问题层出不穷,且会随着历史研究深化与社会思潮演变持续增多。

大学生能否准确理解、理性剖析、科学解答上述复杂历史问题,直接决定其能否自觉抵御各类错误思潮的侵蚀。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牢牢占据高校思想育人主阵地,更关乎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根基是否稳固。基于此,“纲要”课程的核心教学难题与核心育人任务,就是引导学生坚守正确历史观,熟练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培育独立分析历史问题、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理性辨析历史思潮的核心能力。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指出,高校思政课立足大学阶段“重在增强学生使命担当”的育人定位,重点培育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5]。培育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坚定的政治信仰,核心是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备运用科学理论剖析、解答当代现实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着重强调思政课教学的“问题导向”,本质上要求通过问题探究与深度思考的有机融合,引导学生熟练运用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判分析现实问题、破解认知困惑。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理论识记,而在于学会运用其科学思维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16]。

“纲要”课程之所以能够秉持科学、客观、公正的史学立场,关键在于教材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立足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方法,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历史脉络、梳理历史逻辑、凝练历史结论。想要引导学生科学解答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各类热点、难点、争议问题,必须引导学生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视角,运用唯物辩证法,依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辨析研判近现代史上的各类争议议题、多元思潮与复杂历史现象。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发挥思政育人功效,引导学生始终践行“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的重大原则^[11]。

五、教成人:“纲要”教学的拓展性目标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事业。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标准,绝非单纯坚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更在于培育全方位合格的时代建设者。这里的“合格”,不仅指代专业技术素养的达标,更涵盖思想品格、道德素养、社会适配能力等社会学维度的全面合格。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育人工作所要培育和塑造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是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综合素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

“纲要”课程蕴含的“成人”育人价值,是其亟待深度挖掘、拓展落地的核心功能,更是对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补充与深化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统筹处理好支撑国家战略与满足民生需求、知识传授与全面发展、人才培养与社会适配、规范有序与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与借鉴国际经验等一系列重大辩证关系^[9]。这一重要论述清晰指明,新时代人才培养既要筑牢爱国爱党的坚定政治信仰,又要具备适配时代发展的专业技术能力,更要锤炼契合社会需求的团队协作能力、复杂场景下的抗压应变与竞争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软实力”概念逐步普及,其对国家发展、个人成长的重要价值愈发凸显。我国在物资匮乏时期,优先聚焦经济发展、夯实发展硬实力,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软实力培育。受这一历史发展惯性影响,长期以来,社会与教育领域更侧重能够直接影响就业与薪酬的专业技能教育,普遍忽

视学生处世能力、生活素养、社会服务意识、意志品质与道德修养的培育,本质上是弱化了青年学生的“成人”教育。福州才子吴谢宇弑母案、北大毕业生王猛发布万字长文与家庭决裂等青年悲剧案例,根源均在于青年个人软实力缺失、心智成长滞后、社会适配能力不足。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加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度交织,青年软实力缺失的问题愈发凸显,也对“纲要”课程发挥成人育人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历史是映照现实、启迪未来的一面镜子,能够清晰映照人间百态、复盘成败得失。历史积淀的经验智慧,并非治国理政者的专属财富,更能为个体成长提供丰厚滋养。青年可从近代以来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中、从近现代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中,汲取为人处世的智慧、涵养坚定的理想信念、锤炼团队协作能力与坚韧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17]在这一壮阔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理想信念与精神伟力,党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的为民情怀,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的根本属性与强大力量,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艰辛求索与卓越智慧,根植于信仰的革命精神与超凡意志品格,党凝聚各方力量、巩固统一战线、战线的胸襟与谋略,都为当代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丰厚滋养。学习历史、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能够帮助青年增强开拓前行的勇气与力量^[17],为青年应对复杂局面、锤炼意志品质、提升道德修养、培育社会协作与服务能力提供重要支撑。

历史的镜像价值,更能引导青年洞察人性的多元复杂性,客观认知人性的优劣得失。近现代历史画卷中,英雄人物的崇高伟大、反面人物的自私狭隘,以及众多历史人物功过并存、善恶交织的立体特质,都在历史实践与成败起落中得到充分诠释。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认知相对单纯,通过研读历史人物的功过成败、品读历史事件的深层逻辑,能够帮助其更客观地认知社会、包容差异、适配人际交往,时刻自省自律、规范言行品行,塑造健全人格。

学习党史、国史与“纲要”课程知识,不止于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更核心的目标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学史力行。这种力行,不仅在于借鉴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传承先辈的精神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更在于汲取适配社会、服务人民、报效国家的处世智慧与实践经验。当前,中国式现代

化持续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外关系日趋复杂,全球化工分不断细化,人际、国际关系愈发多元交织,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协作与矛盾的辩证关系,已然成为当代青年立足社会、建功立业、助力民族复兴的必备能力。这既是新时代青年必须直面的成长课题,也是青年成人成才的核心必备素养。

因此,作为高校核心公共思政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应立足立德树人根本目标,依托教师的精准引导,让学生在剖析历史热点、解读历史事件、辨析历史思潮的过程中,逐步习得与时代、社会、他人和谐共处的能力,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树立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远大理想,补齐基础教育阶段缺失的处世能力、生活素养等成人必备素养,全方位夯实青年学生的成长根基与成才底色。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14]同时明确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引导广大青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11]。无论是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美好期待,还是助力青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绽放青春光彩,都决定了高校思政课的育人体系必须涵盖知识理论传授、价值观念引领、思辨能力培育、意志品质锤炼,以及社会适应与社会服务能力养成等多元维度。

“纲要”课程绝非大众认知中门槛较低、人人可讲的“简单课程”,而是一项承载多重核心育人任务、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难度的高阶思政课程,集历史知识讲授、思想价值引领、政治方向把关、思辨能力培育、青年成长赋能等艰巨任务于一体。上好“纲要”课程、落实好课程育人使命,既需要教师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扎实的史学专业功底、广博的综合知识储备,更需要教师精准把握课程育人目标、深刻洞悉青年成长规律、准确认知“纲要”课程的教学内容、育人宗旨与教学规律,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深度统一。

参考文献:

- [1] 王鑫.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EB/OL]. (2025-06-19)[2026-05-10]. https://theory.gmw.cn/2025-06/19/content_38101280.htm.
- [2]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

- 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EB/OL]. (2024-05-11)[2026-05-13].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40511/e1109346d3b948169ac1ddcc45b45590/c.html>
- [3]何兆武.何兆武文集:历史与历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4.
- [4]习近平在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7-08(2).
- [5]邱方明.尊重真正的“历史真相”[N].北京日报,2016-08-29.
- [6]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9.
- [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
- [8]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 [9]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J].求是,2025(11):4-9.
- [10]斯坦凡·贝格尔.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J].孟钟捷,译.学术研究,2013(6):91-111.
- [1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10-25)[2026-05-10].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12]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
- [13]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N].人民日报,2015-08-24(1).
- [14]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EB/OL]. (2016-12-08)[2026-05-12].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8/c_1120082577.htm.
- [15]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21-01-01)[2026-05-1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1/01/content_5576046.htm.
- [16]王伟光.学习和掌握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J].红旗文稿,2024(1):4-11.
- [17]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责任编辑 许峻)

What Should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Teach: A Deep Analysis of Its Teaching Objectives

LI Youkun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course "The Outlin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Outline") covers five dimensions: teaching history, teaching ideas, teaching political awareness,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fostering students' maturity. "Teaching history" means teaching historical truth, which constitutes the foundational goal of "The Outline" course. "Teaching ideas" introduces diverse intellectual schools, especially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orrect and erroneous historical thoughts, aiming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historical ideas elaborated in textbooks are sound and objective. "Teaching political awareness"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eaching ideas. While guiding students to analyze and distinguish diverse historical thoughts, teachers help students fulfill the share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 courses, which stands as the most essential task of the Outline course.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guides students to properly assess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dialectical approach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pply the worldview, methodology, as well as the stance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hat run through the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represents a higher-level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e course. "Fostering students' maturity" draws on the successes, failures, merits and demerits of historical figures and events to offer referen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tackle complex practical issues. It cultivates undergraduates'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capabilities and improves their willpower for them to adapt to and serve social development, serving as the expansive teaching objective of "The Outline" course.

Keywords:teaching history; teaching ideas; teaching political awareness;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fostering students' maturity

从封闭到开放:应用型本科高校学业评价体系 枢纽化转型研究

——以四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例

胡 钰^{1,2}

(1. 河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河南 新乡 453007; 2.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当前结构性失业的背后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学业评价体系的功能性失灵,其核心原因是当前高校实施的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程度较低。造成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水平低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学分制的路径依赖造成了企业标准接入高校学业评价体系壁垒高,二是绩点信号在技术劳动力市场中出现衰减,三是学业评价体系能够有效整合外部资源的半径较小。通过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中部地区四所应用型本科高校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的分析,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学业评价体系向枢纽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枢纽, 学业评价, 转型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6

中图分类号: G642.475;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6)04-0096-08

当前我国社会应用型人才供需呈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企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渴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发现自身所学与市场需求脱节,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愈发凸显。这一悖论的根源,不仅在于课程体系内容滞后,更在学业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失灵。传统以平均学分绩点(GPA)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本质是一套相对封闭、依托知识记忆与复现能力构建的人才“筛选器”,曾适配工业经济时代大批量标准化人才的培养需求。但在迭代加速的数字经济与智能制造当下,该体系衡量人才综合素养的信号传导功能正大幅弱化。

人才供给侧(教育端)与需求侧(产业端)在人才评价标准上存在显著分歧。教育端长期依托标准化课程、学分、绩点等量化学生学业成果,侧重外显型显性评价指标,如笔试成绩、课程作业、课堂出勤

等,形成固化的学业评价路径依赖;而产业端适用完全差异化的能力评价框架,更加看重学生内在隐性能力,如复杂问题处置能力、跨领域协同能力、实操技术应用与创新研发能力等。供需两端评价标准存在诸多错位,具体对比见表1。

产业与社会发展亟须的核心能力,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业评价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而当前占据学业评价核心地位的绩点指标,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学业评价体系在引导学生能力培育、素养发展层面出现功能性失灵,直接造成人才培养靶向性缺失,最终引发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匹配效率偏低的问题,结构性失业正是这一体系失灵的典型结果。因此,推动学业评价体系转型,摆脱单一的“绩点筛选”模式,构建能够对接产业需求、整合教育资源、精准传递学生能力信号的评价枢纽,是破解当前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题的

收稿日期: 2026-06-03

基金项目: 2026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范蠡商业思想融入高校商科专业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2026SJGLX542)

作者简介: 胡钰(1977—),女,河南永城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领导与管理,经济管理。

表 1 产业端核心能力需求与教育端传统评价指标对比模型

产业端核心能力需求	对应权重	教育端传统评价指标	对应权重	错位分析
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	30%	课程考试成绩(绩点)	60%	绩点主要衡量对既定知识的掌握,而非在新情境下的应用与创造能力。
跨领域协作与沟通能力	25%	个人作业/论文	20%	传统评价多为个体化考核,缺乏对团队贡献和协作过程的有效评估。
技术工具应用与迭代能力	20%	实验/课程设计报告	15%	实验内容常与产业实际脱节,评价标准固化,无法体现学生跟进最新技术的能力。
自主学习与创新精神	15%	课堂出勤/参与度	5%	被动参与无法有效衡量主动学习意愿和创新潜力。
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10%	思想品德评定(模糊化)	<5%	评价方式流于形式,难以与具体职业情境结合。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统计年鉴、产业报告和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一、文献综述

高校(在本文中指应用型本科高校,下同)的学业评价并非孤立的教育技术活动,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与市场逻辑之中的制度安排。其形态、功能与效力,受到社会组织形态、市场信号机制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多重影响。

(一)制度主义视角:高校的学业评价体系是被社会组织形态塑造的结果

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如高校)的结构与实践并非完全由效率驱动,而是深受其所处社会环境中被广泛接受的“合法性”观念、规则和神话的塑造。学业评价体系正是这种制度同构的结果,高校建立特定的学业评价体系,是为了符合社会对“什么是好教育”“如何衡量学生”的普遍期待,从而获得合法性,而非单纯追求评价的最优化。Dimaggio 与 Powell^[1]提出的“制度同构”理论极具解释力,他们认为在一个组织场域中,组织(如大学)为了获得合法性、稳定性和资源,会通过模仿、强制和规范三种机制,在结构、文化和实践上变得越来越相似,高校针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体系正是这种同构现象的典型体现。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还是中部地区的地方应用型本科的学业评价体系,其核心评价工具(学分制与绩点算法)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趋同并非源于其教育效果的最优化,而是因为这套体系符合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规范(强制同构),被视为现代大学的标配(模仿同构),并得到了学术共同体和评估机构的认可(规范同构)。任何旨在打破常规、引入企业标准或多元评价主体的改革,都会面临来自既定制度环境的巨大阻力,因为改革挑战了组织场域的合法性规则,组织刚性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丁华(2021)^[2]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普及要求学业评价体系随之改革”,体现了外部技术环境(一种制度压力)如何塑造高校内部的评价实践。杜根远等(2026)^[3]提出从“结果性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领域“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这一制度性理念的变迁,高校

的评价体系改革正是对这一新理念的响应和采纳。

(二)信号理论:绩点信号在技术劳动力市场中符合衰减机制

信号理论认为(Spence M)^[4],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文凭和绩点(GPA)是求职者向雇主传递其潜在生产力的重要信号,但该信号的有效性会随时间或环境变化而衰减。在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文凭和学业成绩被视为一种“信号”,用于向雇主传递潜在雇员的生产力信息,信号的有效性取决于其甄别能力和传递成本。Bills D B^[5]的研究深刻揭示了“新凭证主义”时代信号失灵的困境,“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文凭本身的稀缺性下降,雇主被迫寻求更精细的信号,绩点因此成为重要的第二层级信号”,但这一信号正面临严重的衰减。首先是“绩点通货膨胀”(郭玉婷、邬大光)^[6],绩点普遍虚高使得高绩点不再是判断学生优秀能力的可靠指标,信号的甄别度被稀释;陈涛等(2025)^[7]的研究揭示了“学业内卷”现象,即学生为获得高绩点而进行的过度竞争,学业内卷行为本身会稀释绩点作为真实能力信号的价值,加速了信号的衰减。其次,绩点所衡量的主要是标准化符合规范要求的学术能力,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实践技能、协作能力和创新素养之间的关联度低。当雇主发现绩点信号的预测效度持续下降时,他们便会转向其他信号,如实习经历、项目经验、名校背景甚至社会资本,转向过程一方面加剧了教育评价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脱钩程度,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甄别合适人选的成本和培训成本,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人力成本。杜根远等倡导的“数据驱动”和“过程性评价”,正是试图通过引入更多维度的数据(如实践、创新活动)来构建更丰富、更不易衰减的复合信号,以弥补传统绩点信号的不足。

(三)教育评价枢纽的结构洞功能:基于产教融合网络的实证研究

制度主义解释了学业评价体系的“僵化”缘由,信号理论揭示了绩点逐渐“失效”的原因,结构洞理

论则给出了“重塑”的方向。结构洞理论认为在社会网络中,连接两个无直接联系群体的节点(即占据“结构洞”位置)拥有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学业评价体系可以扮演连接高校与产业界的“评价枢纽”角色,一个设计良好的学业评价体系,能够作为高校(知识生产方)与产业(人才需求方)之间的结构洞,通过整合双方信息,有效匹配人才供给与需求,提升产教融合效率。部分学者的前沿研究开始将大学视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网络枢纽”。如 Contreras^[8]的研究发现,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者,更是连接不同行动者(如初创企业、大型公司、研究机构、政府)的“结构洞”占有者;杜根远等提出的“数据驱动”评价体系,通过整合“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学科竞赛”等数据,实质上是在构建一个能同时被高校和企业理解的人才能力“仪表盘”,填补了高校内部评价与企业用人标准之间的“结构洞”,使评价结果成为产教融合网络中一个关键的、可信赖的枢纽信息,从而提升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高校的学业评价体系不应是一个封闭的内部循环,而应成为一个开放的“枢纽平台”。可以通过引入企业项目、行业导师、资格认证等外部节点,将原本隔离的学生能力发展过程与产业真实需求网络连接起来,弥合人才培养和需求信息之间的不对称,为学生创造接触前沿知识和实践机会的路径(宋晔、孟萌)^[9],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高效、精准的人才识别与筛选节点,枢纽化的学业评价体系,其核心功能不再是简单地给学生“打分”,而是“连接”与“赋能”。

二、核心概念及分析框架:学业评价的三重社会属性与枢纽化逻辑

基于制度理论、信号理论与结构洞理论视角,本文将学业评价的社会属性解构为制度属性、信号属性、网络属性三大核心维度;三重属性相互交织耦合,共同形塑学业评价体系的现实形态与功能运行样态。

(一)制度属性:学分制路径依赖抬高企业行业标准接入壁垒

学业评价的制度属性,体现为其是一套长期存续、具备法理合法性的规则与运行程序。以学分制为例,这套发轫于19世纪末美国高校的制度,现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学分制将学生完整学习过程量化为标准化“学分”,后续配套推行的绩点制度,同样秉持便于教学管理、成果互认、资质核验的设计逻辑,由此形成极强的制度路径依赖。

但这种高度标准化、内部闭环运行的制度设计,天然对外部评价标准形成准入壁垒。企业试图把动态化、岗位导向的职业技能标准融入教学评价体系时,常会遭遇系统性制度梗阻:非标准化的产业实践能力如何换算为学分、绩点?企业出具的能力评价结果如何在高校官方成绩单中获得合规认定?

上述制度层面的底层不兼容,导致产教融合场景下的“企业侧评价”大多仅能以推荐信、实习鉴定等非正式材料形式存在;学生通过实习、项目实操积累的专业能力与行业证书,均无法纳入绩点核算体系。综上,学业评价固有的制度属性,大幅抬升了产教评价协同改革的制度壁垒。

(二)信号属性:绩点通胀引发甄别失效,弱化人才市场匹配效率

学业评价的信号属性,核心是向社会外部主体,尤其是劳动力市场传递学生综合能力的信息功能,而绩点是学业评价发挥信号传递作用的核心载体。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绩点通胀现象,已大幅消解绩点的信号识别价值,造成学业评价信号功能失灵。一方面,部分高校为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维护院校办学声誉,逐步放宽课程评分标准,使得学生整体绩点水平持续上浮,高分段学生高度集聚,学业评价难以有效区分学生的学业与能力差异,分级甄别功能大幅弱化。另一方面,绩点作为综合性量化评价指标,仅呈现学生整体学业水平,掩盖了学生能力结构的差异化特征。例如,同样拥有3.5绩点的学生,能力优势既可能侧重理论分析,也可能聚焦实践操作,但用人单位无法通过单一的绩点数值,精准识别学生的能力特质与核心优势。

绩点评价信号的模糊化与价值贬值,最终引发人才甄别失效问题。用人单位对绩点的参考价值与可信度持续降低,为精准筛选适配人才,不得不增加招聘环节投入,通过设置复杂笔试、多轮复试、引入第三方测评等方式重新核验求职者能力。这一行为不仅抬高了企业的招聘用工成本,也显著降低了人才供需市场的匹配效率。

(三)网络属性:学业评价枢纽的资源整合半径

学业评价的网络属性,聚焦其体系的开放性与跨主体连接性特征,核心用以衡量学业评价体系整合校外多元资源的广度与深度,本文将这一核心特征定义为学业评价的“资源整合半径”。该属性可通过多项核心量化指标综合表征,主要包括校企共建课程占比、校企共建课程总量、“双师型”教师规模、“双师型”教师评价参与度与学分银行跨机构认证率。其中,校企共建课程占比为校企共建课程数

量占学校课程总数量的比重;校企共建课程总量指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建设、联合开发的课程总数;“双师型”教师规模特指校内同时持有教师资格证与对应职业资格证书、具备企业实践经验与实操能力的教师总量;“双师型”教师评价参与度,衡量“双师型”教师参与高校教学质量、课程建设、学生学业等各类评价工作的覆盖程度与参与频次;学分银行跨机构认证率,则代表学分银行体系内不同办学主体之间学分互认和兑换的比例。

三、实证分析:应用型高校学业评价的枢纽化程度测量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枢纽化”学业评价体系像一座同时连接产业、学校与学生的“立交桥”,只是

当前这座桥是“单向匝道”——校内评价输出顺畅,产业端输入与反馈受阻,本文使用长三角(A学院)、珠三角(B学院)、京津冀(C学院)和中部地区(D学院)的四所应用型本科高校进行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程度的测量。

(一)制度脱嵌:四所应用型本科高校装备制造类专业课程标准滞后于产业技术标准

“制度脱嵌”在学业评价领域体现为课程标准与产业技术标准脱节,以四校装备制造类专业(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智能制造等)为例,通过课程更新周期、滞后年限及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脱嵌程度与区域产业适配性的关联。见表2。

表2 四校装备制造类专业课程标准脱嵌情况汇总表

高校名称	课程更新周期	滞后产业技术标准年限	核心脱嵌表现	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专业相关度/企业满意度)
A学院(长三角)	2年	1~2年	实训设备未引入数字孪生、协作机器人	75.69% / 82.3%(技术适配性满意度)
B学院(珠三角)	2年	1~1.5年	未覆盖工业互联网、智能产线运维技术	75% / 90%(传统制造企业满意度)
C学院(京津冀)	2.5年	1.5~2年	新兴技术(新能源电池制造)内容占比仅35%	72% / 85.8%(新能源企业满意度)
D学院(中部)	2年	1.2~1.8年	未纳入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传感器技术	78.3% / 92.5%(高端制造企业满意度)

B学院:滞后年限1~1.5年,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迭代快的优势,课程更新周期2年,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纳入智能控制、物联网技术,但未覆盖工业互联网平台(2021年后普及);本地企业(如TCL)愿意承担1~2个月岗前培训,且学校通过“产业学院”动态调整课程(如新增智能传感器理论模块),脱嵌影响被部分消化,专业相关度为78.3%,高于C、A两校。

D学院:滞后年限1.2~1.8年,核心原因是郑州都市圈制造业以传统产业(汽车制造、装备加工)为主,学校课程对接宇通、富士康等企业2019—2020年技术标准,滞后技术仍能满足本地企业基础需求;65%的企业参与课程评价,根据反馈新增新能源汽车电机维修模块,脱嵌对就业质量影响小(传统制造企业满意度90%),仅在高端岗位流动时存在技能短板。

A学院:滞后年限1~2年,虽然未引入数字孪生、协作机器人技术,但长三角高端制造企业(如常熟电梯企业)普遍提供岗前培训,且学校通过“企业导师联合评审毕业设计”弥补技术差距,脱嵌对就业质量制约较小(专业相关度75.69%);高端制造企业技术适配性满意度(82.3%)低于总体满意度(89.41%),反映脱嵌对高端岗位匹配度的影响。

C学院:滞后年限1.5~2年,是四校中脱嵌最明显的高校。受京津冀产业转移节奏影响,传统装备制造课程(占比65%)仍能匹配区域内传统企业

(如河北煤矿机械)需求(满意度93.4%),但新兴产业(新能源电池制造)课程不足,内容占比仅35%,未覆盖智能电池检测技术,导致新能源企业满意度降至85.8%,脱嵌严重制约其毕业生向新兴产业流动,与区域产业升级需求脱节。

专业课程标准调整滞后于产业技术标准年限是评价体系制度属性的“刚性”与网络属性的“弱连接”共同造成的结果,从对比中可以看出,C学院的学业评价活动未能有效嵌入到产业技术生态的演化进程中。

(二)信号有效性证据:毕业生能力指标与企业满意度相关性

学业评价枢纽的核心目标是输出有效的“能力信号”。检验信号有效性的最佳方式,是分析高校输出的毕业生能力指标(如综合绩点、关键能力模块得分)与企业在雇佣后给出的用人满意度评分之间的相关性。在理想的枢纽化学业评价体系中,其毕业生能力评价结果应能显著正向预测其入职后的工作表现和发展潜力,四校具体指标及结果见表3。

B学院:教学实践能力与企业满意度相关系数(0.89)回归拟合度(0.76)均居四校首位。核心优势在于聚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电子信息产业需求,师范类专业(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学业评价中教学实践模块占比60%,由中小学教师联合评分(如试讲考核企业导师权重70%);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实操考核纳入企业真实项目(如潼湖智慧园物联网设

备调试),能力指标与本地企业岗位需求高度匹配。印证能力信号对工作表现的预测价值极高。

99.45%的企业满意度及 100%的企业再招聘意愿,

表 3 四校能力指标与企业满意度相关性汇总表

高校名称	毕业生核心能力指标	企业总体满意度	关键能力与企业满意度相关系数	回归模型拟合度(R ²)
A 学院(长三角)	平均绩点 3.21,工程实践能力 86.5 分	89.41%	工程实践能力:0.81	0.68
B 学院(珠三角)	平均绩点 3.16,动手操作能力 87.5 分	90%	动手操作能力:0.83	0.71
C 学院(京津冀)	平均绩点 3.18,专业基础知识 87.6 分	92%	专业基础知识:0.78	0.62
D 学院(中部)	平均绩点 3.15,教学实践能力 88.2 分(师范类)	99.45%	教学实践能力:0.89	0.76

D 学院:动手操作能力相关系数(0.83)拟合度(0.71)表现优秀。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业评价中实操项目占比高,“汽车制造工艺”课程实操评分由宇通工程师直接参与,能力指标与郑州都市圈制造业岗位操作需求精准对接;定期根据企业反馈调整考核内容(如新增新能源汽车电池检测模块),信号预测价值显著。

A 学院:工程实践能力相关系数(0.81)拟合度(0.68)处于中游。长三角电梯、光伏等高端制造产业对工程实践能力需求明确,学校通过“产业学院+双师评价”将企业技术标准融入能力指标(如电梯故障排查案例考核),但因部分实训设备未引入数字孪生技术,毕业生进入高端企业需 1~3 个月培训,信号拟合度低于 B、D 两校。

C 学院:专业基础知识相关系数(0.78)拟合度(0.62)较低。聚焦京津冀传统装备制造、教育产业,专业基础考核权重高(机械专业理论课程占比

70%),与传统企业需求匹配;受产业转移影响,新能源企业对智能检测技能需求上升,而学校相关能力指标尚未完善,导致信号对新兴岗位预测价值下降,整体拟合度较低。

通过分析四校毕业生能力指标(综合绩点、关键能力模块得分)与企业满意度的相关性,可以看到 B 学院学业评价体系的能力信号最强,C 学院的能力信号较弱,区域人才流动的强弱、企业发展活跃度及教育变革等都会影响学业评价体系的变化。

(三)网络连通性指标:枢纽功能的量化表征

学业评价体系的枢纽化程度,可以通过其“网络连通性”来衡量,采用校企共建课程占比、“双师型”教师参与评价率和学分银行跨机构认证率作为核心观测点,可以反映高校学业评价与企业需求、行业标准、外部教育机构的联动紧密程度,量化结果体现学业评价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输出优质评价结果的枢纽能力,四校网络连通性表现见表 4。

表 4 四校网络连通性核心指标汇总表

高校名称	校企共建课程占比	“双师型”教师规模及参与评价情况	学分银行跨机构认证率
A 学院(长三角)	18.3%(42 门)	“双师型”教师 682 人(占比 57.1%)85% 参与评价	32.70%
B 学院(珠三角)	12.8%(38 门)	“双师型”教师 496 人(占比 42.2%)78% 参与评价	28.60%
C 学院(京津冀)	15.2%(35 门)	“双师型”教师 523 人(占比 41.8%)70% 参与评价	25.50%
D 学院(中部)	13.5%(26 门)	“双师型”教师 415 人(占比 37.2%)68% 参与评价	21.30%

数据来源:四所高校 2022、2023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A 学院:三项指标均居四校首位,核心优势在于深度对接长三角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依托电梯工程学院、光伏科技学院等现代产业学院,与 215 家企业联合开发 42 门课程,其中 12 门直接纳入企业内部培训体系(如“智能电梯控制技术”),课程内容与行业技术标准无缝对接;“双师型”教师规模占比超半数(57.1%),且 85% 深度参与学业评价(如机械电子工程专业毕业设计需企业导师联合评审);与苏州大学等 5 所高校和 10 家行业协会建立学分互认机制,行业资格证书折算学分覆盖多门选修课,跨机构认证率达 32.7%,形成“产业需求—课程设计—评价认证”闭环,其表现得益于长三角地区高端制造产业集中、校企合作政策完善、行业协会协同能力强的区域环境。

B 学院:校企共建课程占比(12.8%)、“双师型”教师参与率(78%)、跨机构认证率(28.6%)整体均衡,优势在于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聚焦教育、电子信息等区域主导产业。建有 3 个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与 156 家企业联合开发 38 门课程(如与潼湖智慧园合作开设“工业互联网技术”),“双师型”教师在电子信息工程、软件工程等专业实现“理论+实操”双评价(企业导师实操评分权重 60%);学分银行与广东省内 4 所高校及 8 个行业协会建立互认,教师资格证、电子工程师证书可折算为选修课学分,区域产业适配性较强。但受限于本地产业以中端制造为主,高端合作企业较少,校企共建课程中深度联合开发比例仅 45%,枢纽功能的产业引领性有待提升。

C 学院:校企共建课程占比(15.2%)、“双师型”教师参与率(70%)处于中游,跨机构认证率(25.5%)略低于 B 学院。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聚焦装备制造、教育产业,开设“智能制造订单班”并开发 35 门专属课程,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实习评价中企业导师权重占 50%;跨机构认证覆盖京津冀 2 所本科高校及 8 家行业协会,但新兴产业(新能源、数字经济)课程仅 8 门(占比 22.9%),枢纽功能的产业覆盖广度不足。

D 学院:校企共建课程中 65% 有企业参与评价(如“宇通新能源汽车技术班”实操评分),但课程多集中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占比 70%),新兴产业(智能网联汽车)相关课程仅 4 门;“双师型”教师参与评价率(68%)虽高于 B 学院,但规模占比(37.2%)较低,且主要负责实践课程评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评价衔接度不足;学分银行仅覆盖河南省内 2 所高校,跨机构认证率为 21.3%,枢纽功能的区域辐射范围较窄,未能形成跨区域联动。核心原因在于郑州都市圈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高端产业资源不足,企业参与教育深度有限。

中部和京津冀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共建课程占比低、“双师型”教师在核心专业参与率低、产业端学分“入口”过窄,是当前枢纽化程度偏低的关键瓶颈,虽然应用型本科转型试点高校在这些指标上已有积极探索,但整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四所高校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程度及分析

长三角(A)因高端产业技术迭代快,A 学院起

步早,校企合作和产业融合度较高,粤港澳大湾区(B 学院)、中部核心制造业城市(D 学院)高校,依托产业需求明确、校企合作紧密的优势,网络连通性较强(校企共建课程占比 12.8%~13.5%)、信号有效性高(相关系数 0.83~0.89)脱嵌程度低(滞后 1~1.8 年);京津冀转型期(C 学院)受产业转移影响,枢纽功能和信号有效性呈“传统产业强、新兴产业弱”的分化态势,反映出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程度与区域产业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

A 学院(85% 双师型导师参与评价)、B 学院(78% 双师参与评价、企业联合评审教学实践)、D 学院(65%企业参与课程评价)因企业深度参与,实现“课程—评价—产业”联动;而 C 学院(22.9% 新兴产业课程占比)、A 学院(数字孪生技术滞后)因企业参与不足或产业技术迭代快,导致枢纽功能短板、信号有效性下降,说明企业参与深度直接决定学业评价体系的适配性,学业评价体系开放度与企业参与深度息息相关。

脱嵌程度高的 C 学院(课程更新周期为 2.5 年),因更新周期与产业技术迭代(1~2 年)不匹配,脱嵌影响显著;而 B、C、A 三校通过 2 年更新周期、企业参与课程调整,有效降低脱嵌程度,说明建立“产业技术—课程标准”动态响应机制,是破解制度脱嵌、提升学业评价枢纽功能的核心路径。

四、变革路径:从封闭评价到开放枢纽的实践

要推动学业评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筛选器转型为枢纽,需要遵循制度重组核心、信号强化载体和网络扩展范围的实践逻辑。见表 5。

表 5 四所高校学业评价体系枢纽化措施

高校名称及所在区域	制度重组核心	信号强化载体	网络扩展范围
A 学院(长三角)	现代产业学院认证	数字工艺师徽章	长三角智能制造联盟
B 学院(珠三角)	电子信息产业学院	TCL 技术攻关徽章	珠三角电子信息共同体
C 学院(京津冀)	生物医药认证委员会	京津冀产教链(规划)	京津冀生物医药中心
D 学院(中部地区)	绿色产教联合体	区块链低碳徽章	中部绿色建造联盟

(一)制度重组:建立“教育—产业”联合认证委员会

变革的首要任务是打破高校在学业评价权力上的垄断,进行制度层面的重组。核心举措是建立超越单一学校层面的、区域性或行业性的“教育—产业”联合认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高校代表、行业龙头企业技术专家、产业协会代表以及第三方认证机构共同组成,其核心职能是共同制定和定期修订应用型专业的核心能力标准和评价框架。在具体的课程评价中,可尝试赋予企业代表实质性的评价权重,如在毕业设计、核心专业课程项目等关键环节,企业专家的评分可占到总成绩的 30%,从根本上改

变评价的权力结构,将产业标准内化为教学和评价的指挥棒。

A 学院已建立“现代产业学院”联合认证机制,联合多家企业制定《产教融合课程认证标准》,将企业技术标准纳入学分认定体系。如智能制造专业由企业工程师参与核心课程考核,学生完成产线项目可兑换学分。D 学院已牵头组建“绿色低碳产教联合体”,联合郑州宇通、河南省环保协会开发全国首套绿色低碳高校教材,配套“课程—证书”一体化认证体系,学生通过碳排放核算实训可获得企业联合签发的能力证明。B 学院已联合 TCL 科技集团共建“电子信息产业学院”,设立企业导师库与项目制

课程,学生参与研发专利或工艺优化项目可直接转换为创新学分,企业评价占课程总评分的40%。C学院已联合河北制药集团、河北省生物医药协会成立“生物医药产教认证委员会”,开发“GMP实训认证模块”,以企业现场考核替代传统试卷测试。

A学院未来还计划联合长三角智能制造联盟,推动跨省“1+X”证书互认,建立区域性产教联合认证数据库,覆盖集成电路、新能源等战略产业。D学院未来拟与河南省人才交流协会合作,申报“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资质,推动区域性碳排放核算能力认证标准落地。B学院正在探索与粤港澳大湾区工程师联盟共建“跨境能力认证中心”,推动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的技能标准互认。C学院未来拟联合京津高校申报“京津冀生物医药产教融合示范区”,推动跨区域认证与学分银行互通。这些高校的学业评价体系已经开启了枢纽化进程,探索在制度上突破封闭走向开放。

(二)信号强化:开发区块链存证的技能徽章

为解决绩点信号模糊化、易通胀的问题,需要开发更精准、可信、细颗粒度的能力信号工具。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技能徽章提供了一种极具潜力的解决方案。与传统成绩单不同,技能徽章是学生掌握某项特定技能(如“熟练使用Python进行数据分析”“掌握西门子S7-1200 PLC编程”)的数字化凭证,其技术实现依赖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特性。当学生完成一个由校企共同设计的项目并通过考核后,一个包含技能描述、评价标准、评价主体(如某企业导师)、证明材料(如代码库链接)、项目报告和时间戳的“徽章”将被创建,信息经加密后记录在区块链上,形成一个无法伪造、可被雇主随时公开验证的“存证”。基于智能合约管理的徽章系统,能够替代部分绩点的功能,为学生构建一个动态、可信、便携的个人能力档案。

D学院在绿色建筑课程中试点“区块链技能徽章”,学生完成BIM建模项目后,系统自动生成含企业名称签名的数字徽章,可嵌入求职简历及学分银行账户。未来计划接入“中原链”教育节点,实现徽章在河南省国资委下属企业的自动验真。B学院已为电子信息专业学生发放“TCL技术攻关徽章”,记录其在企业真实项目中的代码贡献度与问题解决效率,数据存证于华为区块链平台。计划联合深圳微众银行开发“湾区技能链”,支持徽章跨境绑定港澳资格框架(QF)。A学院已在纺织服装专业试点“数字工艺师徽章”,通过物联网设备采集学生操作数据如面料裁剪精度,自动生成能力雷达图上链存

证,同时对接苏州工业互联网平台(SIIP),实现徽章与智能制造企业招聘系统直联。C学院规划联合河北科技大学、雄安新区区块链实验室开发“京津冀产教链”,重点认证生物制药无菌操作等高风险技能。

虽然目前“区块链存证技能徽章”的成熟项目案例尚不普遍,其应用范围还局限在某一地区,但其在技能认证领域的概念和应用前景正在得到广泛探讨,相关技术和存证标准规范也在不断完善。

(三)网络扩展:基于产业链的校际评价联盟

单个高校的资源 and 视野有限,枢纽功能的实现需要突破校园边界,进行网络扩展。未来的方向是推动基于特定产业链如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建立跨学校的评价联盟。首先,联盟内的高校成员可以共享评价标准与资源,共同开发面向产业链需求的课程模块和评价题库,共享企业导师、实验设备等稀缺资源;其次,推动学分互认,学生可以在联盟内跨校修读特色课程,所获学分得到无缝认证,从而汇集各校优势,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路径;再次,共建学生能力档案共享平台,联盟可统一采用类似技能徽章的评价工具,建立区域性的学生能力档案数据库。企业只需接入该平台,即可高效检索和匹配整个产业链的人才资源,极大提升人才市场的透明度和匹配效率。

长三角校际联盟(A学院牵头)已联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苏州科技大学成立“智能制造评价联盟”,共享企业题库与远程实操考核平台,学生跨校选修课程可累积“联盟通兑学分”。未来希望扩展至集成电路领域,建立“长三角芯工坊联盟”,实现芯片设计仿真平台跨校接入。B学院(珠三角)已发起“电子信息校际评价共同体”,联合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东莞理工学院开展“联合毕业设计”,企业命题由三校竞标,联盟专家组交叉评审。未来还会推动与中国香港理工大学共建“粤港电子设计能力护照”,打通两地学分银行结算通道。D学院(中部地区)已联合河南工业大学、中原工学院成立“绿色建造评价联盟”,统一碳排放测算课程考核标准,共享中铁装备集团提供的盾构机操作仿真资源,未来将对接长江经济带产教联盟,推动中部绿色技能徽章与长三角企业互认。C学院(京津冀协同)规划联合天津医科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组建“生物医药校际评价中心”,建立京津冀GMP实训基地互访机制,联盟内企业评价结果通用。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京津冀到中部地区,高校从制度重组核心、信号强化载体到扩展网络连接范

围等方面推动学业评价体系逐步枢纽化。从表5也可以看出产业学院是制度重组的重要抓手,数字徽章是信号强化的载体,网络连接范围当前还局限于所在区域。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完善,数字徽章应用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广,网络连接的区域也会越来越大,学业评价体系也会走出当前相对封闭的状态,向枢纽化转变,成为人才供需的连接器。

五、结语：重构场域，啮合系统

从“绩点”到“枢纽”的转型,不仅是学业评价内容、技术和方法的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学业评价体系整体结构与功能的变革。其实质是将原本封闭、内卷的教育评价场域,重构为一个开放、互联的教育资源再组织化过程。其核心任务是通过重构制度场域如建立联合认证委员会,调整评价权力分配、增强信号效度如引入技能徽章,提升能力信息透明度,以及扩展网络边界构建校际评价联盟,提升资源整合半径,最终实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系统与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产业系统之间在评价层面的深度“啮合”。

参考文献：

[1]Dimaggio P J, Powell W W.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

tional field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2): 147-160.
[2]丁华.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大学生学业评价改革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 2021(5): 72-76.
[3]杜根远, 曹玉松, 岳修峰. 基于数据驱动的大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1): 79-89.
[4]Spence M. Job market signal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87(3): 355-373.
[5]Bills D B. The sociology of stratification and educ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3, 29(1): 455-471.
[6]郭玉婷, 郭大光. 重新认识学分制和绩点制的本质与功能[J].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44(23): 1-9.
[7]陈涛, 李点石, 李佳丽. 大学生学业内卷感知的测量及检验:兼论新时代学生评价改革的微观转向[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5, 24(2): 101-113.
[8]Contreras F. From pipelines to platforms: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as network hubs in region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J]. Research Policy, 2020, 49(8).
[9]宋晔, 孟萌. 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本土化专业学习共同体实践重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1(5): 136-143.

(责任编辑 许峻)

From Closure to Openness: A Study on the Hub-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Based on Four Case Universities

HU Yu^{1,2}

- (1. School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ehind curren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lies the functional malfunction of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e core cause is the low hub-orientation level of existing university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Three major factors account for the insufficient hub-orientation of such systems. First, path dependence under the credit system creates high barriers for enterprise standards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university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Second, the signaling effect of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has declined in the technical labor market. Third, the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 features a limited effective radius for integrating external resources.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hub-orientation practices of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at four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loca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Central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hub-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assessment system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Keywords: hub-orientation; academic assessment; transformation

以赛促改框架下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模式转型的实践路径

熊锡成¹, 李 敏²

(河南工程学院 1.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2. 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以“以赛促改”为核心理念,系统分析了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模式转型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在机制层面,学科竞赛通过能力本位转化机制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以问题导向倒逼机制推动课程内容动态更新,借助激励机制激发师生内生动力;在路径层面,通过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模式迭代、师资能力建设和评价体系创新四条路径,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的根本转变。通过赛教深度融合、资源普惠转化和制度协同保障,能够构建课堂、竞赛、实践互促共进的育人新生态,为新时代高校课堂教学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参照。

关键词:学科竞赛;课堂教学改革;以赛促改;教学模式转型;实践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104-07

近年来,从“挑战杯”到“互联网+”,从基础学科竞赛到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学科竞赛已成为高校培育拔尖创新人才、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与平台。然而,学科竞赛与课堂教学长期存在分离困境,竞赛训练与日常课程相互脱节,竞赛成果与优质资源难以转化为常态化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块^[1]。竞赛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学生,受选拔机制、实训设备等条件限制,多数普通学生难以参与其中,背离了“以赛促学”的普惠育人初衷。高校课堂教学仍普遍存在多学科协同融合不足、教学内容与工程实践衔接不畅、教学方法模式单一等突出问题。

这种赛教分离的现状,折射出人才培养层面两个深层次核心问题:学科竞赛应如何深度融入人才培养主渠道,课堂教学又能否依托竞赛资源实现提质革新。针对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以赛促改”育人理念,强调依托学科竞赛倒逼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推动教学体系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2]。在该

理念指引下,国内诸多高校纷纷以学科竞赛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教学改革实践路径。例如,昆明理工大学将学科竞赛全面纳入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构建起覆盖校级、省级、国家级的多层次学科竞赛培育平台^[3]。但是,从“以赛促改”理念落地到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质性转型,目前仍缺乏系统完善的理论支撑与可落地、可推广的实践框架。

一、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改革的机制分析

(一)能力转化,破除壁垒

传统课堂教学以知识传授为核心,依托固有学科逻辑梳理教学内容,形成了体系固化的课程教学模式。而学科竞赛的核心考核目标,是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竞赛考核需求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之间的适配性矛盾,催生了能力本位转化机制。该机制能够将竞赛所需的综合能力结构反向赋能、回流融入课堂教学,推动课程设置从传统的学科本位逐步转向能力本位。

收稿日期:2026-06-17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工程学院产教融合研究指导项目“以学科竞赛为抓手,引领教师主动对接企业,师生积极互动变革课堂教学”(2024XYJ22)

作者简介:熊锡成(1972—),男,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计算光子学、光电子器件设计。

在具体育人实践中,这一机制形成了“课堂教学培育、竞赛实训淬炼、成果反哺教学”的良性闭环。课项赛协同教学模式可实现“课程教学、项目训练与竞赛实践的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完成竞赛任务的过程中,实现专业知识的深度应用与拓展”^[4]。该闭环模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的线性教学范式,让课堂教学突破封闭的理论知识体系,对接真实、综合的实践能力培养要求。

能力本位转化机制的核心要义,是将竞赛承载的综合能力要求系统性转化为课堂教学的目标体系与内容框架。竞赛重点考察的问题意识、创新思维、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正是传统课堂教学的薄弱环节。将上述能力要素系统性嵌入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实现教学重心从单一知识传授向综合能力培育转变,是该机制的核心育人价值。

(二)问题倒逼,动态更新

学科竞赛多以开放性、综合性复杂问题为载体,命题素材多源于行业前沿技术、产业技术瓶颈与社会热点需求,具备极强的真实性、实践性与时效性。反观传统课堂教学,教材内容更新周期较长,教学内容迭代滞后,难以适配行业发展与时代需求。问题导向倒逼机制以竞赛命题为重要标尺,倒逼课程内容持续迭代、动态优化,精准对接行业发展前沿。

昆明理工大学依托学科竞赛推进育人模式创新,实现了课程内容的动态更新:将竞赛优秀案例、创新成果融入日常课堂教学,推动课程内容与行业前沿深度融合^[3]。这种竞赛导向的课程更新机制,有效破解了传统课堂教学内容滞后、与产业脱节的痛点。以竞赛需求与行业发展为双重导向动态更新课程内容,构建竞赛赋能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有效锤炼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5]。

(三)激励内生,激活师生

学科竞赛能够持续驱动课堂教学改革,核心在于构建了覆盖师生双向的长效激励机制,从学生、教师两个维度激活育人主体活力。

从学生层面来看,竞赛成果与学分认定、评奖评优、升学就业等发展资源直接挂钩,形成了有效的外部激励。更为关键的是,学科竞赛为学生搭建了课堂教学之外的实践成长平台。学生在竞赛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应用经验、团队协作阅历与实践成就感,能够转化为持久的自主学习内驱力,有效提升其课堂学习的投入度、积极性与主动性。

从教师层面来看,竞赛指导为教师开展教学改革提供了全新载体与实践路径。“以赛促教”的核心,是依托竞赛平台助力教师提升教育教学综合能

力,为教师开展教学创新、尝试教改新模式提供重要支撑^[6]。当教师在竞赛指导过程中获得专业成长、教学突破的实效与成就感时,其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认同感、参与主动性将显著提升,实现从“被动整改”到“主动革新”的心态与行为转变。

三大机制相互嵌套、协同赋能:能力转化机制明确教学改革的核心方向,问题倒逼机制保障教学改革的动态适配性,激励机制为教学改革注入长效内生动力,三者联动形成了“以赛促改”的完整内在逻辑闭环。

二、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模式转型的实践路径

(一)课程重构,赛教联动

传统课程体系以单一学科知识逻辑为构建依据,各课程边界清晰、交叉联动不足,形成了碎片化的教学格局。而学科竞赛侧重考查学生跨学科综合应用、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直接凸显出传统学科分割式课程体系的固有弊端。因此,重构课程体系是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转型的首要核心环节。

课程体系重构的核心方向,是突破传统学科逻辑,转向能力培养逻辑,搭建赛教联动、创新赋能的新型课程体系^[5]。一是打破学科壁垒,推进课程内容交叉融合。以各类学科竞赛项目为载体,整合多学科碎片化知识点,搭建模块化、综合性教学内容体系。例如,在能源类竞赛育人实践中,可将能源、冶金、化工、软件工程等多学科知识融入统一教学单元,实现知识的跨界融合应用^[3]。二是搭建分层递进的竞赛教学梯队。通过基础层、综合层、创新层的三级分层教学设计^[7],精准适配不同基础、不同能力层级学生的学习需求,推动竞赛资源从少数尖子学生的专属竞技资源,转变为全体学生均可受益的普惠育人资源。三是推进竞赛成果常态化教学转化。将竞赛中的优秀设计方案、创新思路、典型实践案例进行规范化教学加工,有机嵌入对应课程日常教学,丰富课堂教学案例库与实践教学素材库。

赛教联动并非将竞赛题目简单照搬至课堂教学,而是实现竞赛育人逻辑与课堂教学逻辑在课程体系层面的深度耦合。课程设计需兼顾学科知识的系统性、竞赛任务的情境性与学生能力的进阶性,构建课程、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育人融合模式^[4]。

(二)模式迭代,项目驱动

课程体系重构解决“教什么”的核心问题,教学模式迭代则聚焦优化“怎么教”的关键问题。传统课堂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学生多处于被动接收知识的状态,难以实现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有效提升。学科竞赛的深度融入,为课堂教学模式创新迭

代提供了重要突破口。

以项目式学习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高度契合学科竞赛重实践、重探究、重创新的育人特点,是培育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依托项目式学习开展实验教学,能够有效锤炼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科学素养与科研思维^[8]。在竞赛赋能的育人场景下,课堂教学彻底打破传统知识单向传递的范式,转型为以真实项目为载体、以复杂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式自主学习过程。教师的角色从单一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习引导者与项目指导者;学生则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转变为问题探究者、方案设计者与创新实践者。

在具体实践中,教学模式迭代可从三条路径推进。第一,任务项目化拆解,将复杂竞赛任务拆解为适配课堂教学的阶段性生活项目,让学生在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同步夯实专业知识、锤炼实践技能。第二,课堂情境化赋能,在日常教学中融入竞赛开放性问题与挑战性创新任务,启发学生高阶思维,培育创新创造能力。第三,评价体系与竞赛化适配,引入竞赛成熟的评价体系与动态反馈机制,让学生在常态化课堂学习中沉浸式体验竞赛氛围,激发学习潜能。以学生为主体的项目化教学模式,可有效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与课堂参与度,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综合创新素养^[9]。

教学模式迭代并非完全摒弃传统知识讲授,而是在保留基础性知识教学的前提下,新增探究设计、团队协作、成果展示等多元化教学环节,让课堂真正成为锤炼学生综合能力、培育创新人才的核心阵地。

(三) 师资转型,双向转化

教师是教学改革落地的核心主体,是赛教融合育人的关键支撑。在“以赛促改、以赛促教”的育人框架下,教师需突破传统单一教学者的身份定位,转型为可实现竞赛资源与课堂教学资源双向转化、双向赋能的复合型育人主体。

师资转型对教师综合能力提出了三重核心要求。其一,专业竞赛指导能力。教师须熟练掌握各类学科竞赛的参赛规则、评分标准与备赛流程,具备系统化指导学生参赛、破解竞赛难题的专业素养与实践经验。其二,教学资源转化能力。教师能够精准挖掘竞赛中的优质育人元素,包括典型创新案例、共性重难点问题、前沿技术方法、新兴学科知识等,并将其优化改造为适配课堂教学的素材、案例与教学活动。其三,多方协同整合能力。教师可有效联动课程体系、竞赛项目实施与行业企业需求,搭建三者协同互通、深度融合的育人机制。强化教师

的专业教学能力与竞赛指导能力,是保障赛教联动落地见效的关键^[10]。

在院校制度保障层面,可构建全方位师资赋能体系。一是健全竞赛指导激励机制,将竞赛指导成果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与评优评价体系,激发教师参与赛教融合改革的主动性;二是搭建跨学科教师协作平台,打破学科壁垒,推动不同专业背景教师联合开展竞赛指导与教学改革创新;三是开展专项专题培训,精准提升教师竞赛资源教学转化的实操能力。依托学科竞赛、以能力本位转化机制构建赛教良性互动格局,离不开教师在资源转化、教学改革链条中的核心枢纽作用^[11]。

(四) 评价创新,过程嵌入

传统课堂教学评价以期末终结性考试成绩为核心依据,具备鲜明的结果导向特征,难以精准衡量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与学科竞赛倡导的多元化、综合性、过程性育人评价理念存在显著偏差。

教学评价创新的核心思路,是将竞赛先进的评价理念、多元评价方法深度嵌入课堂全过程,重构立体化课程评价体系。首先,对标竞赛标准优化考核维度。学科竞赛评分体系涵盖方案设计、实施过程、成果质量、团队协作、创新亮点等多个维度^[12],参照该多元评价框架优化课程考核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水平,弥补单一卷面考核的局限性。其次,提高过程性考核权重。将学生项目攻坚阶段性成果、调研分析报告、创新设计方案、实物模型制作、成果汇报展示等学习过程成果纳入考核体系,实现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最后,丰富多元评价主体。借鉴竞赛专家评审、同伴互评的评价模式^[13],在课堂评价中增设小组互评、学生自评环节,构建多主体、全方位的评价体系,提升评价结果的全面性、客观性与公正性。

构建融合竞赛元素的多元化课程考核体系,能够有效倒逼学生主动提升创新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14]。赛教融合式评价创新并非生硬照搬竞赛评价标准,而是深度吸纳竞赛育人评价的核心精髓,结合课堂教学规律与育人实际进行适配优化,让评价真正服务于学生综合能力的长效发展。

三、具体实施案例

河南工程学院以2024年11月举办的首届“河南工业软件创新大赛”为实践载体,积极探索学科竞赛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良性互动的育人路径,为高校深化赛教融合、推进产教协同育人提供了典型实践案例与有益借鉴。

(一)以学科竞赛为校企桥梁,推动产业前沿技术融入课程内容

该校依托首届“河南工业软件创新大赛”搭建校企联动平台,将企业真实项目需求、行业前沿技术成果融入赛事命题,推动竞赛场景、产业资源与课堂教学深度衔接,大力推进“课赛互嵌”教学改革,重构课堂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学校坚持以市场与产业需求为导向,践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育人理念,联动参赛企业发挥技术与设备优势,围绕竞赛命题涉及的前沿技术内容,为师生提供系统化专项技术培训。

其中,清华数为 DWF、鼎捷数智、阿里钉钉宜搭、用友软件等平台企业,结合竞赛应用场景与课堂教学实际需求,面向师生开展低代码开发技术分层培训,依据师生能力基础划分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培训层级,实现精准化、阶梯式能力培育;广联达、山大华天、中望软件等企业立足工业实际应用场景,依托自身核心技术优势,为参赛师生提供针对性、场景化的技术实训指导。

通过赛事命题设计与校企联合实操培训,师生清晰认知产业前沿技术与课堂教学内容的衔接关系及现存差距,进一步明晰教学优化方向与学生能力培养目标。赛事实践有效推动了课堂教学模式与产业前沿技术的精准对接,将产业创新要素、行业技术标准系统性融入人才培养全流程,为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路径。

(二)以学科竞赛为纽带,构建校企合作机制,双向赋能提质增效

学科竞赛为校企深度协同育人搭建了稳固纽带,推动校企共建合作机制、双向赋能育人体系,持续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实效。企业依托自身技术与产业优势,联动校内教师共同开发教学项目、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结合行业前沿技术共建特色课程体系,同时全程指导学生开展实践实训与学科竞赛,为学生提供真实场景下的生产性实训平台。在此过程中,授课教师能够精准把握产业技术前沿,查摆传统课程教学的短板与不足,依托竞赛真实项目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方案、完善学生学习培养路径。同时,教师主动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协助破解产业实际技术难题,有效夯实专业知识体系、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实现教学水平与专业素养的双向提升。校企双方以互利共赢为核心,构建深度交融、协同共进的育人共同体,形成企业、教师、学生三方受益的良性格局,达成校企双向赋能、协同育人的核心目标。

学科竞赛搭建起校企资源互通、优势互补的对接平台,让校企合作形成可持续的资源互补式依存关系。企业依托高校优质的智力资源、师资力量与学生储备,助力自身破解技术瓶颈、推广产业产品、储备创新型人才;高校借力企业前沿产业资源、技术资源与实践平台,动态更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模式,全方位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与学生实践能力。双方在深度合作中持续获取正向收益,主动加大资源投入,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校企双向赋能,倒逼双方建立长期稳定、常态化、制度化的深度合作机制。

(三)解构竞赛项目转化教学内容,融合理实教学提升课堂实效

在赛事育人过程中,企业通过赛事命题规范、专项技术培训、全过程赛事指导等方式,将一线工程经验、产业实操技术系统传递给师生。授课教师立足课堂教学需求,对竞赛核心项目进行系统性拆解重构,提炼关键技术要点,拆解形成模块化教学内容与标准化教学案例库。同时结合竞赛涉及的完整技术栈与工程问题场景,反向修订、优化对应课程的教学大纲与授课内容,保障课堂教学内容与产业技术迭代、行业发展潮流同步更新,彻底打破赛事“赛完即止、学完即忘”的短期育人弊端,构建“竞赛项目—技术提炼—资源转化—课堂应用”的闭环育人生态。课堂教学中,教师融合理论讲解与实操训练,依托优化后的模块化教学内容夯实学生理论基础,依托实验室平台指导学生开展实景实操训练,让学生深度厘清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的内在关联,有效锤炼创新思维与实操能力,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育人实效。

在首届“河南工业软件创新大赛”实践中,参赛指导教师针对清华数为 DWF、用友软件、鼎捷数智等主流竞赛平台的赛题内容进行深度解构,结合自身授课课程的教学定位、知识体系与育人特点,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设计、完善实践教学流程与考核要求,有效补齐了传统教学短板,显著提升了课程教学质量与实践育人水平。

(四)依托产业前沿技术定制竞赛项目,高效赋能课堂教学提质

企业立足产业一线,将前沿技术应用与真实业务场景转化为标准化竞赛项目,制定清晰的赛事规则与量化评价体系,为师生搭建起高仿真的工程实践情境。师生在备赛与参赛的实操过程中,沉浸式体验产业真实技术难题、行业设计规范与标准化操作流程,有效弥补传统课堂重理论、轻实操的育人短板。竞赛驱动的教学革新倒逼全方位教学优化:教师动态

调整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室迭代更新实训设备,学生开展跨学科协作组队攻关,课程评价体系同步引入行业企业标准,实现教学全链条适配产业发展需求。

竞赛项目自带的不确定性、资源约束与时间压力,高度贴合真实工程项目的实施特征,能够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内驱力。学生在攻坚克难、完成竞赛任务的过程中收获实践成就感,持续强化专业学习兴趣,形成“实践探索—能力提升—主动学习”的正向学习反馈。相较于传统教学改革模式,竞赛驱动的教学变革更具灵活性与针对性,紧密贴合产业发展实际与课堂教学实情,能够持续构建竞赛赋能教学、教学支撑竞赛的良性循环,显著提升课堂育人质量与人才培养实效。

在首届“河南工业软件创新大赛”中,中望软件依托真实工业应用场景,面向参赛师生开展机械部件设计软件专项培训,重点围绕三维零件机械制图、特色效果演示等实操内容进行系统化指导。通过沉浸式产业实操训练,师生直观明晰现有教材内容与当下工业生产实际的脱节问题。这一训练为课程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完善、学生学习目标校准提供了真实的产业参考依据,进一步助力课堂教学提质增效。

四、现阶段取得的育人成效

(一)明晰教学与产业之间的差距,双向激活育人主动性

企业通过深度参与赛事命题、赛事评审与技术指导,全面了解高校现有教学模式、课程体系与育人成效,其基于产业前沿需求设计的竞赛题目,能够精准倒逼高校教学方案、授课方式与实训内容迭代优化。同时,师生在备赛、参赛及校企联合实训过程中,清晰把握工业软件领域前沿技术发展趋势,精准认知自身知识储备、实践能力与企业岗位需求的差距,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改革方向与学生自主学习目标。校企师生多方育人主动性得到全面激活,推动人才培养体系持续适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稳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二)固化校企合作机制,明晰双向赋能实施路径

本次赛事实践为构建稳定、长效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成熟范式,进一步厘清了校企双向赋能、提质增效的具体实施路径。校企双方对各自核心育人需求形成清晰认知:企业依托高校智力资源、人才储备实现技术迭代与人才储备,高校依托企业产业资源、前沿技术实现教学提质与课程革新。基于互利共赢的核心导向,校企双方明确了资源互补、协同共建、长效合作的落地方案,为常态化产教融合、赛教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掌握赛教转化方法,优化实学融合教学体系

通过赛事全过程实践,高校逐步掌握了竞赛项目向产教融合教学资源转化的系统解构方法。依托竞赛项目拆解、技术要点提炼、场景案例迁移等方式,可将短期竞技赛事资源转化为具备长期教学价值、可落地、可复用的产教融合教学项目。同时,进一步明晰了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深度融合的改革路径,能够针对性优化课堂教学方案,有效培育适配工业软件产业发展需求、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四)精准遴选合作资源,夯实教改技术人才支撑

结合学校整体发展定位与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高校形成了规范化的竞赛合作资源遴选机制。通过精准筛选技术实力雄厚、产业资源优质的技术支持企业与竞赛平台,严格把控赛事命题的技术先进性、行业前沿性,同步规范校外行业专家、企业导师的准入标准与履职要求,能够为课堂教学改革、课程体系迭代、实践育人升级提供持续、专业的企业技术支撑与行业智力支持。

(五)落地新型教学方案,构建教改闭环保障体系

以赛事实践为抓手,高校持续推进新型赛教融合教学方案落地课堂、落地实训,通过全过程跟踪教学实施效果、观测学生综合能力成长成效,为后续教学体系优化、课程内容完善、育人模式升级积累了翔实的实践数据与案例支撑。同时,逐步建立健全教学改革激励制度与可落地、可执行的实施举措,全方位保障课堂教学改革举措常态化落地、长效化见效。

(六)树立典型示范标杆,营造全域教改育人氛围

针对在课堂教学改革、赛教融合育人中成效显著的优秀教师、教学团队,以及提供优质技术支撑、育人服务的合作企业与平台,探索建立多元化激励机制,通过物质奖励、荣誉表彰、成果推介等方式树立典型标杆。积极推广可复制、可迁移的赛教融合教改经验,以单点突破带动全域提升,以典型示范引领整体优化,在校内形成主动深耕教学改革、聚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良好育人氛围。

(七)深化育人认知,实现赛教融合长效育人价值

总结本次赛事实践经验可以发现,将学科竞赛项目系统性转化为产教融合育人项目,本质上是将短期竞技赛事活动升级为常态化、可持续的赛教融合育人生态。赛事通过创设真实工业应用场景、整合碎片化学科知识、搭建沉浸式实践平台等方式,系统锤炼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河南工业软件创新大赛的实践充分证明,当竞赛资源深度嵌入课程体系迭代、实验室建设升级、师资队伍发展全

过程时,能够持续培育出理论功底扎实、工程实践能力突出、创新素养优良的高素质工业软件人才,真正落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深层育人价值。

五、政策建议

(一)优化学校制度设计,提升教改落地性与可操作性

高校需细化完善教学改革配套制度体系,强化制度的针对性与落地实效。一是细化各专业人才培养定位,明确差异化育人目标,构建可量化、可考核的人才培养评价指标,让教学改革有据可依。二是厘清教学改革权责主体,明确课堂教学变革的统筹层级,界定校级教务部门与二级学院的职责边界,统一改革实施标准,为一线教师开展教改实践提供清晰指引。三是建立容错激励机制,在契合国家教育方针与育人底线的前提下,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改革、赛教融合实践中的非原则性失误,制定容错免责与减负措施,充分保护和调动教师投身教学创新的积极性。四是完善校企协同考核机制,明确企业、技术平台参与校内教学指导、赛事支撑、实训授课的职责标准与考核评价体系,多措并举激励师生主动参与学科竞赛与实践育人活动。

(二)明晰竞赛命题、人才培养与企业支持的耦合关系

立足产业前沿设计的学科竞赛命题,能够精准检验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创新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直观暴露了传统课堂“重理论、轻实践”的育人短板,为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迭代、实践模式革新指明了改革方向。企业通过赛事命题,将产业真实技术难题、一线业务场景与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精准传递至高校育人环节,推动人才培养、教学创新深度贴合产业发展实际需求。

竞赛命题本质上是校企资源互通、价值共生的核心载体。企业命题是产业需求、技术资源与应用场景的投入,高校解题是师资力量、教学资源与人才储备的输出,学校赛事育人成效与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决定企业后续合作意愿与资源投入力度。能够持续产出优质创新方案、培育高素质人才的高校,将成为企业优先合作的核心对象,而企业的深度赋能又能进一步倒逼高校教学提质,形成“企业赋能教改、教改培育人才、人才反哺产业”的正向循环。因此,高校在赛事筹备与命题设计阶段,应主动联动企业协同共建赛事题库,以提质育人、服务产业为共同目标,以竞赛命题为核心纽带,构建校企价值共生体系,实现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企业依托竞赛命题,将前沿、复杂的产业技术转化为适配学生认知水平、可落地实操的竞赛任务,同时依托自有技术平台完成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学生赛事作答表现能够直观反映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差距,为高校动态调整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模式提供精准依据。竞赛命题承载着校企双方的资源投入、责任分工与效益预期,高校需清晰界定校企合作边界,明确企业命题研发、技术支撑、场景供给的投入标准,规范高校竞赛成果转化、教学资源迭代的实施路径,构建双向促进、资源共享、长效稳定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学科竞赛命题是衔接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产业发展的核心枢纽,命题质量直接决定“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育人成效。清晰界定竞赛命题、人才培养与企业支持三者间的耦合关系,是打造高质量学科竞赛、落实赛教融合育人的制度基础与重要前提。

(三)深化竞赛制度建设与激励机制的政策研究

学科竞赛制度体系建设与多元激励机制构建,是保障赛教融合长效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为规范学科竞赛有序开展,保障赛事的专业性、竞争性与公信力,需立足学校办学定位与育人实际,优化完善赛事管理制度、过程监管制度与多元激励制度,精准调动教师、学生、企业三方主体的参与积极性。通过系统化制度建设,确保教师投入有回报、学生参与有收获、企业赋能有成效,依托清晰规范的制度体系凝聚育人合力,持续推进人才培养质量迭代升级,构建赛教融合、产教协同的可持续育人生态。

六、结语

本文构建的“以赛促改”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学科竞赛驱动课堂教学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论证了赛教深度融合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学科竞赛能够成为撬动课堂教学变革的重要抓手,核心在于其激活了能力转化、问题倒逼、内生激励三大联动机制,构筑了从竞赛实践到课堂革新的完整动力传导链条。在实践落地层面,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模式迭代、师资队伍转型、评价体系创新四条路径互为支撑、协同发力,有效推动高校课堂教学从传统的知识灌输范式,转向适配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培育范式。面向未来,高校需持续深化赛教融合改革:在制度层面完善竞赛与课堂教学的协同联动机制,在实践层面深耕赛教融合案例挖掘与经验提炼,在理论层面搭建更为系统、完善的“以赛促改”研究框架。通过多维发力、层层递进,充分释放学科竞赛的育人赋能价值,推

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持续革新,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谢旋,罗威,李彪,等. 竞赛驱动、教赛融合的基础力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J]. 科技视界,2022(13):78-80.

[2] 彭尧,戴璐,刘红光,等.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模式下“木结构设计竞赛”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 中国林业教育,2026,44(2):73-77.

[3] 昆明理工大学. 以学科竞赛驱动育人模式创新[N]. 光明日报,2026-03-17.

[4] 邴杰,贾锦涵. 创造性解决问题模式在生物学科创竞赛中的实施策略研究[J]. 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2025,15(2):54-59.

[5] 王月海,王伟宾,王景中. 竞赛驱动的地方高校电子信息类实践教学体系建设[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5(12).

[6] 陈秉岩,单鸣雷,刘翠红,等. 基于产学研和学科竞赛的物理科技创新教育探索[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11(10).

[7] 胡晓茹,王晶,秦羽,等. “教学做合一”视域下多层级学

科竞赛体系建构与实践[J]. 中国冶金教育,2025(4).

[8] 倪晨,李渔迎,方恺,等. 学科竞赛视角下项目式实验教学的研究:以第三届“卓越杯”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为例[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22,41(8):4-16.

[9] 田书建,李重阳,王台. 基于学科竞赛的新工科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探究[J]. 创新与创业教育,2026(1).

[10] 李莎楠,叶任泽. 产业学院背景下“教、赛、产”互动的工科人才培养机制研究[J]. 产业创新研究,2021(13).

[11] 董媛媛,李天泽,张晓晨,等. 学科竞赛赋能新工科背景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J]. 教育进展,2026(2).

[12] 张勇. 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与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的教赛融合模式探索与实践[J]. 物理实验,2025(6).

[13] 赵小刚,王峰,汪鼎文,等. 以学科竞赛为抓手的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研究[C]//2020 年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大会论文集. 2020:46-50.

[14] 张静. 基于“汽车电气与电子技术”课程“教赛融通”教学改革实践研究[J]. 汽车维修技师,2026(4):71-72.

(责任编辑 许峻)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s
Driven by Discipline-Based Competit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Competitions

XIONG Xicheng¹, LI Min²

(1. School of Electrical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2.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aking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competitions" as its core concep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s driven by discipline-based competitions. At the mechanism level, discipline-based competitions break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arriers via a competency-oriente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dvance the dynamic updating of course content under the problem-driven mechanism, and stimulat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incentive mechanisms. At the practical-path level, four measures including curriculum system reconstruction, teaching model iteration, teacher capacity building and evaluation-system innovation bring about a fundamental shift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competency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teaching, inclusive transformation of competition resources, and coordinat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a new mutually-promoting educational ecosystem integrat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 competitions and practice can be established. It offers operabl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discipline-based competitions;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promoting reform through competitions; teaching model transformation; practical pathways

双融驱动下食品化学智慧课程构建与实施路径探索

宋彦显,王丽敏,杨红艳,张小梅,刘从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食品与健康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为落实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育人理念,破解食品化学课程教学内容滞后、实践薄弱、数字化应用浅层化等问题,以智慧教育技术为支撑,构建双融驱动下食品化学智慧课程体系与全流程实施路径。明确课程定位,搭建“核心理论+科研前沿+产业实践”内容体系,建设分层数字资源,构建多元考核评价机制与双融型教学团队,形成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一体化实施模式。该模式可有效衔接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全面提升学生科研素养与实践能力,为食品类专业基础课程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科教融合;产教融合;食品化学;智慧课程;课程构建;实施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8

中图分类号:G642.3;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110-06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持续推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已成为新时代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遵循,更是推动高等教育与科研创新、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的关键举措^[1]。食品化学作为食品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聚焦食品组分结构、理化性质、加工变化及品质调控等核心内容,是连接食品专业基础理论与科研实践、产业生产的关键桥梁。传统食品化学课程教学模式相对封闭,教学内容以教材经典理论为主,难以同步跟进学科前沿动态与产业新技术;实践教学受场地、设备、安全条件等因素限制,教学内容与食品工业化生产应用技术、实际工艺脱节严重;教学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多为被动接受知识,缺乏探究式学习与创新思维专项训练;数字化教学多停留在课件上传、简单习题测试等浅层应用,未能真正实现智能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存在明显的“数字化与教学内容两张皮”现象^[2]。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人工智能与智慧教学手段为食品化学课程改革开辟了新路径^[3]。借助智慧化教学平台可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有效整合科研与产业优质资源,为双融育人理念落地

落实提供高效支撑。

一、双融驱动下食品化学智慧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一)落实双融育人理念的必然要求

科教融合的核心内涵在于科研反哺教学,即将高校前沿科研成果、科研方法、科研思维与创新训练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向主动探究问题,着力培育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4],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推动教学与产业实际需求精准对接,将产业岗位实际需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供给^[5],作为衔接高等教育与食品产业的重要纽带,产教融合重在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岗位适配能力。

传统食品化学课程教学模式相对封闭固化,校内课堂教学与校外科研实践、产业生产场景严重脱节,难以有效整合高校科研资源与行业产业资源,致使双融育人理念流于形式、无法落地见效。构建双融驱动下的食品化学智慧课程体系,可依托数字化教学平台搭建科教互通、产教衔接的高效育人桥梁,将科研创新训练与产业实践能力培养贯穿课程教学

收稿日期:2026-05-17

作者简介:宋彦显(197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食品与健康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天然产物与功能食品。

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科研素养培育与实践能力提升的协同共进,真正落地“以研促教、以产助教”的育人核心目标。

(二) 破解传统课程教学痛点的关键路径

当前,传统食品化学教学存在四大突出痛点:一是教学内容更新滞后。课程内容多以教材经典理论为主,对蛋白质糖基化改性、蛋白凝胶功能调控等学科前沿内容涉猎较少,与脉冲电场杀菌等食品产业新兴技术存在明显脱节。二是实践教学开展受限。受场地、设备、安全管理等客观条件制约,课程难以开展工业化实景实践教学,导致学生无法建立理论知识与产业实际生产之间的有效衔接。三是教学方式单一固化。课堂以灌输式理论讲授为主,缺少探究式、项目式等多元化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培养。四是数字化应用流于浅层。多数课程仅完成课件上传、习题布置等基础操作,缺乏系统化数字资源体系与个性化教学设计,智能教学技术的赋能价值未能充分发挥^[6]。双融驱动下的食品化学智慧课程,可通过重构课程教学内容、搭建系统化数字资源、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课程评价机制等多措并举,精准破解传统教学短板和痛点,全面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与人才培养成效。

(三) 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选择

教育数字化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提升课程教学效率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核心抓手^[7]。智慧课程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依托智慧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可实现教学内容可视化、学习过程个性化、教学管理精准化、教学评价数据化。针对食品化学课程而言,数字技术可将抽象晦涩的食品分子结构、化学反应机理等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虚拟仿真资源,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线上智慧教学平台可实现课前、课中、课后全教学流程闭环跟踪管理;大数据分析技术则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为教师精准化教学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建设食品化学智慧课程是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升课程教学现代化水平的必然选择,依托知识图谱、虚拟仿真、AI助教等智能化教学工具,可真正实现食品化学课程教学的可视化、个性化与精准化升级^[8]。

(四) 契合食品产业人才需求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食品产业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功能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行业对食品专业人才的需求结构已从传统“理论型人才”转变为“科研+实践复合型人才”,要求从业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突出的科研创新能力、过硬的工程实践能

力与良好的岗位适配能力^[9]。食品化学作为食品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关乎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成效。双融驱动下的食品化学智慧课程深度整合科研资源与产业资源,将理论教学、科研训练与产业实践有机融合,能够精准对接食品产业人才培养需求,培育出懂理论、善科研、能实践、适配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食品专业人才,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二、双融驱动下的食品化学智慧课程构建

(一) 课程构建总体思路

双融驱动下的食品化学智慧课程,以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为根本导向,以智慧教育技术为支撑载体,以提升食品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最终目标。课程建设旨在打破传统课堂边界、打通各类资源壁垒,深度整合高校优质科研资源、食品企业产业资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理论筑基、科研赋能、产业适配、数字支撑”四位一体的现代化课程育人体系。课程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育人理念,将理论知识传授、科研素养培养、产业实践训练与创新能力提升有机融合,实现教学内容、数字资源、评价模式、师资队伍的全方位重构与优化升级。该建设模式可将双融育人理念从宏观政策导向出发,落地为可操作、可实施、可评价、可推广的标准化教学范式,能够显著提升食品化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与综合育人效能,为学生后续专业学习、科研创新实践与长远职业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二) 课程构建基本原则

1. 双融引领,统筹协调

课程始终以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为核心引领,统筹整合高校科研资源、教学资源与食品产业资源、岗位资源,推动各类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在教学内容优化、数字资源建设、教学组织实施、考核评价等全教学环节深度融入科研创新元素与产业实践元素,杜绝科研、产业与教学脱节问题,有效规避数字化技术与教学内容“两张皮”现象,确保课程建设方向与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高度契合。

2. 学生为本,能力为先

立足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与食品专业人才培养核心定位,摒弃传统“填鸭式、知识灌输式”教学模式,聚焦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工程实践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产业岗位适配能力的系统化培育^[10]。在课程整体设计中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大力推行探究式、互动式、个性化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自主探究、躬身实践,全方位提升综合素养。

3. 数字赋能,务实创新

依托智慧教学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大数据分析、机理动画演示等数字化教学手段,针对传统教学痛点开展针对性教学创新设计,摒弃技术堆砌、形式化和数字化建设等问题。始终以教学实效性、落地可操作性为核心准则,让数字化技术真正赋能课堂教学、助力学生成长、服务课程育人核心目标^[7]。

4. 动态优化,持续完善

紧跟食品学科科研前沿、食品产业技术迭代以及教育数字化改革发展趋势,建立课程内容、数字资源、教学模式、评价机制的动态更新与长效优化机制。定期更新补充前沿科研成果、典型产业案例、新型加工技术与工艺,保障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实用性与时代性,实现课程体系的长效运行、迭代升级与持续完善^[3]。

(三) 双融导向的智慧课程核心模块

1. 课程内容体系构建

立足食品化学核心知识模块,紧扣双融育人核心要求,打破传统教材内容单一、更新滞后的局限,构建“核心理论+科研前沿+产业实践”三层级一体化课程内容体系,实现理论深度、科研高度与产业温度的有机融合,为学生搭建从课堂到科研、从校园到产业的完整知识与能力链路。

在核心理论层面,重点夯实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维生素、酶、色素等食品基础组分的分子结构、理化性质、动态变化规律及品质调控机制,筑牢学生专业理论根基,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科研实践与产业应用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在科研前沿层面,将蛋白质糖基化改性、蛋白凝胶功能特性调控、油脂氧化机理与天然抗氧化剂筛选、酶抑制剂及抑制动力学、食品加工非酶褐变控制、食品体系稳定性调控等科研热点与前沿成果系统融入课堂教学。结合教师在研科研项目,拆解实验设计、样品制备、仪器分析、数据处理、结果剖析、论文撰写等全链条科研流程,将前沿科研思维与规范科研方法渗透至各核心知识点,系统性培育学生的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

在产业实践层面,依托教师科技特派员驻企一线实践经验,深度挖掘食用植物油抗氧化剂复配应用、焙烤食品色泽与风味调控、肉制品蛋白凝胶品质优化、蛋白饮料稳定体系构建、果蔬保鲜与酶促褐变防控、方便食品品质改良等典型产业场景案例。系统讲解食品加工过程中组分变化规律、品质劣变机制及精准防控技术,将企业生产标准、质量管控要点、岗位核心技能、行业规范准则深度嵌入知识点教

学,实现理论知识与产业实际应用的无缝对接,有效提升课程实用性与学生岗位适配性。

2. 分层数字资源构建

围绕双融育人核心目标,搭建“基础通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三类互联互通、开放共享、动态迭代的数字化资源库,实现教学资源精准供给与高效复用,为全流程智慧教学落地实施提供坚实资源保障。

基础通用资源涵盖课程微课视频、核心知识点课件、章节配套习题、基础实验操作规范、原理动画演示、重难点专项解析等内容,全面覆盖课堂教学、课前预习、课后巩固等基础教学场景,助力学生扎实掌握课程核心理论知识。

科教融合资源包含科研典型案例库、微观反应机理动画、虚拟仿真实验素材、学科前沿文献导读、科研数据分析实操指南、科研项目拆解系列教学案例等内容,帮助学生具象化理解抽象科研原理,熟练掌握基础科研方法,逐步养成良好的科研思维与创新意识。

产教融合资源整合食品企业品质管控标准、行业操作规范、岗位核心技能要求、真实生产案例、产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等优质素材,搭建“课堂与车间、理论与实践、校园与企业”零距离衔接的资源育人体系,让学生沉浸式感知真实产业生产场景,明晰行业岗位需求。

3. 多元考核评价体系构建

打破传统单一期末笔试的固化考核模式,构建契合双融育人理念、兼顾过程与结果、融合量化与质性评价的全过程多元考核机制,实现“教-学-评”一体化闭环育人管理,全面、客观、精准评判学生的学习成效与综合能力^[10]。

本课程设置过程性考核占比70%、终结性考核占比30%,突出能力导向与过程育人导向。其中,过程性考核包含四大维度:一是理论知识掌握(20%),通过线上章节测试、课堂随堂检测、课后作业完成质量,综合检验学生核心知识点掌握扎实度;二是科研素养(20%),依托文献阅读心得、科研小探究报告、实验方案设计、数据分析与讨论、科研成果汇报等成果,评价学生科研思维与创新实践能力;三是产业实践能力(15%),通过产业案例深度分析报告、岗位模拟任务完成质量、实践总结复盘材料,考核学生产业知识应用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四是学习过程表现(15%),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大数据,自动采集线上学习时长、课堂互动参与、主题讨论发言、任务完成及时性等数据,客观反映学生的学习态

度与投入程度。终结性考核采用闭卷或开卷形式,重点考查学生综合知识运用、核心理论体系理解与复杂问题系统分析能力。

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实现考核数据自动采集、精准分析、实时反馈与永久留存,保障考核过程透明规范、评价结果公正客观、教学反馈高效及时,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诊断、激励、导向与赋能作用,倒逼学生主动开展自主学习、全面提升综合专业能力。

4. 双融型教学团队构建

组建兼具专业科研能力、一线产业实践经验与数字化教学能力的结构化双融型教学团队,实现科研、产业、教学、数字技术等多维度协同赋能,为课程高质量建设、常态化落地与持续性优化提供稳固人力支撑^[11]。

团队实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结构化运行模式:课程专任教师负责课程整体框架设计、常态化教学组织实施与学情动态分析;科研骨干教师牵头负责科研前沿内容融入、科研方法体系传授与学生创新思维引导;具备科技特派员驻企经历的教师负责产业案例挖掘开发、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校企资源对接与产业实操内容讲解;数字化教学专项教师负责智慧教学平台运维、特色数字资源制作、虚拟仿真项目开发与教学技术保障。

建立团队常态化能力提升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参与学科科研前沿研讨会、食品产业技术交流会、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课程改革建设研讨等专项活动,持续更新教师教学理念、知识结构与教学技能,全力打造一支“善科研、懂产业、精教学、通技术”的高水平双融型教学团队,筑牢课程育人核心师资保障。

三、双融驱动下食品化学智慧课程实施路径

(一)课前:线上智慧导学,精准诊断

1. 精准导学,资源赋能

教师课前依托智慧教学平台推送核心知识点微课、教学课件及基础预习任务单,借助智能学伴为学生提供个性化预习引导、疑问即时答疑与精准学习路径推荐。同时配套推送科研预习素材(前沿文献导读、关键机理示意图、简化实验设计思路)与产业预习案例(典型食品品质缺陷分析、加工工艺调控关键节点),引导学生在自主夯实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前感知学科前沿与产业实际场景,实现课前深度学习与前置探究。

2. 数据诊断,学情画像

学生完成线上自测与预习反馈后,系统可自动完成阅卷批改与大数据分析,快速生成科学化学情

诊断报告,精准识别学生在核心概念认知、理论逻辑梳理、产业应用落地三个维度的知识短板与能力薄弱点,形成全方位、可视化的学生学情画像,为精准教学提供数据支撑。

3. 定教优化,靶向设计

教师依托平台学情数据,精准定位班级共性问题与学生个性化学习痛点,靶向优化课堂教学方案与授课设计,构建“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精准教学范式,有效规避传统教学的盲目性,显著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高效性与实效性。

(二)课中:线下深度教学,探究与互动

1. 靶向精讲,融贯三维内容

教师基于课前学情诊断结果,针对学生知识薄弱点开展重难点靶向精讲,将抽象的食品化学反应机理、学科前沿科研原理与产业核心技术要点拆解融入课堂知识点讲授全过程,实现理论深度、科研高度与产业温度的有机统一,使学生在夯实核心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同步掌握科学科研思维方法与产业落地应用逻辑。

2. 多元探究,聚焦能力赋能

通过小组专题研讨、科研模拟实验、产业真实问题思辨、典型生产案例复盘、课堂互动答题等多元化教学形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合作探究、交流表达,系统性培育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团队协作能力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落实“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理念。

3. 数字赋能,打造沉浸课堂

依托智慧教学平台与智能学伴工具,开展实时问答、随机点名、弹幕互动、反应机理可视化动画演示、虚拟仿真实验展示等沉浸式课堂教学活动,全面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性、互动性与趣味性。有效破解传统教学中抽象机理晦涩难懂、实操实验条件受限等教学痛点,推动课堂教学从单一“知识传递”向“思维进阶、能力提升”的根本性转变。

4. 双融浸润,实现实景育人

课堂教学过程中有机融入企业真实生产案例、教师在研科研项目成果、科技特派员驻企一线实践案例,让学生在真实的科研场景与产业场景中理解知识、活用知识,打通“课堂—科研—产业”一体化育人链路,切实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获得感、专业认同感与行业职业使命感。

(三)课后:线上拓展巩固,个性化提升

1. 精准辅导,分层提升

教师依托全流程学情数据,开展针对性答疑解惑与个性化精准辅导,面向不同学情层次的学生推送差

异化巩固习题、拓展学习资源与专属学习指导方案。同时,智能学伴持续为学生提供错题复盘、薄弱知识点巩固、拓展学习推荐、自主探究辅助等智能化服务,落实“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保障不同基础的学生均可稳步提升,实现个性化成长与差异化发展。

2. 拓展探究,双融延伸

以小组协作探究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开展课后科研课题探究、创新实践训练与产业项目拓展学习,推动课堂理论知识与学科科研前沿、食品产业实际需求深度融合。支持学生深度参与教师在研科研项目、企业横向研究课题与科技特派员产业服务项目,在真实的科研与产业实践场景中锤炼科研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与岗位适配能力,助力学生实现从被动“学会知识”到主动“会用知识、勇于创新”的能力跃升。

3. 多元评价,持续优化

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完善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深度融合的多元化考核体系,结合学生线上学习数据、课后作业完成质量、小组探究项目成果、产业实践报告、课堂综合表现等多维度指标,全面、客观、系统地评价学生的综合学习成效。同时常态化收集学生课程学习反馈与教学建议,动态优化课程内容设计、数字资源配置与课堂教学实施模式,推动课程体系持续迭代升级,保障课程高质量、长效化运行。

(四)精准考核评价,闭环管理、以评促教促学

将考核评价机制深度嵌入课程教学全流程,构建过程可追踪、数据可采集、结果可量化、改进可落地的闭环育人管理体系。依托智慧教学平台,全自动采集学生线上学习时长、课堂互动参与度、课后任务完成质量、科研与产业探究报告成效、实践综合表现等全过程学情数据,严格依据多元考核评价体系核算学生综合成绩,及时向学生推送评价结果、得分明细与针对性改进提升建议。教师依托海量学情评价数据,全面复盘整体教学成效,精准查摆教学短板,靶向优化教学内容、数字资源供给、课堂教学方法与课程实施策略,推动教学质量持续迭代提升。全过程立体化评价模式兼顾学习结果与成长过程,更加注重学生阶段性能力提升与素养发展,能够有效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反向倒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切实保障双融驱动下智慧课程的育人目标落地见效。

四、结语

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为新时代高校食品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指明了核心方向,教育数字化背景下的

智慧课程建设,为双融育人理念落地生根、提质增效提供了有效实施路径与坚实技术支撑。食品化学是食品类专业的核心基础性课程,双融驱动下的智慧课程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课程建设需始终坚守双融育人核心导向,紧扣传统教学突出痛点与食品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持续优化课程内容体系、完善分层数字化资源库、创新全流程教学实施模式、夯实双融型师资队伍、健全全过程多元评价机制,实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数字化技术与课程教学的全方位、深层次融合。通过科学系统的课程重构与一体化教学实施,可有效破解传统食品化学教学内容更新滞后、实践教学薄弱、教学模式单一、数字化应用浅层化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课程教学质量与综合育人效能,着力培养适配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食品专业人才,同时为国内高校食品类相关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1]方玮.基于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的“高等分离工程”课程教学改革和实践:以专业硕士培养为例[J].教学研究,2026,49(4):143-145.

[2]王志兵,王红蕾,杨国程,等.“金课”建设背景下食品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J].教育观察,2021,33(10):95-99.

[3]秦亚楠,陆静,周升阳,等.人工智能赋能食品化学智慧课程建设策略探索[J].科技视界,2025(9):94-97.

[4]张静,童莉莉,陈光巨.人工智能驱动科教产融合的创新路径与生态构建[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10).

[5]柳铭钰,苏玉刚.产教融合赋能新时代人才培养[J].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26,42(4):66-70.

[6]成珏飞.基于“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智慧高效课堂构建[J].科技风,2026(1):105-108.

[7]谢幼如,李草茵,李成军,等.智能时代高校数字课程:内涵、形态与构建[J].电化教育研究,2024,45(11).

[8]吴硕,杨成,董校,等.分析化学智慧课程建设与精准教学探索[J].大学化学,2025,40(11):76-82.

[9]王彬,陈志杰,张荣,等.食品专业群适应食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动态调整策略探究[J].食品工业,2025(10).

[10]谢玉花,商飞飞,韩春阳,等.基于AI赋能的食品专业智慧课程升级改造路径探索[J].食品工业,2026(3).

[11]徐国艳,杨世春,张永飞,等.“产教—科教”双融驱动的新工科“AI+”课程体系构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6(2):37-43.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of a Smart Food Chemistry Course Driven by Dual Integration

SONG Yanxian, WANG Limin, YANG Hongyan, ZHANG Xiaomei, LIU Congjun

(School of Food and Health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of science-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address such problems in Food Chemistry teaching as outdated course content, insufficient practical training and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mart curriculum system for Food Chemistry driven by dual integration and its full-process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supported by smart education technologies. It defines curriculum orientation, develops a cont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core theories, cutting-edge research frontiers and industrial practice, builds tiered digit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es a diversified assessment-evaluation mechanism as well as a dual-integration-oriented teaching team. Thus an integrated whole-process teaching model covering pre-class, in-class and after-class stages is formed.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connect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application,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research literacy and practical competenc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basic courses of food-related majors.

Keywords: science-education integr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ood chemistry; smart cours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上接第 63 页)

- [14] 解启扬. 再论胡适的墨学研究: 以近代墨学研究史为视角[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6(4).
- [15] 安妮(Annick Gijssbers). 捍卫墨子: 论侯外庐对郭沫若墨子明鬼主张之驳议[J]. 学术月刊, 2014(4): 149.
- [16] 郭沫若. 十批判书[M]. 上海: 群益出版社, 1947: 105.
- [17] 解启扬. 郭沫若的墨学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 575.
- [18] 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56-473.

- [19] 李宝红, 康庆. 二十世纪中国庄学[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296-297.
- [20] 罗岗. 五四: 不断重临的起点: 重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3-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Intellectual-Historical Themes in Li Zehou's "Three Treatise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HAN Botao

(School of Marxism,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6, China)

Abstract: Them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re also issues of their times. During the three-year transitional hovering period, *Treatise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im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laws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In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Fever", *Treatise on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centered on "Chinese wisdom", conveys affectionate reflections on traditions. In 1986, ten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eatise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dual variation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Li Zehou's passing marks "the end of an intellectual-historical era". His "Three Treatise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rank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academic legacies of 1980s China.

Keywords: Li Zehou; three treatise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Marxism; Chinese wisdom; new enlightenment

聚乳酸增韧及其性能研究

张玲丽, 贾晨辉, 常英杰, 刘志豪, 黄星雨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聚乳酸(PLA)作为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绿色高分子材料,因质脆、抗冲击性差而限制其应用。本研究采用柠檬酸三丁酯(TBC)和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对PLA进行增韧改性。结果表明,PLA/TBC/TPU按照100/21/9的质量分配比时,复合材料的增韧效果最佳。该配方经熔融共混制备的样条冲击强度达 15.1 J/cm^2 ,为纯PLA的11倍;断裂伸长率达271.8%,较纯PLA提高了226倍;玻璃化转变温度(T_g)由 59.6°C 显著降至 33.3°C 。进一步研究发现,增韧PLA体系具有较好的成膜性。本研究表明,TBC与TPU的协同作用显著提升了PLA的韧性,有效克服了其脆性缺陷,为拓展PLA在高端包装材料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可行途径。

关键词:聚乳酸;增韧改性;聚氨酯弹性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19

中图分类号:TB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117-05

0 引言

聚乳酸(PLA)作为最具前景的生物基可降解聚酯材料^[1,2],因其原料可再生、低毒性、降解产物无害,作为全生命周期环境友好型聚合物被广泛应用于包装、医疗等领域^[3-5],同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6,7]。然而,PLA分子链的刚性结构导致其固有脆性(断裂伸长率 $<10\%$)、结晶速率慢、抗冲击性差及热稳定性低等性能方面的不足^[8-10],其中PLA增韧改性是实现其高端应用的主要方法之一^[11]。随着消费者对环保需求的增长,可降解材料在食品、医疗、日用品等领域市场潜力巨大。

现有PLA增韧改性方法主要包括:纤维增强,提升模量但牺牲断裂伸长率^[12];共聚改性,工艺复杂且成本高^[13];纳米复合,分散性难以控制^[14-16]。相较而言,熔融共混法因其操作简便、成本低廉成为工业首选^[17,18],其中增塑剂/弹性体协同改性被证实可突破单一改性瓶颈。柠檬酸三丁酯(TBC)作为

环保型增塑剂,能有效降低PLA链段运动能垒,其酯基与PLA的极性匹配性可显著改善界面相容性^[19];而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TPU)通过微相分离结构诱导能量耗散,可显著提升材料抗冲击性能^[20,21]。值得注意的是,Haihua等^[22]发现TPU可使PLA冲击强度提升300%,但过量添加会导致相分离加剧。目前,TBC与TPU的协同作用对PLA力学性能与结晶性能的影响尚缺乏系统性研究。

而本研究提出通过熔融共混法构建PLA/TBC/TPU三元体系,制备了一系列PLA增韧复合材料的力学测试样条与薄膜。通过评价材料的熔体流动性、热性能、力学性能、结晶性,优化PLA增韧体系的配比。本研究为PLA复合增韧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基础数据。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试剂

聚乳酸(PLA,TR);柠檬酸三丁酯(TBC);热塑

收稿日期:2025-09-15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研发项目“基于手性分离的聚酰胺膜材料制备与结构调控”(25B430033);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可生物降解抗菌膜制备及工艺优化”(202511067001);2025年度郑州市地方高校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面向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高分子材料专业实践教学探索”(ZZJG-A11027)

作者简介:张玲丽(1980—),女,博士,河南新乡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从事生物基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

性聚氨酯弹性体 (TPU, 1385A); 氯仿 (CHCl₃, 14602-86-9); 无水乙醇 (分析纯)。

1.2 实验仪器

FA2004 电子天平, DZF-6053 真空干燥箱, DF-1015 集热式磁力搅拌器, TY-7003 微量精密注塑机, NETZSCH 214 示差扫描量热仪, CMT5305 电子万能试验机, ZBC8400 摆锤式冲击试验机。

1.3 样品制备

1.3.1 PLA 拉伸样条的制备

将 PLA 放入真空干燥箱中, 在 60℃ 条件下烘干 4 h, 随后将 PLA、TBC 和 TPU 按照不同比例进行配制并混合均匀。以 PLA 为 100 份, 其他组分为相对于 PLA 的质量份数, 具体配方见表 1。使用微量精密注塑机来制作实验样条, 分别制作不同配方的拉伸样条与冲击样条。注塑机加工条件: 加料段、压缩段、计量段温度分别设置为 170℃、190℃、180℃。螺杆转速设置为 20 r/min, 模具温度为室温。

表 1 增韧 PLA 设计配方

配方	PLA/(wt%)	TBC/(wt%)	TPU/(wt%)
配方一	100	0	0
配方二	100	0	3
配方三	100	15	0
配方四	100	18	0
配方五	100	21	0
配方六	100	24	0
配方七	100	27	0
配方八	100	21	3
配方九	100	21	6
配方十	100	21	9
配方十一	100	21	12

1.3.2 增韧 PLA 薄膜的制备

以氯仿作为溶剂, 量取 20 mL 倒入烧瓶中, 计算溶剂质量后称取 1.48 g PLA, 配制成浓度为 0.05 g/mL 的 PLA 溶液。随后制备 TBC/TPU 共混增塑剂, 增塑剂浓度分别为 PLA 质量分数的 21% 与 9%。上述工作完成后, 将二者在烧瓶中混合, 置于磁力搅拌器中, 在室温条件下搅拌 6 h, 并滴入 1% 的无水乙醇作为稳定剂。搅拌完成后将混合溶液倒入培养皿或者光滑的容器中, 放入干燥器中在室温下干燥 12 h 后成膜。

1.4 表征与测试

熔融指数 (MFR) 测试: 依据熔体流速测试标准 (ASTM D1238-04) 进行测试, 测试温度设定为 190℃, 压力为 2.16 kPa。

机械性能测试: PLA 增韧改性样条力学性能参照 GB/T 1040-2006, 采用电子万能试验机进行测试。样条规格为标准哑铃状 4×10×150 mm, 拉伸速度设定为 5 mm/min, 标准距离为 10 mm。薄膜样品

力学性能参照 GB/T 1040.3-2006, 采用电子万能试验机进行测试。剪切 80×15 mm 薄膜样品, 拉伸速度设定为 5 mm/min, 标准距离为 20 mm。

简支梁缺口冲击性能测试: 采用摆锤式冲击试验机进行测试, 样品尺寸为 80×10×4 mm, 缺口深度为 2 mm, 缺口角度为 45°。

差示扫描量热 (DSC) 测试: 将 5 mg 样品封装在铝坩埚中, 置于样品池。程序设置为: N₂ 气氛, 变温速率 10 °C/min; 20℃ 加热至 190℃, 恒温 5 min; 再从 190℃ 降温至 20℃; 最后再将温度升至 190℃。DSC 测量样品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T_g)、熔融温度 (T_m) 和结晶温度 (T_c)。样品结晶度 (X_c) 可根据结晶过程的焓变进行计算, 具体公式如下^[23]:

$$X_c = \frac{\Delta H_m}{W_f \times \Delta H_m^0} \quad (1)$$

在 (1) 式中, ΔH_m 为加热时的熔融焓, ΔH_m^0 为 PLA 在 100% 结晶时的熔融焓, 数值为 93.7 J/g; W_f 为 PLA 组分在共混物中的质量分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PLA/TBC/TPU 复合材料的流动性能

高分子材料熔体流动性直接决定其成型加工方式与制品性能, 其中熔融指数 (MFR) 是表征其熔体流动性最直接的参数。本研究采用熔体流动速率测定仪来进行测定, 即材料的 MFR。不同配方的 PLA 材料 MFR 数据图如图 1。单纯采用 TBC 增韧 PLA 结果显示, MFR 随着 TBC 含量的逐渐增加而变大, 从纯 PLA 的 MFR 为 17.1 g/10 min, TBC 添加量为 27 份时, MFR 为 45.5 g/10 min。在纯 PLA 中添加 3 份 TPU, 复合材料的 MFR 为 19.2 g/10 min; TBC/TPU 复合增韧 PLA 结果显示, 在 PLA/TBC (100/21) 中添加 3 份 TPU, MFR 为 33 g/10 min, 添加 9 份 TPU, MFR 为 41.3 g/10 min; 添加 12 份 TPU, MFR 为 35 g/10 min。一般而言, 聚合物的 MFR 越小, 流动性越差, 熔体强度越高^[24,25]。TBC 作为小分子极性增塑剂, 与 PLA 相容性较好, 能够降低大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添加后流动性增加。PLA/TBC 复合改性材料的流动性能显著提升。此外, TBC 内的酯键与 PLA 的端羟基发生酯化反应, 进一步降低了共混改性材料的黏度, 复合材料的流动性提升明显。另一方面 TPU 对复合体系流动性影响不明显, 过量添加反而会使熔体流动性下降。

2.2 PLA/TBC/TPU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调控 PLA、TBC、TPU 配比制备测试样条, 测试了缺口冲击样条的冲击强度, 如图 2 所示。纯 PLA 冲击强度为 1.4 J/cm², 当 TBC 添加到 21 份时, 冲

击强度为 2.8 J/cm^2 ,随着 TBC 的添加量增加到 27 份,冲击强度降为 1.7 J/cm^2 ,此外,在纯 PLA 中添加 3%的 TPU,冲击强度为 1.6 J/cm^2 ,但是在 PLA/TBC(100/21)中添加 3 份 TPU,冲击强度可突变为 7.8 J/cm^2 ;当 TPU 加到 9 份时,冲击强度为 15.1 J/cm^2 ,是纯 PLA 的 11 倍。哑铃型样条的静态拉伸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3 所示,纯 PLA 拉伸强度很高,达到了 68.27 MPa ,断裂伸长率仅有 1.2% ,纯 PLA 硬且脆。图 4 显示,在 PLA 中单纯添加 TBC,断裂伸长率却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添加含量为 21%时,断裂伸长率达到最大值,最大值为 214.7% 。在 PLA 中单纯添加 3%的 TPU,其断裂伸长率为 2% ;然而在 PLA/TBC(100/21)体系中添加 3%的 TPU,其断裂伸长率为 99.9% ;三种组分配方为 100/21/9 时,断裂伸长率达到 271.8% 。图 5 显示,纯 PLA 拉伸强度为 68.3 MPa ,TBC 添加 21 份时,降低为 20.2 MPa ,在 PLA/TBC(100/21)中添加 9 份 TPU,拉伸强度可以维持在 24.5 MPa 。图 6 显示,纯 PLA 的杨氏模量为 4631 MPa ,PLA/TBC/TPU 为 100/21/9 时,杨氏模量为 840 MPa 。

由此可知,TBC 和 TPU 复合添加剂的合理配制,对于提升 PLA 的冲击强度和延伸性方面具有协调增效的作用。TBC 作为一种安全环保的生物基极性增塑剂,与 PLA 互溶性较好;一般来讲,极性增塑剂对极性聚合物的增塑机理为“屏蔽效应”,即增塑剂分子中的极性基团与聚合物的分子的极性基团相互吸引,取代了聚合物分子间的极性基团的相互作用

用,削弱聚合物分子之间的作用力。同时,TBC 还提升 TPU 与 PLA 之间的相容性,使得 PLA/TBC/TPU (100/21/9)复合材料的韧性增加,具有优异的柔软性、延伸性和熔体流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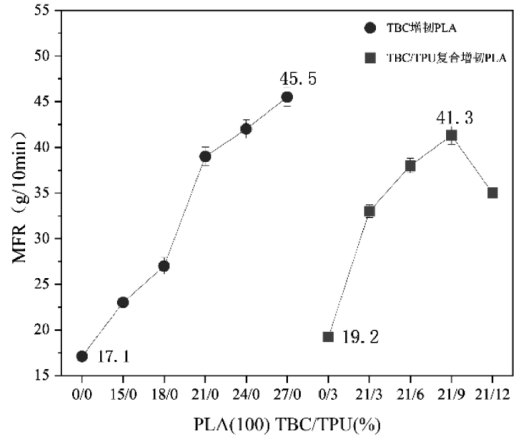


图 1 100 份 PLA 中添加不同份数 TBC 和 TPU 的材料熔融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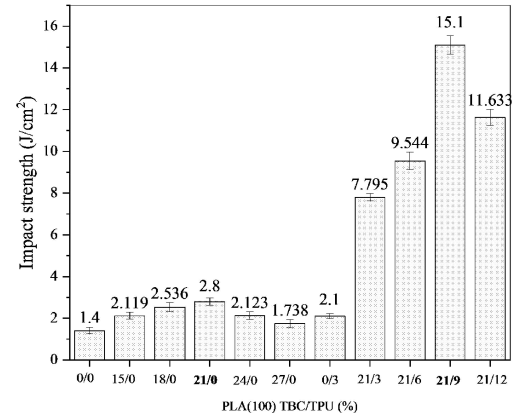


图 2 100 份 PLA 中添加不同质量份数 TBC/TPU 的材料冲击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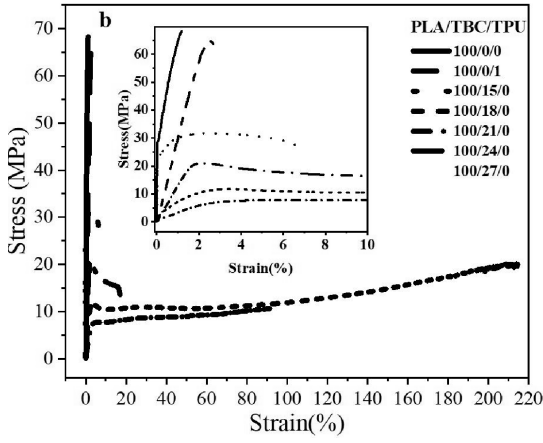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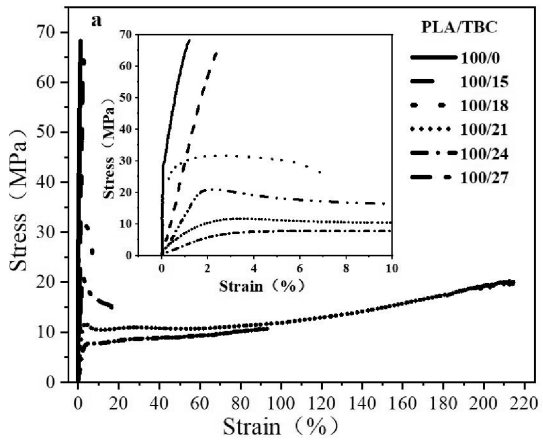


图 3 PLA 基复合材料应力-应变曲线;a:100 份 PLA 中添加不同质量份数的 TBC;b:100 份 PLA、21 份 TBC 中添加不同质量份数 TPU

2.3 PLA/TBC/TPU 共混材料的热性能

DSC 实验用于研究 PLA/TBC/TPU 共混材料的热学性能。图 7 给出了 PLA/TBC/TPU 共混材料的升温曲线。由图 7 可以看出,DSC 曲线主要显示出了三个主要的转变:玻璃化转变温度 (T_g)、冷结晶温度 (T_{cc})与熔融温度 (T_m)。并将通过 DSC 测试的

所有样品的热力学数据汇总至表 1 中,由这些数据对改性共混材料进行热力学分析。

由图 7 升温曲线与表 2 可知,纯 PLA 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59.6°C 、冷结晶温度为 122.7°C 、熔点为 155.7°C 。当加入 21%的 TBC 时,共混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到 29.45°C ,下降了 30.15°C ,这也

表明共混材料中 PLA 的链段运动能力提升。同时共混物的冷结晶峰朝着低温方向移动,由 122.7℃降低到 86.29℃,降低了 36.41℃,这表明 PLA/TBC/TPU 共混材料的结晶能力逐渐增强。随着 TPU 含量从 9 wt% 增加到 12 wt%,PLA/TBC/TPU 共混材料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为 29.74℃,温度变化幅度较小;冷结晶温度降低到 80.92℃,降低了 41.78℃;熔点由 155.7℃降低到 151.42℃,降低了 4.28℃,降低幅度较小,说明了共混物内部所形成的片晶厚度差别较小^[26]。纯 PLA 的 DSC 曲线中出现的双熔融峰转变为单熔融峰,温度降低了 5℃左右,结晶度增加了 9.2%。这也说明了 TBC,TPU 二者的使用均对 PLA 的结晶性能产生了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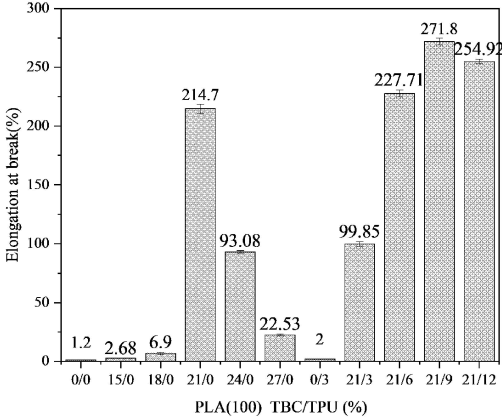


图 4 100 份 PLA 中添加不同质量份数 TBC/TPU 的材料
的断裂伸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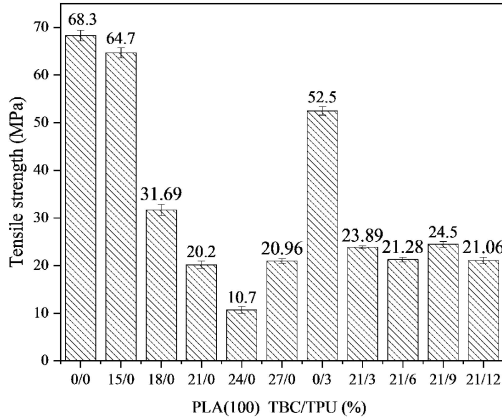


图 5 100 份 PLA 中添加不同质量份数 TBC/TPU
的材料拉伸强度

3.4 PLA/TBC/TPU 复合薄膜

用氯仿作为溶剂,以溶剂法制作 PLA 薄膜。所制备的薄膜利用游标卡尺对薄膜的厚度进行测量,经过反复测量后对薄膜的平均厚度做出计算,并汇总数据列于表 3 中。通过观察薄膜的形态发现,纯 PLA 薄膜的透明度极高,并且具有较高的规整度,表面光洁无杂质。尽管制备而成的纯 PLA 薄膜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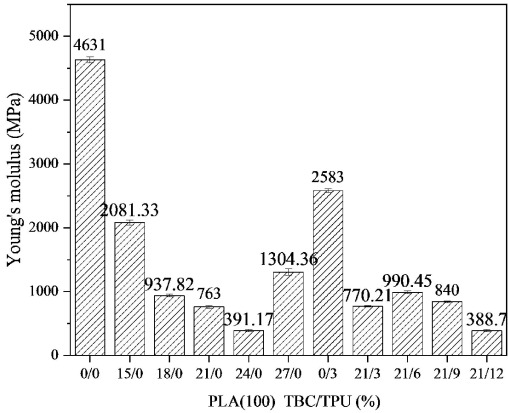


图 6 100 份 PLA 中添加不同质量份数 TBC/TPU 的材料杨氏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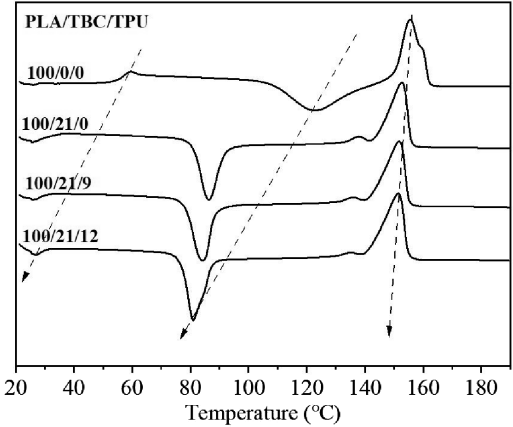


图 7 PLA/TBC/TPU 共混物的 DSC 升温曲线

表 2 PLA/TBC/TPU 共混物的 DSC 测试的特征参数

PLA/TBC/TPU/ (wt/%)	T _g / ℃	T _{cc} / ℃	ΔH _{cc} / (J/g)	T _m / ℃	ΔH _m / (J/g)	X _c / %
100/0/0	59.6	122.7	22.8	155.7/158.5	24.29	25.9%
100/21/0	29.5	86.3	20.0	152.5	24.5	31.6%
100/21/9	33.3	84.25	18.1	151.7	23.7	32.9%
100/21/12	29.7	80.92	20.1	151.4	24.7	35.1%

表 3 不同成分的薄膜厚度

薄膜成分	薄膜厚度/mm
纯 PLA 膜	0.06
PLA/TBC 复合膜	0.09
PLA/TBC/TPU 复合膜	0.10

较好的光泽,但本身脆性大的缺陷依旧存在,这也极大地限制了其在薄膜方面的应用场景;PLA/TBC 复合改性膜也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表面也非常光洁。但与纯 PLA 薄膜不同的是 TBC 增韧的膜柔软度较高,因此表面呈现出较多的褶皱,这不仅证明了 TBC 对 PLA 的增韧改性效果,也证明了制备改性薄膜的可行性;PLA/TBC/TPU 复合膜的透明度明显下降,一部分原因是 TPU 的掺入使得复合材料的结晶度提高而导致的透明度下降,另一部分原因是制作薄膜的过程中,部分 TPU 粉料未完全溶解,导致表面黏附了 TPU 粉料,由于 TPU 为白色粉状料,因此导致了膜透明度的下降。尽管膜的透明度有一定的下降,但

是 PLA/TBC/TPU 复合膜的成膜性良好,易于加工。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熔融共混法成功构建了 PLA/TBC/TPU 三元体系,结果表明 TBC 与 TPU 的协同作用显著提升了 PLA 的韧性和加工性能。当 TBC 含量为 21%、TPU 为 9%时,复合材料的冲击强度达到 15.046 J/cm²,断裂伸长率提高至 271.75%,这相比于只使用 21%TBC 增韧的 PLA 复合材料的断裂伸长率提升了 26.56%。而在热力学方面,将 T_g 降低至 29.45℃,促进了冷结晶行为且 MTR 提高了材料的延展性和流动性。通过溶剂法制备的 PLA/TBC/TPU 复合薄膜表现出良好的成膜性和柔韧性,但 TPU 的加入导致透明度下降。尽管薄膜厚度均匀,部分 TPU 未完全溶解以及结晶度的提高带来的影响表明加工工艺仍需优化,该研究为开发高韧性 PLA 薄膜提供了可量化的配方设计依据。

参考文献:

[1]陈学思,陈国强,陶友华,等. 生态环境高分子的研究进展[J]. 高分子学报, 2019, 50(10): 1068-1082.

[2]杨菊香,张雅欣,贾园,等. 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及其降解机理[J]. 塑料, 2021, 50(2): 108-113.

[3]林鸿裕,夏新曙,杨松伟,等. ADR4370F 对聚乳酸流变行为和力学性能的影响[J]. 中国塑料, 2017, 31(6): 54-58.

[4]宫贵贞,全梦玉,董黎明,等. PLA/MCC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J]. 合成树脂及塑料, 2020, 37(2): 9-12+40.

[5]魏泽昌,蔡晨阳,王兴,等. 生物可降解高分子增韧聚乳酸的研究进展[J]. 材料工程, 2019, 47(5): 34-42.

[6]Ali Z, Abdullah M, Yasin M T, et al. Organic waste-to-bioplastics: Conversion with eco-friendly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24, 244: 117949.

[7]Hasan M M F, Rossi L M, Debecker D P, et al. Can CO₂ and renewable carbon be primary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fuels and chemicals? [J].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2021, 9(37): 12427-12430.

[8]张小青,张腾,郑素枚. 柠檬酸三丁酯改性 WF/PLA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J]. 塑料, 2023, 52(5): 27-30+35.

[9]Zhao X, Pelfrey A, Pellicciotti A, et al. Synergistic effects of chain extenders and natural rubber on PLA thermal, rheological, mechanical and barrier properties[J]. Polymer, 2023, 269: 125712.

[10]Xu L, Chen Y, Xu C, et al. Polylactide Films with Superhydrophobicity and Superior Mechanical Properties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Annealing Stretching and Nonsolvent-Induced Phase Separation[J].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 2023, 11(25): 9498-9508.

[11]Shi X, Zhang G, Phuong T V, et al. Synergistic Effects of Nucleating Agents and Plasticizers on the Crystallization Behavior of Poly(lactic acid) [J]. Molecules, 2015, 20(1): 1579-1593.

[12]Li S, Yuan H, Yu T, et al. Flame-retardancy and anti-dripping effects of intumescent flame retardant incorporating montmorillonite on poly(lactic acid) [J]. Polymer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2009, 20(12): 1114-1120.

[13]Zeng C, Zhang N, Ren J.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bio-based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based on poly (L-lactic acid) copolymer polydiol [J].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2, 125(4): 2564-2576.

[14]Senatov F S, Niaza K V, Stepashkin A A, et al. Low-cycle fatigue behavior of 3d-printed PLA-based porous scaffolds [J]. Composites Part B: Engineering, 2016, 97: 193-200.

[15]张银芳. 聚乳酸/纳米二氧化钛复合物的制备及性能[D]. 北京:北京服装学院, 2015:8-10.

[16]杨雯迪,刘文毅,梁孝林,等. 聚乳酸/聚多巴胺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J]. 应用化工, 2019, 48(12): 2919-2923.

[17]Macrae R O, Pask C M, Burdsall L K, et al. The Combined Synthesis and Coloration of Poly(lactic acid) [J].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 in English), 2011, 50(1): 291-294.

[18]吴盾,李会丽,陆颖,等. 不同相对分子质量聚乙二醇增塑聚乳酸共混物的制备与性能[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17, 33(5): 164-169+177.

[19]江元平,张云秀,李嘉莉,等. 聚乳酸/柠檬酸三丁酯改性微晶纤维素的制备与性能[J]. 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21, 37(9): 133-140.

[20]宋小娜,管永,王玉,等. 生物基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的研究[J]. 化学推进剂与高分子材料, 2022, 20(4): 57-59.

[21]El-Nawasany L I, Nawasany A, Kadoum L A, et al. Amelio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magnetically sensitive TPU nanofibers-based food packaging film for long-life cheese preservation[J]. Food Bioscience, 2023(3): 1320-1331.

[22]Liu S, Chao B, Fu W, et al. Study on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orming and properties of Ni/PLA/TPU composite microwave absorbing material[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2023, 58(16): 6983-6997.

[23]贾世玲. 聚乳酸的增韧改性及其耐低温性能研究[D]. 长春:长春工业大学, 2022:24-26.

[24]王跃平,郭玉初,高凌雁,等. 双峰 PE100 级管材专用树脂的结构与性能[J]. 合成树脂及塑料, 2023, 40(5): 46-50.

[25]宋敏驹,何雪莲,刘柏平. 超声波与引发剂结合制备高熔体强度聚乙烯[J]. 合成树脂及塑料, 2016, 33(1): 32-36+52.

基于 STM32 控制的多能源管理系统设计

刘 帅¹, 潘靖博², 雷 钢¹, 黄传金¹, 王亚龙¹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郑州大学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 要:针对新能源供电系统中单一电源稳定性差、能量利用率低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 STM32 的多能源复合智能管理系统。系统以 STM32F103C8T6 单片机为控制核心,构建了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与超级电容的复合电源架构;硬件部分采用 TP4056 充电管理模块实现太阳能与外部电源的双路充电控制,并集成 JCQ-5 高精度电压传感器实时监测负载端电压;软件采用分级供电策略:当负载电压大于 3.7 V 时由锂电池单独供电,当负载电压突降至 3.7 V 以下时由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投入超级电容进行功率补偿;同时配备 LCD1602 显示模块与 ECB02 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实现充放电参数的本地显示与手机端远程同步。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能稳定实现多能源的智能切换与管理,供电可靠性高。结论认为,该系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STM32;多能源管理;复合电源;超级电容;无线通信;电压检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4.020

中图分类号:TP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4-0122-07

0 引言

随着全球能源危机不断加重,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成了各界关注的热点。太阳能因具有清洁、可反复利用、储量丰富的显著优点,在各种新能源技术中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它很容易受到天气变化、光照强弱这些自然因素的影响,其输出电压会有明显的波动性,而且还不能一直持续发电,所以只靠太阳能是很难保证持续稳定的电力供应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研究人员就开始尝试把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超级电容这些能存电的元件结合起来,构建一个能智能管理多种能源的系统,通过动态调整能源分配,来提高整个系统供电的可靠性和能源的利用效率^[1]。

传统的电源管理系统大多功能简单,也没有完善的智能调节方法,很难根据实际的用电需求和能源状态实时调整能源输出。这样做不仅会浪费能源,还会让系统的稳定性变得很差。在车载电源管

理这一领域,复合电源系统的出现,解决了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车辆续航不够这些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这种系统通过结合不同存电元件的优点,能够有效地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还能增加车辆的续航里程^[2]。在选择控制核心的时候,STM32 系列的单片机因为性能好、耗电少,还有丰富的外部接口这些特点,成了嵌入式控制领域里比较合适的选择;用 STM32 做的控制系统,能够实时收集各个能源模块的运行状态信息,还能通过优化控制方法,实现能源的智能分配和高效管理^[3]。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围绕嵌入式系统、新能源利用、电源控制和通信技术,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比如说,有相关研究显示,通过优化控制方法和电源管理策略,能够大大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响应速度^[4];在系统集成化这方面,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复合电源系统的集成化和小型化设计,还研发出了结构紧凑的复合电源模块^[5]。在国内,也有研

收稿日期:2026-05-25

基金项目:2026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转子轴心轨迹新模型及其特征提取方法研究”(26B460025)

作者简介:刘帅(1998—),男,河南省驻马店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视觉、目标检测。

究提出了新的高效能量管理方法,提高了电源系统的能效比^[6];针对安全性能,研究人员通过改进控制逻辑、增加故障诊断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7];在硬件设计这一块,系统在轻量化、小型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8]。虽然国内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现在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系统的成本优化做得不够好、标准化程度不高、在实际使用中的匹配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等^[9]。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STM32 控制的多能源管理系统。该系统用STM32F103 作为核心控制器,结合了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等多种能源,电压检测模块会实时监测负载端的电压变化,系统会根据这个变化随时切换供电模式,这样就能保证系统在不同工作状态下都能稳定运行。另外,这个系统既能用太阳能充电,也能通过外部电源补充电能;同时它还会借助蓝牙模块,把运行数据同步到手机上,方便用户远程查看系统的状态。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改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采用超级电容和锂电池一起供电的方案,利用超级电容反应快的特点,弥补了锂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的不足;二是实现了供电模式的平稳切换,能保证负载电压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三是加入了蓝牙无线通信功能,能把系统的状态实时同步到手机上,提高了系统的智能程度和用户的使用体验。

1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

1.1 方案设计

本系统要实现多能源输入管理、供电模式动态切换、充电状态监测与显示、无线数据同步四项功能。系统的硬件架构包含太阳能电池板及充电模块、锂电池及超级电容储能模块、电压检测模块、显示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和继电器控制模块,各模块外接于STM32 单片机主控芯片。系统通过电压检测模块实时采集负载端电压,STM32 根据电压值与设定阈值的比较结果控制继电器模块,实现锂电池单独供电或锂电池与超级电容共同供电两种模式的切换。同时,系统检测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当电压达到充电阈值时启动充电模块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并在LCD 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充电时间和充电状态。此外,系统通过蓝牙模块将充电数据同步至手机端,为用户提供远程监控功能。系统总体结构框图如图1 所示。

系统的工作流程包含两种供电模式和两种充电方式。供电模式方面,当负载电压大于3.7V 时,系统判断锂电池电量充足,由锂电池单独为负载供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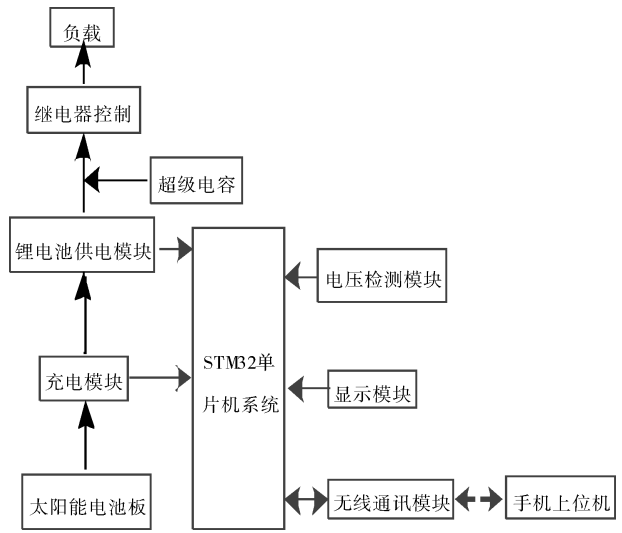


图1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当负载电压低于3.7V 时,系统判断锂电池输出电压下降,此时控制继电器将超级电容切入电路,由超级电容与锂电池共同供电,利用超级电容快速放电的特性补偿电压跌落,保证负载电压稳定。充电方式方面:当光照强度充足时,太阳能电池板将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TP4056 充电模块为锂电池充电;当光照不足或需要快速充电时,可通过MicroUSB 接口连接外部5V 电源为锂电池充电。系统支持两种充电方式的自动识别与切换。

2 系统硬件设计

2.1 主控电路设计

系统选用STM32F103C8T6 作为主控芯片。该芯片基于ARM Cortex-M3 内核,工作频率最高可达72MHz,内置64KB Flash 和20KB SRAM,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包括USART、I²C、SPI、ADC 等,能够满足多能源管理系统的控制需求。芯片内部架构由Cortex-M3 内核与片上外设构成,二者通过AHB、APB 总线实现数据交互。系统中各模块与单片机间的数据传输依托DMA 通道,可实现数据的高速、无CPU 干预传输,提升运行效率。STM32 集成外设模块,其中RTC 模块搭配32.768kHz 晶振可实现定时功能,系统无需额外配置时钟芯片,简化了硬件设计。此外,芯片集成ADC 模块用于电压信号的模数转换,USART 模块用于与蓝牙模块的串口通信。主控电路主要包括电源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和程序下载接口。电源电路采用3.3V 稳压供电,晶振电路采用8MHz 和32.768kHz 晶振分别作为系统主时钟和RTC 时钟,复位电路采用按键复位方式,程序下载接口采用SWD 模式,便于调试和程序烧写。系统的硬件连接如图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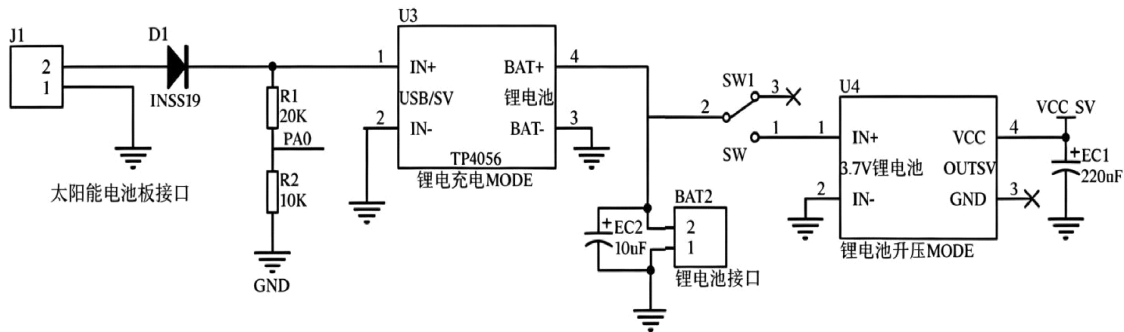


图2 系统关键硬件连接图

2.2 太阳能电池管理模块设计

太阳能电池管理模块负责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电能转换为适合锂电池充电的电压。本系统选用 9V 太阳能电池板作为能源输入,通过 TP4056 充电模块对 3.7V 锂电池进行充电。TP4056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器,其充电电流可通过外部电阻设置,最高可达 1A。模块内置防反接、过压保护等功能,充电过程中,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正在充电,绿色指示灯点亮表示充电完成^[10]。

在电路设计方面,太阳能电池板接口通过 J1 模块实现正极和负极连接,正极通过 D1 二极管连接到 TP4056 充电模块的 IN+ 引脚,完成供电电压的输入功能。通过 R1 和 R2 电阻进行分压,将太阳能电池板的供电电压分压后输入 STM32F103 的 PA0 引脚,当检测到该引脚电压高于设定阈值时,判断处于正常的充电状态,进行充电时间的统计。TP4056 的输出部分 BAT+、BAT- 分别连接锂电池的正负极,在两个引脚之间连接滤波电容,用于稳定电压、储存电荷和提高电路效率。该模块的电路设计如图 2 所示。

2.3 锂电池升压模块设计

锂电池的额定电压为 3.7V,而系统部分模块(如 LCD1602)需要 5V 供电。因此,需要设计升压电路将锂电池电压提升至 5V。本系统选用基于 Boost 拓扑的升压模块,将 3.7V 输入转换为稳定的 5V 输出。升压模块的输入端连接锂电池正负极,输出端为系统提供 VCC_5V 电源,同时在输入和输出端并联滤波电容,以减小输出电压纹波,提高供电质量。升压模块采用专用升压芯片,具有效率高、纹波小、输出稳定等特点,能够满足系统各模块的供电需求。该模块的电路设计如图 2 所示。

2.4 电压检测模块设计

电压检测模块是实现供电模式动态切换的关键。系统选用 JCQ-5 电压检测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测量范围宽、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等优点。JCQ-5 的额定电压范围可达 500V,能够满足不同电压等级

的检测需求,同时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和良好的运行稳定性^[11]。在电路设计中,JCQ-5 电压检测模块的电源引脚 VCC 与 GND,需对应连接至 STM32F103 单片机的相应电源引脚,以此为电压检测模块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支持,保障其检测功能正常发挥。传感器的输出引脚则接入 STM32 的 ADC 引脚,这样单片机就能实时采集负载电压的数值。系统设定了一个参考阈值(3.7V),单片机根据采集到的电压与阈值的比较结果来判断当前供电模式。当检测到负载电压低于预设的 3.7V 阈值时,单片机立即执行控制指令,驱动继电器闭合,将超级电容切入供电回路,与锂电池协同为负载供电,从而有效抑制电压跌落风险。电压检测模块的具体电路连接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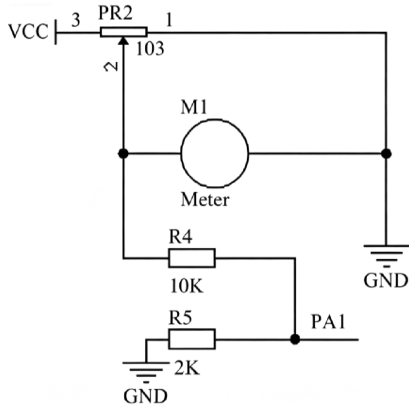


图3 电压检测模块

2.5 显示模块设计

显示模块用于在本地实时展示系统的充电时间、工作状态等信息。本系统选用 LCD1602 字符型液晶显示屏,这款屏幕刷新率高、响应快、视角广,并且对比度和亮度都可以调节,可靠性和耐用性都比较好,能够适应车辆环境下的长期使用^[12]。LCD1602 与 STM32F103 单片机通过并行接口连接:供电部分接入+5V 稳压电源;控制端连接单片机 GPIO,用于接收使能、读写及寄存器选择信号;数据端采用 8 位并行传输模式。此外,LCD1602 的 AO 引脚通过电位器

连接到电源,实现了亮度的手动调整功能。

2.6 无线通讯模块设计

为实现系统状态与手机端的无线同步,本系统选用 ECB02 无线通讯模块。ECB02 基于蓝牙 5.2 协议,支持低功耗模式,具有传输距离远、连接稳定、可编程性和扩展性强等优点^[13]。该模块通过串口(TXD、RXD)与 STM32 单片机进行通信,单片机将充电时间和充电状态数据通过串口发送至 ECB02 模块,模块再将数据无线传输至手机端。用户可通过手机端 APP 实时查看系统运行状态。在电路设计方面,ECB02 的电源引脚 VCC、GND 与 STM32 的对应电源引脚相连,串口通信引脚 RXD、TXD 分别与 STM32 的串口引脚 TXD1、RXD1 相接,构成数据传输通道。

2.7 继电器模块选型

继电器模块用于控制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供电通路。系统选用 SRD-05VDC-SL-C 继电器,该继电器工作电压为 5V,触点负载能力为 10A/250VAC,具有快速响应和精确控制的特点,非常适合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源管理系统。继电器控制引脚与 STM32 的 GPIO 引脚相连,单片机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从而实现供电模式的切换。当负载电压大于 3.7V 时,单片机控制锂电池供电继电器闭合,超级电容继电器断开;当负载电压低于 3.7V 时,单片机同时闭合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供电继电器,使两者共同为负载供电。

2.8 超级电容选型

超级电容,也叫电化学电容器或者双电层电容器,它的性能介于传统电容和充电电池之间,是一种比较新的储能器件;它存电的原理主要是依靠电极材料和电解液接触时形成的双电层效应,还有一部分材料产生的法拉第准电容效应。充电的时候,电解液里的离子会被吸附到电极材料的表面,形成双电层来储存电荷;放电的时候,这些离子会从电极表面脱离,回到电解液里,这样就能释放电能。依靠这种机制,超级电容可以实现快速充放电,一般几秒到几分钟就能充满电,放电的反应速度能达到毫秒级别;而且它还具有功率密度高、循环寿命长的特点,适合用在需要瞬间输出大功率的地方。

在本系统中,选用的是 MAX17701 型的超级电容模块;这种芯片支持 9V 到 60V 的宽范围输入电压,能够适应不同的供电环境;在充电方面,它能提供最大 20A 的恒流充电电流,还能输出稳定的 5V 电压。另外,这种器件还具有输入短路保护、安全定时器和输出过压保护等功能,能够满足系统对安全

性和可靠性的基本要求。在实际工作的时候,超级电容和锂电池是配合使用的;一旦负载电压出现下降,超级电容就会快速放电,补偿电压的下降,这样就能维持供电的稳定性。

3 系统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采用 C 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开发环境为 Keil uVision5。软件设计遵循模块化思想,主要包括主程序、太阳能充电程序和蓝牙通信程序三个模块。

3.1 主程序设计

主程序完成各功能模块的初始化后,进入主循环。初始化包括时钟配置、GPIO 引脚配置、ADC 初始化、LCD 初始化、串口初始化等。在主循环中,程序首先通过电压检测模块采集负载电压,并与设定阈值 3.7V 进行比较。若负载电压大于 3.7V,则控制锂电池供电继电器闭合、超级电容继电器断开,由锂电池单独供电;若负载电压小于 3.7V,则同时闭合锂电池和超级电容的供电继电器,由两者共同供电。同时,程序通过 ADC 采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若电压高于 3.3V,则启动充电计时,并在 LCD 上显示充电状态。在蓝牙连接状态下,系统每秒钟通过串口向蓝牙模块发送充电时间和充电状态数据,实现数据同步。主程序流程图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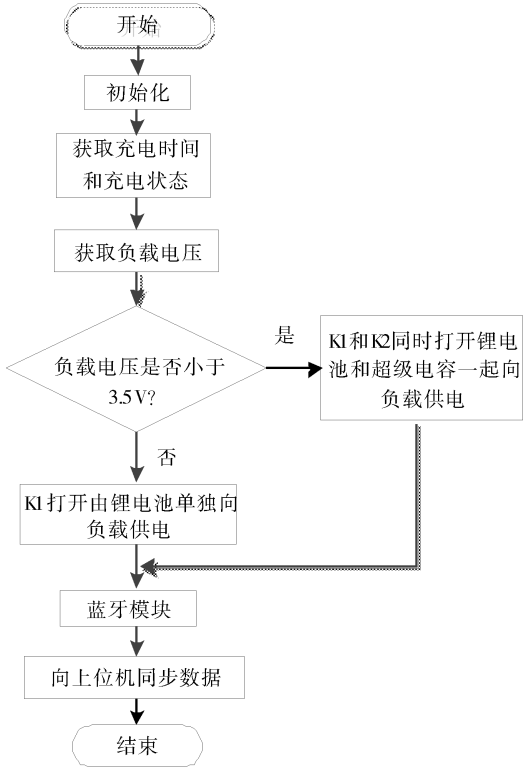


图 4 系统主程序流程图

3.2 太阳能充电程序设计

太阳能充电程序负责检测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并在条件满足时启动充电过程。程序首先对

ADC 模块进行初始化,然后循环读取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当电压达到 3.3V 时,系统判定具备充电条件,启动 TP4056 充电模块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充电过程中,系统对充电时间进行累加计时,并在 LCD 上实时显示。若电压低于 3.3V,则停止充电计时,并显示“未充电”状态。当锂电池电压达到充满阈值(4.2V)时,充电模块自动停止充电,防止过充。太阳能充电程序流程图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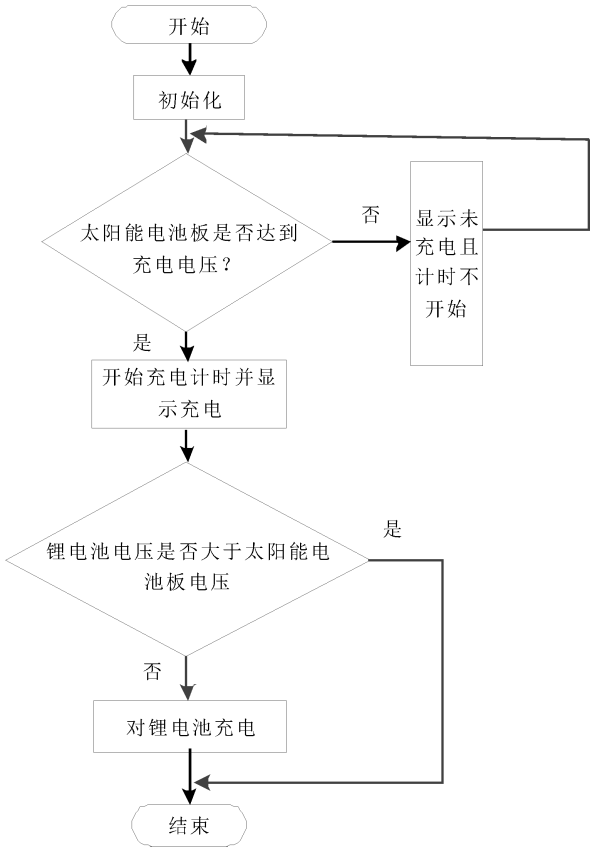


图 5 太阳能充电设计流程图

3.3 蓝牙模块程序设计

蓝牙模块程序负责实现 STM32 与手机端的数据通信。程序先对串口进行初始化,配置波特率为 960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位,使其与 ECB02 模块匹配。然后通过 AT 指令对蓝牙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设备名称、连接模式等。在主循环中,程序检测蓝牙连接状态,若已连接,则按照预定格式将充电时间和充电状态数据通过串口发送至蓝牙模块;若未连接,则仅在 LCD 上进行显示。数据发送频率设定为每秒钟一次,以保证手机端数据的实时性。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系统的功能完整性和运行稳定性,搭建了完整的实验测试平台。测试平台主要包括:STM32F103 核心板、9V 太阳能电池板、TP4056 充电模块、3.7V/1200mAh 锂电池、超级电容、LCD1602

显示屏、ECB02 蓝牙模块、JCQ-5 电压检测传感器、SRD-05VDC-SL-C 继电器以及可调负载电阻。测试过程中,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通过手机端 APP 接收蓝牙数据,并观察 LCD 显示内容。

4.1 太阳能充电功能测试

太阳能充电功能测试的主要目的是验证系统能够通过太阳能电池板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将太阳能电池板置于光照强度较强的环境下,测量其输出电压。测试结果表明,在光照充足条件下,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为 1.61V,此时 TP4056 充电模块红色指示灯点亮,表示正在充电。LCD1602 第一行显示累计充电时间(时:分:秒/0.1 秒),第二行显示“now: Charging”。随着光照强度变化,充电电压相应变化,当电压低于 3.3V 时,系统自动停止充电计时。经测试,在 1.61V 充电电压下,锂电池完全充满约需 5 小时。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表明系统能够正确识别太阳能充电状态,并进行计时和显示。

光照条件	太阳能板输出电压	充电状态	LCD 显示
强光照	1.61	正在充电	Charging
弱光照	0.85	停止充电	Not Charging
无光照	0.12	停止充电	Not Charging

4.2 外部电源充电功能测试

外部电源充电功能测试验证系统在光照不足时通过外接电源实现锂电池充电的能力。通过 MicroUSB 接口连接 5V/1A 外部电源至 TP4056 模块,模块红色指示灯点亮,系统进入充电状态。LCD 显示充电时间累计,第二行显示“now: Charging”。测量充电电压,充电 4 分钟后电压为 4.1V,随着充电时间增加,电压逐渐上升,约 3 小时后达到 5V,此时充电模块指示灯变为绿色,表示充电完成。测试结果表明,系统支持外部电源充电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4.3 供电模式切换功能测试

供电模式切换功能测试是验证系统核心性能的关键实验。系统上电后,初始状态由锂电池单独供电,测量负载电压为 3.7V。通过逐渐增加负载电流,使负载电压逐渐下降。当负载电压降至 3.6V (低于 3.7V 阈值)时,继电器动作,超级电容切入电路,与锂电池共同供电。此时测量负载电压回升至 3.7V,电压波动范围在±0.1V 以内。当负载减小时,负载电压回升至 3.7V 以上,继电器断开超级电容通路,恢复锂电池单独供电。反复测试 10 次,供电模式切换成功率 100%,切换过程中负载电压波动不超过±0.15V。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表明系统能够根据负载电压动态切换供电模式,有效保证了

负载电压的稳定性。

表 2 供电模式切换测试结果

测试序号	切换前电压/V	切换阈值/V	切换后电压	切换状态
1	3.71	3.70	3.69	正常
2	3.68	3.70	3.71	正常
3	3.72	3.70	3.70	正常
4	3.67	3.70	3.72	正常
5	3.70	3.70	3.70	正常

4.4 无线数据同步功能测试

无线数据同步功能的测试,主要是验证系统通过蓝牙模块和手机端实现数据同步的能力;在手机上打开蓝牙,和 ECB02 模块配对成功之后,再打开专用的 APP,系统每一秒都会向手机发送一次数据,APP 上会实时显示累计的充电时间和充电状态,比如“充电中…”或者“不在充电”。在测试的时候,系统连续运行了 2 小时,数据同步很稳定,没有出现丢包的情况,手机上显示的数据和 LCD 上显示的内容完全一样;测试的结果显示,无线数据同步功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设计的要求。

4.5 系统整体性能评估

综合上面的功能测试和性能验证结果可以看出,本系统设计的太阳能-锂电池-超级电容多能源管理架构运行很稳定,各项指标都达到了设计要求,能够满足新能源复合电源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可靠供电需求。和现有的研究相比,这个系统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系统切换供电模式的反应很快,电压检测和继电器驱动配合得很默契,从发现负载电压下降到超级电容投入补偿,整个反应时间不到 50ms,能够快速解决大电流负载带来的电压突然下降的问题,最大程度上保持负载端的供电电压平稳,还能有效避免因为电压波动导致的设备异常停机,大大提高供电的连续性;第二,采用了太阳能和外部电源两种模式互相补充充电的设计,光照充足的时候,就依靠太阳能实现绿色、零成本的自主充电;光照不够或者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外部 5V 电源快速补充电能,这两种充电方式能自动识别、无缝切换,大大提高了系统在室内外、阴晴天气等不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彻底解决了单一充电源受环境限制的问题;第三,集成了蓝牙无线通信模块,实现了运行数据的远程同步,能把充电时长、供电状态、充放电模式等关键参数实时上传到手机上,再配合本地的 LCD 显示,形成“本地监测+远程管控”的双重交互模式,简化了现场调试和状态查看的流程,明显提高了系统的智能水平和使用的便捷性。系统在连续运行 72 小时的稳定性测试中,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这说明系统具有很好的可靠性。

5 结论

本文针对传统电源管理系统能源利用效率低、供电稳定性差的问题,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基于 STM32 控制的多能源管理系统。系统以 STM32F103 单片机为核心,集成了太阳能电池板、锂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能源单元,通过电压检测模块实时监测负载电压,动态切换供电模式,有效提高了供电稳定性。系统支持太阳能充电和外部电源充电两种方式,并通过蓝牙模块实现与手机端的数据同步,便于用户远程监控。经实验测试,太阳能充电功能、外部电源充电功能、供电模式动态切换功能及无线数据同步功能均满足设计要求,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本系统在以下方面仍需进一步优化:一是可引入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充电效率;二是可增加电池电量监测功能,实现更精准的能源管理;三是可扩展 Wi-Fi 通信方式,实现更远距离的远程监控。后续研究将围绕上述方向展开,进一步提升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王春伟. 光伏-储能一体化在停车场中的应用[J].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2023,22(S1):52-55.

[2]付王强. 新能源汽车技术应用研究[J]. 汽车测试报告, 2025(16):40-42.

[3]向敏,朱智勤,唐晓铭,等. 单片机原理与工程应用[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1.

[4]Meng H, Liu Y, Cui X, et al.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 in modern communication system [J]. Applied Science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2024, 8 (1):39-47.

[5]耿志平. 计及电动汽车储电的建筑空调需求调控优化研究[D]. 北京建筑大学,2023:32-44.

[6]Balamurali R, Wenceslas S C A, Isidore K N, et al. Dynamical probing of piecewise nonlinear resistor-capacitor inductor shunted Josephson junction circuit embedded in micro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J]. Physics Letters A, 2024, 502: 129396.

[7]梁伟雄. 学生公寓智能热水系统设计和实现[J].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1, 23(2): 45-51.

[8]王亚利. 基于可持续理念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计研究[D]. 济南: 山东建筑大学, 2023:60-65.

[9]邓亮. 基于以太网的车用太阳能电池控制器研发[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3:11-17.

[10]郑伟. 基于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的电动汽车充电桩[J]. 时代汽车,2023(8):107-109.

[11]孙闻远. 计及电动汽车的光伏发电系统碳减排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3:47-60.

Design of Multi-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STM32 Control

LIU Shuai¹, PAN JingBo²,LEI Gang¹, HUANG Chuanjin¹, WANG Yalong¹

(1.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3, 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oor stability and low energy-use efficiency of single power sources in new-energy power-supply systems, this paper designs an intelligent multi-energy hybrid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STM32. With STM32F103C8T6 microcontroller as the control core, the system builds a hybrid power architecture composed of solar panels, lithium batteries and supercapacitors. On the hardware side, the TP4056 charging management module is adopted to realize dual-channel charging control for solar energy and external power supply, and the JCQ-5 high-precision voltage sensor is integrated to monitor load-terminal voltage in real time. The software implements a hierarchical power-supply strategy. When the load voltage is higher than 3.7 V, the lithium battery supplies power independently. When the load voltage drops below 3.7 V, the microcontroller controls the relay to switch on the supercapacitor for power compensation. Equipped with an LCD1602 display module and an ECB02 Bluetooth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the system realizes local display of charging-discharging parameters and remote synchronization on mobile terminals.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system can perform stable intelligent switching and management of multiple energy sources with high power-supply reliability. It possesses promising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words:STM32; multi-energy Management; composite power supply; supercapacit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voltage detection

(上接第 121 页)

35 (8): 78-83.

[26]李丽,王琪,刘正英.聚乳酸/聚己内酯共混物的结晶行为与力学性能[J].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2019,

(责任编辑李玉玲)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oughened PLA

ZHANG Lingli, JIA Chenhui, CHANG Yingjie, LIU Zhihao, HUANG Xingyu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Polylactic acid (PLA), as a biodegradable green polymer material, is limited in its application due to its brittleness and poor impact resistance. In this study, citric acid tributyl ester (TBC) and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 elastomer (TPU) were used to toughen PLA.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PLA/TBC/TPU is blended in a mass ratio of 100/21/9, the composite exhibits the best toughening effect. The tensile bars prepared by melt blending with this formulation achieved an impact strength of 15.1 J/cm², 11 times that of pure PLA, the elongation at break reached 271.8%, 226 times higher than that of pure PLA. The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T_g) decreased from 59.6°C to 33.3°C. Furthe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toughened PLA system has good film-forming propertie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BC and TPU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oughness of PLA, effectively overcoming its brittleness and providing a feasible approach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PLA in high-end packaging materials.

Keywords:Polylactic acid; toughening modification; polyurethane elastomer